1934: 沉寂之年

图片20世纪中国编年丛书

⊙主编　李继锋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丛书策划／汪稼明
李继锋
责任编辑／汪稼明
曹凌志
装帧设计／王　芳
蔡立国

1934年，一个很不起眼的年份，除了红军长征始于此年，算是一件能引人注目的大事件外，这一年有点平淡。说实在话，1934年降临时，当时人就很不看好。

1934年的中国度过了虚弱而稍显宁静的三百六十五天，这是一个没有风云人物的年头，缺乏激情，没有新思潮的喷涌，连一向喧嚣的战争都那么单调、沉闷。为什么如此？这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对以后的年代又有什么影响？谁成了本年度的赢家？想来颇值得回味。

1934年能够显得较宁静，日本的动向是关键性的因素。出乎国人的预料，日本人暂时停止了侵华的步伐。不是日本军阀良心发现，也不是《塘沽协定》有神奇的约束效力，而是"九一八"以后，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利品太多，东北三省加上热河，这个小个子巨人尽管贪得无厌，也不能不先消化一下过多的食物。于是，国人因日本入侵而一直紧绷了许久的神经，稍稍松弛下来了，就像大潮过后，沙滩上留下一片空寂。

精明的蒋介石却没有放过日本休战的难得时机，这使他成了1934年的赢家。自1932年复出后，他认真汲取了教训，不再像以前那样张狂。1934年，他成了"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改善自己一介武夫的公共形象。同时，他悄悄地加强了特务组织，利用庐山军官训练团加强军官阶层对自己的忠诚。更重要的，他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并摧毁了长江流域的苏维埃政权，显示了自己对国民党与南京政府的价值……





ISBN 7-80603-732-2
定价：30.00元

1934：沉寂之年

主编　李继锋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34：沉寂之年/李继锋主编．—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4
(图片20世纪中国编年丛书)
ISBN 7-80603-732-2

Ⅰ.1… Ⅱ.李… Ⅲ.中国-现代史-1934-史料
Ⅳ.K26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2751号

责任编辑 汪稼明 曹凌志
装帧设计 王芳 蔡立国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电话 总编室(0531)2060055-5420
市场部(0531)2053182(传真) 2906847
网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格 185×230毫米
16.125印张 170幅图 150千字
版次 2003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定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目　录

【这一年】

谁是赢家

⊙李继锋

1934年，一个很不起眼的年份，除了红军长征始于此年，算是一件能引人注目的大事件外，这一年有点平淡。说实在话，1934年降临时，当时人们就很不看好。

林铎夫：今年会发生以下几件怪事：1. 小饭馆里，除莫谈国事外，加贴"说话各自小心"；2. 各大都市男澡堂中有了女子搓澡；3. 平沈有了"国际通车"；4. 鸦片公卖公买，公卖所大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5. 中学生依然作着这样的好文章："内有军阀武人之专横，外有帝国主义之压迫，生灵涂炭，民不聊生"；6. 某处某某(或机关或人)通电全国父老，声讨某某等。

周宪文：1934年的中国至少恐有八个有名有实，即所谓"名副其实"的国家出现(形同割据者尚不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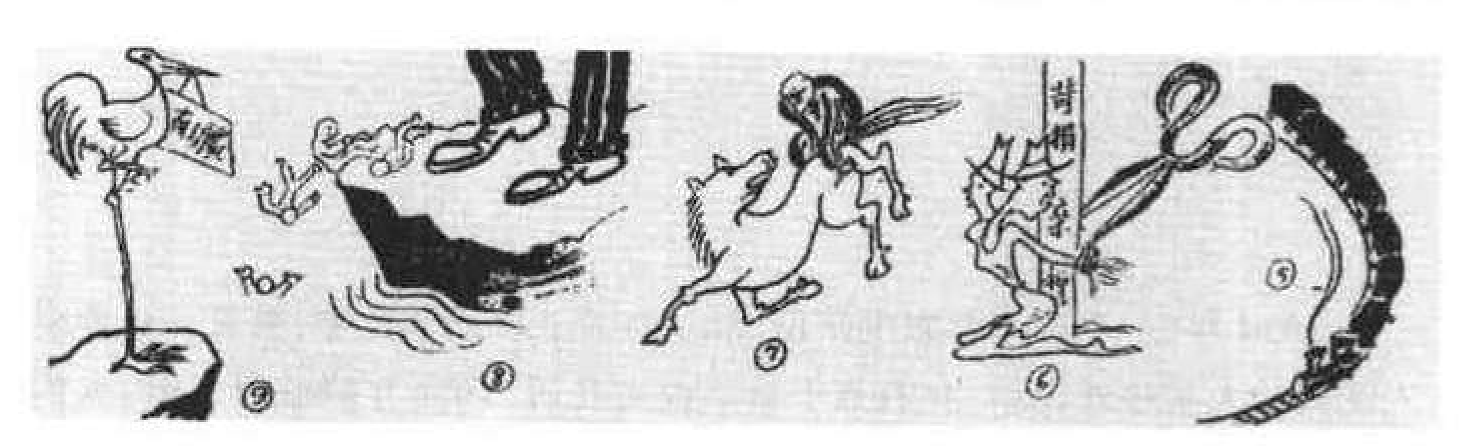
陈健夫：内蒙古和西藏将在本年不再为中国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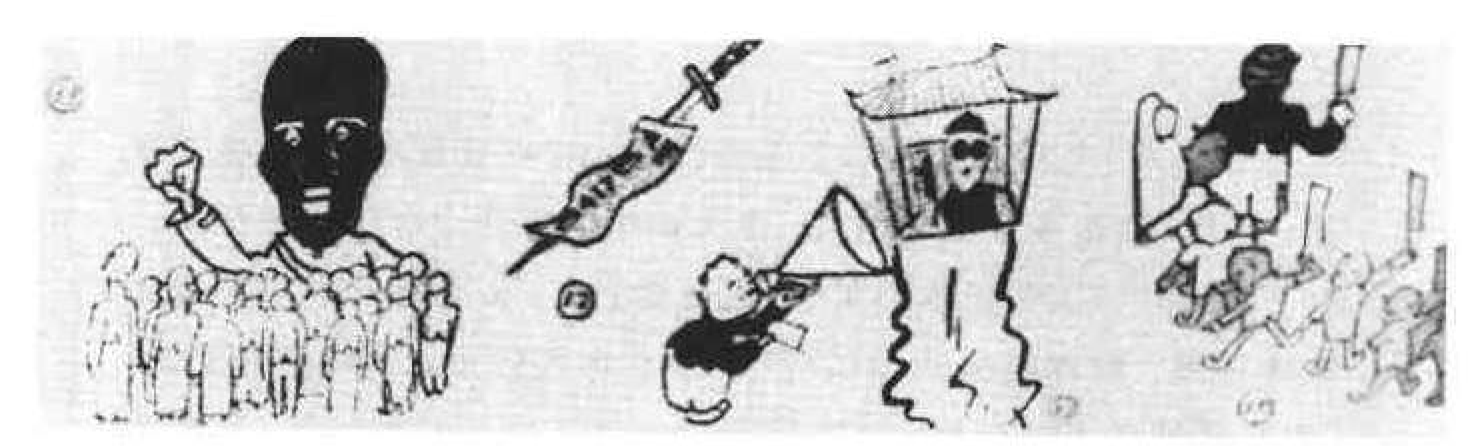
张一凡：1934年将在恐怖中开展，"无疑的，1933年的恐怖和恐慌把维持世界暂时和平的一线希望也都残酷地割断了。欧洲已恢复到1914年的时代，远东是已到了总算账的时期，列强间政治经济的矛盾和冲突，像充满了恶脓毒血的痛，已到了非开刀不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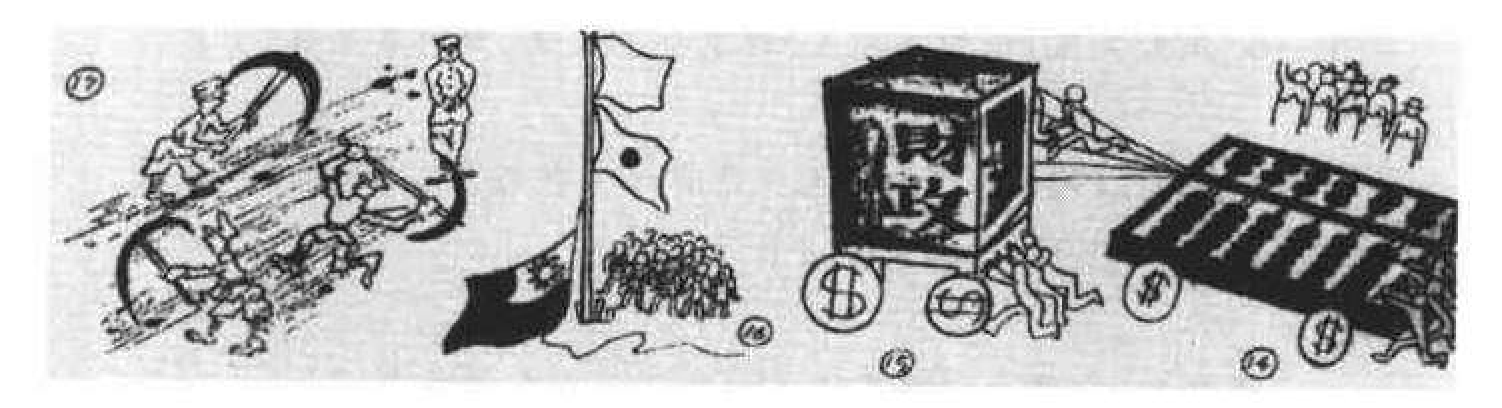
1934年大事漫画(一)

1. 国民党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2. 蒙汉联欢。
3. 中央军占领福州。
4. 十三世达赖在藏逝世。
5. 杭江铁路全线通车。
6. 苛捐杂税废除。
7. 孙殿英进军宁夏受挫。
8. 华侨受排斥。
9. 南疆"独立"。
10. 新生活运动。
11. 溥仪"称帝"。
12. 日本发表《天羽声明》。
13. 南昌举行各省长官会议。
14. 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5. 全国财政会议。
16. 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
17. 西北实行兵工筑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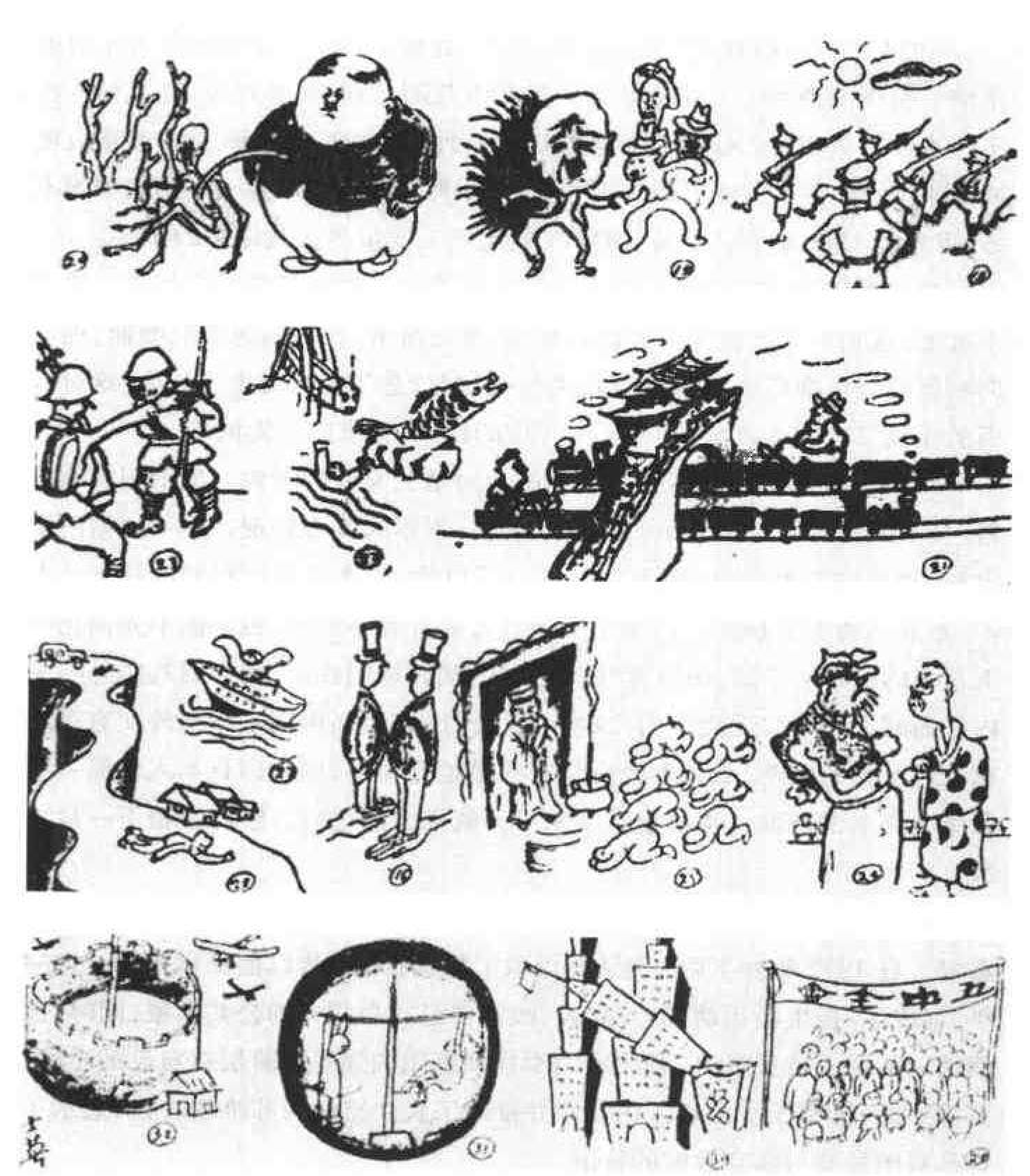






阶段。到处已都可听到霍霍磨刀的声音。"

徐懋庸：这一年的中国将复返于战国时代，而在某一部分，则精神的统一运动将加紧，一切自由复被埋葬于地底。十六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人们，多数将作血祭的牺牲。在乡村间遣匪运动将加



1934年大事漫画(二)

18. 学生周末的社会服务和军事训练。
19. 藏本失踪寻获。
20. 银行界救济农村。
21. 平沈通车。
22. 旱灾、水灾加虫灾。
23. 榆关英日军事冲突。
24. 中东路问题紧张。
25. 祀孔。
26. 中国、意大利互换大使。
27. 银出口征税。
28. 史量才被刺杀。
29. 国民党五中全会开幕。
30. 银行倒闭。
31. 妇女请愿修改新刑法。
32. 京沪防空演戏。

(黄士英作，原载《申报月刊》)

紧。对外，则南宋与金的关系将确定地再现。

刘真：小学教师的资格检定将更严格，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的位置将更难谋，因为今年将又多一批师范毕业生学士和博士。民国二十三年的教师们所组织的索薪团和跪请团将更加多，因为二十三年的教育经费将大部分移为军费。

1934年,《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上登载了四十二位知识界人士对那年前景所作的预测。上面摘录的便是其中几例,看起来悲观极了!其他人也不敢抱什么奢望,国人多数意气消沉,忧心忡忡,主要是忧虑三点: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日本人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不仅中国不妙,世界也不妙,许多人认定1936年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头。

这么多年后回眸望去,1934年的中国度过了虚弱而稍显宁静的三百六十五天,这是一个没有风云人物的年头,缺乏激情,没有新思潮的喷涌,连一向喧嚣的战争都那么单调、沉闷。为什么如此?这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对以后的年代又有什么影响?谁成了本年度的赢家?想来颇值得回味。

1934年能够显得较宁静,日本的动向是关键性的因素。出乎国人的预料,日本人暂时停止了侵华的步伐。不是日本军阀良心发现,也不是《塘沽协定》有神奇的约束效力,而是"九·一八"以后,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利品太多:东北三省加上热河。这个小个子巨人尽管贪得无厌,也不能不先消化一下过多的食物。于是,1934年中日之间的纠葛局限在《天羽声明》、关外与关内的通邮通车等口舌之争的"文雅"范围内,甚至还出现了藏本外交官在南京失而复得的闹剧,令日本政府颇有些尴尬。于是,国人因日本人侵而一直紧绷了许久的神经,稍稍松弛下来了,就像大潮过后,沙滩上留下一片空寂。

精明的蒋介石却没有放过日本休战的难得时机,这使他成了1934年的赢家。自1932年复出后,他认真汲取了教训,不再像以前那样张狂。1934年,他成了"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改善自己一介武夫的公共形象,同时,他悄悄地加强了特务组织,利用庐山军官训练团加强军官阶层对自己的忠诚,更重要的,他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并摧毁了长江流域的苏维埃政权,显示了自己对国民党与南京政府的价值。

福建事变只是延续了上年末的余波,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人陈铭枢等改了中华民国的国号,扯下了青天白日的国旗,脱离追随已久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大幅度改弦易辙,无奈各方面反映冷淡,尤其是两广的不合作态度造成的影响是致命的。惟一有能力援手直接帮助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福建政权的诚意半信半疑,自然也就没有全力救助的激情。在中央军有条不紊的攻击下,福建政权迅速瓦解,有光荣历史的十九路军就此一下子解体。

这年，国内最惨烈的战事是国共内战。双方进入短兵相接的地步，很凑巧，双方的军中都有来自德国的军事顾问，蒋介石有塞克特等，博古有李德。国民党的军队靠愚笨的碉堡战术和冷酷的经济封锁蚕食苏维埃的土地，红军将士虽然依旧勇猛顽强，但对手的实力太强大了，无法打开战局。广昌失守后，战争已经分出了胜负。到了下半年，红军终于支持不住，离开苦心经营的长江流域的根据地，踏上了漫漫的撤退之旅，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

蒋介石的成功引起了有心人的关注。伴随世界性的法西斯主义的号召力，一批人愿意拥戴他为中国的独裁者，他的忠诚党徒自不待说，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从海外归来后，也明确了自己对蒋介石领袖地位的忠诚，甚至愿意当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有些事更让人大跌眼镜：钱端升、丁文江等一批崇尚自由主义的学者，也开始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的身上。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把政府的经费大部分用在军费上，这使已经持续处于深刻危机中的中国经济愈加风雨飘摇。人们忐忑不安地注意着白银外流、物价跌落、市面萧条，连荣宗敬经营的大企业都摇摇欲坠，遑论其它中小企业。市民们祈祷自己的饭碗能够端得牢靠，破产或者失业的命运不要轮到自己头上。农村越发凋敝，1934 年水灾与最严重的 1931 年几乎同样严峻，而号称"人间天堂"的浙江则困于干旱，恶劣的气候导致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受灾。

尽管经济不景气，加之国民党及其政府加强书刊、电影、新闻等方面的检查，文化界仍然显示了充沛的活力。本年被称为文化史的杂志年。电影《渔光曲》上座率之高也代表了电影业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另外，1934 年中国要分出几个新国家的预言幸好并没有成为事实。达赖十三世的圆寂引发了黄慕松使团进藏，西藏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开始艰难起步；新疆的动乱告一段落，盛世才成为新疆的统治者；内蒙古王公的自治要求暂时得到了满足，蒙政会在百灵庙成立；在东北，溥仪第三次登极，这次当的是"满洲帝国"皇帝，路人皆知，这是日本人与溥仪间无聊的把戏，当时的中国舆论普遍报之以冷笑而已。

1934 年，一个各方暗暗积蓄力量的的年份。这些能量将在 1935 年甚至更后的年份里猛烈释放。

【名人聚焦】

漫画中的中国新闻人物

⊙李继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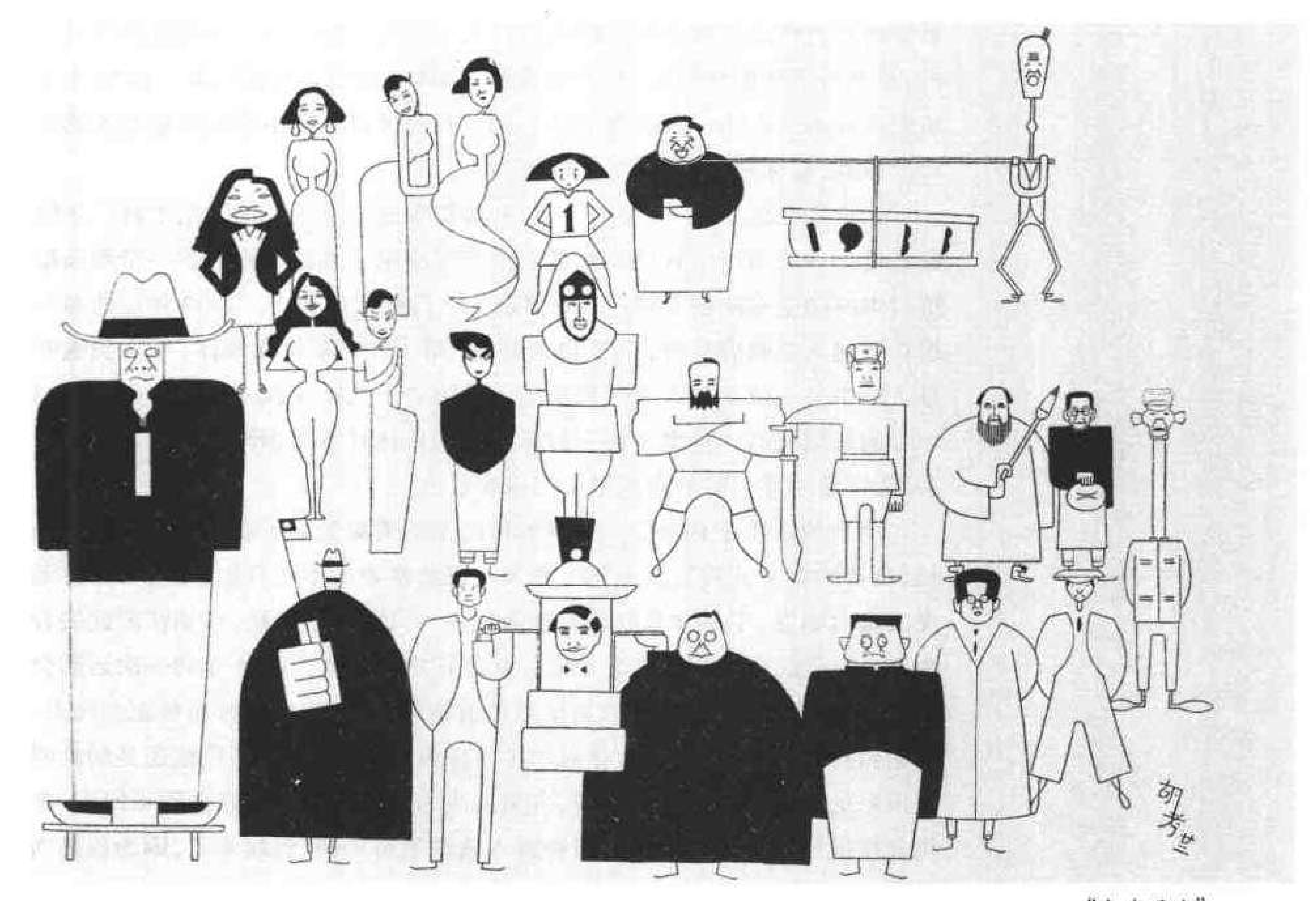
在中国，领袖、政要和将军们历来是被看得很尊贵的，要是有人冒昧地将他们与走红的艺人、体育明星等放在一起等量齐观，总有点怪怪的感觉，滑稽而不自然，无怪乎人们初见30年代初的这幅漫画时，先是惊异，接着大笑，稍后才对漫画家胡考的构思报以会心的微笑。

胡考将1933年至1934年间国内最有新闻价值的男性党政要人、军事将领和当时最为走红的电影演员、体育明星等放在一幅画面上"大出风头"。当然，30年代的电影演员和体育明星的风头远不及他们90年代的同行，在画面上也没有那一批政界明星们抢眼。

政要中，林森位置最尊，官任国民政府主席。1931年底，在一片反蒋声中，他取代蒋介石出任此职，直至1943年去世。图中的他，峨冠博带，清风道骨，造型高大，凛凛乎有如一神像，实际上他也就只是一尊神像，诸事不管，只是个"监印官"而已。没有这股潇洒空灵的劲头，一个大独裁者又怎么能允许他的名位一直高出自己一头呢？

紧挨着林森的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画中形象比国家元首林森低矮得多，脑袋极小，拳头却大得惊人，擎着青天白日旗，隐喻他治国的智慧不高，却大权在握。他作威作福，很多人嫉恨他，等到1931年底国民党内的广西、广东帮将他赶下台，大家才发现：蒋氏在，"党国"运转不灵；蒋氏不在，"党国"运转更不灵。

汪精卫（行政院长）与孙科（立法院长）是政坛上经常抛头露面的角色，这两位对于自己的弱点心知肚明，那就是处乱世却手无缚鸡之力，不过，与



“大出风头”

国父孙中山的亲密关系是他们的政治资本，因此总要抬着孙中山的神龛。孙科是孙中山的大公子。汪精卫则从同盟会时代就堪称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孙中山逝世后，他一度是国民党和广东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对蒋介石的后来居上始终心有不甘。

第一排醒目处还站着“大腹便便”的孔祥熙、“体壮如牛”的宋子文，他们长期任职财政部长，既是南京政府的大管家，又是孙、蒋、孔、宋家族链中的关键人物，谁也不敢小瞧这两位的政治能量。

介乎第一排与第二排之间的张学良隐隐已显落魄之象。遥想1930年，他帮助蒋介石击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的反蒋大同盟时，政坛上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首次造访南京时礼遇极隆，一时风光无限。他可是有

恩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人物。但自"九·一八"失去东北,少帅就等于没了根,虽然外表依旧洋装在身,从容潇洒,但内心则已是创伤累累。1933年他放弃兵权悄然出洋,1934年初才回国,有的报章不依不饶地在他心灵的伤口上撒盐,在标题上大书"不抵抗将军回国"。

张学良身后站着一位脖子特长有如长颈鹿的军人,他就是来自广东的蔡廷锴。1932年初,这位体形瘦长的将军率第十九路军在淞沪一带顽强抵抗日本海陆空军队的立体进攻,奠定了抗日英雄的英名。1933年底他参与组织福建人民政府反蒋,失败得很彻底,第十九路军从此解体,令人扼腕叹息。画中另一位手执大刀的魁梧军人是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1933年春的长城抗战,他麾下的大刀队在喜峰口让日本兵领教了中国刀法的厉害,让惯使东洋刀的日本武道士们谈虎色变。

剩余的政要还有三位。拿着如椽巨笔的美髯公是于右任,时任监察院长,负责纠察文武百官。老先生率领一班监察委员不愿只拍苍蝇,可想打老虎又难以如愿,于是常常闹着要挂印归乡。只穿一条裤衩,状如江湖武侠者为谁?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是也。此公好户外活动,1934年的一次运动会上,他当众表演太极拳。作为追星族的前辈和楷模,当年他曾屈尊充当马夫,驾着新打造的马车,载着游泳冠军杨秀琼姐妹驰骋南京。褚民谊还是颇具明星风采的汪精卫的政治追随者,直至追成为人所不耻的汉奸也死不回头。冬烘先生模样的吴铁城不知有何资格入选政治明星榜,想起来了,因为他是当时上海市的市长。大上海是电影明星的摇篮,吴市长自然也是明星了。

政要清一色为男性,而演员、体育明星十一人中,女性顶起了三分之二的天,男性仅有四人,其中梅兰芳还是以男扮女装驰名的。

京剧的表演艺术包括唱、念、做、打四种,当时能够将这四种表演艺术完美地融为一体的京剧演员中,梅兰芳无疑是最为出色的。他扮演的女角集演唱、舞蹈、技巧、动作于一身。1917年他应日本东京帝国剧场之邀赴日本演出,开中国戏曲演员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先河。1930年他又到美利坚合众国展示了京剧这一国粹艺术,载誉而归。

当时的风云人物够现代派的了,除了梅兰芳是靠弘扬中国传统艺术扬名外,其余都很"摩登"。当时上海的十里洋场领导着中国社会的时尚,30年代上海电影演员更是新时尚的弄潮儿。

胡蝶因主演《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等成名，30年代初加冕“电影皇后”，可树大招风，马君武博士认为国祸与红颜有关，故而作诗一首，称少帅张学良之不抵抗缘起胡蝶，此诗捕风捉影，却谬种流传，害得胡蝶女士百口难辩，直至红颜褪尽，仍在海外辟谣。

湘女王人美，因在1932年拍摄的《野玫瑰》中出演主角而一举走红，1934年她主演的《渔光曲》在上海连演数月不衰，后到苏联参加电影展获得荣誉奖。徐来与王人美同属一家电影公司，初擅长歌舞，多次赴南洋演出，有“东方标准美人”之誉，后步入电影圈。

至于阮玲玉的芳名艳事，已经流传很广，她出演的角色多变，曾在《野草闲花》、《新女性》、《三个摩登女性》等二十多部影片中担任角色，1935年因“人言可畏”自杀身亡。漫画中的其他演员的演技亦各有所长，黎莉莉是甜，刘继群与韩兰根是幽默滑稽。

欲与红影星试比高的还有体育明星，虽然她们的知名度和影响面当时还不能够望影星们的项背，但1933年与1934年也许是个例外。

被誉为“美人鱼”的杨秀琼是全国的游泳冠军，在1934年远东运动会的女子游泳表演赛中获得四项锦标，并与队友夺得团体冠军。年青貌美、充满活力的杨小姐是当时新闻界的宠儿，连影星也自叹不如。个头矮小的女子钱行素怎么看也貌不惊人，但这个女飞人在上海的运动会上一举打破跨栏等四项全国记录，她跨栏的照片被登在杂志的封面上。

飞行员穿戴的壮士名为孙桐岗，曾留学德国，他一人驾机从欧洲飞回中国，并在国内进行飞行表演，在飞机的作用已被日益重视的30年代，这个勇敢而且掌握新技术的年轻人成了航空时代降临的象征。

细细想来，政要也好，将军也好，明星也好，他们有一点很相似，都是30年代初中国的新闻人物，是大众注目的焦点。他们也乐于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演员未必是政治家，而政治家似乎都是演员。演员的品格与演技有高低优劣之分，众人的评说仁智互见，胡考借漫画所作的褒贬也只是当时的一家之言罢了。

【名人聚焦】

佛陀的恩怨:班禅与达赖

⊙晓　剑

1933年12月17日下午7点,拉萨传出了惊人的消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罗布藏塔布克嘉穆措在拉萨圆寂,终年五十六岁。消息传至金沙江畔,已经渡江的西藏官兵无心恋战,仍返回原来防地,与西康的军队隔江对峙。

在首都南京,班禅九世很快得知达赖的噩耗,十分悲恸,他知道,他和达赖十三世在现世已永久失去了和解的机会,怨恨也好,误会也好,无法在生前弥合。

十三世达赖无疑是个精明干练的宗教领袖。在20世纪初的混乱局势中,他利用清政府瓦解的机会,改变了清朝统治西藏的传统,直接取代了驻藏大臣的角色,使自己的权力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了世俗政治领域,直接统治着西藏的芸芸众生。他对西藏自主权的强调导致了他同民国中央政府的关系一直笼罩在猜忌和紧张的气氛中,西藏与内地的联系长期中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与英国的关系却发展得十分密切,内地人士对他是否忠诚于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质疑,但是,达赖在他临终前那份著名的遗嘱中,表现出他晚年深知西藏与中国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遗嘱中写道:"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相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予以丝毫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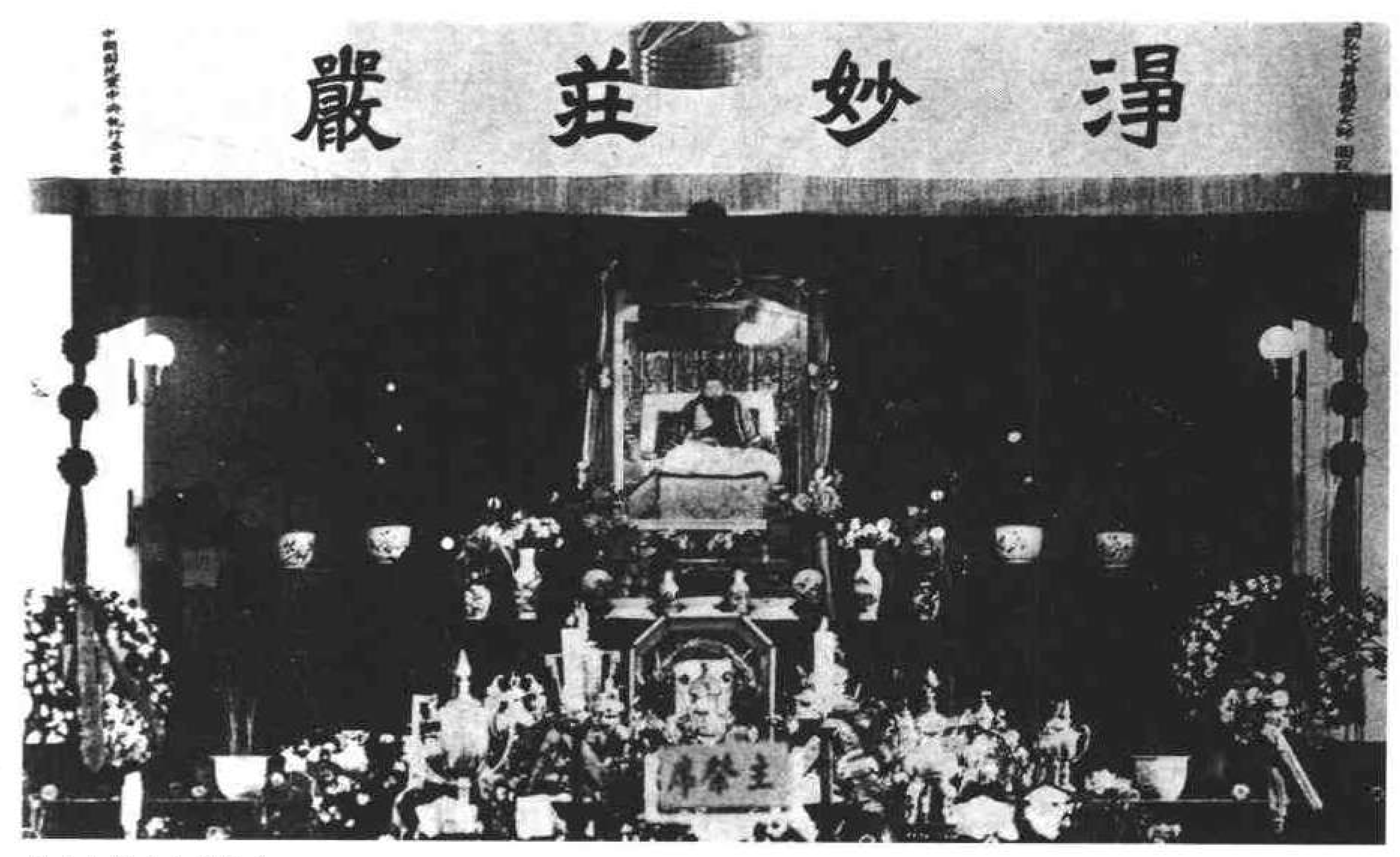
达赖与班禅之间的恩怨贯穿了他们的一生,不仅影响了西藏的政局,也将中央政府卷入矛盾的漩涡中。达赖与班禅本为西藏两位最高宗教领袖,达赖最尊,班禅次之。两人地位相当,且互为师徒。按照惯例和传统,达赖与班



十三世达赖

禅分别管理前藏与后藏。十三世达赖是九世班禅的师傅，班禅对达赖的态度也一向谦恭，但达赖意欲控制整个西藏的权力，这种无情的追求打破了双方势力的平衡，导致师徒出现严重嫌隙。

问题出在达赖曾两次从西藏流亡。一次是 1904 年 3 月底，领兵在江孜



南京追悼达赖的灵堂

大败藏军的荣赫鹏率英军迫近拉萨，达赖被迫流亡外蒙和北京。在北京，他觐见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第二次冲突发生在达赖与清廷之间，1910年，达赖被迫出走印度，清廷宣布革除达赖名号，废黜他的全部职权。达赖一离开西藏，班禅便被认为是天然接替者。清廷建议他取代达赖，这对班禅无疑是个极大的诱惑，但他还是拒绝了。可长处瓜田李下，达赖及他的左右随从们便对班禅心存芥蒂了，这种猜疑因小误会而日益加深，他们回想起班禅早年从住所札什伦布寺前往西藏访问时，他的随从在经过达赖的住所布达拉宫时继续打鼓，被达赖认为是对自己不够恭敬，结果罚了班禅一百五十两银子。1912年6月，达赖从印度返回拉萨，班禅从札什伦布寺去江孜迎候，达赖拒不接见，后改在热隆寺会面，但会谈的结果并不愉快。

两位喇嘛关系最终破裂是因为达赖不断对班禅管辖的后藏地区施加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班禅辖区的经济收入仅为达赖地区的十分之一，但达赖却要他承担四分之一的军费。1923年11月，达赖责令班禅缴纳



流亡内地的班禅九世

五百万两银子及大批粮食、牲口支应乌拉，还将九世班禅手下几个重要管事人召到拉萨，全部拘留。11 月 15 日晚上，班禅带了几名重要侍从连夜出逃了，一行人星夜潜行，经旷野草地径直北上，来到青海境内，开始了终生的流亡生涯。达赖得报班禅遁去，派骑兵向北追捕，他对班禅不辞而别的行动始终不肯原谅。

在内地，班禅受到历届中央政府的礼遇，因为他不仅是西藏的领袖，而且对蒙古的事务具有影响力，蒙古的王公贵族与普通牧民都是喇嘛教的虔诚信徒。国民政府任命班禅为国民政府委员、西陲宣慰使。班禅还在内蒙古讲经，"放头"（即摸顶），靠他的影响可以获得不少收人，养活了他手下的数百人员。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弥合班禅心中的酸楚，恢复自己在西藏的权力，回到住所札什伦布寺是他最强烈的愿望。1931 年，国民政府曾两次派代表去拉萨，提出达赖应欢迎班禅回藏，两人在藏政教权力"应维持原状"。尽管南京的使者谢国梁于到达拉萨前一日神秘死去，但班禅喇嘛不久得到来自拉萨的代表的通知，达赖乐于请他返回西藏并恢复其全部特权。班禅派出代表两人去拉萨，但他们到达拉萨后被告知，达赖必须同西藏人大会商量班禅回藏之事。在讨论此事召开的会议上，敌视班禅喇嘛的人操纵了会议，大会反对他回藏。班禅又派安钦呼图克图去拉萨继续商议，但因达赖去世而中止。

对班禅来说，达赖喇嘛圆寂，这是他重返西藏、恢复自己地位的最后良机。出自对达赖的深厚情感，他向西藏、西康、青海和内蒙各喇嘛庙布施大洋七万多元，祈祷达赖大师早日转世。在南京，他主持了国民政府为达赖举行的追荐，还派代表携带重金去其他地方举办追荐活动。此外他还要求国民政府追封达赖。1934 年 1 月 21 日，国民政府追赠达赖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举行悼念活动，并派黄慕松到西藏祭悼达赖喇嘛。黄与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商谈，摄政允许班禅回藏，但以不带庞大的护从人员、不在拉萨行使任何政治权力为条件。

1934 年 10 月，黄慕松回南京，建议武装护送班禅返藏。在他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后，班禅回藏的计划开始实施。1936 年 5 月，班禅向拉卜楞寺前进，国民政府派赵守钰为护送专使，并派遣三百人组成的仪仗队护送，这些护送人员中，有班禅请派的政府各部如交通部、邮电部、参谋本部、测绘局等



班禅路过绥远时坐在为活佛特备的四人轿中。



班禅在上海市政府大厅前受到欢迎。

班禅利用无线电为上海人诵经。



的专家，班禅打算让他们当开发西藏的顾问，改变班禅命运的时机似乎终于等到了。9月，他到达青海南部的玉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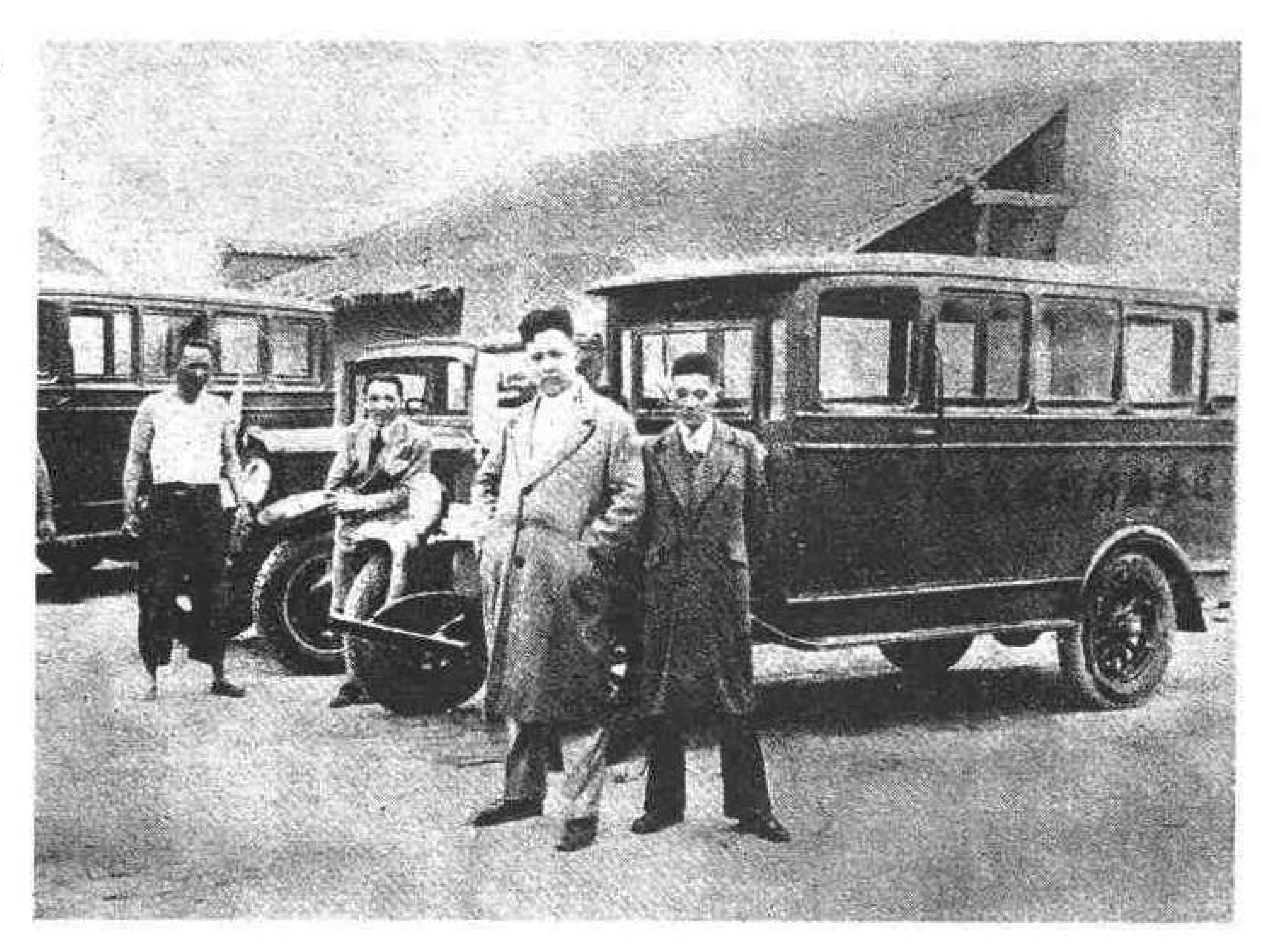
班禅回藏之行遇到重重障碍。英国提出抗议，声称中国军队不得入藏，要求班禅从海道经印度入藏。国民政府和班禅拒绝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此后，英国不断干涉班禅返藏计划，与此同时，拉萨地方政府也表示，护送九世班禅的蒙汉官兵不许到拉萨，只能在札什伦布停留几个月，然后从海路返回内地，并要有所谓英国提供的“国际担保”。这些都遭到班禅的拒绝，噶厦就取消了最后一项，改为要九世班禅立字据，保证蒙汉官兵在西藏只住五个月；保证班禅从此归达赖管辖。班禅如果不能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噶厦就



班禅出任国府委员。

返藏途中的班禅

护送班禅一行的车队



准备以武力阻拦班禅回藏。于是，凄苦的班禅逡巡于康藏边境数年，故园虽近却觅不得归路。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班禅意识到回藏的前景愈来愈黯淡。果然，忙于应付战争的国民政府无暇西藏事务，也不愿意因班禅回藏一事，恶化与西藏地方当局及英国人的关系。8 月 24 日，南京方面正式要求班禅暂缓回藏。10 月初，班禅一行在大雪纷飞中撤回玉树。心情郁闷的班禅在艰难的跋涉中患了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于 12 月 1 日圆寂。他死得很寂寞，因为整个中国都为了生存而苦战，没有精力再来关顾他的命运。

【名人聚焦】

张学良海外归来

⊙陈 程

1934年1月6日，张学良由意大利乘“康脱浮特”号轮回国，他以前的顾问端纳及旧部鲍文樾、冯庸等十多人到香港迎接。五十多人从天津一带陆续南下，到上海迎候张学良。嗅觉灵敏的记者们已经捕捉到东北军少帅政治观念变异的蛛丝马迹，迅速在电台、报刊上发布：张学良将军迷上了风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

8日下午，张学良回国抵上海，沿途戒备森严。随张而来的还有四个意大利的飞行专家，他们是应对空军着迷的少帅之邀而来的。上海市长吴铁城、蒋介石代表蒋伯诚、宋子文代表黄纯道、杜月笙等前往码头迎接。阎锡山、韩复榘和汪精卫等都派代表迎接。众多记者们也前来一睹少帅的风采。

想当初热河失守，京津告急，蒋介石亲自北上，要他年轻的盟友张学良作出艰难的抉择：一个人跳海，还是两个人一齐呆在船上淹死。张学良虽然痛苦，但不失是个有担当的汉子，他选择了跳海，在一片唾骂声中下野赴了海外。那时节，他的朋友们不仅忧虑他政治上的挫折，更担心他精神上被击垮，出国前的张少帅全无往日的霸气，给公众留下的是憔悴不堪的苍凉印象。当时，他的鸦片烟瘾极深，身心遭受巨创，已难承担大任。

如今，他回来了，面颊丰腴，目光自信，身穿长大风衣，步履有力，全无昔日的颓气。张学良整个像换了一个人。戒了毒瘾的少帅不仅恢复了一个少壮领袖的神态，而且体格健壮了许多。他依旧自信而热情。

张学良在上海的莫利爱路二号寓所接见记者十多分钟，他否认了出任要职以及航空部长的传说，对法西斯主义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坚持他的



张学良和妻子女儿在英国。




张学良自欧洲回国。


张学良决定奉蒋介石为最高领袖。

一贯主张——“和平统一”。

1月11日，张学良发表书面谈话，称欧洲的物质文明建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感慨地说了三点：其一是公民拥戴领袖，而领袖忠诚无私。而中国争做领袖者太多，既不能令，又不愿受命。国人应该允许有一个领袖有机会试验。张学良没有明说，但记者们知道他说的那个领袖是蒋介石。其二，西方学者精于学术，有磨穿铁砚的精神，反观中国，教师为金钱，学生为文凭，对国家的贡献只限于摇旗呐喊。所以需要刷新教育，培养人才。其三，欧洲极厌战，但备战也急到万分，中国人应泯除恩怨，从速准备御侮。他强调对内和平是可以的，但对外和平则是骗人的，当今世界上，能奋斗才能生存。至于回国的原因。张学良称自己回国的原因，一是倦鸟归林，二是料理家庭个人私事，三是与政府讨论东北难民的救济问题。他再次重申，自己是个军人，将无条件地服从命令，自己的志向在维持和平，促进和平。

张学良是应蒋介石电召回国的，东北军对他的忠诚依然如故，需要他回国统率。2月1日，他在浙江杭州会晤了蒋介石夫妇，表示一切听命于中央。在欧洲的游历使他对国内政治有了新的感悟，他决心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而不再将自己看成是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的盟友。他甚至要求在蒋介石

重掌军权的张学良





1934年3月1日，张学良在武汉就任华中剿共副总司令。

的侍从室工作，当然，以将介石的精明，他是不会把有实力的东北军统帅放在一个无足轻重的幕僚长的位置上的。

尽管张学良一再袒露和平统一的心愿，蒋介石还是委之以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的重任，将东北军的几个师南调，参加对红军的围攻，张学良匆匆赶到武汉就职指挥。

豪迈热情的少帅其实始终处在一个尴尬处境中：他下了决心效忠蒋介石，但蒋介石圈子里的人在内心里还是将他视为拥有私兵的军阀，需要加以防范和戒备；他对日本的侵略铭记于心，对打内战颇不热情，但又被他决心效忠的领袖派往内战的最前线坐镇。

【名人聚集】

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

⊙黄国伟

从1928年11月鲍尔率领第一批顾问团员二十五人踏上中国的土地，到1938年7月法肯豪森率最后一批顾问团员离开中国，此十年间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在华活动是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史上主要内容之一。

蒋介石国民政府之所以要在列强中挑选德国人做军事顾问，是基于中德双方当时的处境考虑的。从中国方面来看，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对苏联绝交后，急于寻找新的外国顾问来接替苏联军事顾问撤走后所留下的空缺。而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此时已沦为与中国同样的国际地位，在相互交往中双方可以平等相处。同时蒋介石本人对德国的军事很感兴趣。1912年和1918年，蒋曾两次准备去德国进行军事深造。在第一次，他甚至学习了德语。从德国方面来看，在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沉重打击之后，德国致力于迅速恢复经济，重整军备。军工生产的迅速发展，要求更多地从国外输入德国所缺乏的制造军火所必须的钨、锑等稀有矿产，而作为世界藏钨大国的中国对其有强烈的吸引力。《凡尔赛条约》废除了德国的义务兵役制，将军队总数限制在十万人以内。为了未来的扩军需要，德国将一批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军官派往国外以"私人"身份充当军事顾问（比如拉丁美洲国家、土耳其、日本等国）。他们在国外试验陆军整训及新式武器。他们实际上是德国放养在国外的一支无形军队，随时等待召唤，而动荡中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战争试验场。因此，德国军事顾问来华也就势成必然了。

抗战前的在华德国顾问团先后有五位顾问，先后是鲍尔、克里拜尔、佛采尔、塞克特和法肯豪森。第一任德国军事顾问鲍尔在华工作仅历时半年，

就因染上天花病死在上海。接替他的克里拜尔在代理顾问团长的一年时间内，由于不太善于应付内外关系，引起顾问团内部矛盾激化，最终于1930年5月辞职下台。第三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佛采尔应蒋介石之邀于1930年5月正式抵达中国履职。佛采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作战处处长，是一位厌倦政治斗争而热衷于枪炮战火的职业军官。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壕沟战，深受当时陆军部长塞克特将军的赏识，两人之间私交不浅。



佛采尔

佛采尔上任伊始，恰逢蒋冯阎桂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他行装未卸，立即马上不停蹄地跟随蒋介石投入中原大战，辅佐蒋同各路军阀争战。他甚至乘上了蒋介石的专列，与蒋同吃同住，形影不离。佛采尔根据战场态势以及以前自己在一战中西线战场的经验，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阎锡山与冯玉祥的间隙，集中优势力量攻击阎锡山在山东的部队，击退这一实力较弱的对手，以免两线作战。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意见，结果山东的晋军避战保存实力，只想让冯军打头阵而一触即溃，蒋军轻而易举占领了济南，免除了侧翼之忧。佛采尔来华初战告捷，蒋介石大喜，对佛采尔更加欣赏。

冯玉祥的西北军作战顽强，据险固守，蒋军连攻不克。佛采尔又向蒋介石建议，首先集中炮火兵力，猛攻一点，打开缺口，然后向两翼扩张战果。在蒋军强大冲击之下，西北军溃不成军。中原大战最终以蒋军大胜而告结束。佛采尔及其他德国顾问们为蒋立下了汗马功劳。佛采尔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战争结束后，佛采尔在公函文电中的署名头衔从"中将"升为"上将"。但是，佛采尔的行动引起了德国驻华使馆的注意，当得知佛采尔率领德国顾问们全副武装在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时，德国外交官们气得吹胡子瞪眼而又无可奈何。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佛采尔亲赴上海前线参战，他负责跟随由顾问团训练的、全部由德式装备武装起来的陆军第八十八师。佛采尔此行的真正目的，并非要指挥对日作战，而是要考察德国顾问们为中国练兵的实际效果。佛采尔对第八十八师的作战能力非常满意，他向蒋介石建议积极推广德式训练，将中国军队在短时间内训练成新式劲旅。

1933年初，日军继续侵华，出兵占领热河。中国守军奋起反击，发起了"长城抗战"。在此期间，佛采尔又率领德国军事顾问们北上，参与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佛采尔此次北上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对北方国防部署贡献很大。《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后，他随即风尘仆仆赶赴南昌，参加筹划对中共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为蒋介石制定了许多作战计划。

此时，主持制定中央红军反"围剿"战略的，也是一位德国人，名叫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因此，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国共双方德国军事顾问间的一场较量。佛采尔似乎略胜一筹。

佛采尔在协助蒋介石整顿军队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显著。他将前任总顾问所组建的"教导队"、"教导团"扩充为"教导师"，即陆军第八十八师，后来又增加第八十七师，并进一步推广其训练经验到其他部队。1933年底又帮助蒋介石组建了十个炮兵营，全部配备德式装备。他还建议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等多兵种部队，以及首都演习场、射击场、炮兵航空观测机队等，使国民党军队朝近代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佛采尔十分重视军事教育，他亲自兼任中央军校总教官，完善了军事教育体制，深得蒋介石的赞许。

佛采尔虽然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但他在政治上却较幼稚，不了解中国"国情"，尤其是国民党官场上的规矩，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以致在中国官场上积怨太深，导致他重蹈前任的覆辙。佛采尔辅蒋在军事上连连获胜，日耳曼式的傲慢自大情绪油然而生，在与素质不佳的国民党将领打交道时，动辄以教训人的口气说话，招致国民党某些上层军官的不满。在他们看来，德国的军事理论再先进，也掩盖不了战败的事实，况且顾问只是"客卿"，提提建议与预案而已，不能反客为主。1931年1月，蒋介石派佛采尔随何应钦去南昌，协助何应钦指挥第二次"剿共"作战。佛采尔鉴于第一次"围剿"失败的

教训，建议采用“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方式，袭击苏区中心。何应钦害怕再吃大亏，主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佛采尔自恃有蒋介石撑腰，不把何应钦放在眼里，结果两人关系不和。

佛采尔及其部下的建议一旦被蒋介石采纳，即以军令的方式下达，军政部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讨论的权利，以军政部兵工署署长陈仪为首的一批高级将领对此是敢怒不敢言。1931年12月蒋介石宣告第二次“下野”。蒋下野后，德国顾问团失去依靠，被派往政府各军事及有关部门充当顾问，地位下降。陈仪甚至提出所有现聘外籍顾问合同都应由军政部出面重签，欲趁机撵走一部分不满的德国人。军政部长何应钦经多方考虑，阻止了陈仪的计划，才没有使军政部与德国顾问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蒋介石不久即复职，德国顾问的地位又稳定下来。佛采尔的前任们在华活动谨慎小心，尽量隐蔽，以免惹出国际矛盾。然而佛采尔却完全不同，他在华奔波于内战和抗日前线，毫不隐讳其身份，特别是他率领顾问团出现在“一·二八”淞沪抗日前线，使日本人愤怒异常，多次向德国外交部提出抗议，使德国外交部处境非常狼狈。

德国顾问受聘于蒋介石个人，命运也操在蒋手上。他们与中国官员发生争执时，蒋介石可以裁决调停，但如果与蒋产生矛盾，后果可想而知。蒋介石对佛采尔的军事才能非常赏识，但在实际工作中两人还是有许多分歧。

在对江西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中，佛采尔为蒋介石制定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惨遭失败。佛采尔无话推托，便指责蒋部下军官无能，进展缓慢，贻误战机。蒋介石对此十分不快。在第五次“围剿”中，佛采尔为蒋介石拟定了“分区围剿、分进合击”的作战计划，欲切断红军各部间联络，使之首尾不能呼应，再逐个消灭。蒋介石采纳了佛采尔的建议，但没有同意他在夏季未发动攻势的要求，佛采尔大为不满，认为蒋不重视他。蒋介石以军事起家，视军队为命根子，对于他人插手军队非常敏感、忌讳。佛采尔来华后经人介绍与宋子文相识，两人一见如故。佛采尔向宋介绍了他的整理中国军队计划，并在组训新式中国军队工作中得到了这位“财神”的大力帮助。佛采尔还经常陪同宋子文视察整训部队及新建军事设施。佛采尔此举招致谣言四起，说他挟宋子文以自重，破坏了军事指挥体系。蒋介石因此对佛采尔愈加不满。

佛采尔与蒋介石的最大分歧在于精锐部队的使用：好钢用在刀刃上，在视国家民族为第一生命的德国军人看来，中国的精兵强将理所当然应用来抗日御侮，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佛采尔固然反共，但坚决反对蒋介石把德国顾问训练的新式军队全部投入"剿共"战场，认为此举有违抗日国防本意，而蒋介石以"安内"为首要任务，全力推行"剿共"政策，不惜血本与红军相拼斗，就连正在整训的部队也要中止整训开赴前线"剿共"。由此，两人矛盾进一步加深。特别是佛采尔主张应由南京国民政府出资重新训练、装备退入关内的张学良东北军，使其成为抗日劲旅，这更是触犯了一心想要剪除异己势力的蒋介石的大忌，蒋介石终于决心要让佛采尔走人。

1934 年 3 月，应蒋介石之邀，德国著名军事家塞克特来华出任蒋的军事总顾问。佛采尔作为蒋介石的第三任军事总顾问生涯就此结束，他是五位军事顾问中任期最长的一位。

1934 年嘉兴一带旱灾严重



嘉兴灾民



嘉兴农民裸体踩水车。

【名人聚焦】

冯玉祥:重归沉默

⊙张莲红

1933年12月31日,晚10点。旧年将去,新年即至。正在泰山五贤祠隐居的冯玉祥在日记上写下了对1934年的希望:"我须实现革命;我要成为一个真的穷光蛋;对于革命青年大量助之;要有组织;要有计划;要有一致的主张;要刻刻同情于贫苦同胞;要对旧友百般厚,百般宽;要写遗嘱;读书,须有一个极切实的标准;学英文;作汉文;学哲学。"尽管此时冯玉祥对隐居生活已基本适应,但在辞旧迎新之际,冯玉祥的心情并不平静,他期待新年能给他带来新的生机。

一、先生十几位,学生只一个

在泰山隐居期间,冯玉祥用力最深、费时最多和受益最大的恐怕就是读书了。冯年幼家贫,少年从军,上学读书既无时间也无机会。下野隐居之后,读书成为冯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一时期,冯读书是采取自学和请人讲解相结合的方法,1934年冯从北京聘请各科教师,讲授天文、地理、文学、外语、物理、化学、书法、绘画诸课程。另外还请拳师教练武术,并专聘山东名流范明枢讲授《春秋》和《左传》。这年暑假,冯还邀请许多知名教授来泰山避暑,借此机会请他们讲授专门课题。1934年曾来泰山给冯讲课的有:李达讲授通史,陈豹隐讲《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赵望云教授绘画,法商学院的粟寄沧讲授土地问题,北大徐万钧讲授西洋史,中法大学的陈定民讲授文法,北大赵澄之讲授进化史,心理学专家张孝如讲授心理学,许德珩讲授



政治学，邓初民讲政治学概论，薛德育讲授生物学，陶宏讲授天文学，等等。在给冯讲授的专家当中，最老的有年已逾七十的范明枢老先生，最年轻的有年仅二十岁的陶行知的儿子陶宏小先生。

为了使读书能有计划和有系统，冯还接受陈豹隐的建议，成立了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研究室，专门辅导冯的读书学习，研究室的主任由日本问题专家宋斐如担任，1935年初宋离开后由赖亚力担任，成员大都是北京各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冯研究室的研究员的任务除讲课外，还担负着轮流在每星期六下午作时事报告，这时，参加的除冯和夫人李德全外，还有跟随冯到泰山的文武随员，一般有二十人左右。另外，研究室成员还经常研究国际形势，写出对时事的分析，供冯参考。

冯读书非常勤奋，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会外，每日我个人的工作，便是功课，一张功课表，是填得满满的课程，从天不亮就开始，一直陆续上到天黑。"据冯身边的人员回忆，没有特殊情况，冯总是每天早6点起床，夏天提早到5点。洗刷后，就登山活动。7点至9点读书，9点吃饭，10点至12点读书，12点午睡两小时，下午2点至4点读书，4点晚饭，5点至6点读书，晚10点休息。上课时，冯不仅静静听，而且记笔记，做练习，并且爱发问。如其读书笔记《读春秋左传札记》就是其读书的心得体会。这一时期，冯玉祥读书兴趣盎然，乐此不疲，冯在《我的读书生活》中说："读书，我此时好像吃甘蔗，越往下吃越甜。越读越感到它的趣味。而且越读眼越亮，心越宽，因为我所读的书，不是一般骚人雅士读来开心的书，而是救国救世界的革命理论，而是20世纪最进步的思想学术，而是历史上的宝贵教训……这些书可以使我认识过去、现在，知未来，可以使我获得正确的人生观，可以使我不错走了道路，可以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定，可以使我时时刻刻在前进。"

除上课外，冯还有计划地看了许多书，如《高尔基传》、《托洛斯基传》、《资本论》、《儒林外史》等。冯不仅读书，他还要抽出时间写书和写诗，这一年写的书有《读春秋左传札记》、《胶东游记》，冯的回忆录《我的生活》也开始动工，由冯口授，张雪山(抗战爆发后离开冯，并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记录。另外，冯每天都有固定时间练字，写隶书和魏碑体，当时向他求字的人不少。冯写的对联都是宣传爱国抗日的，最常写的对联是："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



冯玉祥下泰山去胶东游历。

二、兴办义学，访贫问苦

1934年5月底，冯从胶东回来，想到泰山南麓的居民，大都是各寺庙的佃户和依靠抬山轿、拉洋车、砍柴度日的穷苦大众，他们的子弟因为贫苦，入不了学校，读不起书，冯为此陆续兴办了十四所小学校，学生读书是全部免费的，领取书、笔、纸、墨等都不花钱。学校教师从各地高薪聘请，学校开办经费及教职员工的薪金，均由冯负责开支。学校定名为"武训纪念小学校"。冯对武训十分钦佩，认为以行乞所得，兴办义学，这在历史上是罕见和难能可贵的。冯曾请赵望云先生给每一个学校都画了一幅武训的巨像，张贴在学校显目的地方。为激励学生发愤学习，冯还自编泰山民歌数首，要求学生每天学唱。如《洋车夫的弟弟》的歌词："大哥拉车满街跑，终日劳苦两三毛，拉车一天几身汗，我得读书怎敢辞劳？"《轿夫的儿子》："爸爸抬轿上泰山，终日劳苦牛马一般。来回百里三角钱，我得读书怎敢偷闲？"《柴夫的儿子》："爸爸上山去砍柴，日落西山方才回来。百斤柴草百里路，我得读书怎敢发呆？"这些歌词通俗易懂，且富有教育意义。这群孩子除努力读书外，还兼学石工，冯从青岛聘来一位技师，教学生们用泰山石头磨制各种印章，拿到车站向旅客出售，其收入作为学校基金。

除了办穷人学校外，冯也曾设想办一个“贵族学校”。起因是这一年7月李烈钧将其不服管教、游手好闲的儿子李赣雕送到泰山上，交由冯帮助教育，由此冯曾想要办一个“谁家子弟吃喝嫖赌吹可来此间读书的一个学院”。可惜这一很有意义的设想未能实现。

在泰山，冯玉祥的口碑很好，泰山老百姓都亲切地称冯为“老先生”、“大善人”。冯出生贫苦，十分同情贫苦百姓，他曾派张公干到附近农家进行生活水平的调查，他认为：“贫富之不均，贫者过贫，则终日劳苦不得一饱，富者过富，则任意挥霍，大楼跳舞，不平之事未有过于此者。”但冯却无法解决，非常痛苦，他在日记上写到：“我只有节衣缩食省下的几文用来接济他们，使我稍得一点安慰。”如2月4日，冯曾给泰山附近四十家穷同胞，每家送去一袋面、八斤肉、两盒茶食。实际上泰山附近的老百姓几乎每人都曾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冯的资助。

但冯本身经济并不宽裕，他在泰山的生活来源主要来自以下几个主要渠道：韩复榘每月给5000元和500袋面粉；宋哲元每月5000元；孙连仲三五个月送一次，不过1000元；鹿钟麟、孙良诚每个年节送500元；国民政府每个月发给他薪金800元。但冯的开支很大，尽管跟随他的人员不管是武装人员，或是闲散人员，都不发薪金，仅是吃饭穿衣，几个月才发一次津贴，为数亦很少，就是这样也不敷开支。冯全家大小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每日两餐与传令兵一个伙房，吃的是一样饭菜。除了招待客人，每天主食是馒头、面条、窝头，米饭换着吃。至于副食一般是白菜、豆腐、粉条，另外有辣椒、咸菜。星期日改善生活吃顿红烧肉，来了客人，添个炒鸡子。

三、反蒋抗日，徐图再起

除读书、办学和访贫问苦之外，在泰山期间，冯并未放弃东山再起的努力。这一时期冯同其原西北军旧部如韩复榘、宋哲元、孙良诚、石友山、孙连仲、杨虎城等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人员往来十分频繁。冯为实现反蒋抗日的目的，在三阳关庙内，还设有私人电台，和各方反蒋势力联系。当时冯派张锋伯、熊梦宾为代表，往来两广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联络，策划反蒋；陕西名流刘治州为冯奔走于杨虎



冯玉祥在健身。

城、邓宝珊两处；四川名流高兴亚为冯奔走于刘湘、邓锡侯、刘文辉三处；邱斌则来往于宋哲元、韩复榘等原西北军将领之间。而各方也派有代表常驻泰山与冯保持联络。

在同国民党各派系的关系中，冯十分重视同胡汉民、李烈钧等西南实力派的联络。1934年1月，胡汉民派曹四勿赴泰山见冯。同月12日，冯派李兴中去香港见胡。5月，冯同李烈钧一起游胶东，并对抗日反蒋之事有所会商，其后双方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0月，冯又派刘定五、熊观民二人去广东、香港等地，分别会见陈济棠、胡汉民等人，就抗日反蒋等事有所商谈。11月23日，胡致函冯主张“严切准备”。

冯失败下野之后，加强了同中共的联系，原西北军将领中共党员王梓木常驻泰山同冯生活在一起，在泰山期间冯的周围还有很多中共地下党员，如冯的传令兵冯文华、周茂藩、赵力钧、李景合、李止义等，李德全的弟弟李连

山、李连海，负责泰山图书室的王倬如，冯研究室的主任宋斐如，讲授战史的崔贡琛等，另外还有数人在其后不久加入中共的，如赖亚力、卫队营营长魏凤楼等，而且为冯讲课的人亦多为民主进步人士。通过读书学习和中共地下党有意识的引导，1934 年冯对中共的认识有了很大的飞跃，这一点他在日记中经常有所流露，如 2 月 15 日的日记中写道："共产主义我是很科学的赞成的，我有多大力量我就竭力来帮助。"5 月 3 日的日记中有："为某民族而革命，为推翻皇帝而革命，为社会主义而革命，为国家而革命，均不如为共产主义而革命。"11 月 2 日，冯过五十二岁生日，冯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我应当有一个新的决心、新的计划，我把它写在下边：彻底革命，按照共产党的办法来革命。"

在泰山冯还积极发展自己的秘密团体"抗日同盟会"，这个组织是冯从张家口重新返回泰山时开始成立的。冯认为"抗日须有团体，有组织，不然是不能持久的，不能成功的"。冯在泰山的部属大多参加这一组织，但是入会仪式却如同封建道会一样，宣誓室内烧着两支明烛大蜡，放着一束黄表纸，案上缚着一只公鸡，墙壁上挂着一张地图，图上东北四省用蓝色勾出，上面写着"还我河山"。宣誓人在熊熊的烛光和烧纸的火焰中，高举左手，读誓


在田间劳作的冯玉祥夫妇



词："我某某，献身同盟，服从领袖，内除国奸，外抗强权，如有违犯，愿受法典！"读完誓词，右手举刀将鸡头砍落，以示决心。然后冯过来，用左手与新会员握手，左手握手为暗记，凡从事抗日活动的人，遇见用左手握手的人就是自己人。这一组织在外地也有发展。参加的人数当不在少，仅 1 月 13 日晚，就有十二人加入。另外，冯还特别注重干部人才的培养，在泰山成立了一个战术研究班，课程除研究军事外，冯还亲自讲时事、政治。

1934 年，除许多国民党显要如居正、孔祥熙等前来或途经泰山拜见冯外，而更多的是许多来泰山春游的大中小学生纷纷要求谒冯，凡青年学生要求谒见，冯无不答应，而其发表谈话大都是批评政府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宣传抗日。凡有宣传抗日的机会，冯从不放过。他在胶东考察期间，几乎每到一地都要作一次抗日宣传的演讲。1934 年正是"莫谈国事"和"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的年代，在泰山"隐居"的冯玉祥几乎成了全中国抗日的代言人。

政界不应有"常青树"，领袖下野本为历史的常态，但对每一位领袖而言，下野总是一剂难吃的药。领袖下野，欲当平民，难！下野领袖，再欲为王，难！大彻大悟，遁入空门，一了百了，难！卧薪尝胆，孜孜以求，东山再起，难！1934 年，冯的隐居生活究竟过得如何呢？冯曾对这一年作过小结，权且作为本篇的结束：

> 今年同我相处如此之久，还不如去年来得难过，来得有劲，来得有意思，来得慷慨义气……国土失了不能复，同胞奴了不能救，你这个年算把我白活了，我不能真正满意你。

【名人聚焦】

庐隐:新的女性

⊙陈庆琳

庐隐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坛上，曾经是位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就像某个前辈所说的:“凡略看过中国新文学书籍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庐隐女士的。”

庐隐的作品，无论散文和小说，都带有自传的色彩，读得多了，她的身世更清晰，或哀或怨，或思或感，或爱或憎，都从她描写的人物一颦一笑中走来。她在成名作《海滨故人》里描写女主角露沙的相貌和性情说:“露沙有一个很清瘦的面庞和体格，却十分刚强，朋友们给她的赞语，是短小精悍，她的脾气很爽快，但心思极深，对于世界的谜，仿佛已经识破，对人们的交接，总是诙谐。”我们知道，海滨故人是庐隐自己前半生自传，露沙就是她自己。翻看庐隐的相片，她那双哀怨而富有才情的眼睛，还有那紧闭的双唇，无不显示出她坚毅而叛逆的性格。

庐隐和冰心同样以“问题小说”步入文坛。对于“人生是什么”的问题，她们差不多同时发问，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回答却完全两样。冰心作人作文是温雅细致，庐隐则是豪爽痛快;冰心的作品里充满粉色的温馨、母爱、小弟弟、高山大海，是家庭的温情和大自然的赞歌，满含柔情，力求将读者从生的烦苦中引向“爱”的意境，而庐隐的作品却渲染出了灰色的孤寂，是男学生、女学生、同性恋、多角爱，是爱情追逐，是悲苦命运的挣扎，她努力打破世人的迷梦，引读者去恨世。

庐隐承认，她自己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总拿着一声叹息，一滴眼泪，去笼罩宇宙，去解释一切。她的朋友们认为她有一颗饱经忧患的寂寞心灵。她的情感总是被一张悲愁之网笼罩着，所以她爱用“斜阳”、“孤鸿”、“疏星”、

"凄风"、"雨后梨花"。她多数写自己的悲苦，可在读者看来，这悲苦并不只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哀伤。文学批评家称她的作品是"伤痕文学"，称她是"感伤派女作家"。

庐隐率真、坦白、毫不掩饰地袒露心迹。个性极坚强，几乎什么事都由她自己做主，虽然表面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内心却有厌世的倾向。她童年的遭遇决定了她的性格。

庐隐有着极不幸的童年。她原名黄英，1899年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官宦家庭。降生那天，外祖母离开人世，小女婴被看成是不祥之物，遭到冷落和嫌弃。身为富家女，庐隐却在孤独和压迫中度过初生的岁月，亲生母亲对她漠不关心，有一次甚至将她关在黑屋子里，给她心灵留下了永远不能弥合的痛苦和恐惧。她变得孤僻、倔犟，家人愈发讨厌



女作家庐隐



庐隐与高师的同窗好友程俊英（左）、罗静轩（右）。

她，让她时时感觉："假如死了，也许比这活着快乐……"

出乎亲友的预料，这个众人嫌弃的女孩却在1919年考进入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国文部。她的第一次创作，是1919年写的《隐娘自传》，追忆她幼年的故事，那是用文言文写成的伤感故事。她感觉"隐娘"这名字不雅，就换成了"庐隐"这两个字作笔名。

也是在这一年，五四新思潮将庐隐卷了进去，《新青年》杂志成了她的"圣经"，胡适与陈独秀的论文、鲁迅的创作、周作人的翻译是喂养她的粮食和供她呼吸的空气。反抗大家庭、反抗礼教、追求个性化的生活，庐隐一生乐此不彼。她开始用白话文写些短篇。1921年，她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处女作《一个著作家》，并与冰心、叶圣陶、王统照一起成了文学研究会的活跃分子。1922年，庐隐从女高师毕业后，先后在安徽、河南、北京等地任教，成为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

1923年，她爱上了有妇之夫郭梦良，解除了与以前未婚夫的婚约，而先前的婚约也是她自己作主的。与郭梦良的婚姻遭到双方家庭的非议，给她带来的痛苦多于快乐，这一切她默默忍受了。两年后，她的丈夫因肺病离她而去，给她留下一个不满十个月的女婴。来自不易的幸福幻灭于一瞬之间，她不知如何是好，烟卷、酒瓶时刻不离身。她大声地哭，大声地笑，情感与理智



痛失爱妻的诗人李唯建

濒于崩溃，生活颓废而放纵。人们看到的她，总是穿一件深黑色的不长不短的衣服，脸上布满了愁云。她做过教员和编辑，靠微薄的薪水，带着孩子艰难度日。所幸的是，她的文思并没有枯萎，依然勤奋，写作敏捷，写成了《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归雁》等作品。此时她所写的作品比她以前及以后更有力量。

一个偶然的机会，清华大学的年青乐天诗人李唯建成了庐隐的热烈追求者，他们通信，交谈，庐隐被穷追不舍的诗人感动了，尽管这个追求者比她要年青十岁，却从此让她动荡的情感和生活安顿下来。两人洋溢着炽热爱情的书信发表在有名的《云鸥情书集》中。1930 年两人东渡日本旅行结婚。这场奇异的婚姻让庐隐品尝了自由婚姻的甘甜，她的作品也一扫过去郁闷伤感的阴霾，代之以清新自然的笔调。归国后，庐隐在西湖畔写出了《玫瑰的刺》、《象牙戒指》、《女人的心》等。1932 年淞沪战争时，她慰问十九路军伤兵，写出了长篇小说《火焰》。她的创作要从纯粹的个人生活圈子迈入到宽阔的社会天地。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隐的名字由此而来，也隐示着这位新女性先驱毕生坎坷的命运。就在新的尝试开始之际，1934 年 5 月 13 日，庐隐却因难产死于上海的大华医院。

庐隐，这位五四精神的产儿，一位浑身充溢着个性张扬的新女性，在对旧礼教的叛逆中走向了自己的归宿。

【名人聚焦】

李仪祉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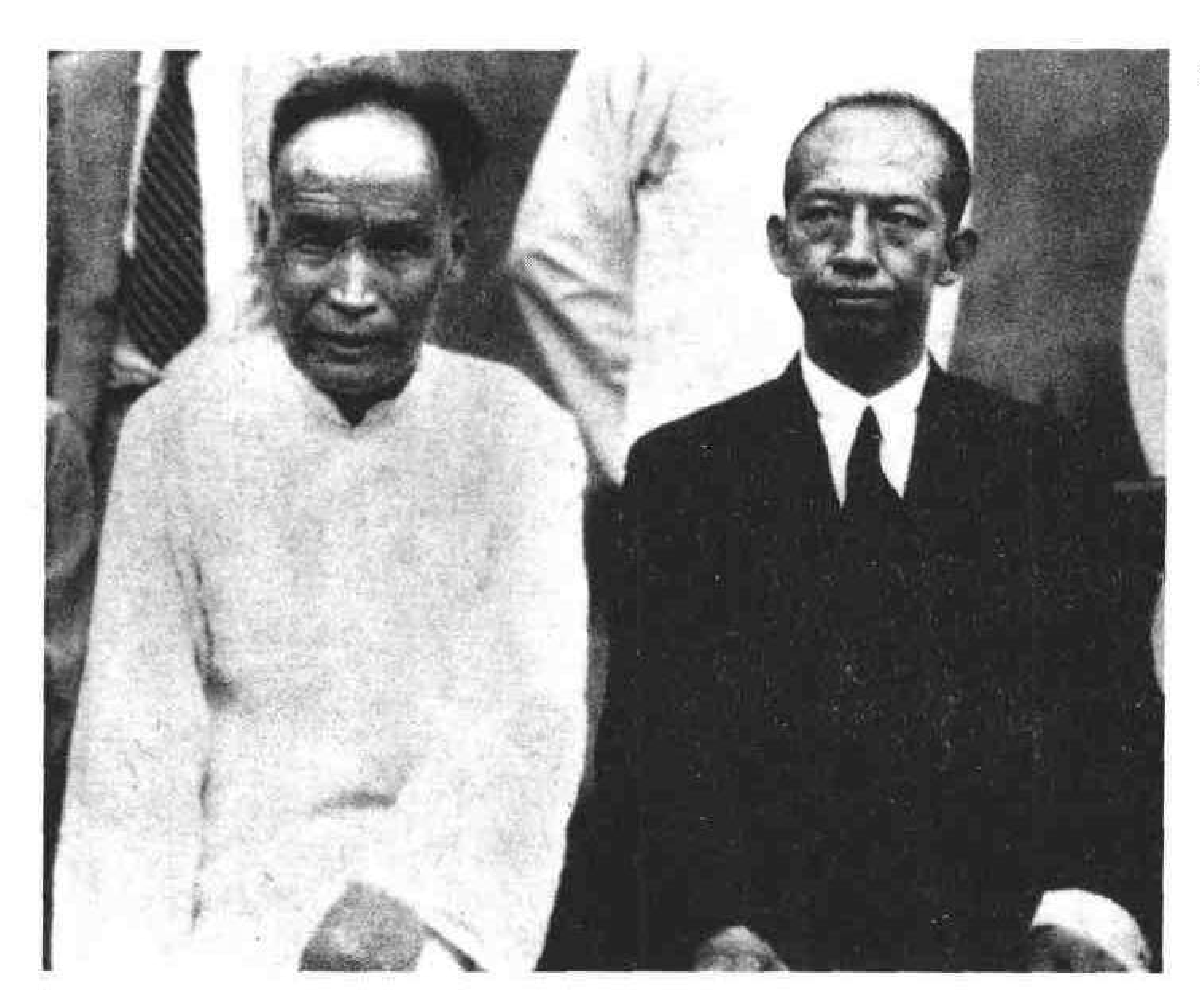
⊙枫 林

1934年，洛惠渠水利工程在陕西动工，这一工程灌溉的面积预计达50多万亩。工程的发起、设计和组织都离不开水利专家李仪祉。

李仪祉，一个陌生的名字，正统的教科书很少提到他，而经常会提及他书院的同学于右任，他那位同学相貌堂堂，有“美髯公”之誉，是政坛上的活跃人物。出生陕西蒲城望族的李仪祉选择的是一条与功名富贵毫不相干的行当——水利。他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主要是在德国留学时获得的。1909年，他到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当时是为了修铁路。1913年进但泽工业大学学习水利，他的勤奋和对水利事业的热爱给那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极少有人像李仪祉那样深刻了解农业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他认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国家，他在所著的《重农救国策》中，提出一个令人难忘的观点，即：在历史上，中国过去伟大的领导人都是农业方面的行家，凡是重视农业的年代，社会就稳定繁荣。他建议以后中国的元首应该称为农首，各省长官称为司农，国民应该成为常农（经常从事农业劳动）或者隙农（间隙从事农业劳动），军队要成为农军。李仪祉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他在1915年回国后，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最能够影响农业收成的水利事业。

归国后的最初七年，是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度过的，他在那里担任教授、校长，为学生教授河工学、水文学、大坝设计等课程，以一丝不苟的态度为中国造就出一批水利工程人才。1922年秋，李仪祉自南京返回陕西，那个省份严重缺水，需要水利工程的赞助，而陕西又是李仪祉的家乡，是他最



李仪祉(左)

乐意服务的地方。在黄土高原上他付出了自己最多的心血。他先后为陕西设计兴修过八项灌溉水利工程,在一个被战乱、贫困和愚昧折磨的内地省份能够完成这许多事业,他的才干和毅力必定是无与伦比的。他痛恨鸦片,泾惠渠完工后,他宣布:凡是种鸦片的田地,拒绝供水。结果,泾惠渠全区便没有人敢种鸦片。日后,黄炎培参观泾惠渠后在《河车记》中写道:元朝郝陵川先生有句话"能活百万生灵于水火之中,则吾学为有用矣",像李先生才不惭愧了。可是,当地豪门深恨李仪祉不让种鸦片,绝了他们的财路,致使已经任陕西建设厅厅长的李仪祉无法忍受他们的攻击而辞职。

不仅陕西,全中国都需要这样的上才。从1931年到逝世,他一直被推举为中国水利学会会长。1933年4月,国民政府任命李仪祉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8月,黄河决口,有五省五十余县被淹,民众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9月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成立,他任委员兼总工程师,负责



每年都有大量的黄河灾民离乡背井。

堵口工程。在忙于治黄河的同时，他仍关心陕西水利工程的进展。

李仪祉死于 1938 年。临终前他看到自己筹划的八个水利工程中，已经修建的有五个，其中已完成的泾惠、渭惠和洛惠三渠灌溉面积共计 180 多万亩，梅惠、织女渠还未完工。他的贡献超越了政治，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他的成就表示了敬意。3 月 15 日，李被安葬在泾惠渠上的两仪闸畔。附近民众纷纷赶来吊唁，有五千农民为他送葬。

【秘闻曝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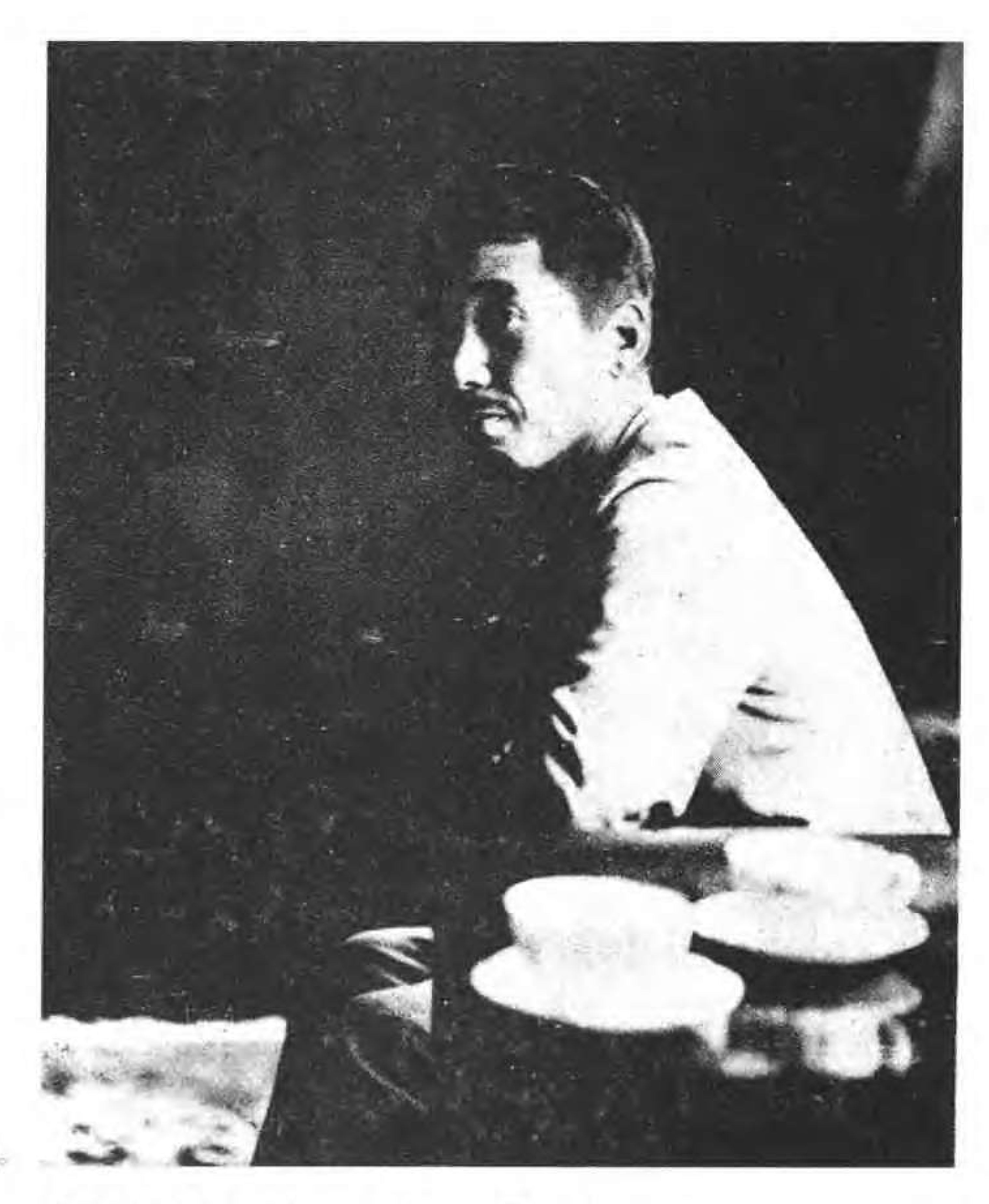
震动首都的藏本失踪事件

⊙朱宝琴

1934年6月8日晚10时45分左右，坐落在南京鼓楼西侧的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内走出一位四十来岁、中等身材、蓄有小胡、身着淡色西装的日本人。他叫藏本英明，时任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因仕途失意，决计轻生，乘同僚们前往火车站为日本驻沪公使有吉明来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外交部宴会送行间隙，单身出走。只见他雇了一辆洋车，嘱车夫将其拉至中山门外。车抵中山门时，已近夜间12点，车夫因天时过晚，不肯出城，藏本只得在中山门前下车，步行出城。他沿着通向紫金山下的中山陵路径直朝前走，夜色中登上了紫金山顶。气喘吁吁的藏本，回转身来俯视南京城内，只见灯火璀璨。他稍稍吸了一口气，双手合十向城内阴阳营方向的亲人(随其居住的夫人及一子二女)默默告别。随后，他来到山顶的三角塔旁，将随身所带的名片、照片用手帕扎在三角塔扶梯上，作为曾经到此处的标识。做完这一切，藏本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初夏的紫金山顶，凉风习习，阵风带来的松涛声似夜色中低沉的豹吼，由远而近，令他毛骨悚然。求生的本能使他一跃攀上离塔不远的一棵松树，寻死的念头，一时间抛到九霄云外。就这样，战战兢兢的藏本攀着松枝熬到天亮，这一夜他感到特别长。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藏本即离开紫金山顶，向中山陵侧的紫霞洞方向走去。他饥肠辘辘地来到紫霞洞旁，找到一处塘水，饮了个痛快。9日这一天，藏本逗留在紫霞洞旁，饥渴时以水充饥，晚上就爬上大树过宿。显然，藏本既不想速死，也不愿成为山上野兽腹中之食。

6月10日，他又由紫霞洞走向后山。据其事后称，想在山中僻静处“断



藏本在外交部客厅里。

食绝命”。又因绝命场所未能完遂，又苟活下来。

原来，藏本拟在后山搬石造一坟墓，独居其中，绝食毙命，无奈此地，“石块过小，未能筑造坟墓”。于是又攀上大树度过一宿。不难想象，两天来粒米未食的藏本，已是求生不能，求死无力。

6月11日藏本从中山陵后山，一路蹒跚来到明孝陵后山，打算在这里搬运石块重新建筑坟墓，终因体力不支，又虑及此处靠近城边，易被人发现，于是改变计划，走向明孝陵后山深处，发现一山洞，足能容下一人，于是他就此藏匿其中。三天三夜腹中无食的藏本早就精疲力竭，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是12日晌午。浑身瘫软，饥饿难耐的藏本已无力站起，只得由洞内蛇行爬出，到一洼地处，顾不得三七二十一，一头埋进积水，呼呼地吸起来，腹中进了水，藏本觉得略有精神，又艰难地爬回洞中过了一宿。6月13日一早，藏本熬过饥饿难眠的一晚，拿定主意，不再绝食，爬到山下寻找食物。

藏本藏身的地洞



这天一早，明孝陵前的一家茶馆刚开门，便迎来了神情沮丧、囚首垢面的不速之客藏本。茶馆女主人还算见过世面，没有惊慌失措，收下了藏本送上的两毛钱茶资，安排客人喝完茶，又按藏本要求，端上一碗刚捞起的阳春面，看着来人狼吞虎咽的吃相，心里似乎明白了三分，女主人坚持拒收藏本从西装袖口扯下的两颗充作食面资值的金钮扣，连称："所食甚微，可俟下次。"藏本用流利的汉语苦笑着说："未必再来。"说完将两粒钮扣放置桌上，神情木然地离开了茶馆。

藏本前脚离开茶馆，政府军警机关便接到茶馆女主人差工友打来的电话，称有政府查访寻人要情报告。

于是，日人藏本失踪事件，始有线索，从6月8日藏本出走至6月13日寻获藏本，中国首都南京上下为之搅动不安，城内城外闹得鸡犬不宁。

6月9日上午10时，日本驻京副领事田中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口头照会藏本失踪，要求搜查。下午4时，日方向中方递交了备忘录。承担对日交涉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面对来自日方的汹汹抗议和下关江面上蜂拥



发现藏本的魏宗青

而至的日本长江舰队，惊恐万状，深虑经其协调的中日关系再次蒙上“阴影”。

当是时，南京国民政府以“妨碍统一政令”和“讨逆”名义，先后用武力扑灭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与此同时，蒋介石向江西发动起的第五次“围剿”，也因红军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得了主动地位。急于求胜的蒋介石，为与日本保持“相安”，迎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声明》的要求，与日本达成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协议，默认了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占领。就在蒋介石在江西“督剿”红军、汪精卫独挡一面承担对日外交的时候，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因日本驻京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事，面临着一触即发危机。这不能不令汪精卫心惊肉跳。他一面对日本方面汹汹抗议表示“极为重视”，一面通知驻京军警当局“严密搜查，务期明了真相”。

9日上午，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长陈焯，派监察长陈独真前往日本领事馆访问，力图了解藏本平素个性、嗜好、身材、服饰及出走原因。日本方面虽未提供藏本出走真实原因，但就其出走时间、外貌特征提供了线索并交出一张藏本近照。当日，南京警厅即将藏本近照翻印多张，分贴藏本平日来往各处及城关车站。在四处查访的同时，军警当局悬巨额奖赏，以期水落石出。督察长陈独真还对从日领事馆至阻阳营藏本寓所、日领事馆至下关一带的沿路岗警逐一查问，也未获得蛛丝马迹。

6月10日是星期天，首都军警当局破例不休息。厅长陈焯召来驻京各局队所长官研究扩大访查办法，还派专人赴藏本住所慰问家属，以示当局“竭诚关怀”。经过星期天紧张寻查，仍未发现藏本踪迹。此时，日本长江舰队纷纷调至下关，还传出“有水兵上岸强占南京的消息”。面对这种形势，汪精卫急忙召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及朱培德等军事要人计议，这时才知南京城内无作战部队，仅有军官学校学生三四千可以临时应战。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主力已全部调往江西“剿共”前线，石城实际等于空城。汪精卫又获悉，蒋介石将定于6月13日左右回南京参加军官学校成立

十周年纪念。汪为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使"前方军事不至于因而扰动",在一天中三次致电蒋介石,劝他万万不能回南京。"若一人回,同堕空城,俱无益也",并再次特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前往日本使馆面达政府重视藏本失踪之意,请求"日方持镇静态度,勿过张皇",表示政府"现正督饬宪警尽力彻查"。

6月11日,首都警察厅在督察处召集各主管会议,决定实行大规模户口总检查及四郊侦察。饬令各下属单位不分昼夜加紧工作,"即日寻出线索查得藏本下落"。与此同时除登报悬赏寻访外,还派员分赴苏州、无锡、镇江各处查访。

6月12日汪精卫为安抚日方,又派员赴上海面见日本公使有吉明,再次表达对藏本失踪一事的高度重视,详细通报了南京宪警竭力查饬的情况,请求日方"务取镇静态度",殊不知,此时日使馆已派参赞有野前往南京与日领事馆密谋对南京政府继续施加压力的对策。

这天下午,日领事馆一等秘书须磨、日本使馆参赞有野奉命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以藏本副领事行踪尚无着落,要求严饬彻查"。

自藏本失踪后,南京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韩文焕、警察厅督察处处长金斌,秉承上级旨意接连几天亲自参加探查工作。查访范围由市区扩展到城郊的道路及沿江管辖区域。南京城里城外,行迹可疑者、面貌奇异者、似有精神病状态者都成了重点探查对象。重赏告示布满了全城要道。但直到6月12日晚仍无藏本线索。

6月13日上午9时,军警当局接到明孝陵茶馆举报有关线索,当即派人依此线索向明孝陵后山寻觅。上午11时左右,在明孝陵后山,发现了神情沮丧、蓬头垢面、身着西装的藏本。经查姓名,校对照片,确认是藏本无疑。

起初藏本支吾其辞,欲言又止。警方当局派人请其下山登车入城,藏本坚辞不允。经来人再三诉说南京政府在其出走后四处寻觅的苦衷细节,藏本才答应下山入城。为此警方与藏本一直磨蹭到下午2时。

被寻获后的藏本,由警厅人员径直带至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焯与藏本素有交往。一见面,藏本便紧握陈的手涕泣不已。经劝解,藏本才揩泪进食。饥不择食的藏本,一口气喝下两杯牛奶、一瓶汽水。在叙述出走经过时,又禁不住伤心落泪。看他那种痛苦万状的神情,似有难言之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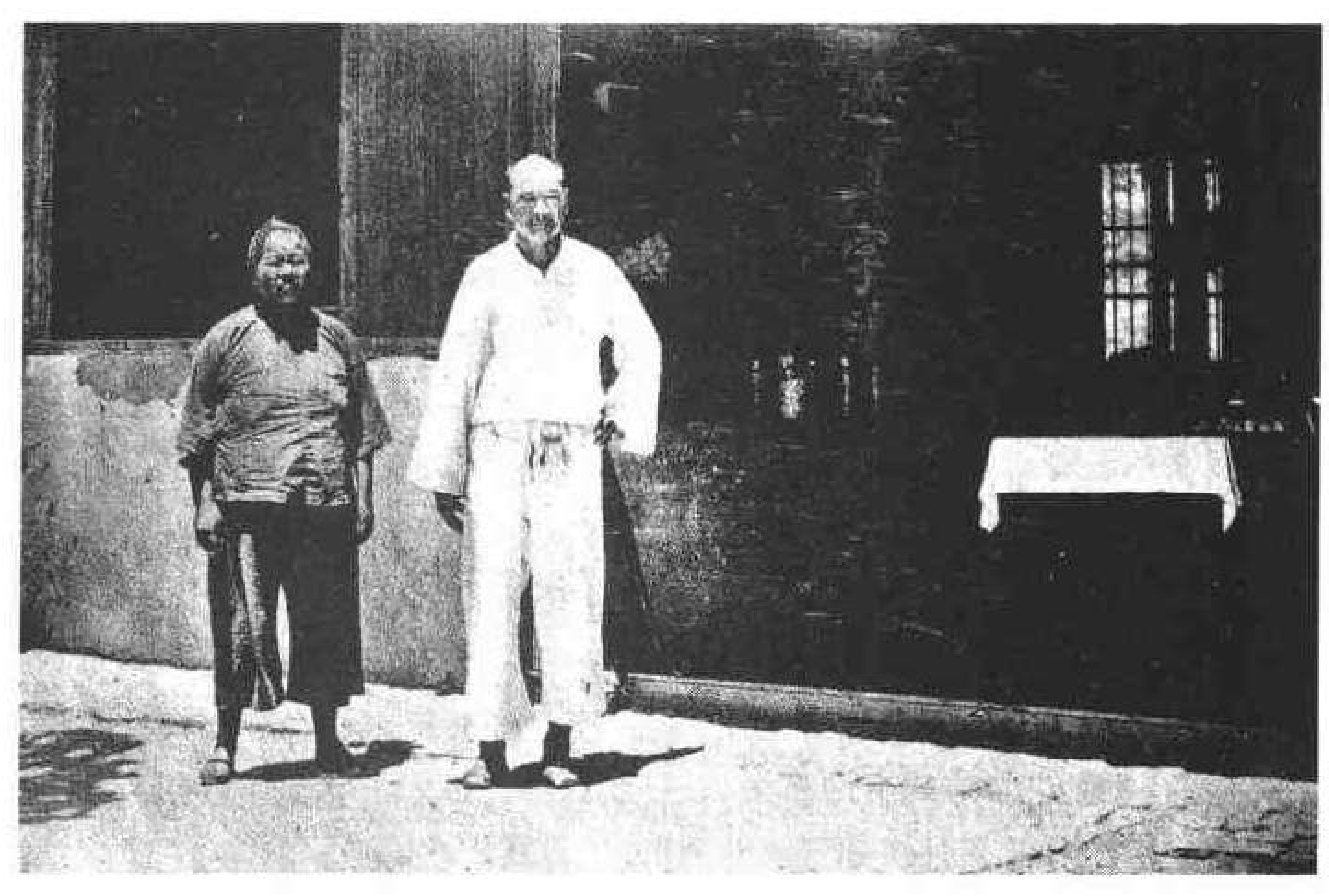
藏本意外寻获，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如释重负，弹冠相庆，仿佛喜从天来。外交部、首都警察司令部、行政院、参谋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组织委员会纷纷派要员到警察厅探视藏本，以示关怀。

藏本对于出走原因一再表示："我不愿说，回领事馆后，也不愿发表。"但他强调："我一身存亡与贵国均无关系，我今已回，贵国无负于我。"当美联社记者、路透社记者向藏本采访新闻谈话时，他言语清楚，记忆良好。

6月13日下午，国民政府外交部通知日总领事馆须磨来部接洽转送藏本事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亲自出面接待。曾经登门兴师问罪的须磨，一脸的尴尬。藏本的寻获使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倒是藏本见到这位上司，涕泪横流，抽泣不止。颇有涉外经验的唐有壬，试图当着日方的面澄清藏本出走经过，实际上在此之前，外交部已经笔录了藏本出走的全过程，并要求藏本草绘了出走详细途径。不料，唐有壬的逢场作戏被须磨打断，他冲着欲作详叙的藏本生硬地说："你现似疲倦，少说话吧。"难得在日本人面前有勇气的唐有壬，一改常态，冲着藏本问道："你现在精神还好吗?"绝处逢生的藏本对中方多日彻查已感激涕零，连声回答："现在渐好。"此时，候在室外的中外记者一涌而入，将相机镜头对着藏本不停地拍摄，须磨见状，即刻起身催回。落



款待过藏本的刘氏夫妇



日余辉中，须磨领走了藏本。笼罩石头城的藏本失踪阴云暂时退去。

6月14日日领事馆派须磨等人进见汪精卫，诡称"过去疑云已一扫而空，两国邦交益见好转"，并掩饰说"藏本副领事8日晚之出走，系一时神经衰弱，毫无其他原因。"汪精卫心领神会连声称"欣慰"，并希望藏本早日恢复健康。

6月15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派专人"陪同"藏本赴上海福民医院"疗养"。期间，不准他接触任何宾客和来访记者。

6月21日当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将藏本的两枚金纽扣找回，并派人送交南京日本领事馆时，藏本及其眷属，已在日前由日警"护送"回国。搅得石头城上下鸡犬不宁的藏本失踪事件，随着藏本的押解回国，销声匿迹。

由"执政"而"皇帝"的溥仪



1934年1月，溥仪在日本的操纵下，成为伪"满洲国皇帝"。图为溥仪"登基"后着元帅装的留影。

【秘闻曝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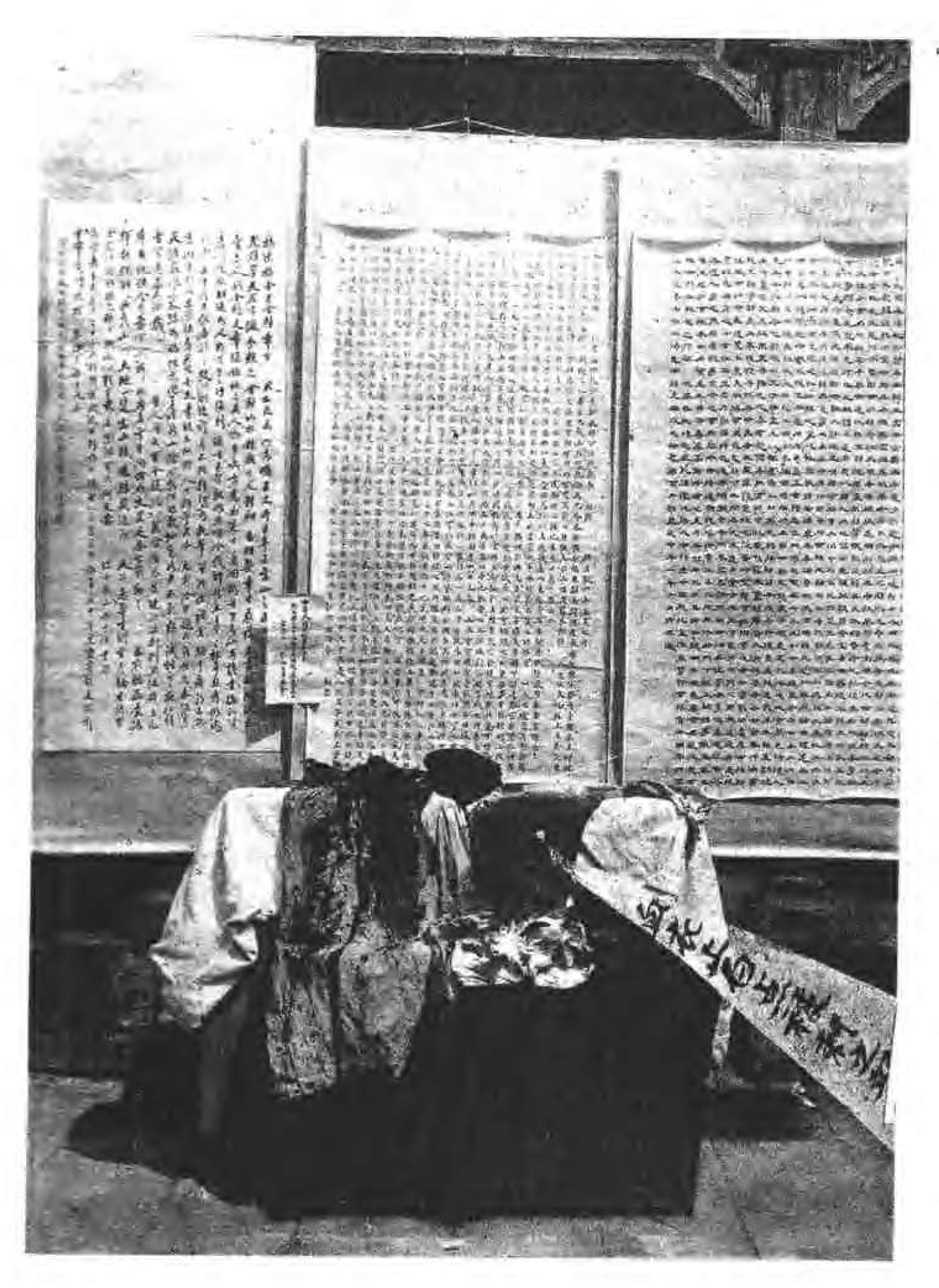
哀哉，叶木花！

⊙李 风


叶木花遗像

1934年5月24日，华侨学生叶木花在日本长崎被杀害。此案引起中国舆论的关注，人们还都不可能忘怀两个月前的藏本英明失踪案，失踪案与中国毫无瓜葛，日本却将中国首都闹得战战兢兢。那么，日本人公开杀害中国侨民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5月23日，叶木花在赴华侨所办时中小学途中，遭到长崎贸易学校学生渡边信义等数人无故辱骂，叶忍让而走，才躲避无事。25日，叶在上学途中竟遭渡边等用短刀刺死。6月1日，中国外交部训令驻日公使蒋作宾转请日政府严惩凶手，并注意审判情形。中国报纸也登载了叶木花的遗像和血衣，要求严惩罪犯。7月20日，日司法机关仅判渡边二年以上、七年以下苦役，送少年刑务所了事。叶木花的父亲叶修仪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赔偿也被拒绝。比较藏本英明失踪案，当时日本政府声嘶力竭的威胁引起南京全城的骚动，中国政府、外交部与警察在责任未明的情形下，便诚惶诚恐地四处寻找，到了叶木花案，日本根本不把中国的态度当回事，年青的叶木花的生命显得那么无足轻重、微不足道。当时一家刊物只能默默写下：“哀哉，叶木花！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悲哉，弱国的国民！



叶木花的血衣

【秘闻曝光】

史量才：魂归何处

⊙李继锋

1934年11月13日，下午3点零5分。一辆崭新的湖绿色防弹轿车正行进在沪杭公路翁家埠段，司机忽然发现前方路中停放着一辆别克牌敞篷车，赶紧放慢了速度。突然，有六个黑衣人提着手枪从敞篷车周围钻出来，向着轿车放枪。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跳出轿车，夺路狂奔，穿过一间茅屋，躲入干涸的水塘。杀手们追上来连放数枪，一颗子弹从他的嘴里穿过脑部，另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耳射入。他倒在血泊之中。

第二天，上海的《申报》披露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标题是《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不幸遇害的正是这家报纸的总经理史量才——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第一人。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和铁路一样，报纸被看作是近代文明的象征，而且它们相得益彰。自从沟通华北与江南的津浦铁路通车后，京津地区的邮件两天内可以寄到上海，徐州以南地区的邮件，一天就可以到达。而未通火车的边远省份，邮信到上海，少则十天到二十天，长的要拖拉到两个月以上。

上海的夜晚充满诱惑。繁华的南京路霓虹灯五光十色，涂了油漆的木块铺就的马路闪着令人目眩的光芒。有人作过统计：在这条路上，从上午8点、9点到晚上11点左右，要是间隔三分钟还看不到一辆汽车，那就是一件新闻了。

相比贵族化的南京路，被称为四马路的福州路却是个各色人等聚集的地方。福州路与山东路交界的地方叫作望平街。这里正好是市区中心。前门有福州路的光怪陆离、声色犬马，后门挨着安静的石库门、小弄堂。这一

带从清末以来就是新知识、新思想的输入与传播中心，许多左右着中国舆论的报馆在这里安家落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一家家报馆紧挨着一起。每天清晨都有邮车和成千的报贩云集在百十米的街道上，将报纸运往本埠和外地。

在当时的英国伦敦，有一条报馆林立的舰队街，《泰晤士报》等各大报发布的消息和评论左右着英国乃至欧洲的舆论。中国的望平街就仿佛是英国的舰队街，而《申报》长期是这支舰队的旗舰。在半个多世纪里，它既是中国最老资格的报纸，同时也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史量才

那时，上海的商人、企业家、银行家、求职者、教师与市民习惯在家里看《新闻报》与《申报》，那里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各种消息。长江以南一带，许多人只知道《申报》，他们干脆将所有报纸称为"申报纸"。

1872 年，复兴大清王朝的曾国藩去世，带走了儒家传统的最后一抹辉煌。这一年的 4 月 30 日，英国商人美查创立了《申报》。报纸代表了一种新的思维与力量。这家报纸从一开始就是办给商人和市民看的，它的创办人既不想干预政治，也不想充当道德方面的传教士，只想靠提供各种消息和娱乐而赚钱。在第二份报纸上，申报就开始登载广告，华商每五十字刊登一天，收铜钱二百五十文，而洋商登同样的广告要付大洋一元，相当于千文铜钱。那数十年是办报人最寂寞的时分，能够识字读报的绝大多数是读书人，他们整天沉溺于四书五经中，忙着应付科举，博取功名富贵，对于国际形势和国家大计漠不关心。直到康有为、梁启超利用报章杂志宣传变法，人们对报纸才刮目相看。

1903 年，"《苏报》案"是上海人街谈巷议的话题。大清政府向租界当局的会审公廨控告自己的两个臣民章太炎、邹容。章太炎在报纸上公开嘲讽光绪是个五谷不分的皇帝，邹容更鼓吹用共和代替帝制。他们被投入了监狱。这一年秋，杭州蚕学馆毕业的学生史量才从松江来到了上海。那天正好秋雨

潇潇，衣着单薄的他浑身尽湿，囊中羞涩。他得靠在南洋中学的薪水生活。他帮助校长接待各方面客人，还担任理化教员，有空还到其它学校兼职。在务本女学，一位叫汤国梨的女学生回忆道：史量才自奉甚俭。上课时，常穿一件半旧面经过改造的竹布长衫，由于纽扣位置均已移动，纽扣原有位置痕迹较新，很显眼，但他讲课很认真，间或涉及时局的国家大事，则富有正义感，但颇含蓄耐人寻味。

1904年，史量才到《时报》馆拜访朋友，第一次踏上了望平街。这条貌似平常的小街将最终改变他的人生轨迹。1908年，史量才到《时报》任过主笔，参与了当时的立宪运动。他第一次成了望平街的一员，见识了叱咤风云的各界人物。但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四年后，他会成为《申报》的老板，成为望平街上举足轻重的人。

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9号，有一座幽静典雅的花园住宅。在宽敞的庭院里，时常可以发现史量才在舞剑打拳。他喜欢用这种方式舒缓自己紧张的神经，强健自己的体魄。他能与拳师角力半小时，仍然脸不红，气不喘。平常的日子里，只要有空暇，他好读书。即使事务繁忙，也常常手执一卷精读。虔诚信佛的他每晚与夫人沈秋水在佛堂里焚香静坐，直至入定。1934年，他算得上是上海最忙碌的人之一，但还保持着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1912年是史量才人生的转折点。那年，中国成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舆论受到空前的重视。北京办起了上百种报纸，上海也有三四十种，全国不下一千一百多家。大多数是创办得很快，消失得更快。

史量才是个机遇极好，又能够把握机会的人。1912年，一位钟情他的女人沈秋水投奔他，并带来巨额财产。那时，正逢《申报》老板席子佩要出售该报，对报纸的效用印象深刻的史量才，不失时机地以12万元买下了这份已经发行7000份的老牌报纸，并找到名重天下的张謇等人入股。从此，他的事业、他的生命与这张报纸合而为一。

史量才对《申报》的投资离不开沈秋水，对这位青楼女子他终生心怀感激。

史家是三层楼房。沈秋水住在二楼朝南的大房间里，这里阳光明媚。而史量才的原配夫人庞明德住在沈秋水隔壁小间旁的一间内。平时，沈秋水在史公馆执掌经济大权，迎来送往的应酬全由她出面。在杭州西湖边，史量才还为她盖了秋水山庄别墅，闲暇时同来这里小住，以驱散都市生活带来的烦

踪。

早就闯荡上海滩的史量才兼有文人的眼光、商人的精细和创业者的魄力。在《申报》馆一楼，放置着他从国外买来的最新的印刷设备。他还聘请到了办报的干才。《时报》的陈景韩被史量才挖来作主笔，《申报》给予的薪水三百元，为《时报》的两倍。《时报》老板狄平子一气之下从此与史量才断交。常以"冷血"为名的陈景韩做事细心，反应敏捷，遇事负责任，史量才常赞赏他舵把得稳，能够在民国的政治混乱年代生存下来。负责经营的经理是张竹平。在望平街上，张竹平的经营能力是出了名的。他首先采用分栏分类刊登广告，赢得了许多客户。

1913年3月，《申报》连续刊登十多天广告，重金收购开办四十年来的《申报》。一位叫张仲照的老人有感于史量才的诚意，将收藏完整的《申报》交与《申报》馆。后来在《申报》五十年大庆的时候，他在纪念册的封面上方刊载了创办人美查夫妇的照片，张仲照这位忠实读者的照片则登在封面的下方。许多人都无法理解史量才的这一做法。直到1928年，史量才在"《申报》发行二万号纪念"，才说出了自己的意图："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他正是以司马迁修史的态度来办报。苦心经营三年后，《申报》的销量从7000份增加到了2万份，增长近三倍。

1932年是史量才买下《申报》二十年的日子，也是《申报》六十年生日。这二十年的路并不平坦，尤其是1915年的大难，几乎让史量才前功尽弃。

1915年冬，正是世界大战正酣、袁世凯谋求称帝的时候，舆论日渐消沉，报馆纷纷关门，剩下的也不得不将报道的重点从政治转向工商，由国内扩展到世界。忽然，《申报》内部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诉讼。原来的股东席裕福控告史量才还款超时，将史量才等《申报》股东推向法庭，开出了赔偿24.5万两银子的高价。史量才被囚禁，租界法院判他赔偿24.5万两。史量才遭到这场飞来横祸，愤怒之极，几乎就要抛弃这花费三年心血的报馆而去。

陈景韩等劝他委屈忍耐，再图发展。张竹平经理回忆当时的情形：史量才爱报之心，甚于生命。依靠平日个人的信誉，朋友们纷纷借钱给他，当他握着一大叠钱庄汇票递交给检查官时，拿钱的手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旁观者也毫不掩饰对这不公平的判决的愤怒。史量才独自一人掏出了全部的赔偿



史量才遇难处及遇难时所乘汽车。

金，他在进行一次巨大的赌博，《申报》成了他一个人的产业。

缺乏资金的史量才，忍辱搬出了老《申报》馆。在他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北京的袁世凯大总统派人无偿赠送15万元，交换条件是希望《申报》能够呼应袁世凯称帝的计划。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史量才想起了父亲所开的"泰和堂"药铺里，有一句醒目的格言："掺假药必火烧雷劈。"成年后他一直没有忘掉这句话。史量才严辞拒绝了袁世凯的诱惑。9月3日，《申报本馆启示》公开披露此事，并表明："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亦无反复之调。"这个谨慎的报人面对不可一世的袁世凯大总统，坚定地站在了维护共和的立场上。

顶住了1915年的大风暴和大诱惑，《申报》全馆员工奋发图强。从这年起步，只用十多年后，他们就抚平了巨大的创伤，《申报》名利双收，史量才很快成了中国新闻界的无冕之王。他的事业扩展到纱厂、银行等许多领域，成



上海各界悼念史量才。

了上海有数的富豪。

望平街中段的一座五层楼建筑物富有西洋情调，至今保存完好，这就是《申报》的报馆。1918年落成时，它是这条街上最气派的报馆，内有上百间的房屋，宽敞而舒适。据说，它花费了主人70多万两银子。

1921年11月21日上午，英国《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参观过《申报》馆，当他看到三部美国新式卷筒印报机在大楼底层转动着，印刷三大张90000多份的报纸只需要一个小时，惊讶不已。他没有想到中国报界有如此先进的设备，会有史量才这样有魄力与眼光的办报人。他不禁感叹到，完全独立的报纸是人类未来的希望，而《申报》和《泰晤士报》算是能够达到这一标准。

20天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也参观了《申报》馆。这位世界报业大会的会长，在这里才与他的副会长见面。两年前世界报业大会在檀香山举行，史量才等被中国新闻界推选为代表。但因父亲去世，史量才未能成行，但世界报业大会的同行为了对他、对中国的同行表示尊敬，仍然推选他为副会长。会晤时，威廉问史量才在中国办报有什么感想，史量才告诉了自己的一个担忧，中国新闻界还缺少忠诚可靠的记者，以至编辑时难以判断消息的真伪。

史量才还收到了美国总统哈定发来的贺电，这位半辈子从事新闻的总统对《申报》的成功感到羡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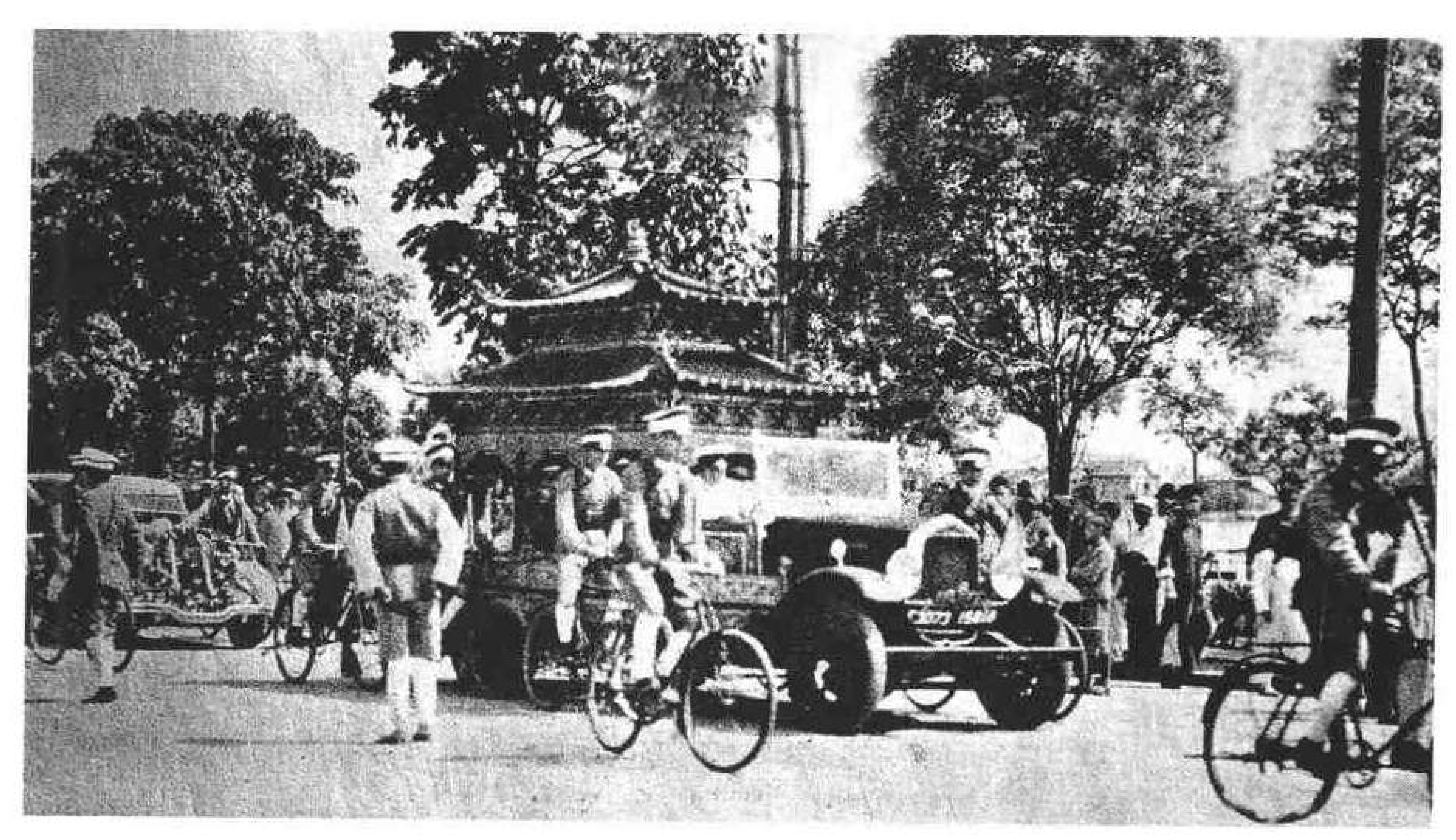
1922年，距史量才买下《申报》已经十周年。那年元旦，《申报》的《元旦增刊》意气风发地写道："往日为政府附属物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经济独立、指导民意之明星；往日为骚人墨客卖弄笔头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宣传民意、促进大同之使者；往日无聊敲诈之新闻记者，今后将为代表舆论之利器；往日为武人、政客作家谱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发展工商实业之先声。"

稳健，不偏不倚，客观而超然，这是《申报》在几十万读者渐渐树立起一种形象。从史量才接手《申报》起，中国的政局就一直处在动荡之中，他办报小心翼翼，以避开政治漩涡和陷阱。当许多报纸为军阀政客摇旗呐喊以获得接受补贴时，史量才早已确定了自己的办报方针。在《申报》馆里，员工们都知道史量才办报有二大原则：一是经济自主，不接受任何方面的金钱赞助；二是新闻中立，新闻报道要快速真实。翻开《申报》，一大半是广告。这是报纸的主要收入，也是《申报》保持独立、长久和稳定的保障。

1927年以后，中国逐渐摆脱了北洋时代的混乱羸弱的局面，但对新闻界来说，新的威胁却在降临。1928年，上海慈淑大楼出现了一个新机构"上海新闻检查所"。刚刚执政的国民党，对待新闻界绝不像北洋军阀时代的那般散漫和放任自流，它的宣传机构竭力要用它的意识形态来控制报杂志和书籍。包括《申报》在内的报纸开始不断出现伤口般的天窗，1930年2月至10月间《申报》就开过几次天窗。望平街的报馆绝大部分都不敢不接受国民党的监督人员，《申报》却拒绝了。史量才的理由很充足，他的报馆没有从政府那里拿过一份津贴，政府没有理由监督他，但史量才仍然希望这个新政权能够给国家带来稳定和繁荣。

《申报》的发行量一直在稳步提升，到他遇害前已经发行到15万份。每天的报纸有四至五大张，根据新闻多少而定。上海本市另有二至二张半的增刊。文学青年喜欢看星期五的文艺周刊，星期天，为孩子们准备了儿童周刊。

在同行中，《申报》遭遇到的最强劲对手是《新闻报》。它的销量也达到了15万。这两家报纸的报馆近在咫尺，相隔只有数十米。1893年1月1日，《新闻报》刚创刊就和《申报》争市场，它在上海市内的销量甚至长期超过了《申报》。竞争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这两家报纸最后都进入了中国发行量最大



史量才灵柩运回杭州。

的报纸之列。

经营《新闻报》的是年轻的汪伯奇兄弟。史量才教训他的儿子史咏赓时，便要他向汪氏兄弟看齐。但对这个强有力的对手，他并不像以前那么担心。早在1929年，他就用《申报》的赢利从《新闻报》的美国老板福开森那里买下了这家报馆的股份，成了它的最大股东。这件收购案曾在上海掀起巨大的波澜。《新闻报》的汪氏兄弟不愿意拱手相让，国民党也不愿意看到史量才在新闻界一统天下。史量才最后采取了妥协的办法，《新闻报》仍然由汪氏兄弟经营，他自己虽然是最大股东，但不过问具体的事务。他信守了诺言，一辈子也没有踏进《新闻报》馆一步。除了《申报》、《新闻报》，他还控制着上海的第三大报纸《时事新报》，那家报纸发行量达到了8万份。这三份报纸加起来，每天的发行量达到了惊人的38万份，通讯方面自备长途电话，国外则和路透社、美联社订有随时提供消息的合同。史量才已经在中国组建了一个庞大报业王国。

他的事业走向顶峰，但却让执政的国民党深感不安。国民党津贴的官方

报纸《中央日报》才发行3万份左右，还抵不上《申报》的零头。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满怀疑虑地注视着史量才的动向，虽然史量才一向谨慎行事，但国民党的报纸还是经常旁敲侧击地称他为报阀，指责他有建立报界托拉斯的野心。

史量才并不像一个劳碌的总经理。他很少把自己弄得疲倦不堪，《申报》早已经确立了完备的组织，他的部下数百人都能够同舟共济。他接办报纸二十多年，使用的还是老班底。

但一进人30年代，史量才和他的《申报》在内外压力下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常以"冷血"之名发表时评的陈景韩已经厌倦了没有休息日、形同苦役的报界生涯，他为史量才干了十八年主笔，也是史量才公馆里练身场上的常客。1930年5月，他离开了报馆。七个月后，经理张竹平也告辞，他要自立门户，不甘只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两人是史量才的左膀右臂，帮助《申报》走了近二十年的成功之路。

失落的史量才再也不可能无为而治了。1931年1月，史量才在《申报》馆内成立总管理处。他请来了老朋友黄炎培，黄炎培又介绍来教育家陶行知，当时，陶行知正受到南京政府的通缉。

1931年9月19日，史量才在家中打麻将，神色紧张的黄炎培冲进来告诉他，日本军队占领了沈阳城。次日，《申报》以醒目的标题《日本大举侵略东三省》、《蔑视国际法　破坏东亚和平》报道了这一将改变历史进程的新闻。这一天的《申报》上，登载了87条战地消息，其中有45条是《申报》记者亲临战地采访得来的。

那个年代是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史量才受到了时代的感召，行事风格大变。《申报》与它的主人一样开始了改变，它尽量保持着客观中立和冷静，但也不时喷涌出忧愤和激情。《申报》公布了《今日努力的工作》当作了改革宣言。他们要以新面貌迎接1932年，这一年对《申报》是不平凡的日子，那是它的六十华诞。

史量才起初关注的还是报纸本身，但动荡的时局使他最终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不仅是《申报》馆的前台，而且是社会的前台。

1932年初上海本地的局势骤然紧张。日本海军和在沪的日本侨民不断挑衅，上海的空气里充满了愈来愈浓的火药味。1月14日，上海众多名流到史量才的家中聚会，以应付危险的局面。他们约定每周聚会一次。后来被称

为"壬申俱乐部"。蔡廷锴军长等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军官也与史量才来往密切，他带领的这支军队民族意识强烈，一直要求北上与日本军队作战。

1月28日，日军海军陆战队对上海发起攻势，希望能够有关东军在东北的运气。但十九路军的官兵没有退走，而是坚决抵抗。大上海被战火笼罩。闸北宝山路一带被炸成了废墟，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烧成了灰烬。



史量才遇刺后蒋介石的题词

上海市民在惶恐、激奋、血泪中度过每一天。1月31日4时44分，在企业银行大楼，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组织成立，会址设在瑞金路。延安中路口聚集了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杜月笙等上海最有影响的人物，史量才当选会长。成立会议上，史量才发表演说道："只知打仗杀人的是武人，倾国倾城的是美人，那些做了大官只知封妻荫子的人是家人而已。惟有以身许国的人才配叫国人。"史量才不仅是要别人做国人，他自己也要做国人。面对战火，他从容地说："事已至此，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年近花甲，行将就木，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耳。"

望平街上的史量才变了。他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维持会成立后，他就不再去《申报》办公，而是每天下午到维持会办公，晚饭后主持会议，从不缺席。深夜回家还要和宋庆龄、杨杏佛、黄炎培等会谈。他还将放在汇丰银行的为《申报》购置纸张的七万美元兑换成银元，捐献出来，放在中南银行供市民兑换，避免金融恐慌。

维持会的接待站设立在四川路66号，那里上海市民前来捐献者络绎不

绝，大到汽车、卡车、脚踏车、防毒面具，小到年糕、粽子、红烧肉，这种场面在上海是空前未有的。捐款数达到了93万元。上海开设了39所伤兵救护医院，难民收容所63所，收容从闸北、虹口涌入租界的近20万难民。

2月10日，他在寓所召开维持会的理事会，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还有何香凝、宋庆龄都赶来参加。会后，他们共赴前线慰问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前线官兵。那段日子里，史量才每周同宋庆龄会晤一次，保持密切的联络。会议期间，他的胃痛时时发作，只好自带止痛药片。

3月3日，中日宣布停战。十九路军撤离上海。《申报》在这一天发表评论："吾人惟有继续作艰难而持久之奋斗，毋灰心，毋馁气。吾人如能具持久抵抗之决心，则更大更光荣之历史，终当在吾人热血溅洒之下，展示于世人之眼前。"又说："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长之可能。"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蔡廷锴将从"一·二八"开始到3月撤兵时蒋介石手令和何应钦训令全部让史量才看，使史量才受到极大的刺激，悲愤异常，对内战政策深恶痛绝，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希望幻灭。

4月30日，《申报》六十周年纪念那天，在英国等外国领事的调停下，中日已经停战。随着十九路军撤退，上海及周边地区将成为中国军队不准驻防的地带。在这个忧伤的日子里，《申报》无心庆祝自己的节日，它的时评写道："六十年中殆无一日非国难，六十年来之本报可谓一部国难实录，一部鞭痕层叠、血泪交织的丧礼日志。"在文章的右侧，在一幅版面上，以特大字号分两行写着："媚外苟安，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者，罪浮于汉奸。"

5月5日，《淞沪停战协议》在英国军舰上正式生效。两个签字者都躺在病床上，中国代表郭泰祺是被愤怒的学生打伤，日本代表重光葵则在日本天长节那天，被朝鲜志士尹奉吉炸断了腿。

在那段忧愤激动的日子里，主编张蕴和时常听到史量才感叹办报是一种罪孽，便安慰他说："如果有罪，则罪是我们具体造成的，也应该由我们来承担。"史量才却摇头说："不，你们是按照我的意思在办报，具体事务虽然有劳各位，但责任应该由我负。所谓罪孽不仅仅是登些诲淫诲盗的社会新闻，或者欺骗破坏别人名誉。报馆的责任在明辨是非，是非稍微颠倒，就是罪孽。报馆的责任在提倡公道，公道如果不伸张，就是罪孽。国家与社会依赖舆

论监督和改进，稍有不力，就是罪孽。种种罪孽，决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在不知不觉的环境逼迫中发生的。罪孽真不知道有多少，这些难道不是我应该承担的吗？报纸的威信越高，造成的罪孽也越大。最近，我一直在忏悔，但是补救之道，光念佛是不行的，做些慈善事业也不够。我想为社会做些文化建设事业，虽然不能消除我们的过失，总也能尽尽自己的心意。"

深思熟虑后的史量才决定直接为社会服务，他开始举办各种文化事业。

1932 年 5 月上旬，他在四马路同兴楼招宴《东方杂志》社的俞颂华。史量才席上说，他希望俞帮助他办一份杂志，刊名叫《申报月刊》，目的是阐扬文化和奖励生产。俞颂华记下了他对史量才的印象：先生的果断力是强的，待人的态度是很诚挚的。他的办报纯粹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

史量才还让俞颂华介绍来的《东方杂志》同事张梓生编辑《申报》年鉴。张梓生是个拘谨的人，他怕不能胜任，但史量才说："我早已明白，要先生发展大事业，是为难的；谨慎地去主持一个年鉴社，我却放心。"这样，一个从日到月到年的体系建立起来了。就像他为年鉴作序所写的："以月刊辅日报，乃又益之以年鉴，俾日报月刊为经，年鉴为纬。求治者以史为鉴，同人则以史自役。"他要求他的报纸，像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那样公正无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余惨淡经营此报者数年了，非为私，而为社会国家树一较有历史之言论机关。"

他还设立了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让成千上万青年与市民受益。

就《申报》本身而言，《自由谈》是变化最大的一个栏目。这儿本来是轻松的文艺天地，史量才新聘请的主编黎烈文却让它变成一个富有激情的栏目，他刚从法国留学归来，是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12 月 1 日。他接管了《自由谈》。一大批反对国民党政府或者对国民党政府有所不满的人有了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且是在全国最大的报纸上，还有着优厚的稿酬。茅盾等大批左翼作家成了这个栏目的常客。鲁迅后期写得最多的是杂文，而他为《自由谈》写得最多，一年中发表 143 篇，用了"何家干"等各种各样的笔名 40 多个。

《自由谈》中有一个栏目叫"斋夫自由谈"，陶行知一直以"不除庭草斋夫"笔名发表短文。1 月 8 日，在《颠倒的逻辑》一文中，陶行知写道："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两君

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这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直言不讳的指责。

上海国民党市党部注意到了《自由谈》，并再三向《申报》提出警告。史量才回信说：感谢诸位赐教，我想诸位也未必愿意将《自由谈》办成"不自由谈"吧。

1932年5月、6月间，蒋介石指挥60多万军队进攻红军。宋庆龄等与史量才商量要反对内战。史量才与陶行知一席长谈，由陶写成评论。从6月30日起，申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7月2日)、《三论剿匪与造匪》(7月4日)，严厉批评政府不改善政治，不安定民生，而迷信武力。

1932年7月15日，第一期《申报月刊》问世，上面有史量才写的序。7月20日，就在他满心喜悦地翻阅月刊时，他的手下转来一封信。他一看内容，惊呆了。

来信人在邮局工作，署名是"史知名"，是《申报》的忠实读者。他发现，从7月16日起，《申报》发往外地的报纸被扣，扔在邮政总局的地下室里。每隔一天的深夜就送往龙华一带焚毁。外地发行站也询问为什么收不到报纸。史量才的脸色大变，他赶紧打电话询问上海警备司令部，对方回称并不知情。一气之下，史量才准备在报纸上揭露这事。他的朋友们劝他先了解情况再谋对策。

《申报》的一个职员奉命追到武汉，他通过可靠的途径看到了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报告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致蒋介石的信件。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和朱家骅指责史量才是报阀，想用垄断的舆论工具危害党国，称霸一方，图谋上海独立。蒋介石大怒，亲笔在信上批了红字："《申报》禁止邮递。"由上海警备司令部派人到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

史量才立刻领悟到，要不是《申报》馆设在上海租界内，国民党政府早就直接查封它了。对完全自负盈亏的《申报》来说，卖不出报纸，就无法生存下去。史量才只得寻求缓解危机的措施。

蒋介石提出了复刊的三个条件：一是《申报》的评论态度必须改变；二是陶行知和黄炎培必须脱离报馆；三是国民党宣传部派人到《申报》指导日常出版与发行业务。史量才接受了前两条，但拒绝同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人来指导报社。经济独立与言论自由是他坚守的信条，他毫不含糊地表示，如

孙科的题词

明善誠身恂恂儒者人
羣指導椽筆如瀉績
著廿年名聞九野匯禍
惨罹傷哉大雅
量才先生遺像
孫科敬題

果国民党宣传部真要来人，他宁可报纸不办。《申报》经理马荫良回忆说：史量才待人以诚，说话坦率。有人劝他，他很平静地说：“我家三代行直。我宁愿直言以开罪于人，决不会讨好人而乱是非。”蒋介石只得先同意《申报》恢复发行。

南京政府曾多方拉拢史量才，给了他许多荣誉，如国难会议委员、中山

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职务，总希望他能转变《申报》的政治态度，但他不为所动。

1932年3月，国民党召集国难会议，上海的代表最多，但国民党拒绝满足他们提议的结束训政、开放党禁的要求，史量才联合上海的66名代表，没有参加洛阳的国难会议。4月7日，国难会议在洛阳开幕。通过了绥靖、救灾和御侮三项议案。汪精卫派人与史量才疏通，但史量才的《申报》对这三项决议不断加以批评，国民党的报纸反过来攻击《申报》不明是非，思想左倾，为共产党效力。

1932年10月，上海临时参议会成立。史量才任议长。当上海临时参议员得知国民党将大量税款项用于内战军费时，全体宣布辞职。

这年年底，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大多在中央研究院楼下休息室开会，为被关押的政治犯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它援助。

史量才与宋庆龄已经有交往。1931年12月15日，由于国民党内部宁粤谈判，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蒋下台之前，在南京秘密杀害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宋庆龄激于义愤，特发关于"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重要宣言，开头第一句就说："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的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这篇痛快淋漓的宣言，全文刊载于同年12月20日的《申报》。事前，史量才作为上海日报公会主席，曾在该会会议席上慷慨陈辞："宋庆龄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她的宣言，我们的报纸为何不可发表?"在淞沪抗战时，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之间的友谊加深了。他们之间大都通过史量才的直线电话约期会晤，谈话时，所乘汽车从不停留在史家门外。

12月29日，史量才出席了《申报》馆补办的六十周年华诞庆祝会，全馆250人聚集在东亚酒楼庆祝。宴会散后，他立即赶到华安人寿保险公司(今华侨饭店)，出席民权保障同盟的记者招待会。史量才派了两个职员参加了这个同盟。这次他是以记者的身份出席。记者陆诒还清楚记得他那时的模样：他中等身材，面目清秀，穿一件长袍，年约五十左右，像一位大学教授。他与前来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握手寒暄，彬彬有礼，后来他就坐在了记者席上，这令其他的记者们大为诧异，因为这种事一般派一个记者就可以了，怎么会有劳《申报》老板亲自参加。

杨杏佛代表宋庆龄讲话后，史量才即席发言，宣布《申报》和他本人支持

民权保障同盟提出的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主张，并抗议政府由于《申报》报道中央大学学潮真相及反对剿匪言论，未经法律手续就禁止邮递达到35天之久。

事后，他对《申报》馆的左右说：他接办《申报》以后，出席会议总用《申报》主持人的名义，而以记者身份为人民大众发言，这是第一次。他没有想到这也是他公开发言的最后一次。

史量才言行一致，他说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在实际行动上也就这么干。每天晚上他经常到三楼编辑部，亲自审阅报纸言论和要闻版的大样，遇到有被上海市新闻检查所扣发的稿件，他必认真追究，再上五楼上海市日报公会办公室，打电话把新闻检查所的负责人找来当面交涉。当时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所设于南京路大陆商场（慈淑大楼），主任陈克成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

《新闻报》记者陆诒回忆道："记得一九三三年春的一个深夜，我为了交涉《新闻报》被扣发稿件也要去新闻检查所，经先与《申报》电话联系，约我到该报五楼日报公会一起谈判。史氏对我亲切接待，很热心地问我被扣发了什么消息，我说是一条有关东北义勇军的消息。隔了五分钟，陈克成匆匆而来，对史量才恭敬行礼，但史却对他怒目而视，也不招呼他坐下，就把我手上拿的稿子接过来往桌上一放，大声责问他：'时至今日，你们竟然还扣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你们究竟还像中国人吗？'陈克成慑于史氏雷霆之怒，表面上微笑忍受，连称史先生息怒，让我打电话向南京请示。史量才当时所表现的大义凛然气概，至今记忆犹新。"

1933年，就在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口，杨杏佛遭到了枪手的伏击，当场丧生。保卫民权的人连自己的安全也失去了保障，民权保障同盟从此停止了活动。

史量才提高了警惕，购买了防弹轿车和手枪。1934年，他的胃病发作，为了彻底放松，他与沈秋水驱车到杭州秋水山庄静养。那一年是大旱之年，一路上可以见到受灾的农村惨景，史量才捐献了许多财产给灾民。

在这段时间里，他曾经应邀到南京与蒋介石会了面。关于他们会谈的内容，有各种传说。据称，蒋介石警告史量才：把我搞火了，我有百万雄兵。史量才毫不犹豫地告诉那个军事独裁者：我也有几十万读者。此时的史量才已经

是舆论自由的化身。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和蒋的会晤是非常不愉快的。

11月13日，已是深秋季节，史量才与他的儿子还有妻子、朋友一行六人，从秋水山庄缓缓起程，前往上海。他们将手枪放在了后备箱里。两个保镖也没有随行。史量才自信地说："这条路上我没有什么仇人。"没有人想到，几个小时后，他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他用生命履行自己的诺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谋杀案，但却想不到谋杀的理由。就像章太炎在史量才的墓志铭上所写的，他与人无怨仇，没有遭受杀身之祸的理由。没有人想到这是当时蒋介石直接授意的谋杀案。这次谋杀案与宋教仁案、杨杏佛案一样，都是经由最高统治者授意的政治谋杀案。全国民众被蒙在鼓里，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也一无所知。11月16日下午2时，在他的寓所举行大殓，市政府所属各机关一律下半旗志哀。史宅附近军警戒备森严，各界来吊唁者达到两千多人。蒋介石送来了挽联，"哲人其萎"四个字显得分外醒目。而在南京，军统特务们却在弹冠相庆，暗杀史量才的经过，后来作为成功的案例教授给新的特务。

史量才的灵柩安葬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茅家埠天马山。他一生想让他的《申报》记载真实的历史，而历史同样记住了史量才的名字，因为他不惜为自己的信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30年代初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统计

名称	发行数量	发行地址
申报	150000份	上海
新闻报	150000份	上海
时事新报	50000份	上海
大公报	35000份	天津
时报	35000份	上海
益世报	35000份	天津
午报	25000份	天津
公评报	20000份	广洲
国华报	16000份	广州
中央日报	15000份	南京

【边疆风云】

诡谲的“南疆独立”

⊙李　风

30年代初，中国的边疆地区极为动荡不安。

1934年1月24日，苏联塔斯社发布一则有关中国新疆政局的电讯：

> 塔什干来讯：新疆南路最大中心喀什噶尔地方，由和阗回族首长之支持，已树立新政府。新政府系以该首长之属员为首领，乃一商人出身，名萨毕脱·杜摩拉，宣称脱离中国，自保独立，领有整个新疆西南部地段；同时派遣代表团前往阿富汗之喀布尔，进行相互承认之谈判，该团并拟赴印度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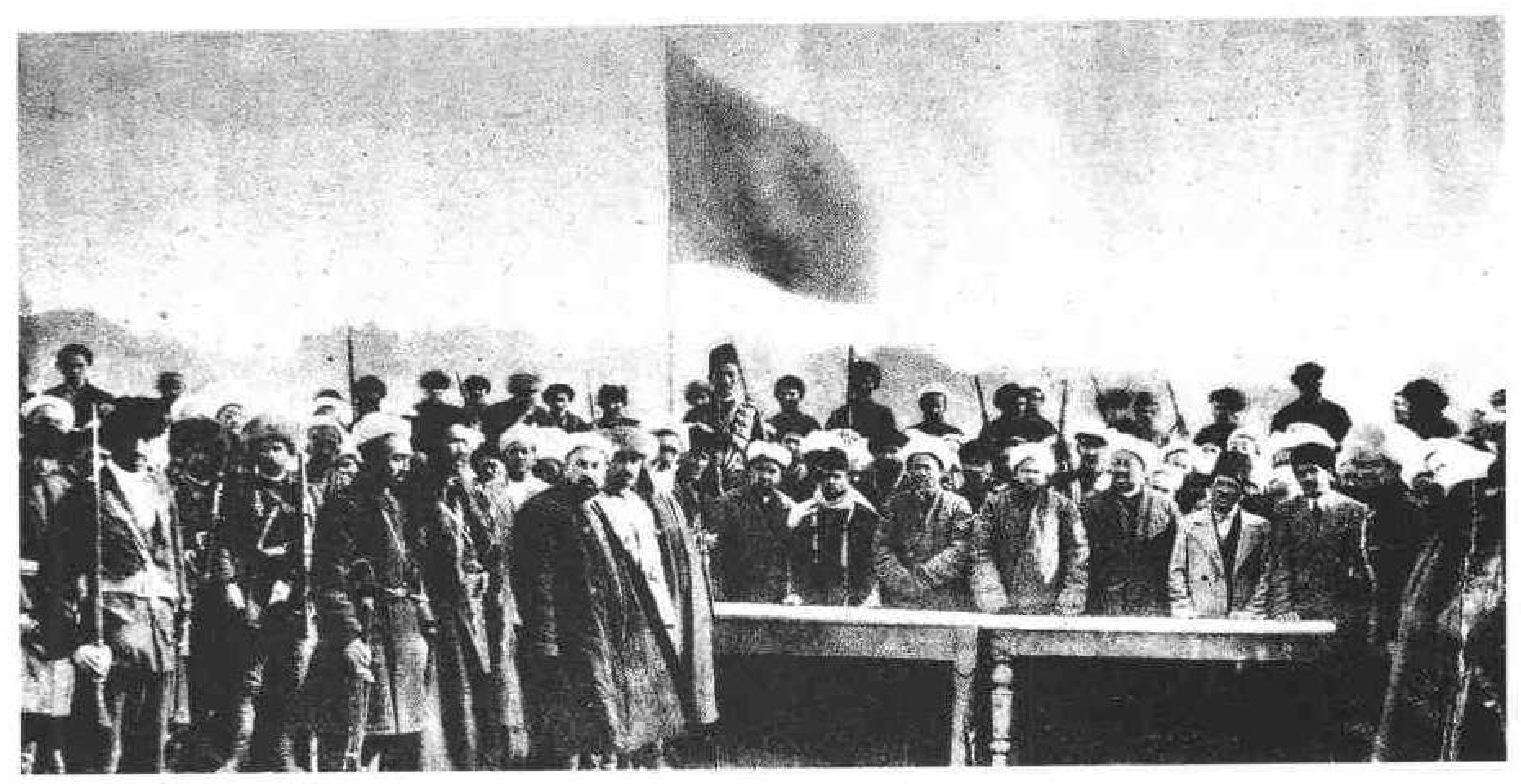
随后巴黎《时报》登载杜巴司加所撰写的一篇文章，言及新疆喀什噶尔的新政权，该文声称：“英国对此西藏附近反对汉人、反对布尔什维克之政府，站在最严重的立场以援助之。”英国的路透社也发出了这一消息，而且没有否认英国卷入此事件的报道。

喀什噶尔地处南疆，僻在西陲，当时由北平到喀什噶尔需要五个月时间，连邮电也不通，而苏联的中亚细亚铁路已经到达新疆西北部和西部，它的南端塔什干距离喀什就很近，英国也从克什米尔筑路，接近新疆边境。南疆的战乱，对中国内地的人们是一头雾水。1933年9月以后，原设在喀什的一架电台损毁，它与内地之间的音讯完全隔绝。

南京政府先否认南疆变乱的消息，随后又称交通不便，真相不明。1934年1月29日，南京政府才对南疆的事态表态，称南疆疏附的独立似

新疆维回首领和加尼牙孜





参与“独立”者及其“国旗”

有可能，而事变的主角应是沙比提。《申报》的特讯则对南疆的事态有比较准确的报道，它在报道中称：南疆的判乱是出自喀什噶尔缠回首领铁木尔的阴谋，他是新疆缠回首领和加尼牙孜的亲信，蓄意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并有英国人在幕后指使，但伪组织的内部组织混乱，不难平定，云云。南京政府为此几度召集会议，还是老一套的招数，2月2日，准备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到新疆宣慰，劝叛乱者取消“独立”政权。可决议正要公布时候，新疆又已经传来新消息，“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已经被马仲英的军队毁灭。

其实，南疆“独立”并不是发生在1934年，而是在1933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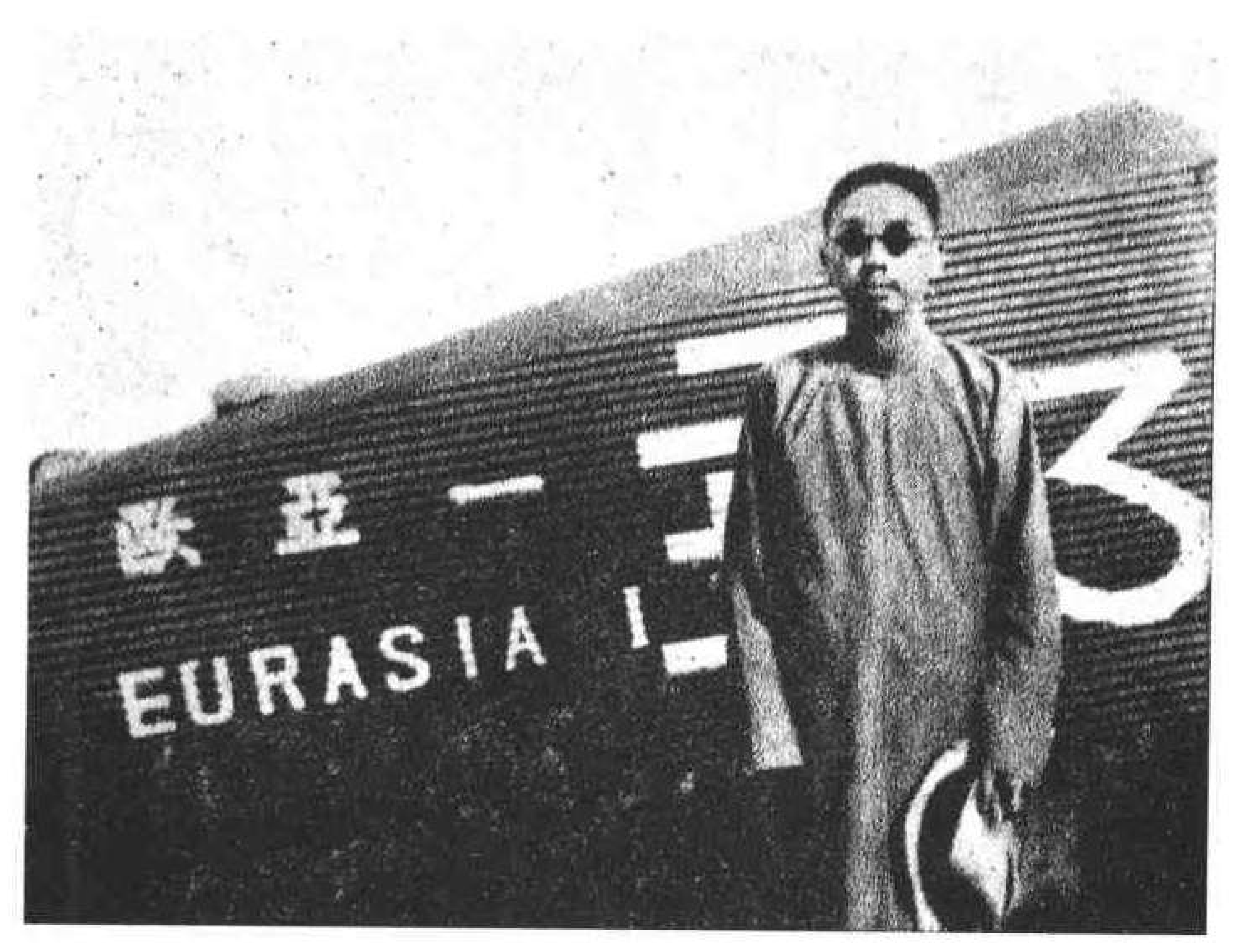
新疆的战乱开始于北疆，南疆之乱则受北疆战乱影响。南疆南接克什米尔，西与阿富汗为邻，北与苏联的中亚相接。趁北疆的盛世才、马仲英两强激战方酣、无暇南顾的时机，和阗地区的维族首领穆罕默德·伊敏帕夏和沙比提大毛拉，于1933年6月8日在墨玉县暴动。南疆的缠回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以伊斯兰教为号召，仇杀当地汉官及汉人，南疆各城都被叛乱者攻陷，其中喀什抵抗的时间最长，长达七个月。

铁木耳任命的官员



疏勒城外的铁木耳和他的徒众





到新疆考察过的中央大员罗文干

占领喀什后，回族首领马占仓、缠回首领铁木耳与和阗的维族首领伊敏帕夏等分成三个势力，不相上下，相互火并，铁木耳为马占仓枪杀，马占据汉城(疏勒)，伊敏的维族势力占据回城(疏附)，维兵攻汉城七个月之久而未得手。1933 年 11 月 12 日，沙比提等组织“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国旗为白布中间嵌半月及星，上书回教经典标语，在征得在阿克苏的缠回领袖和加尼牙孜同意后，由和加尼牙孜出任“总统”，沙比提任“国务总理”，定喀什为首都，颁布《建国纲领》三十条，规定“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据回教教条而成立，谨遵万世不渝之《古兰经》所载条文命令以为准则”。它的组织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它反苏，反盛世才的军队，反汉人，就是由苏联过来的伊斯兰教徒，如稍违教规，也要处以死刑，无形中它成为反对中苏、亲近英国的独立组织。该“共和国”成立不久，派员往土耳其、阿富汗、伊朗、印度等国要求承认而未逞。起初，英国也试图支持它，后来认为这个傀儡希望不大，遂取消极态度。根据相关资料，这个“共和国”只与同教的阿富汗有直接的联系，而与英国、苏联

马仲英





盛世才

没有直接的关系。

正与盛世才作殊死战的马仲英部虽然也是信奉伊斯兰教，但见他们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就决定军事解决。马仲英所属马虎山部于 1934 年 2 月间进入和阗，6 日，进攻喀什。而“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内部一直分崩离析，无力抵抗，很快即告瓦解。和加尼牙孜为保全自身，亲自将沙比提押送给盛世才，盛则委任和加尼牙孜为新疆省副主席。至此，除南疆尚有马虎山部与盛抗衡外，全疆基本统一。

“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存在不及半年，即告消亡。马仲英部的这次军事行动对国家民族实有很大的贡献。

【边疆风云】

黄慕松的西藏之旅

⊙丁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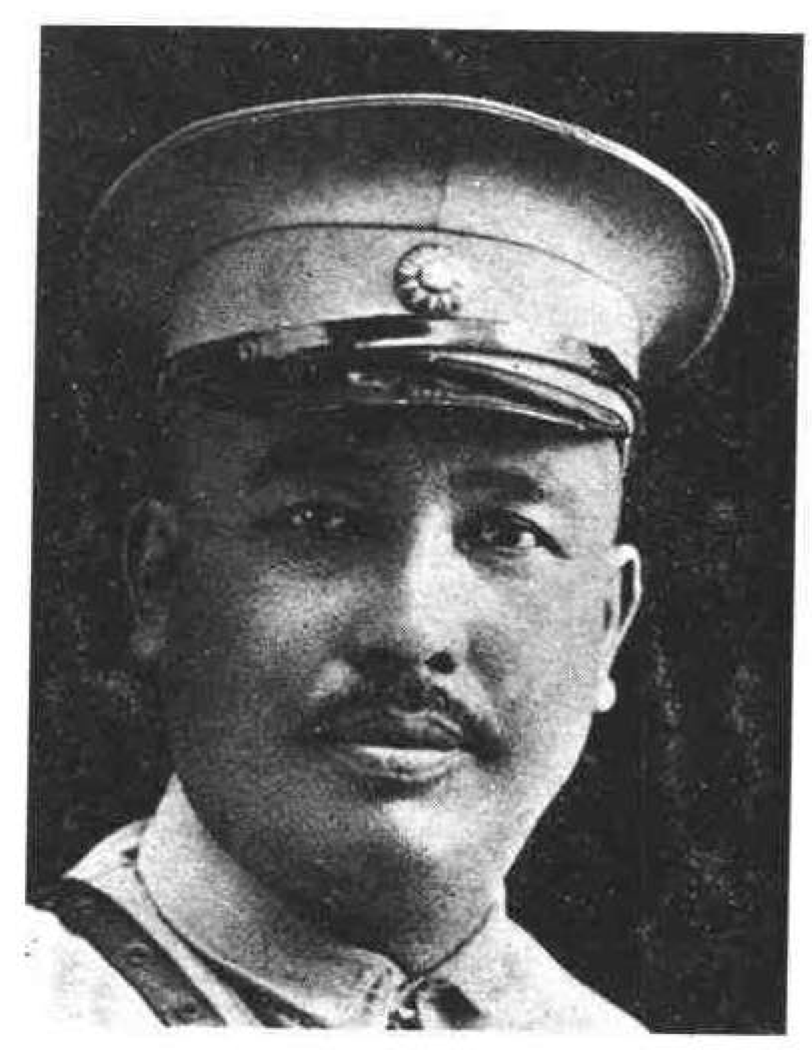
一、进藏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萨圆寂。国民政府于12月22日明令赠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并表示哀悼。同时批准任命热振呼图克图·土丹益西丹巴坚赞为摄政,管理西藏地方的政务,并定于1934年1月12日特派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专使",前往拉萨册封、致祭。

黄慕松接到奉命以后,积极筹备入藏事宜。由于入藏道路艰险,一是由海路经印度入藏,二是由川入藏。黄慕松从调查实情、宣达国民政府德意的角度出发,决定由川入藏。首先在3月18日派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议蒋致余、秘书王良坤先行由川入藏联系,黄慕松本人则留南京等待国民政府册封、致祭玉册、玉印,以便早日镌成而行。

黄慕松一行由蒙藏委员会总务处处长陈敬修,蒙藏委员会委员巫明远,蒙藏委员会编译李国霖,参谋本部专门委员刘朴忱、蒋致余,外交部参事林东海,参谋本部上校参议驻加尔各答总领馆三等秘书衔主事高长柱,测量总局上校中校股长王维崧组成,4月26日离开南京经成都开始西行入藏。5月21日,黄慕松一行抵达康定,在康定购办了馈赠西藏地方官民的礼品以及沿途各呼图克图、土司之赐物。为了宣扬中央政府的威德,特别选购砖茶二

百余包。另外还准备了差马五百四十匹。7月8日，一行抵昌都，受到汉藏僧民及驻军部队的十余里欢迎。8月22日黄慕松一行抵仁钦，先遣人员蒋致余、王良坤、巫明远已同由拉萨来此欢迎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二人一起已经来此迎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向黄慕松汇报拉萨方面的筹备准备情况，表达希望专使一行早日到达拉萨的诚意。黄慕松一行终于在8月28日到达拉萨。西藏地方噶夏政府派僧俗噶伦各一员、五品官以上僧俗文武官员着最新式服装表示欢迎，这时共有不下万人在雅鲁藏布江边欢迎黄慕松等中央政府代表。下午1时到达行署，噶夏四噶伦分别前来谒谈，黄慕松陈述了中央政府关怀西藏军民的厚意，僧俗等表示感谢，并请黄慕松代为向中央表示谢意。



黄慕松

黄慕松自接到奉命，积极筹备入藏以来，历时两个月，于5月7日由成都出发，取道西康，途经驿站七十四个，高山三十四座。

二、册封

在拉萨办理各种事项时，西藏地方政府首席泽墨噶伦等以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僧俗官民异常悲哀为理由，认为国民政府举行册封盛典一事，属于一大喜事，不愿立即举行，以免西藏僧俗官民的反对。9月16日，黄慕松等则派员同各噶伦协商，坚持中央政府的意见。西藏地方政府各噶伦到齐后仍然坚持反对册封盛典一事，强调要等到十四世达赖转世之时再为进行，到时全藏僧俗官民自然会接受。泽墨噶伦还说：中藏和好其事难，册封、致祭其事

准备进藏的黄慕松



易，要求先难后易，先商中藏和好，后行册封、致祭典礼。黄慕松则认为，中央政府派专员来藏是为表彰达赖的西陲之功，也是为了发扬佛教宗旨，对达赖加以追封。如果不先举行册封大典，将违背中央派遣专员入藏的本意，并湮没达赖保障祖国西陲与维持西藏政教合一的伟大功绩。故黄慕松一意以册封、致祭为入藏的首要任务，坚持认为册封、致祭二者缺一不可，对西藏地方政府的请求严正拒绝。黄慕松并回答道：今中央政府派本使来藏，原为册封、致祭达赖大师。今日置此不谈，中央政府远隔数千里以外，不明真相，肯定会凭增许多疑惑，外人也将会借助此事挑拨离间，从而不利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问题的解决，这样，反而有悖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和好的目的。最好一面积极筹备册封典礼，以便早日举行，另一方面希望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要求在可能范围内提出来，以便本专使寻机向中央汇报请示转达。经各方疏通，以及黄慕松两次与泽墨噶伦的个别谈话，终于使西藏地方政府接受册封仪式，并定于9月23日上午9时在布达拉宫正殿举行册封典礼，追赠达赖"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

1934年9月23日上午8时，黄慕松一行穿着中央规定的礼服由拉萨

行署出发，一路由西藏地方军队迎送，拉萨市民倾城观看。黄慕松一行受到西藏地方政府自司伦以下、四名噶伦、扎萨克、护卫司令及拉萨代本、僧俗官员数百人的在册封礼堂外的恭候。总堪布、司伦等高级职员也恭迎于宫门外。9时正，由僧俗官员、仪仗乐队在前，黄慕松一行参与人员随行于后开始进行册封仪式。入正殿以后，一切按册封礼节单进行。黄慕松专使奉册印恭置于香案，并向册印香案呈敬哈达，由姬觉总堪布代受玉册、玉印。接着，黄慕松等人依次向达赖大师座呈敬哈达，并行三鞠躬礼。全堂肃静，礼节至为隆重。至11时册封活动结束。此外还在大、小昭寺，三大寺等熬茶、布施，每一喇嘛散发银元二元。

次日，总堪布到黄慕松专使行署向国民政府专使敬献哈达，并行一鞠躬礼，请代为转呈中央表示谢意。

在举行册封盛典以后，黄慕松即开始接洽致祭日期。这时西藏地方政府认为致祭达赖是一很重要的典礼，再三选择吉期，终于定在10月1日在布达拉宫举行



一个典型的西藏兵

三、致祭

在具体商量致祭时，因祭堂悬旗问题，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又表示反对，

强调布达拉宫系达赖大师坐锡之地，以往从来没有外人悬旗的先例，就是西藏地方的军旗也不能挂在宫殿内。黄慕松专使当即表示："举行达赖大师册封时，党、国旗亦需要悬挂在宫门上。现在举行庆贺大会时，在内地悬挂党旗、国旗已经成为当然的日常事情，本人这次代表中央政府，也亦代表四万万同胞来布达拉宫致祭达赖大师，如果说不能挂旗，别人会问是什么人来此致祭，有人也会搞不清楚，发生这种事是不是欠妥当?"经过一番周折，并请示中央政府后，除决定在拉萨行署周围悬旗外，还将党旗、国旗放至布达拉山祭堂，暂不悬旗。1934 年 10 月 1 日上午 9 时，在布达拉宫正殿举行致祭典礼。礼节隆重同前，只是比先前册封典礼，更显凄惨之情景罢了。

四、会谈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隔阂以近有二十余年，中央将藏中政权、教权暂行由达赖主持，此次适逢十三世达赖圆寂，中央派黄慕松专使追封达赖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并借以考察藏情，联络情感，同时西藏地方政府也感到对中央与西藏的关系问题要加以解决。因此，在拉萨黄慕松还就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问题与藏方会谈。9 月 16 日，黄慕松在行署同泽墨、朗中、哲康、彭休四噶伦进行会谈。会谈中提出西藏为中国领土，西藏过去签定条约未经中央承认者须呈报审核，恢复中央与西藏原有的隶属关系，中央派驻藏长官，确定藏康界址，以及西藏国防由中央统办等项。但是，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却避开这些问题，只谈今后汉藏和好应先解决康藏边界问题，对此或按唐柯三调解的以甘孜为界，或请英国人进行调解。

9 月 24 日，噶伦送公函来署，内容仅是说要注重边界问题，对于根本上的中央与西藏的政治关系并未提及。9 月 27 日，黄慕松派刘朴忱参议前往泽墨噶伦私宅，对黄慕松办理中央与西藏关系问题的态度加以说明。10 月 2 日，黄慕松以册封、致祭事项完毕后，前往热振呼图克图及司伦处表示谢意。黄慕松再次强调康藏纠纷固然需要调解，但中央与西藏关系若不决定，实难达到和平而共福利。10 月 4 日，泽墨、朗中、哲康、彭休四噶伦来访，面递公函，内容仍是说要注意西康德格、瞻化、霍尔五属以及上、中、下俄洛之地界争执的问题。又询问黄慕松专使有无办理此事全权证书，或其它字据。

黄慕松答道：本专使来西藏，又不是前往国外办理外交事务相比，无任何全权证书及其它字据的必要。若西藏仍然希望解决中央与西藏和好问题，本专使自然是竭诚个人的智慧，及时向中央呈报鉴核办理。

10月5日，黄慕松召集行署全体人员会议，讨论噶厦政府的复文，决议先由黄慕松往访泽墨噶伦，先说明康藏地界问题恐怕难以按照西藏地方的意见办到，并询问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治关系究应如何加以确定，以及此后交涉应该以何种方法为最佳，一切要等后再作商议。

在会谈中，黄慕松专使问："五族共和，共同建设中华民国，西藏是否诚意合作？"

泽墨噶伦答："若满、蒙各族加入，西藏亦可加入也。"

黄慕松专使问："西藏对中央政府之政治关系如何？"

泽墨噶伦答："若内地人士欲夺西藏之政府，则万难办到。康藏地界问题，为全藏人民最所渴望迅速解决的大事，应该先加以解决办理。"

10月7日，黄慕松派刘朴忱参议及巫明远参议送回复噶厦政府的复文，公函再次强调在今日情况之下，如果中央与西藏地方不以国家政治关系加以联络，则不适合于国际法与国内法，无法周旋于国内外，敬请西藏地方明确表示西藏对中央的政治关系。



西藏的军队

热振摄政。



10月8日，黄慕松第二次派刘朴忱参议及巫明远参议送递复函，表明黄慕松专使对于中藏和好问题的意见可以综合如下：一是对内谋求西藏的安定。所谓“谋求西藏的安定”，指康藏问题与班禅问题。为西藏的永久安定从计，现在要迅速解决此两个问题。二是对外谋取力量的结合。就对西藏而言，应该结合外交力量，结合国防力量，共同中央政府一致对外，方可以自立自足。来函所阐述的西藏对中央的政治关系就是此点，故请西藏明确表示对中央的政治问题关系后，中央才可能对外负责安定西藏，亦没有抢夺西藏地方政权的意思。

10月24日，黄慕松同刘朴忱参议、林东海参议、巫明远参议、李秘书前往噶厦政府与各噶伦晤谈，详细说明中华民国五族共和与西藏政教制度并没有抵触，中央并没有改变西藏政教制度的意思，反复开导达二小时之久。但经黄慕松多方工作进行劝说，最后西藏地方噶厦政府说：“英人逼近可危，中央力弗能及，改变现状，好则无功，坏则受咎。”坚持噶厦政府民众大会决议而不参加五族共和，不承认民国统治。会谈终无结果。

泽墨噶伦还询问班禅回藏问题，并强调藏中的民意一是希望大师由海

路返藏。二是照旧章待遇进行。三是倘若班禅带兵由青海入藏，其责任由中央负责。黄慕松则回答："此问题有二大原则。一是保持班禅大师的尊严与自由，二是维持西藏现有的安定治安。"刘朴忱参议发言："班禅大师为西藏的大佛爷，假道外国回藏，诸多不便。"

最后，黄慕松和西藏地方政府商妥，留总参议刘朴忱、参议蒋致余等为专使行署留藏人员名义驻在拉萨，并留无线电台一部以通讯联络，作为蒙藏委员会办事处的先哨。以后改为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

11月11日，黄慕松一行前往布达拉宫正式向西藏地方噶厦政府辞行。

五、归途

黄慕松一行事后于11月28日离开拉萨，途经尼泊尔、印度、菲律宾等地，至1935年2月16日回南京复命，向国民政府呈递《奉使入藏册封并致祭达赖大师报告书》一册，并将此行之个人日记编成《使藏纪程》。



拉萨佛教大圣殿

【边疆风云】

内蒙古自治的风波

◎白 健

一、德王与自治运动

绥远境内的百灵庙本是一个很大的喇嘛庙，后来它所在的地方便以庙为名。它地处归绥(呼和浩特)西北方约250公里处，北通外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西达宁夏、新疆，东连察哈尔北部，是陆路交通要地。除了那个大喇嘛庙及数十家多为汉人所营的小商店外，其余都是临时集散的蒙古包。1933年7月26日，一批蒙古王公人等在此集会，讨论"内蒙古高度自治"问题，正式向中央政府请求"自治"，百灵庙一时成为内蒙古的政治焦点，小小的集镇因而第一次闻名全国。9月28日，百灵庙召集第二次蒙古自治会议，与会的蒙古王公和青年代表们致电南京，宣布他们打算成立蒙古自治政府。

参加百灵庙集会的蒙古王公中，有绥远省辖乌兰察布盟长云王，伊克昭盟盟长沙王代表副盟长阿王、察哈尔省辖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王、宁夏省辖阿拉善霍硕特旗代表以及贝勒、贝子数十人。其中云王老朽庸弱，无所主张，阿王、沙王内心并不热心赞成自治，年轻的德王才是会议真正的主角。

德王，全名为德穆楚克栋鲁普，是蒙古西苏尼特右翼旗郡王之子。见过他的人都觉得他有蒙人强健的体格和汉人灵活的头脑。他在北京等地受过良好的教育，蒙、汉语均熟谙。1919年，他袭父爵为西苏尼特郡王，1921年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该盟盟长年逾六旬，身体衰弱，德王成了锡林郭勒盟最

有势力的人物。在蒙古的王公中，他是个新派人物，兴办牧区学校和工厂，要不懂经文的青年喇嘛还俗，罗致受过新式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的蒙古青年，扩编蒙旗的保安武装，号召复兴蒙古民族，以现代的成吉思汗自命，因而惹得年长的王公暗中议论："苏尼特旗如今出了个疯王，要改革祖宗留下的成规，还要喇嘛还俗哩。"1932年冬，德王率领一批王公代表去南京请愿，国民党对这些内蒙的王公、贝勒、贝子等上层人士竭力笼络。但德王不为所动，在一次欢迎席上，他抱怨说："我们到南京来，希望中央对内蒙问题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意到了南京，终日都是被邀参观赴宴，或者被请表演骑马，对于内蒙政治，一字不提，实在使我们感到失望。"在场的人并未特别注意，但内政部长黄绍竑却敏感地意识到，德王的政治欲望很高。



全国瞩目的百灵庙

二、王公与牧民：各有心酸

30年代的内蒙古仅是一个历史名词。昔日内蒙的区域，早已于1914年划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国民党执政后，又将三特别区分别改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自东北四省沦陷后，内蒙的范围，仅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三盟，以及察哈尔十二旗群、归化土默特旗左右翼两旗。盟之下为旗，为内蒙行政的基本单位。盟设盟长、副盟长各一人，旗主称札萨克，是世袭的封建领主。这种盟旗组织是清皇室统治蒙古的重要政策之一。自从改省之后，靠近南边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的盟旗已经改为县治，只剩极北荒漠、人烟稀少的地方，尚未改县。不过，盟旗的王公、贝勒、贝子等称号，依旧保留，就是地方行政的实权，也仍操在他们手里。不仅盟旗如此，在已设县治的地方，他们对于蒙古族人也保有一部分统治权，这样一来，设县地区的蒙古



内政部长黄绍竑乘装甲车前去谈判。

人受到省县与盟旗双重的统治。

内蒙古的王公们对清室很眷恋，清帝以前对蒙古王公常有各种恩典与赏赐。北京政府也基本延续清代的做法，王公的收入有俸银、俸米、盔甲赏、旅费等，此外还有婚礼、优恤等费用，双方得以相安无事。即使在北京政府崩溃时，也未有分离的迹象。但到国民政府时代，这一切优待都失去了。王公们因此对国民党政府大为不满。德王在百灵庙自治会议上就巧妙利用这一点，在演说中指责中央政府停付清代以来一直给予蒙人之款项，抱怨国民政府对蒙古王公不仅不如清帝，甚至不如北京政府。

可怕的是，王公们收入减少了，可他们的消费欲望却因受到近代城市生活的影响而大增。他们不再只满足于吃牛奶、砖茶、炒米，而要吃西餐；不再满足于蒙古包和旧式的王府，要住多层的洋房，并大跳摩登舞。"由百灵庙到武川已等于到上海，再到绥远简直是到了巴黎。"蒙古王公迷恋城市生活，全年至少两三次到包头或张家口作个短时间的度假，尤其是每年为着到五台山礼佛，或因公与省府接洽，总得要在包绥线上的工商城市中流连一回。有位王公滞留平津，为城市繁华所刺激，不惜将其所属旗地好几千顷卖掉，取得款项一万两，购了一辆汽车，兜了一个暑天的风，就又把它扔了。

汉人的屯垦也使蒙古王公与牧民感到不安。内蒙古地广人稀，据当时调查，蒙古人最多不过35万人左右，在察绥两省人口中仅占8%不到。在已设县的地方，十分之九均为汉人，未设县的地方，汉人也多前往经商。这十分之九的汉人，都是历年从外省移民而来，尤其是平绥铁路通车后，外省移来的人口，更是迅速增加。少数的蒙古人，自然感到生活与生存的威胁。放垦的土地日多，他们游牧的范围就愈窄。而且蒙古人一向以游牧为生，自改省改县之后，受到政治法律的束缚加多，这与他们一向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惯颇不相容，地方政府沉重的捐税和蒙古王公的剥削使牧民们生活极为艰难。

汉人的地主和商人的高利贷更加剧蒙古人的痛苦。蒙古人当时尚处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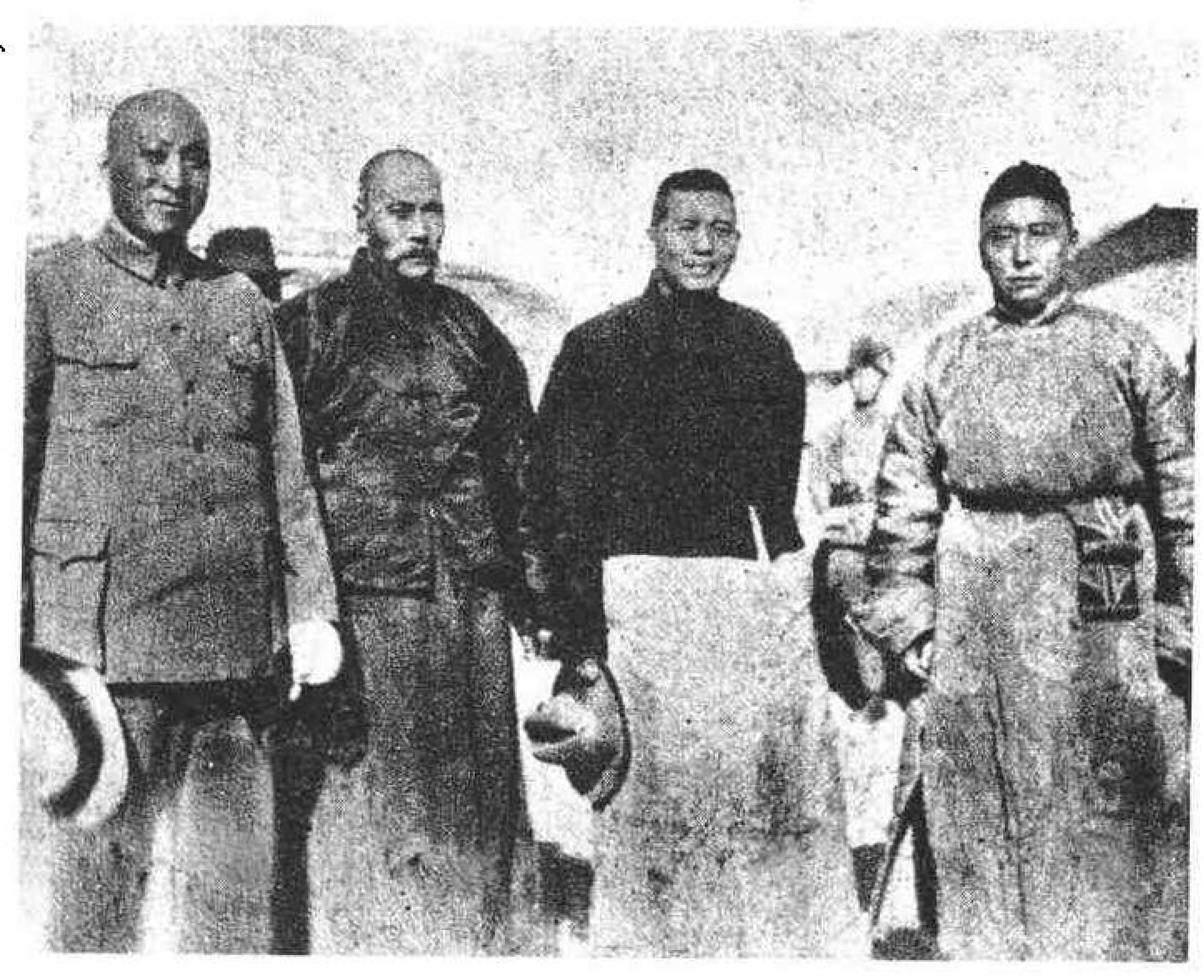


黄绍竑抵达绥远。

游牧生活时代，不善经商，彼此货物的交换，必须假于汉人。汉族商人、地主算账全凭账簿，而蒙古人全凭记忆，结果双方因数目不清而涉讼的事就很多，有些贪心的汉商利用蒙古人购物喜欢赊欠并拖延清债的弱点，以高价赊出，加利讨还，愈积愈多，毫无限制。如一蒙人的祖先在清代赊汉商1斤葱价，积至1934年已欠银1000多两。又有某旗署因在前清由北平购买铺垫，欠汉商20多两，积至1934年已达6000多两，此两案均闹成长期纠纷，其它类似事件不胜枚举，牧民常因债务的高筑而破产。

未改省改县以前，整个盟旗就是王公们的势力范围，可以予取予求，不受什么限制。有了省政府、县政府，他们的权力与利益，就日渐削弱了，虽然名号尚存在，而实际权力已不及过去十分之二三。本来中央政府改省改县都是意在消灭盟旗王公势力，但结果，不但王公势力受到打击，蒙民生活也感受许多新的痛苦，他们气愤不平，而这正好成为王公、贝勒、贝子辈煽动利用的机会。所以王公要求自治的真正目的，是在恢复以往的权力。蒙古百姓所受经济上的痛苦，比政治上的痛苦更为严重，他们要求自治，目的在解除经

谈判的主角：德王（右一）、黄绍竑（右二）。



济之压迫，恢复游牧的生活。

三、黄绍竑的绥远之行

内蒙自治运动发生后，正逢多事之秋的国民政府无意横生枝节，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入蒙安抚。黄绍竑本是赫赫有名的桂系首领，位在李宗仁之下，而在白崇禧之上。后反蒋失败，意气消沉，离开广西投奔南京。黄绍竑出发前，蒋介石要他相机处理，并须得到阎锡山的合作，此外再没有具体的腹案指示。黄绍竑的副手是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赵是山西五台人，与阎锡山关系密切。黄绍竑要完成使命，阎锡山的支持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绥远的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原本是阎锡山的部将。

黄绍竑仿效以前清代朝廷大员至蒙藏的作法，准备了很多礼物，准备馈赠给当地的王公与贝勒、贝子们，如团龙花、古铜色或黄色的绸缎、银质的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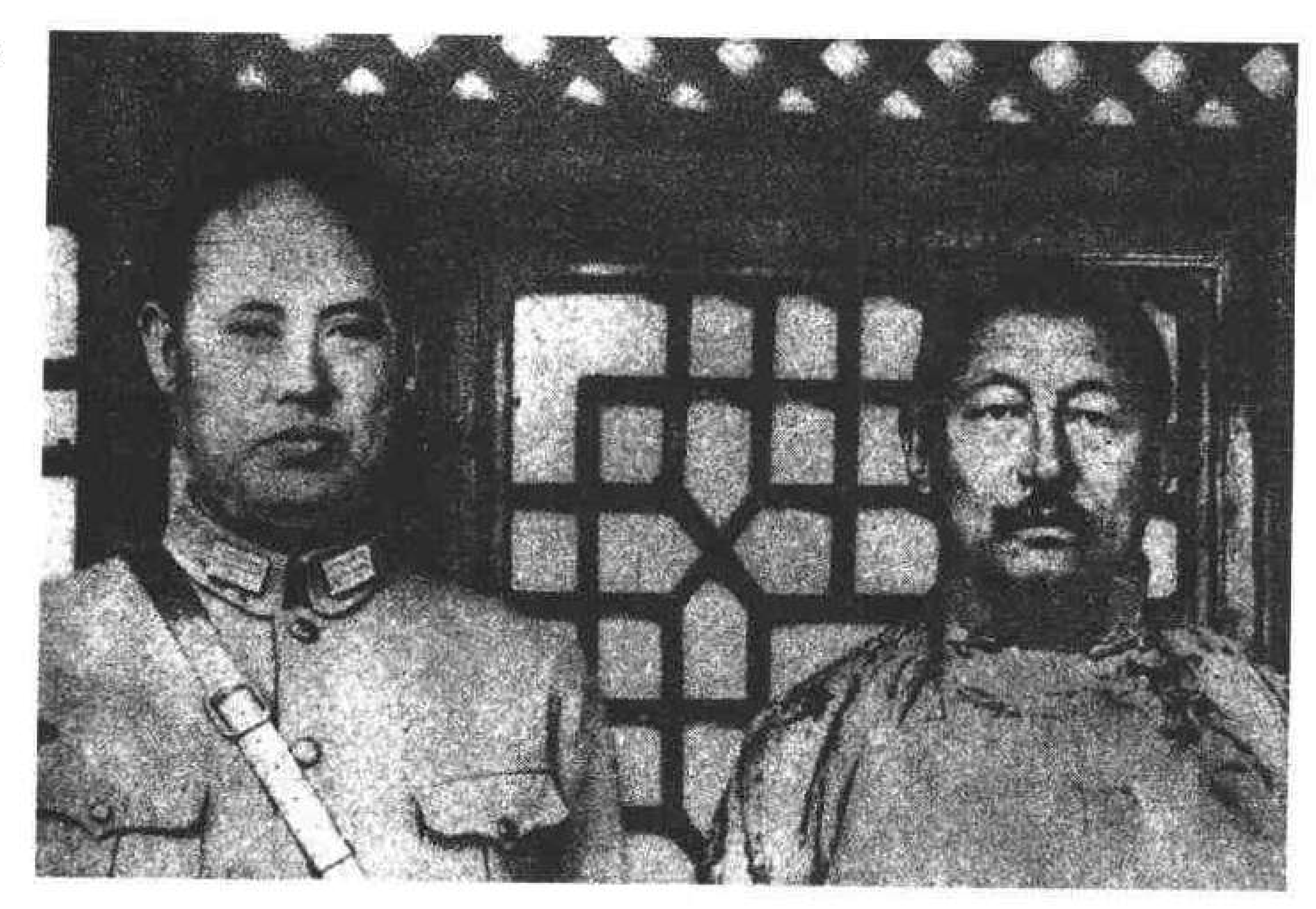
三个蒙古王公：巴王、德王、郭王(从右至左)。

壶、酒壶、酒杯、筷子及手表之类，都是蒙人最喜欢的物品。10月21日，黄绍竑离南京北上，在北京滞留了几天，同行有李松风、贺扬灵等技术专家十多人。中外新闻界都非常注意黄绍竑此行，尤其是外国记者认为，蒙古自治要求是中国民族间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问题，非其它单纯的行政问题可比。

百灵庙蒙古王公们得知消息后，先特派代表吴鹤龄（蒙人改汉名）到北平来欢迎。当黄绍竑们到达已是一派塞北风光的张家口时，又遇见了王公们派来的欢迎代表包悦卿(蒙人改汉名)。10月29日到达归绥，那时百灵庙会议已休会。

在低层次的磋商未有结果后，11月10日，黄绍竑去百灵庙会见云王、德王及其他蒙族领袖。他注意到盟旗王公等知识甚低，王公中间，云王是名义上的蒙族首席代表，主要发言人却是德王。黄绍竑决定就以德王为主要对象来处理问题。12日，双方举行首次会谈，德王将《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交给黄绍竑等，蒙方要求的条件要点：(一)组织内蒙自治政府，区域包括察哈尔、绥远、宁夏、蒙古各盟旗，直隶中央，经费由中央拨补。(二)凡是蒙古

班禅(右)与傅作义。



人，皆归内蒙自治政府统治，不受各省各县政府之统治。(三)内蒙自治政府得自行编练、指挥、调遣军队。(四)保证盟旗王公名义永远存在，以后永远不再设县和开垦牧区。(五)内蒙自治政府得自行制定法律。黄绍竑认为蒙方要求欠妥：第一，破坏了省的行政区域。第二，已设县区域的蒙古人不能同受两个政府的统治。第三，自行编练军队，不但易与各省发生冲突，而且与中央正在进行中的军事统一政策不符，易受日本的利用。第四，盟旗及王公之名义，不适于现代政治，而游牧部落多尤不适于现代生活。因此，黄绍竑将所定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统方案，稍加增删，同意"蒙古原有各盟旗群之组织及制度仍应保存"，同意设立蒙古各地方行政委员会，所需要的经费由中央政府负责补助。而且，蒙古地方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各省政府应即停止设县或者治局。尽管黄绍竑作了一些让步，但他断然说明，中央政府不容许建立统一的内蒙自治政府。

黄绍竑所提方案与蒙方的要求相距很远，谈判进行得很艰难，几至破裂。

到1933年11月，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塞北的气候日渐寒冷，只是





蒙汉联欢。

联欢会上普通蒙古民众

还没有下雪,河里的水已完全结冰了。若下大雪之后,道路壅塞,必须等到第二年春暖雪融后,才能够南返,这使黄绍竑们感到难以忍耐。幸好,远道而来的蒙古王公、贝勒、贝子们也都没有带足过冬的粮食和工具,极愿回去。11月16日,黄绍竑将德王的方案退还,声言第二天回归绥,以示不惜谈判破裂。云王邀班禅出来斡旋,表示愿在察绥两省各设自治机关的基础上与黄绍竑继续谈判,晚上,递交了自治方法十一条,仍要求在内蒙古设立统一的内蒙自治政府。黄绍竑依旧不能接受,德王才在班禅等的劝说下,终于放弃了某些主张,将方案改为设立内蒙古第一、二自治区政府,两自治区政府之间设立联席会议、各区政府,直属行政院,经费由中央按月支付。黄绍竑这才同意此案,答应转交中央政府最后裁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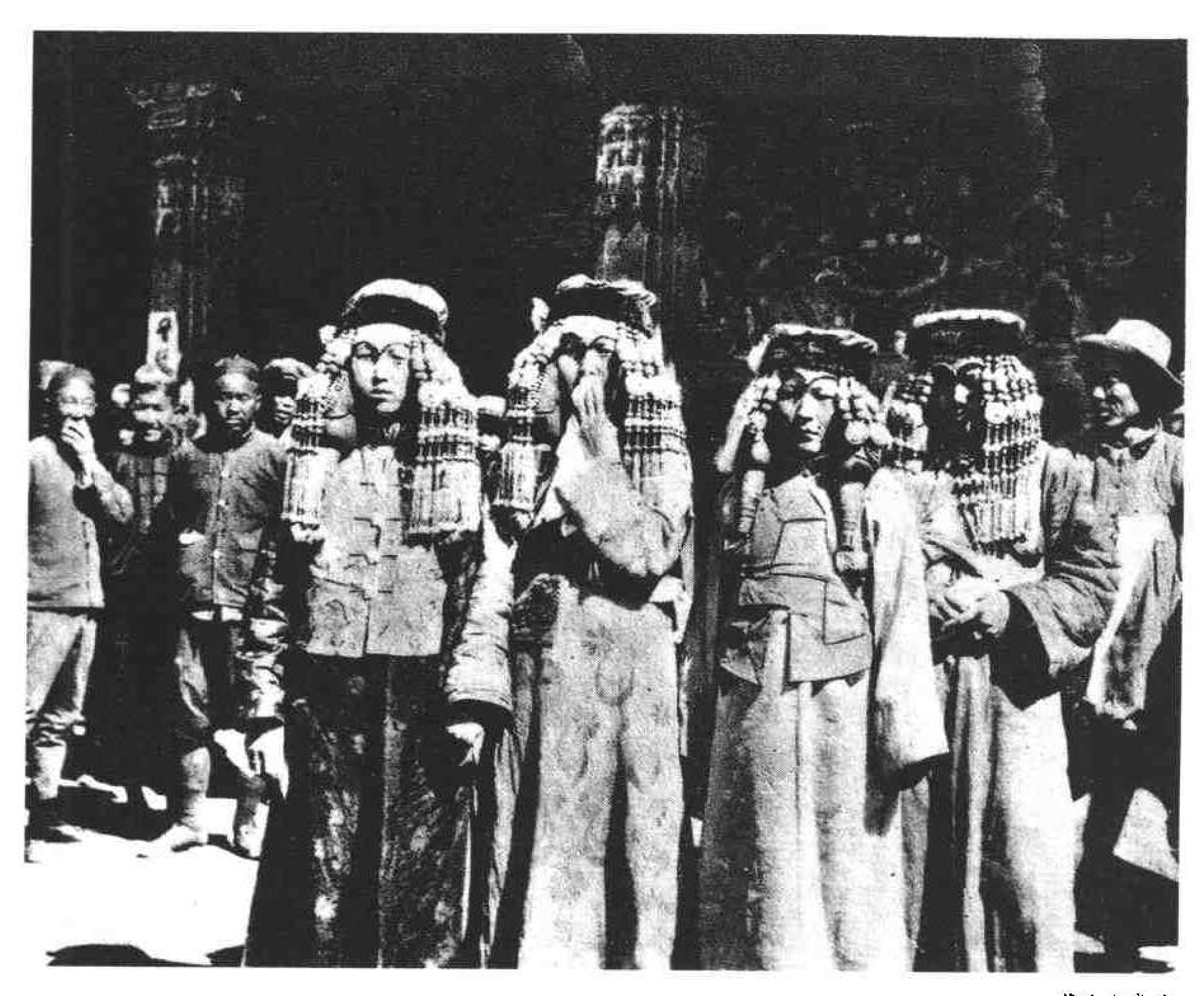
黄绍竑一行于19日起程回归绥,车过阴山时,黄绍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还作了一首词,词曰:"大阴山,朝夕跨,既牧牛羊限胡马。苏武留边十九年,我今匝月归华夏。"

回到归绥,已是11月下旬,那里举行了汉蒙联欢大会,举行阅兵、骑术表演、演戏等,一连热闹了一星期之久,营造了汉蒙两族和睦安宁的气象。众多蒙古王公及民众参加了联欢会。

四、自治中的暗潮

1934年1月17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内蒙古自治办法》十一条,批准了百灵庙会议所商定的形式,而删除了部分实质内容,分歧再度出现。同日早晨,已经得到消息的各王公来京代表及各盟旗驻京办公处代表等,齐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容纳内蒙方面要求。

分歧的关键约有三点。第一,黄绍竑曾允蒙古自治政府与省府平分税收。绥察两省政府对此全力反对,所以中央政府决定只允补助自治政府经费,而不允许平分税收。第二,中央政府允许蒙古以外人民凡往自治区内居住一年以上者,均享有游牧垦种的权利。蒙古人认为如此办法,汉人将大量移垦,足以影响蒙人生计,故对方案中此项规定反对最力。第三,中央授于绥远、察哈尔两省政府办理蒙古事务方面的一些权力,蒙人担心汉人为主的省政府将利用权力干涉蒙古自治政府的事务。



蒙古女贵族

1月29日，内蒙晋京代表赵泰保等谒蒋，请求修改《蒙古自治办法》，同时分派代表各一人向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等权力机构作最后的请愿。南京政府以蒙古代表既一致坚决反对，为顺应舆情，取消了1934年1月的那项决议，经多次讨论于2月28日，由中政会通过《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决议成立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并在三个关键问题上有所妥协。蒙古代表以此种解决办法适合蒙情，通电全国表示接受。

3月7日决定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任命云王为委员长，索

德王（前排左四）任蒙教会秘书长时留影。



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等二十多人为委员，并且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指导公署，何应钦和赵戴文分别担任正副指导长官。4 月 23 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于百灵庙正式成立，5 月 2 日，二十四名委员通电就职。国民政府每月拨款 5 万元作经费。

但德王对获得的权力绝不满足，对国民政府的盐运和商务通过蒙境加以阻挠，人们一直感到忧虑的事情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日本对于内蒙早图染指，侵略内蒙的准备工作，也早已开始。“九·一八”事变后，此种工作更加积极，他们对德王的自治活动当然要加以利用。1934 年 8 月以后，德王就和日方公开谈判了。1934 年底，日本开始直接帮助德王对抗中央政府，到 1935 年，日军势力已扩大到天津、北平、张家口地区，德王就完全依附日本方面了，蒙古自治运动堕落成了分裂国家的分离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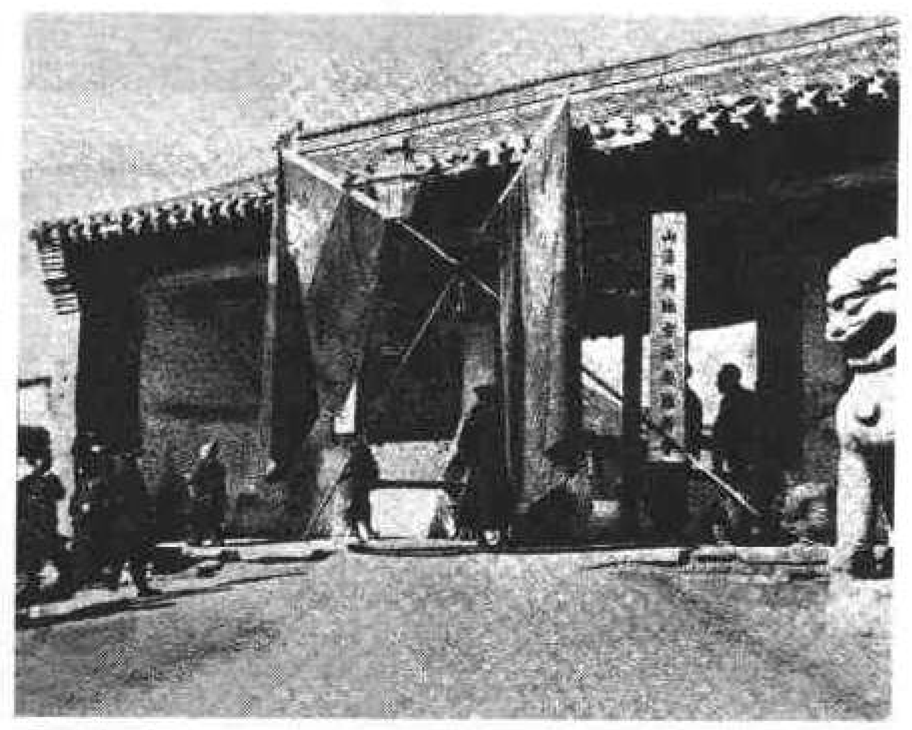
【中日纠葛】

榆关接收典礼

⊙枫　林



接收时的山海关



交接办公处

1934年1月30日，滦榆行政专员陶尚铭与日特务机关长仪我在天津商定接收榆关方案，计六条：(1)定于民国二十三年2月10日实行接收；(2)山海关原有一切行政尽行恢复事变前原状；(3)前项行政机关即于接收之日移至原处；(4)山海关附近事变期内所有当地之临时组织，于接收时即行取消；(5)当地人民在事变中对地方有正当服务者，接收后得选择酌用；(6)在山海关之日方机关，尚有一部分因临时需要，暂时留驻，待迁移办法确定后即行迁出。按照这一规定，2月10日，榆关接收典礼在临榆县署举行。日方代表驻榆特务机关长仪我、天津驻屯军代表川合等，按照1月30日所商定的榆


中日双方代表步入会场。


接收专员陶尚铭(前右二)

关接收方案,移交部分行政权给中国代表陶尚铭。是日,新任临榆县长袁泰及山海关公安局长苏玉琦分别就职。接收后,伪机关仍占据城外,日关东军一部及特务机关、宪兵队仍继续常驻榆关。中国警察在榆关只限定二百人,且须徒手站岗。一切反日活动更被绝对禁止。中国接收了榆关,但并未改变日军控制榆关的局面。

【中日纠葛】

外部对日本声明应付之经过

来日大难国人速自振拔

⊙《大公报》

【南京通信】从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发表非正式声明到现在，国际间起了一层很大的波涛，尤其是被日为“被保护国”的中国，朝野人们，都受了一种很大的冲动，现在把政府应付这一次事件的前后情形，写一点出来。

外交部是十八日才知道有这回事的，当下几个干部人们，看了这一次声明，觉得异常触眼刺鼻，认为有阐明中国立场的必要，所以一方面研究对付的方案，一方面打电报给驻日公使蒋作宾，叫他向日本政府询问真意所在，到十九日由外部某要人亲自拟稿，呈送汪兼外长核阅，方算定稿，当日下午就由外部情报司公布。

那时因为驻外各公使纷纷打电报回来，问是怎么回事，外部把中国的声明书，全文打出去，叫各公使向驻在国政府说明中国的立场，这一次的声明书内容，只说“国际和平之维持，端赖世界各国之群策群力……”中国为国联会员国之一，对于提倡国际合作，认为其应有之义务，中国与他国之合作，不论其为借款或技术协助，常限于不属政治事项，“中日现有情势与真正永久之和平，须建设在善意与互相谅解之基础之上”，措词的委婉，得未曾有。

所以驻欧的某某两使，接得全文以后，他们就嫌它不够强硬，另用使馆名义，发表了一篇声明，在这期间，驻外各公使确实起来活动了一阵，驻美公使施肇基他的电报打得最多，他在那几天，每天都有三五次电报打回来，十之八九是报告美国各大报的论调及记载，还有是报告美国政府的态度。

此外如驻英公使郭泰祺、驻法公使顾维钧，他们两位持论是十分激昂，

主张用更严厉的措词对待，他们在伦敦、巴黎的各方面，很出力活动一番，他们对于英法政府的态度、与会见英法当局的情形以及舆论的论调，都随时有电报回来，向外部当局报告。还有驻东京公使蒋作宾，驻罗马公使刘文岛，驻莫斯科代办吴南如，都将会见各驻在国政府当局的结果，向外部报告。

二十四日那天，日本驻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由上海回来，奉日外务省的训令，把日本政府对于上次声明的解释，向汪兼外长面陈一过。（全文见二十六日本报）二十五日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汪即席把日本声明书引起之外交局势，及各国态度、政府应付经过等详细报告，并把二十四日须磨来访时，所述对于声明的解释内容，向中央报告，当时对于政府应付的方针，亦经讨论，从早晨八时开到十一时五十分，方告散会。

汪离开中央党部后，就回到官邸，召外交部次长徐谟到邸，告以中政会讨论情形，并决定由外部对日本解释，再事驳斥，当下即由部下着手起草，当晚亦即发表。（全文已见二十六日本报）这第二次声明书，措词含义，较第一次声明，都有进一步的表示，如说"中国之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予损害……中国不能容受列国间之共同束缚势力，犹如不能容受任何国之单独束缚势力……"

这是表示中国最低限度的立场，凡有损及中国主权与独立国格的行为，中国决不能忍受，算是话已经说明，不像第一次声明的吞吞吐吐了，最后一段说一对外则致力于国际安全之保障，及国际条约如《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之维护，对内工作之进行，不容他国之干预……这简直是把中国政府的外交方针，也说了一个明白，这种诚恳的坦白，是值得称赞的。

事后记者遇见外交当局，他告诉记者："政府对于日本声明的应付方策，在两次声明书中，已概括无遗，中国的立场与其独立主权，都已阐明，除了这个，政府暂不用再有什么话说。"政府的应付是从容而稳慎，不愿空言贾祸，更不愿徒事虚矫，在这个当口，政府是不再取更强硬的步骤了。

日本的非正式声明，当然是对《九国公约》，重新撕毁了一次，论理九国公约国是应该如何的共同奋起，维护条约的神圣，但是睁眼四望，国际间情势是依然暗淡无光，世界舆论虽然激昂，而各国政府类多束身自好，力避与日本军阀的凶锋接触，所以英国只是"质问"而止，美国并未有具体行动，至如法意两国，则声明不问此事。苏俄态度，更沉默极了，他说日本的声明，是

对借款与中国，供给飞机军火的国家而发，苏俄没有借款给中国，亦没有把飞机军火供给中国，所以此事与苏俄无关。

国际情形，在这几日来、大抵如此，换句话说，各国还是惧怕蛮横的日本，非有实际的准备完成，各国是不会有进一步的有力行动，日本军阀从"九·一八"以来，看透各国亦不过如此，预料就是有什么言动，亦不会引起各国的切实反响，至多是文字或口头的纠缠，那是早不在日本军人的眼睛中了。

听说此次日本的声明，完全是军部的主张，原来日本对中国的和平建设，最是嫉忌，尤其是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拉西曼的来华，日本人已经目眦欲裂，拉西曼的回欧，过日本时，毫不理会日本人，这是第一件不乐意的事。再次如中国的整顿飞机，日本亦是最嫉忌的事，尤其大半购自美国，棉麦借款旧恨未消，重增新怨，所以要说"中国与列国的交易，须经日本同意"。最近德国的名将受中国聘，为某种顾问，亦是叫小眼孔的日本人，侧目而视，日本人的看中国，已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其声明之荒谬，外交界认为远过于《二十一条》，来日大难，真不知何所的止也。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编者点评：

文中所谓日本声明是指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司天羽英二发表的公开声明，声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要经日本同意。此言一出，世界惊诧，日本已经不把中国当成独立国家看待，而是看成了它的附属国。日本就像霸道、粗鲁的恶棍，对邻家女虎视眈眈，当看到有其他男人出没邻家，立即妒火中烧，也不管邻家女是否愿意，就像个监护人一样限制她的自由。

【中日纠葛】

买卖中东路

◎韩文林

说到中东路买卖，就先得谈谈中东路。中东铁路是俄国沙皇政府为了侵略的目的于1897年至1903年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的一条丁字形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抵大连、旅顺。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为日本占领，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仍称东清铁路，民国后改称中东铁路。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曾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愿意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殊权利，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及其它租占的矿产、森林和各种产业。

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经过不断谈判协商，于1924年5月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的前途只取决于中苏两国，不容许第三者干涉；苏俄政府同意中国赎回中东铁路及其所属一切财产，其款额、条件以及移交手续，另行召开会议决定；中东路由中苏两国共管。

有关中东路的协定虽然订立，但毕竟是一纸空文，随时都有可能因需要而变更。用一个文本文件来约束对方，有时是不实际的，也是不牢靠的，这种事例不胜枚举，中东路后来的命运正是如此。

1927年中苏"绝交"后，中苏两国围绕中东路的纠纷升级，冲突不断，并最终酿成中东路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东北失土，中国已无法保持中东路主权。日军占领东北，中东路便处在日本与伪"满洲国"的包围之中，日伪与

管理中东路的苏联方面不断发生磨擦和冲突，形势日趋紧张。



中东路副理事长到东京商量中东路出售问题。

由于中东路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于日方来说，是其实现北进方针的交通枢纽，必须控制在自己手中；而就苏联而言，则难以对其行使强有力的控制，加之当时苏联而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欧洲，其领导人不愿两面树敌。所以想来思去，还是卖掉省心，而这正是日方梦寐已求的。

说来叫人难以置信，苏联瞻前顾后，意欲出售中东铁路，恰恰就是没有考虑对中东路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的利益，中东路毕竟是在中国国土上，总不该忘记吧！

1933 年 5 月 2 日，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委员李维诺夫向日本驻苏大使太田提议拟出售中东路，太田立即电告日本政府。4 日，日外务省次官有田就与苏驻日大使尤列涅夫作私下商议。

中国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外交部于 5 月 8 日电令驻苏大使颜惠庆就苏联出售中东路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外交部长罗文干也召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明中国政府对此事之态度。9 日，外交部为苏联出售中东部发表声明，指出：中东路仅中苏两国享有合法权益，中东路一切事宜应继续依照 1924 年中苏两国所订协定处理，不容第三者干涉，任何新订办法未经中国同意者应视为无效，中国政府绝对不予承认。驻苏大使颜惠庆亦于同日向苏人民外交副委员加拉罕面致节略，加拉罕矢口否认有售路之举。

苏联出售中东路一事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商会

苏联驻日本大使与日本外相讨论中东路问题。



等团体电苏人民外交委员李维诺夫，表示苏联出售中东路，"中国民众绝对不能承认"。其后几日，上海钱业公会、银行公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上海大学教联会等团体纷纷电苏外交人民委员及苏驻华大使表示反对。

5月11日，李维诺夫对塔斯社谈话，承认确曾对日驻苏大使太田提起"由'满洲国'赎回中东路之可能"，并辩解道："中苏及奉俄协定中均未曾规定中国在合法期限前有赎回中东路之权，亦未曾限制苏联以该路售之他人，尤以对方为满洲国之一现存势力，且在实际上行使中苏及奉俄协定中之华方权利义务者。"显然，苏联根本没有把中国政府放在眼里。

同日，加拉罕接见颜惠庆，正式宣布了苏联政府售路与伪满的决定。仅仅两天前，加拉罕还矢口否认，现在却公开宣布。也许当初他碍于面子，毕竟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所以能瞒就瞒。既然现在已真相大白，干脆也就撕开脸皮。两者间的关系，有时就是隔着一层纸，一旦捅破，也就无所顾忌了，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行政院于13日召开会议，由外交部长罗文干报告了关于中东路问题交涉经过，经讨论由外交部提出抗议书。次日，颜惠庆向苏人民外交副委员加拉罕递交抗议书，内称：中国政府受武力压迫，暂时不能行使中东路管理权，

固不能影响中苏协定之效力及中东路之地位。苏拟将铁路出让，不啻是承认伪国，援助侵略。声明该路为中苏共有，非得中国同意，不能处理。

6月26日，苏联与伪满、日本不顾中国朝野的强烈反对，在东京举行中东路售卖的首次会议，苏驻日大使尤列涅夫、外交委员会远东部长哥兹洛夫斯基、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库兹涅佐夫，日本外相广田、外务次官重光、外务省欧美局长东乡、伪满"驻日公使"丁士源、伪满"外交次长"大桥忠一（日人）、中东路伪满"代表"沈瑞麟等参加。谈判中，苏方提出售卖价为2.1亿卢布，另加木场及有关之附属事业费4000万卢布。而日与伪满只同意给5000万日元，不包括其它财产。双方争执不决。无奈，尤列涅夫拜访日外相广田，要求日从中积极斡旋。其后，双方继续为所有权问题发生争执。苏曾表示售价可减至2亿卢布，伪满代表则态度强硬，认定5000万日元已很高，不考虑增额。

9月24日，日与伪满将中东路局苏方运输、厂务、会计、业务四处长及满洲里站长扣押，绥芬站长传讯，想以此来压一压苏方。苏方立马还以颜色，苏联驻日大使尤列涅夫当日向日外相递交抗议书，苏《真理报》则载文警告日本称：满洲境内发生各事以及破坏中东路苏联权利之完全责任，须由日方担负，若日人一味挑衅，则日必将受到相当之报复。此时苏方已调兵14万、飞机300架驻防远东，冲突一触即发。

因售卖中东路一时无法达成一致，伪满依仗日本之势，旁敲侧击，力图诋毁、打击对方，造成一定优势，以便在谈判桌前能占先手之利。可偏偏遇上苏联这样一个大国，不买账，苏方决定中止其售路谈判。

转眼时间跳到了1934年，日伪终于按耐不住了，于2月将上年拘禁的中东路苏籍职员六人释放，以此博得苏联的好感，以换取中东路售路谈判的恢复。两天以后，苏方即表示愿将中东路售价减为2亿元卢布，这表明苏方也有意恢复谈判。日本政府对此事是相当关注也十分着急，28日，日电讯社传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表示："切望从速解决售路问题。"至此，中断六个月的谈判酝酿恢复。

苏日两国第二次中东路售卖谈判于4月26日由秘密转为公开进行，在其后的三个月中，双方讨价还价，进展仍缓慢。8月初，传闻苏联又将拒绝出售中东路与日本，伪满"外交大臣"谢介石于3日发表谈话，指责苏方无诚



日本外相广田拉着苏联大使与伪满洲国"外相"谢介石的手一脸笑意。

意，日苏关系又告紧张。是日深夜，哈尔滨伪方出动军警将中东路东段苏方人员十七人以"间谍罪"逮捕，日军并对该段实行戒严，以便占夺。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至25日，苏联人员先后被逮捕者达四十人，日苏关系又趋紧张。可转眼到了31日，日外相广田在内阁会议上就日苏中东路买卖问题发表讲话，称该路售卖问题仍有回旋余地。言下之意，日方将作出让步。同

时，日驻苏大使太田向苏联官员建议苏联撤退远东驻军。苏联方面居然听命，于9月间自动撤退了远东边防军之监视部队，日苏关系骤然又升温。

从表面上看，苏日双方关系因中东路问题时有恶化，多次趋于紧张，似乎这笔买卖很难做成。但结果却总是柳暗花明，其间虽不断斗嘴、动手，其实那可看做是保持相互间联系的另一种方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否是他们之间达成的某种默契，是一种障眼法，是有意做给中国方面和国际舆论看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最终的结局似乎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双方都得到满足。

从1933年6月26日，苏联与伪满、日本举行第一次中东路售卖谈判开始，其间谈谈停停，停停谈谈，历时一年半，会谈共四十次，最终于1935年1月22日达成协约。苏联还是做出让步，将中东路权作价1.7亿日元售与伪满，但由伪满负担苏职员退职津贴。双方确定由日本外务省欧亚局第一课长西春彦、苏联远东部长柯资罗夫斯基、伪满"外交部次长"日人大桥忠一组成起草委员会，草拟中东路买卖协定。

几天以后，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莫洛托夫在会上发表演说时称："苏联对于中国各部（包括新疆在内）之独立与不可侵犯，为无条件之拥护者。""苏联反对瓜分中国与外国以武力占据中国之领土。"这番话表明，苏联对中国的总体态度是很明确的，但在中东路售卖问题上，却很难自圆其说，一方面态度鲜明，而另一方面做法背离，这多少与我们心目中那个所敬仰的国家的形象有所不同。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强大社会主义邻国精心包装过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利己主义，也能为十年之后再度侵犯中国主权完整的《雅尔塔协定》的出笼寻到源头。

3月11日，中东路买卖草约由日外相广田、伪满"驻日公使"丁士源、苏驻日大使尤列涅夫在东京签字，23日上午9时，苏、日、伪满"代表"在东京正式签订中东路买卖协定及附属文件共六份：苏伪基本协定、苏伪间最终议定书、日苏间声明日本保证支付之换文、日苏间关于解释支付保证之换文、日苏伪间关于物品代偿之议定书、日伪间关于日本承认保证之换文。就这样，几纸协定给一桩非法买卖划上了一个句号。中东路售出后，中东路苏籍职员21176人分批撤离回国，至8月23日全部撤完。

中国政府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中东路所有权由苏联转到伪满手中，这无疑是对其不恭，更是一种污辱和悲哀。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抗议苏联出售该路为非法，声明“中国保留对中东路之一切权利”。其后，又向《九国公约》各关系国政府致送同一内容之声明书，并致文驻华日使馆，指出日政府应负之责任，中国政府对此深表遗憾。

声明虽然义正辞严，但掷地无声，以当时中国的国力与所处困境，实在无法改变中东路为日伪所攫取的事实。

【中日纠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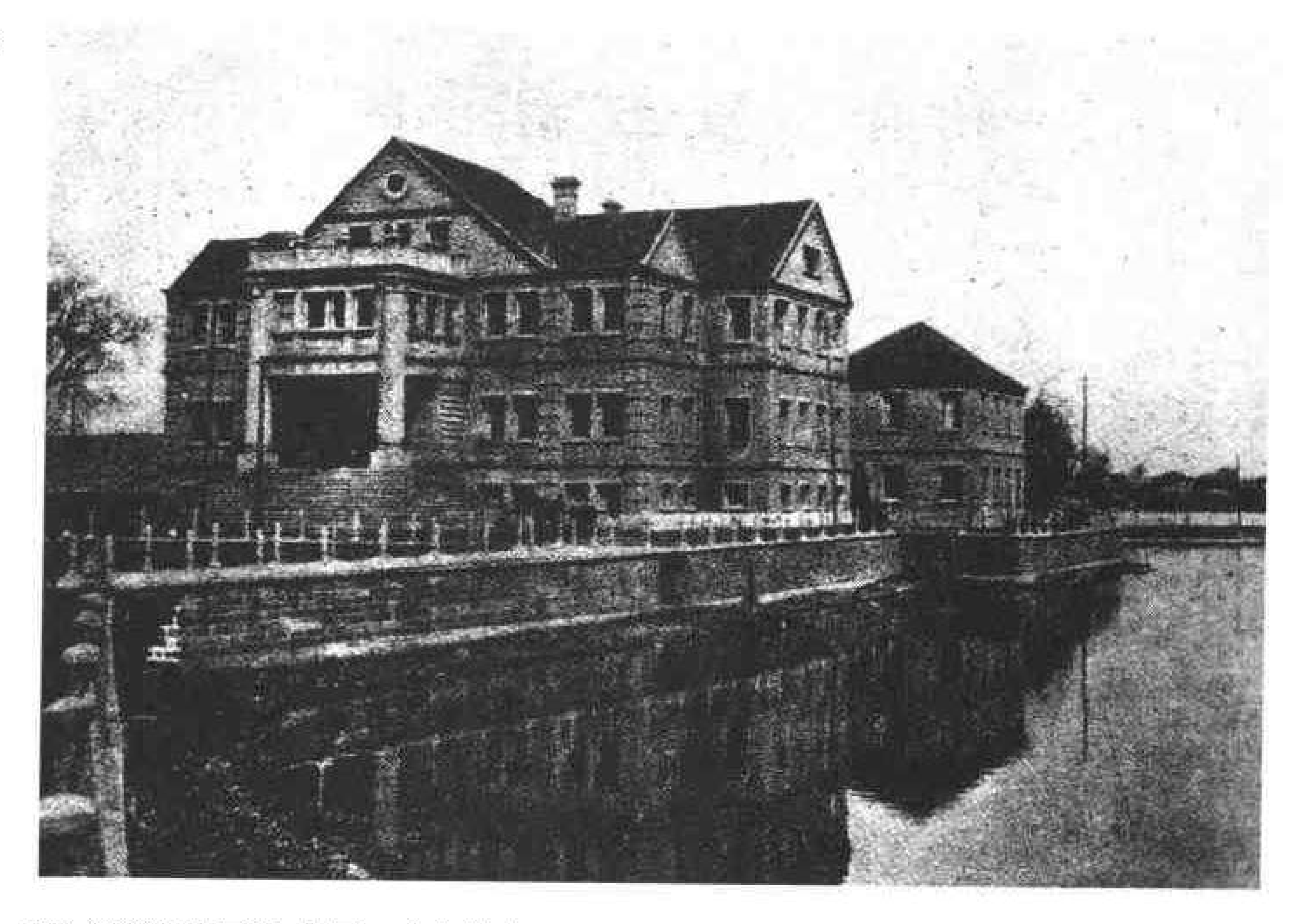
蒋介石放飞“和平鸽”

⊙谢圣红

《塘沽协定》签订后的1934年，中日关系相对稳定，但谁都明白潜藏在平静局势后面的巨大危险。怎样对待中日关系？日本是敌是友？对日是战是和？国民政府的决策者蒋介石作了紧张的思考，在此之前，他已经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他需要进一步营造一个对日妥协和苟安的局面，恰好，日本政府在摇动“中日提携”、“中日亲善”的橄榄枝，蒋介石便决定放飞他的“和平鸽”，1934年12月发表了一篇政策性论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此文于1934年10月由蒋介石在奉化溪口的病榻上口授要点，军委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记录整理，以侍从室第二处秘书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暗含徐徐道说邻邦之事的语意，对侵略不止的日本人加以劝诫，同时，蒋也想试探一下满怀悲愤的国人的反应。他很谨慎，没有用真名。文章刊于同年12月出版的《外交评论》杂志，此后《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等报刊，全文转载或摘要刊登了这篇文章。

蒋介石在年轻时曾数次东渡日本，对日本社会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正是站在这种“知己知彼”的立场上，《敌乎？友乎？》一再述说，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友”而不是“敌”，甚至明确宣称：“首先我敢断言，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为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因而着重强调妥协高于一切，胜过一切，抵抗必遭失败。在蒋看来，中日双方应当实行妥协，“和则两利，敌则两败”。两国如果开战，他断定其结果必将“同归于尽”，而中国则先遭重创。蒋认为，中日如果交战，日本在十天内便可灭亡中国，至少可以占领中国的重要都市与海港。由此，他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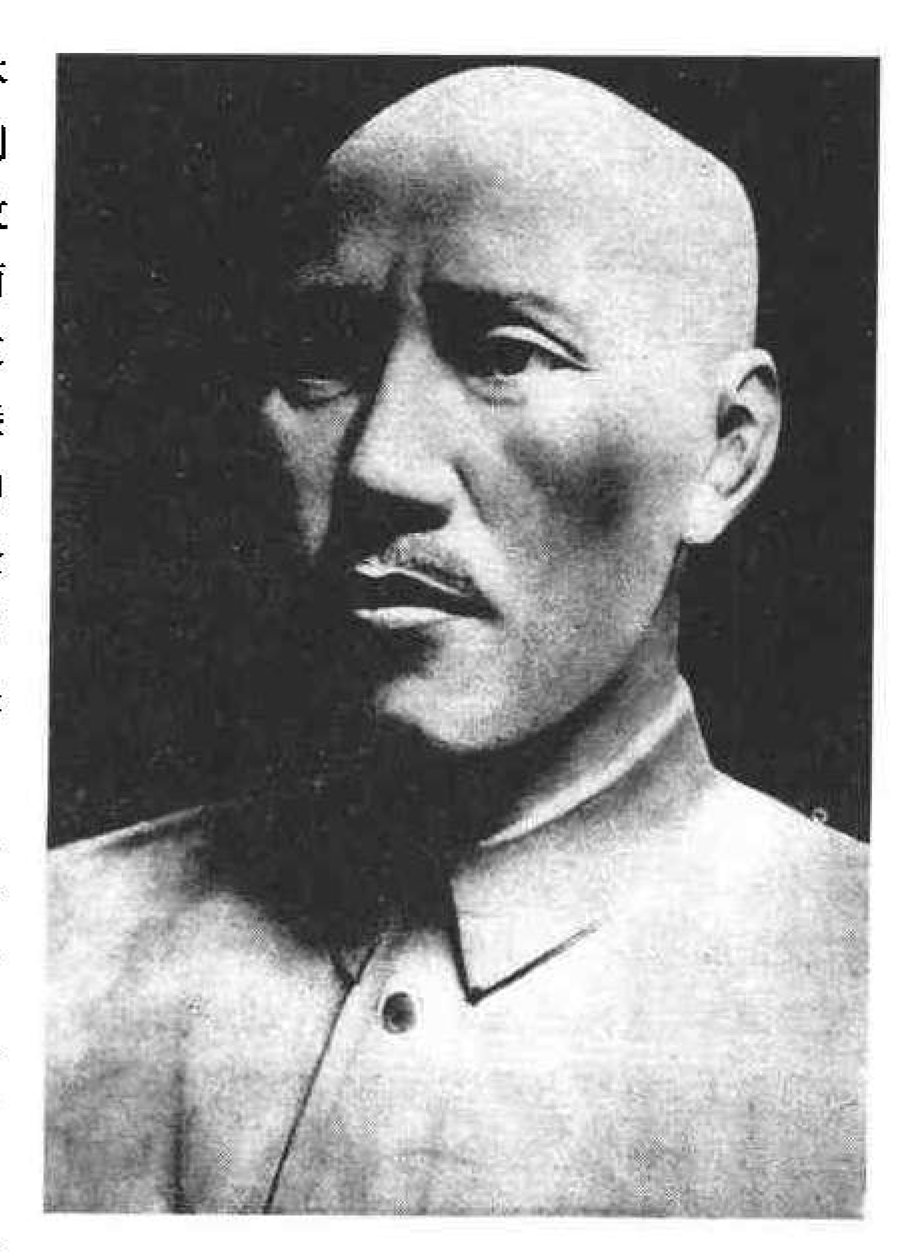
南昌行营——蒋介石决策的地方。



言："我以为目前中国，只有尽力消弭战机，才是惟一可采之路。"中日问题应依靠外交途径，通过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来解决，中日间要化敌为友，避战谋和，"相互提携，共建两国和东亚的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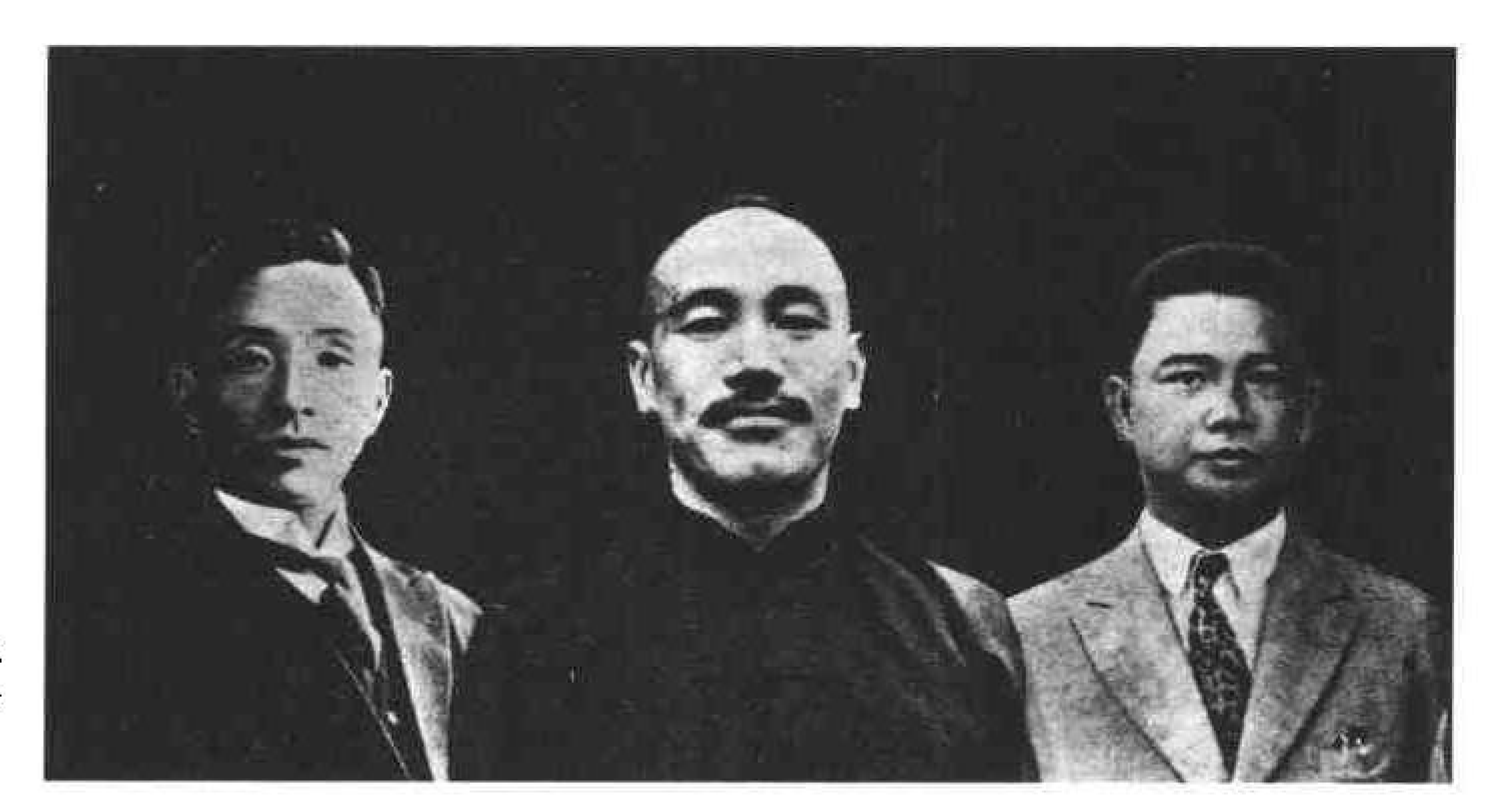
《敌乎？友乎？》反省了中国以往对日本政策的七项所谓"错误与失计"，并认为正是这些错误造成了现时两国关系的僵局。文章系统地回顾了北伐战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国对日关系，指出中国对日本态度骄妄，意气用事而缺乏理智，"当屈不屈"，屡屡丧失与日本打开僵局、达成妥协的机会。例如，"九·一八"事变时拒绝以日方提出的五项原则进行谈判，这是"失却时机的错误"；中国民众以为用抵货运动可以击败日本，这是"判断对方的错误"；民众对本国力量夸张过大，信赖过甚，"甚至自信短刀可以制飞机"，这是"审察自力的错误"；中国朝野对国际联盟、对英美列强干预和制约日本，期望过高，这是"观察第三者的错误"等等。总之，蒋绝不认为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实行不抵抗、签订《淞沪协定》和《塘沽协定》等都是大错，却断言由于中国方面"不但不知彼，实亦不知己"，不自量力，感情用事，以致酿成大患。

文章认为中国对于日本应实行“革命外交”,“能伸则伸,当屈则屈”;中国应在政治、经济、文化、道义各方面与日本“共同提携”、“恢复友好”;并建议与日本举行直接谈判,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只要日本停止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其他一切要求,中国均以诚意谋求解决等等。这就是蒋介石的对日关系观和对日政策论,字里行间充溢着浓厚的日本情结。因之,《政经日本》的一篇评论写道,“满洲事变发生以来,在中国方面只听到感情的排日论之流行,最近……《敌乎?友乎?》的大论文,冷静而大胆直率地痛论中日的关系,诚为近来中国杰出的文章”,算是对这篇文章的正面回应。当然,无论蒋怎样“检讨”、“自责”,日本军部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还是相当清醒的,他们并不信任蒋介石,认为蒋对日态度的所谓转变,仅是南京政府一时的敷衍之计,而不是本质上的改变。1935 年 9 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订的《对华基本观念》中就明确指出:“世人往往称蒋介石为机会主义者,判断其如大势不利,必将转向,此可谓过于盲目的观察,因为他的这种转向意味着屈服,具有遗臭万年的性质,并将会招致等于自杀的后果”,“另外,鉴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浙江财阀与英美间的关系,特别是他们的大部分财产都存于英美系统银行等事实,他们能否同与其利害不同的我们日本相结合,是十分清楚的”。



忧郁的蒋介石(塑像)

《敌乎?友乎?》的思路在国内招致许多人的批驳。1935 年 2 月,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指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



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的汪精卫、蒋介石、黄郛(自右至左)。

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北京大学教授张熙若在《论所谓中日亲善》中写道:"天下事更奇怪的乃是:土地被人占了很多,人民被人杀了很多,劫后的性命还是朝不保夕,在此种岌岌可危的情势下,有些人竟然一闻人诱以亲善之词,诳以提携之说,便似乎欣欣然色喜,以为好了,有办法了。'今日演说惟恐不亲,明日访问惟恐不善。'这么说来更难了!人于侵略之后来讲亲善,自然是于'伤害之上加以侮辱',我于被侵略之后甘心去和人家讲亲善,岂非表明不但无力抵抗,并且情愿受辱?"李公朴在《读〈敌乎?友乎?〉书后》亦提醒南京当局丢掉妥协幻想:"我们无论怎样委曲求全而'全'终不可得","要想日本'悬崖勒马'至少是对牛弹琴"。

蒋介石在50年代谈及《敌乎?友乎?》一事时说,"当时,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人最后关头,极思设法打开僵局,遂发表《敌乎?友乎?》,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这也是为什么1935年上半年中日关系突然一度解冻并热乎起来的深层背景。

【政局动向】

平等惩罚通奸者:女权分子的呼声

⊙肖　剑

1934 年 10 月间,男性占绝对优势的立法院通过了一项《刑法》修正案,将原来《刑法》中的二三九条继续予以保留,内容为:“有夫之妇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也就是说,对通奸罪的处罚只限于女性,男性可以逍遥法外,这个赤裸裸的性别歧视法律刺痛了妇女界。

早在 1931 年 5 月的国民会议上,全国妇女团体代表在首都开会,成立了提案委员会,收集关于妇女问题的提案。当时就有人指出现《刑法》第二五六条“有夫之妇与人通奸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的内容,应改为“有夫之妇或者有妇之夫与人通奸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此条提议经妇女团体大会通过,转交立法院参考。

1934 年春,立法院成立刑法委员会准备修改《刑法》。南京市妇女救济会负责人唐国桢、夏湘苹,妇女共鸣社负责人谈社英、李峙山,国民党中央妇女科科长刘蘅静等集议,就《刑法》上男女不平等的不公正条文,事先提请立法院注意。会议后,决定一起去拜访刑法委员会委员长焦易堂,陈述妇女界的意见。焦氏答应主持公道,并嘱代表等备一份意见书分散给各刑法委员,以便赢得多数委员的理解与同情。嗣后,妇女共鸣社与妇女救济会均有呈文及意见书呈递立法院,其中最关键之处便是要求将现《刑法》二五六条“有夫之妇”字样修改为“有配偶”的字样。

1934 年冬,刑法委员会将整个《刑法》修改完竣,原《刑法》二五六条修改为“有配偶与人通奸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在新的修正案内列为二三四条。妇女界担心该修正案能否顺利在立法院大会上通


首都各界妇女争取法律平等同盟会议代表

过，一直予以严密的注意与监督。10月25日下午，得知立法院将讨论《刑法》二三四条，妇女共鸣社、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会代表李峙山、郑季惺、唐国桢及王俊英(立法委员陈长衡的夫人)等人列席旁听。但当日未来得及讨论二三四条，即告散会。26日，立法院继续审查时，各妇女团体代表再次往旁听，立法委员的家属又增加了林宛文(钟天心的夫人)、黎剑虹(梁寒操的夫人)、黄湘(黄佑昌的女儿)等，进一步对立法委员施加影响。立法院在讨论二三四条时，辩论非常激烈，结果以六十八票对四十票多数通过取消该条，即两性的通奸行为，仅负民法责任，刑法不再加以规定。妇女界对此结果自然深感满意。

10月31日，立法院开三读会，通过《刑法》。因三读会一般仅作文字的修改，不能更动条文，所以妇女团体有些松懈，未派人参加旁听。不料立法委员们竟不依合法手续，推翻前案，未经复议手续就将二三四条重新提出讨论，委员们纷纷提出新修正案，终以四十票同意，通过恢复二五六条原《刑法》的条文，只处罚有夫之妇的通奸行为。该修正案新序号为二三九条。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会、妇女共鸣社等三团体，认为此有背男女平等原


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成员

则，联名请求复议，又被否决，列席旁听的妇女代表愤极而退席。事后妇女会、妇女文化促进会均召集临时理会，与妇女共鸣社共同决定召集南京市妇女大会，共同商谈对付之道。

11月5日，三团体在南京女中大礼堂召开市妇女大会，五百多人参加了大会，决定成立"首都妇女力争法律平等同盟会"。大会通过通电宣言，并推出代表三十人向中政会请愿。

7日上午，各代表聚齐后赴中政会请愿，中政会派陈璧君、叶楚伧两委员接见。陈说："大家的来意我已晓得，请诸位放心，我们定与诸位表同情，要处罚，男女都处罚；要放任，男女都放任；决不应单处罚女子。"代表们虽认为答复满意，但在中政会未讨论该案之前，仍不能安心，聚在中政会会客厅等候消息，一面再开临时代表会议，讨论应付步骤，决定派人到沪，联络上海市各妇女团体一致行动。时至十二时，始知中政会决议将此问题交法制组审查，于是代表们商议分头疏通法制组各委员，请他们主持公道。

南京代表赴沪后，与上海妇女协进会、妇女运动同盟会、妇女节制会等接洽。11日，上海各妇女团体在务本女校召开联席会议。妇女协进会、妇女

节制会、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中华妇女社等代表胡瑛、陈婉贞、刘王立明（陈令仪代）、杨志豪等二十多人出席，公推杨志豪为主席，决定推举刘王立明、杨志豪等六人为代表前往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请愿，要求宣布《刑法》第二三九条无效。她们的请愿内容不限于二三九条，恢复现行法少女被强奸年龄为十六岁的规定等也在要求之例，并请求国民政府让立法院根据男女平等及保障幼女的原则，重新订定条文。12日晚起，各代表即陆续赴京，13日在南京会齐，准备次日晨在中政会开会时请愿。

"首都妇女力争法律平等同盟会"发出通电后，得到诸多省、市数十妇女团体的响应，除上海外，镇江、汉口等各地妇女会，均派代表来京联系，浙江、杭州、湖南等妇女会、北京妇女社会服务促进会等均致函表示声援。

14日上午，南京推派代表五人，与上海代表同赴中政会请愿，那时中政会还未将复议二三九条的议案交付审查，因已有上海代表赴京请愿，担心其他各地妇女代表也将陆续来京，在众怒难犯情势下，遂敦促审查委员即刻审查，将审查结果报告大会，加以讨论。讨论结果是要求交立法院根据平等原则，复议二三九条。妇女代表因为第一步目的已达到，就相继退出。

11月30日，立法院开八十四次大会，再讨论二三九条，将内容修正为"与有配偶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各界妇女共同的抗争终于获得成功。她们的愤怒显示了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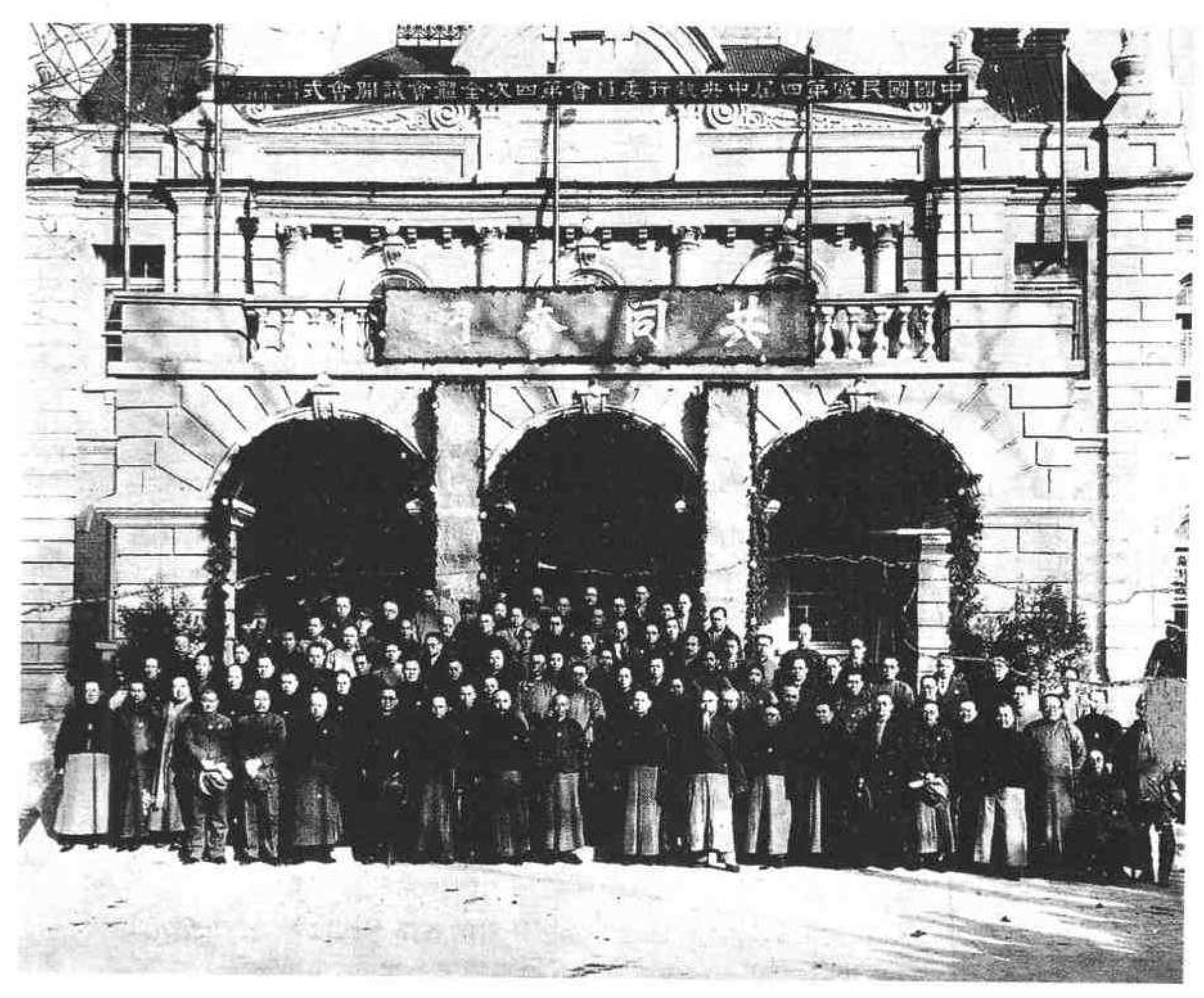
【政局动向】

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粉饰太平

⊙李继锋

《时代漫画》(月刊)是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1月中旬创刊的,主编鲁少飞,发行人张光宇,由上海的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当时恰逢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举行,于是便有了漫画家胡考的这幅政治漫画《四中全会样样佳好》。这幅漫画画得极精细,气魄非常,竟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多达四十一人的外貌特征,从知名的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到现在已经鲜为人知的刘守中、萧佛成等人,令人叹服。

本来,按照国民党的总章,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半年举行一次。1934年1月20日召开的四届四中全会,离1932年底的四届三中全会却已经一年有余,会议召开于"福建事变"行将结束之时。事变在国民党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因为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都是1926年北伐战争前就加入国民党的忠实党员,绝非那些只是看到国民党胜局已定而想进入分一杯羹的各路军阀政客可比,但这样一批人在"福建事变"中将国民党这块招牌彻底抛弃了,不用国民党的名,不提三民主义,不挂国民党的旗帜,连中华民国的国号都改了,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忠实的党员都嫌弃本党,这个党一定是已经堕落得很不成样子了。李济深等如此绝情绝义,弄得国民党大丢面子,又羞又恨。所以四中全会的第一大要务便是尽力显示执政党的团结。会议前,南京方面特派张继、马超俊等四名中央委员,风尘仆仆赶到自主意识很盛的两广笼络感情。两广也觉得福建方面做得有点不近情理,勉强同意为南京方面捧场。广东派崔广秀等四人代表在粤中央委员,广西只派黄旭初作为在桂中央委员的代表,这也算是给了面子,因为三中全会时,广西根本无人出席。



四中全会代表合影

1934年1月20日，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召开。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九十九人出席。汪精卫致开幕词，作政治报告，俨然是会议的主角。22日，蒋介石由杭州乘飞机抵达南京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剿共”问题及西南地区政治改革、中央与地方均权等事宜。会上提案不多，也没有解决任何重要问题，只是继续推林森连任国民政府主席，同时，为了杀一儆百，宣布将毁弃“党国”的李济深、陈铭枢等一干人永远开除出党。



张继（右一）等中委到西南地区游说。

四中全会样样佳好

四中全会样样佳好

吴老说："今天天气佳好。"吴铁说："出席人数多，印象佳好。"张知说："虚心论事，精神佳好。"李烈说："不作意气之争，团结佳好。"王法说："预料所有提案可望全体通过，佳好。"何成说："各同志能通力合作，改过图新，佳好。"汪精卫说："各同志皆虚心勇气，为本党前途祝，为中国前途祝，佳好。"各方来电："党国元老，荟萃一堂，共商大计，佳好。"中央饭店、华侨招待所、励志社、安乐酒店，派警切实保护，佳好。民生舰奉调驶京拱卫，佳好。欢迎标语贴满，佳好。港胡八项主张，与中央方面极为洽合，佳好。全经宋报告借款棉麦，销路甚畅，佳好。财孔整理田赋，除积弊而裕税收方案通过原则，佳好。林主席年高德劭一致主张连任，佳好。省委改省长制，佳好。发表宣言洋洋千言，佳好。决议案十二件研究核办案二十六件，编报告即日结束，佳好。诸位舟车劳顿静养珍摄，佳好。外交方针国防计划，全国小子太上遗民，不可使知，机宜机宜，佳好佳好！(列席委员自左至右)(一排)李烈钧、褚民谊、吴铁城、张学良、蒋介石、汪精卫、林森、孙科、王正廷、张静江；(二排)居正、张群、陈果夫、戴传贤、于右任、孔祥熙、宋子文、吴稚晖、罗文干、蔡元培；(三排)陈肇英、甘乃光、赵戴文、罗家伦、朱家骅、邵力子、王伯群、邹鲁、刘守中；(四排)陈布雷、陈树人、王法勤、张继以及各位；(高踞树巅)陈济棠、萧佛成、白崇禧、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胡汉民。

就像胡考在漫画的说明文字里所写的，会议只是粉饰太平，普通国民根本就不知国民党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胡考不客气地将国民党最讳言的党内离心离德的景象展现给读者：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逗留香港未来；冯玉祥、韩复榘在山东冷眼旁观；阎锡山继续在山西搞他的闭关自守；李宗仁、白崇禧虎视眈眈，不把南京的当家人放在眼里；陈济棠、萧佛成这批广东佬对蒋介石的用心总是满腹狐疑。国民党的派系传统就是这样根深蒂固，互争尚且不暇，哪里有多少心思和气力去干利国利民的正事？

【政局动向】

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

⊙李继锋

"新生活运动"源起江西南昌。

1933年9月，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将行营设在了南昌。南昌是江西省会，与大多数内地省份城市一样，市容显得破旧落后，杂乱不堪。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到南昌后，对此感到吃惊，她成长在沿海城市和国外，对内地的传统生活感到厌恶和羞耻，蒋介石对内地社会的了解远甚于宋美龄，但对妻子的见解很有同感，两人认为："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些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纪律扫地以尽，荡然无存，终于引起社会动乱，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人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宋美龄、复兴社的邓文仪等建议蒋介石努力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蒋介石接受了建议。他下令南昌所有机关、团体、商店、学校、必须整理内务，搞好清洁，改善环境，振奋精神。南昌各级官员不敢怠慢，闻风而动，一时间南昌城内外到处都在清除垃圾，整顿市容，整理街面。

1934年2月10日，在科学市附近的广场上，举行"新生活运动"大会。蒋介石在会议上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他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列举了少年在街上吸烟、随地吐痰、走路抽烟、蓬头散发、帽子歪戴、扣子不扣、拖着鞋子等现象，批评南昌市民的日常举止不够文明，还告诉



"新生活运动"时的南昌城

他们，不懂礼节，不讲清洁，是国家不能进步、社会混乱频仍的根源。如何才像个文明国民呢？蒋介石推出了他的"新生活运动"："现在要先从南昌起开始一种新生活运动，要使南昌所有的国民个个人都过整齐、清洁、简朴、一切能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我们中国人被外人欺侮，被外人轻视，因中国人身体不及他们强，生活不如他们整洁，现在我们努力新生活运动，要先从自己做起，爱护自己方能爱护国家，爱护国家先要爱护自身"。这个运动将通过复兴中国古圣先贤所提倡的礼义廉耻诸道德，让国民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等，可以为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奠定基础。大会还当场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长由蒋介石担任，熊式辉任主任干事，阎宝航任书记，宋美龄后来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散会时，全场齐呼大会宣布的新生活口号和准则："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守时间，爱清洁。"

这场从南昌发起的运动意在重整道德，革新国民的生活习惯，改造社会风气，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蒋介石有时讲得更直截了当：“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整个运动先由“规矩”和“清洁”两项开始，要求从自己做起，由不费钱、不费时、不费力之事做起，由机关团体及公共场所，如学校、公署、车站、码头、戏院、公园、会场等做起，然后再推向整个社会。通过自教、言教再配合图画、文字、戏剧、电影等手段来宣传“新生活运动”的要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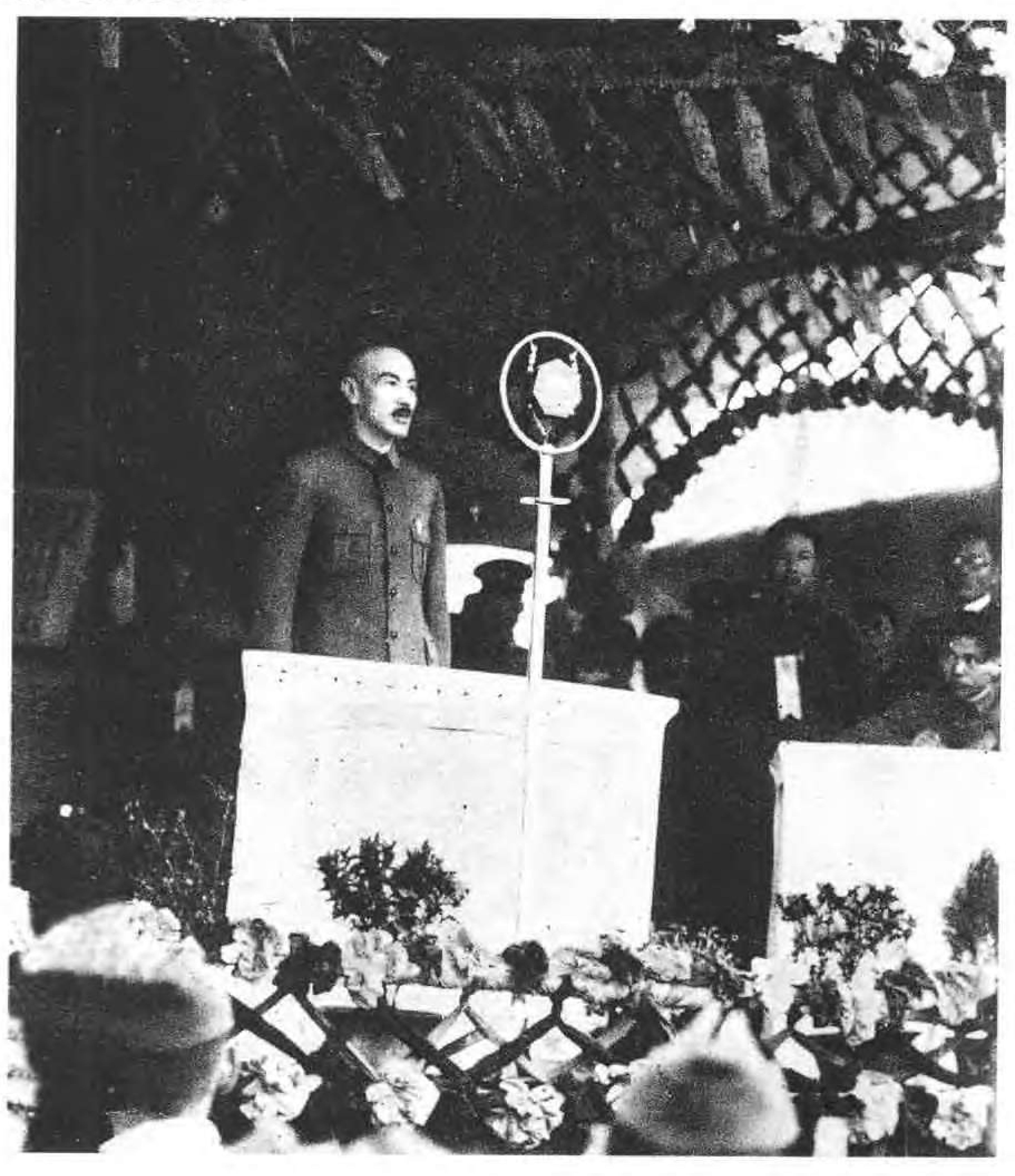
“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认为治本的办法在于教育，“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可算为独辟蹊径，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主旨》中说，“新生活运动”以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礼义廉耻为基准。蒋介石把“礼义廉耻”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中心意思是把传统文化中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贯彻到“衣食住行”四事之中，而治标的办法在“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八个字。

此项运动发起后，江西各界就组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并制定标识图样。新生活运动的图样整体为盾形，中间有指南针，边上染有红、黄、蓝、白四色。据宣传者称，盾是表示自卫，指南针表示生活有一定的准则，红色表示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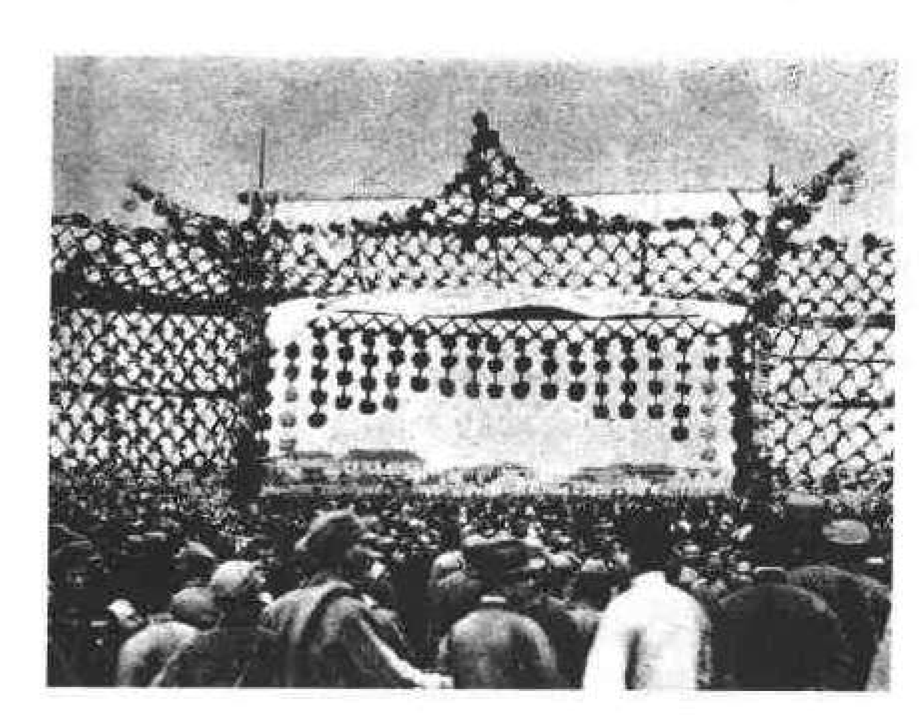
九江大铁桥

蒋介石宣传“新生活运动”。



斗热烈勇敢进取的精神，黄色表示光明和大公无私的态度，蓝白色表示青天白日的意义。除参加“新生活运动”的人都要佩带此项标识的证章外，各机关团体、学校、娱乐场所、公园、火车、轮船、车站、码头和热闹街区、酒馆、茶楼、浴室和理发室等都得悬挂或粉刷上此项标识。这个标识成为发起者蒋介石的一个象征物，就像显示冯玉祥朴素生活的大饼，或者隐寓张静江不良于行的轮椅。从此而后，蒋介石不仅是个精悍无情的军人，还时常像个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者。

“新生活运动”搞得最热闹的地方，也就是南昌。蒋介石说过：“我们要使南昌所有的国民，个个都过着整齐朴实，一切能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所以做全国人民的模范……我相信三个月后，南昌一定可以造成一种新风气，造成一个新南昌、新江西，半年以内风动全国，使全体



“新生活运动”大会会场

“新生活运动”的游行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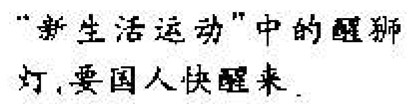
参加大会的民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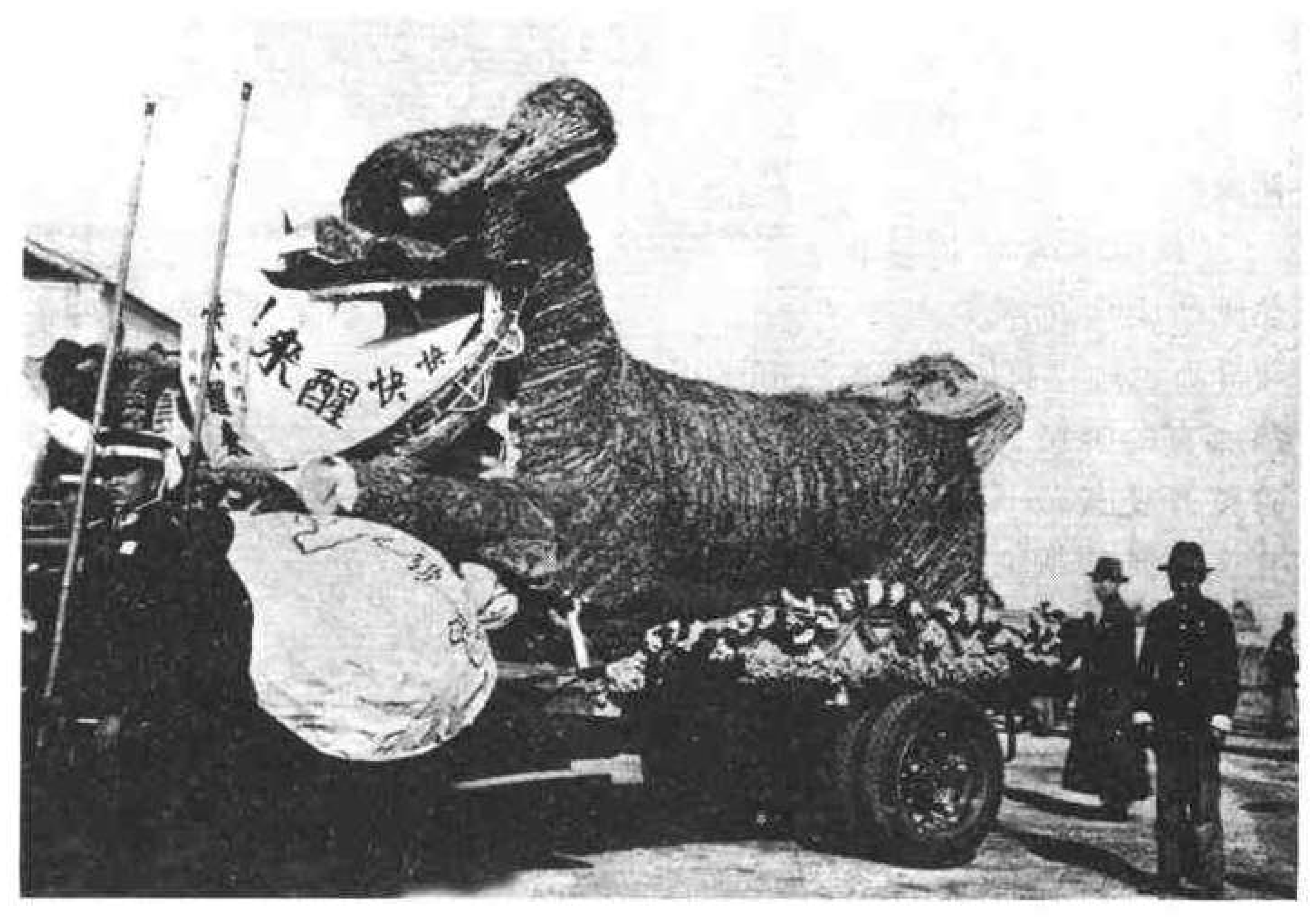
国民的生活，都普遍地革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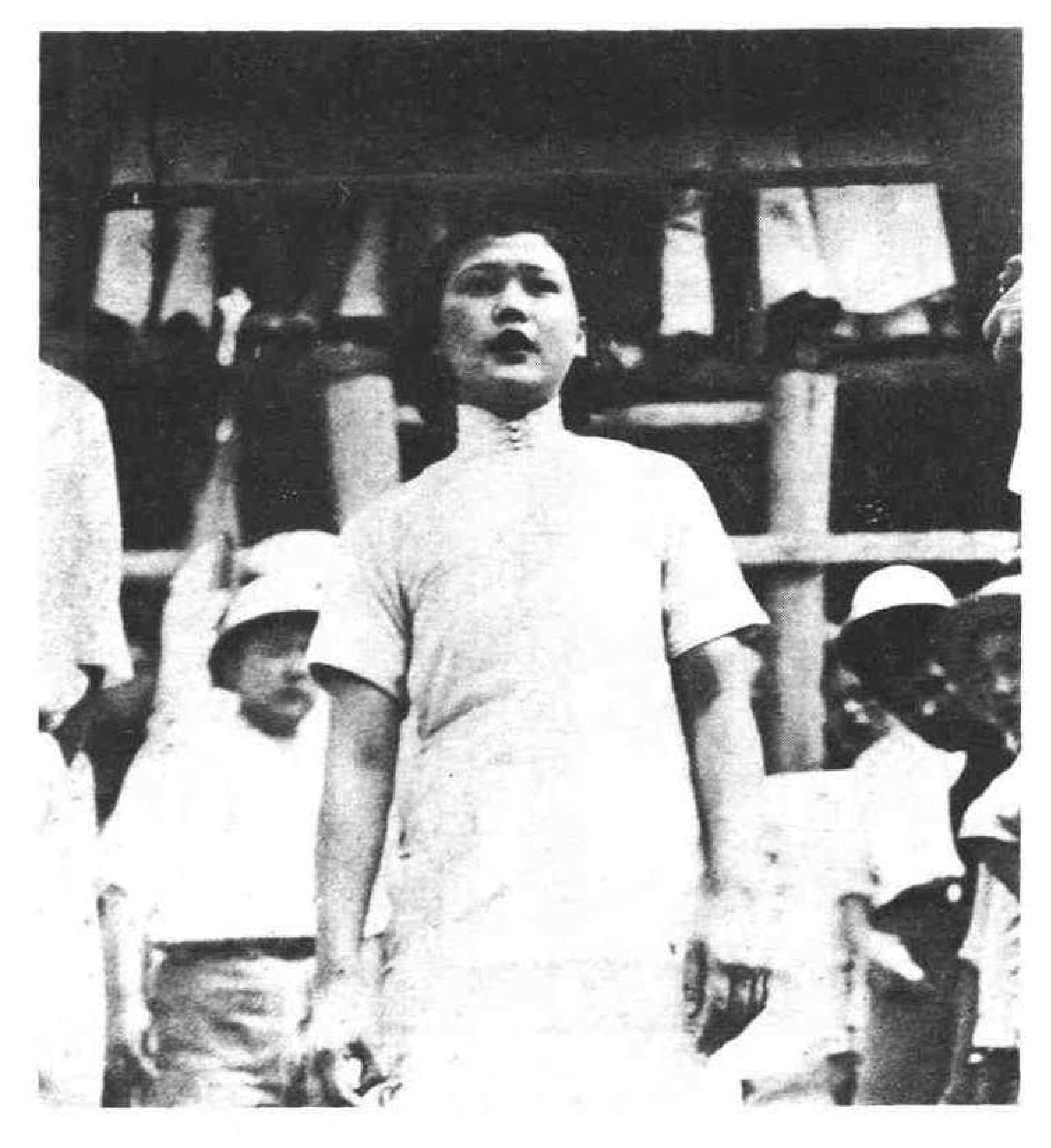
大会开完，当局利用正在过寒假的学生，编成二百多组，在南昌市设立十三个宣传站，分发宣传品。由各机关、部队、学校、社团及各保绅分别召开座谈会。3月1日在公共体育场召开规模更大的市民大会，市民达到五万人左右。会后进行了游行，以壮声势。

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口号四起，《新生活公约》中对人们如何走路、吃饭、穿衣、住房、行事等作了一些具体规定，诸如“拔上鞋跟，扣齐钮颗”，“吃饭要规矩，座位要端正”，“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鱼贯出入”，“闻党国歌，肃然起立”等。再如，“吐痰在地，在所禁忌；行路走动，安全第一；举止稳重，步伐整齐；走路靠边，上车莫挤；窗户多开，通光能气；捕鼠灭蝇，习劳习逸；漱口刷牙，黎明即起；饮食养主，莫恣油腻；互救灾难，和洽邻里；端其视听，走路莫急；小孩清洁，零食勿给；厨房厕所，净扫仔细。”蒋介石夫妇和他们的追随者们像家长教幼儿一般一招一式、不厌其烦地教诲着全国的子民。

各种新奇的景象出现在南昌的街头：童子军们纠正路人歪戴的帽子，还


“新生活运动”中的醒狮灯，要国人快醒来。





南昌"新生活运动"中，游泳运动员杨秀琼用"国语"发表讲话。

要监视正在饭店用饭是否超过四菜一汤的食客；值勤队在处罚随地吐痰的人；化妆打扮和穿短袖短裤的女性被盖上"奇妆"、"异服"的印章，提醒她们保留点儿羞耻心；烫发和新式游泳衣更被禁止。新生活促进会的工作人员到处宣传、鼓励进行集体婚礼，简化葬礼，每日每人要洗三次手，每周要洗一次澡，一时热闹非凡。

继南昌之后，江西的九江、庐山和南浔铁路沿线也群起仿效，有些省市



“新生活运动”的标识



“新生活运动”宣传大纲

也有所表示。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于3月16日开成立大会，汪精卫、朱家骅、叶楚伧、陈立夫、罗家伦、王世杰等全是发起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此理常言常新，百试不爽。“新生活运动”中激进的国粹主义者出现了，他们组织“摩登破坏团”，标榜“爱国”传统，以“排洋兴华”为行动指针，到处手执利剪，对过往行人身上所穿西服“动刀”，一开始他们在杭州、北平的活动最为频繁，后逐渐蔓及南京，引起风潮。4月5日，行政院长汪精卫通令各省市严厉查处专门毁损他人身上西装的“摩登破坏团”。取缔令称：中国鉴于积弱，才提倡军事化，如果都穿上长袍马褂，不是自相矛盾吗？以后，穿长袍大褂可

以采用国货丝布，服西服者采用国货呢绒。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开始设在南昌，后迁往南京。蒋介石亲任会长，宋美龄任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陈果夫、何应钦、康泽、张群、杨永泰、邓文仪、钱大钧、熊式辉、蒋孝先等为总会的总干事。各省市县相继成立新生活运动组织。到 1936 年，全国共有 20 个省和 4 个直辖市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会，有 1355 个县成立了新生活运动分会，形成了遍及全国的网点。在国民党的强制命令下，各地学校也都推行了新生活运动。但是，这场喧嚣一时的新生活运动，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尽管南昌不到三个月就成为所谓的"模范市"，江西不到一年就成为所谓的"模范省"，可蒋介石"三个月造成一个新南昌、新江西，半年风动全国"的目标没有实现，以至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之感想》中说，"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识，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而他在《新运三周年纪念演词》中更批评道，"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蒋介石夫妇从中国的文化系统中找出一些经学理论，再仿效欧洲、美国或者日本的一些生活方式，加以揉合，使用半说服半强制的方法推行，以为他们会给中国民众带来文明而道德的生活方式，这是典型的自命不凡的领导者所容易犯的错误。当时的兵学权威蒋方震在讨论战争原理的时候，曾经特别强调"战斗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其实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更是如此，想靠道德说教和强迫命令来改变它，就像用毛笔蘸墨在白瓷砖上习字，黑白倒是很分明，也给人成效昭彰的幻觉，但只要用水一冲洗，就立刻无影无踪，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不过，据一些专家研究，对蒋介石夫妇来说，"新生活运动"也有意外的收获。一是使第一夫人在全国出尽风头，南京城里的文武官员，对这位与蒋介石结婚以来在政治舞台上还不过多露面的第一夫人有了新的认识；二是蒋介石在西方世界的形象有所改善。如果一场花费大量人力财力的运动只取得那些效果，也就不能怪蒋介石老是唠唠叨叨地到处指责别人的不是了。

【政局动向】

梁漱溟与邹平乡村建设

⊙贾国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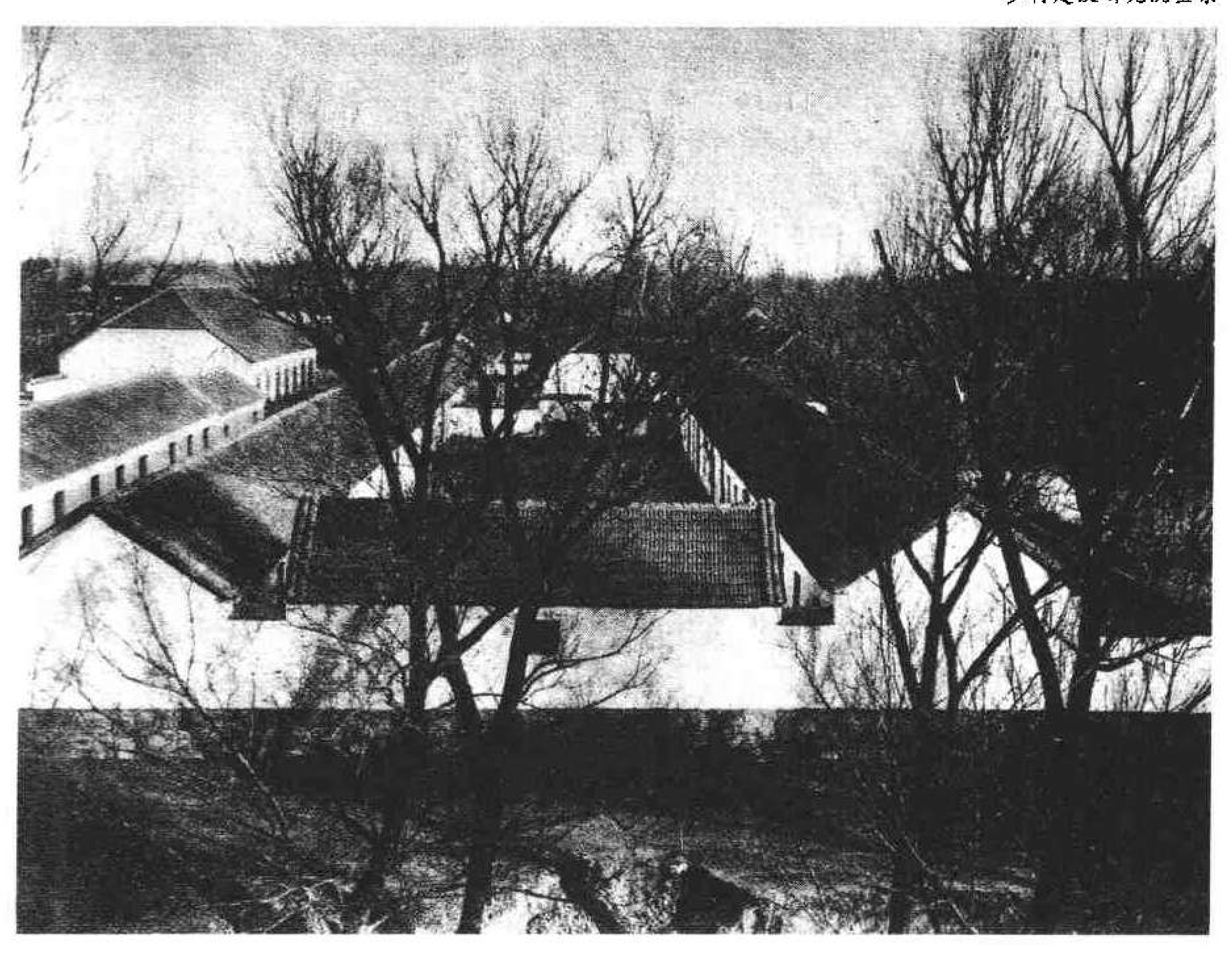
1921年，在西风劲吹之时，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表示，孔子的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一个等级，激烈批评苏俄的共产主义和欧美的民主主义不符合中国文化的特性，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作为传统本土文化的维护者，人们也许会联想起在共和时代仍然留着小辫子的北大教授辜鸿铭，会想起冬烘、顽固、保守、迂腐等词汇来。且慢，让我们察其言，观其行，看看他都做过什么。

梁漱溟没有出过国，没有上过大学，1917年，因发表《究元决疑论》而受到蔡元培的推崇，被聘在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中国、印度、西方三大文化体系进行比较，自称经历了三段心路历程：西方式的功利主义，印度的佛教，最后则皈依于本土的儒家。尽管时下他已被尊为"新儒家"的宗师，其实他的言论著作中很少引用儒家经典，甚至没有在儒家经典的阐扬上下过功夫，不做考据，不作注释。这个圣徒式的人物，使命感、自信心极强。20年代中国苦于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时，他公开声明："吾侪不出，如苍生何？"1924年，梁离开北大，开始从事乡村建设。1928年，梁漱溟在广东试行乡治主张，不久因支持者李济深下野而告吹。1930年，梁漱溟等人在河南辉县百泉镇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又因中原大战的影响而昙花一现。

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持续凋敝，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图恢复和振兴，都不约而同地关注起农村。一时间，全国各地

兴起了乡村改良运动的浪潮。乡村改革实验星星点点，遍布大江南北……有官方主持的，如行政院农村复兴运动、江浙的县政改革实验、山西的村政改革等；有民间倡导的，如山东乡村改革运动、定县平民教育、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等。其它的实验还有很多，最多时全国不下二百多处。这些运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但他们的目标相同——“改良农村”。因而他们能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互通声气，互相观摩。自1933年至1936年，他们先后举行过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山东的邹平、河北的定县、江苏的无锡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三大中心。其中，尤以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是最具本土特色，影响也最大。

乡村建设研究院全景



1931年初，梁漱溟等人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邀请，前往山东进行他们的乡村建设实验。梁漱溟与韩复榘关系非同一般，梁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冯玉祥部驻在南苑，韩复榘为冯部团长。冯玉祥邀请梁前往所部讲演，韩复榘得以认识梁，并很推崇梁漱溟的观点。1930年，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乃邀梁漱溟到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主任。1931年，韩复榘主山东，又邀梁到山东。韩对梁非常尊敬，总是称"梁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在有关乡村建设工作方面则更是言听计从。韩复榘曾公开宣称："我就是迷信梁先生啦。"1931年6月15日，在韩复榘的帮助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成立。

邹平县在济南东一百七十里，全县幅员不过百里，人口不到二十万，是个三等县。

梁漱溟是研究院的精神领袖，具体工作则由院长梁仲华、副院长孙则让、训练部主任陈亚三、军事训练部主任王冠军等负责。

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地位很特别。它直属山东省政府，正副院长由省政府任命，经费与行政均由省政府负责，任何机关也不能干涉。研究院负有指导全省乡村建设工作的使命，又有为这项工作训练干部的义务。研究院自身由三个主要机构构成：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邹平实验区。

乡村建设研究部设在校外，由梁漱溟亲自任主任，招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学期两年。它一方面为乡村建设工作培训高级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一方面具体研究山东各地的情况，为研究院制订政策和计划提供依据。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主要招收中学或师范毕业生，学制一年，为乡村建设培训低级干部到基层去工作。训练内容包括乡村建设中的行政、民众自卫、合作社建设等问题，还包括林业、畜牧、蚕桑、水利灌溉等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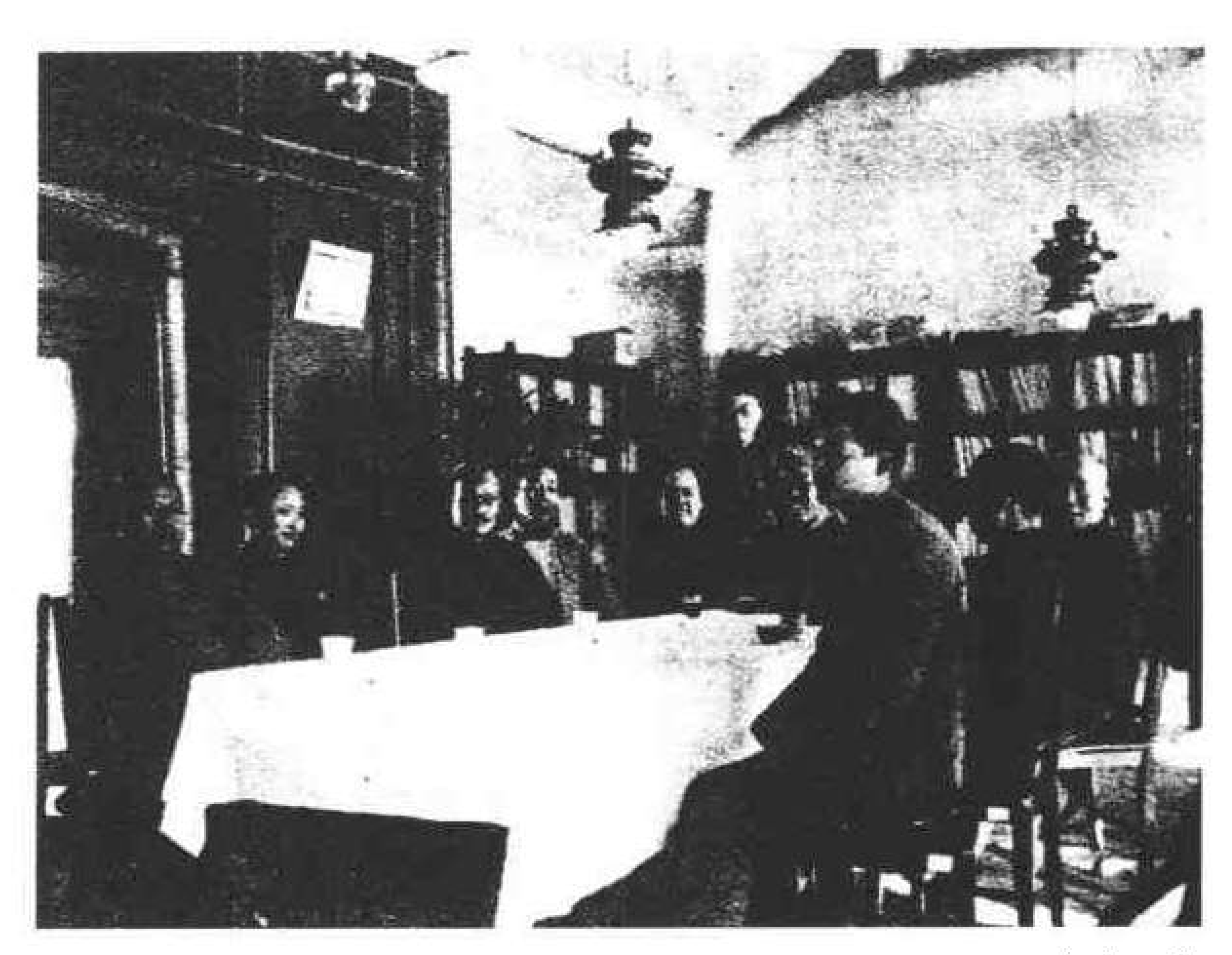
实验县区邹平，是研究院的实地练习试作场所，更是山东乡村建设的起点，为其它各县乡村建设作示范。

另外还有实验农场作为研究院的辅助性设施，负责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进行农作物、畜种和牲畜繁殖的实验等。随着乡村建设实验工作的开展，研究院还先后设立了社会调查部、乡村服务指导处、合作指导处、乡村书店、卫生院等机构。

研究院成立不久，梁漱溟就带领大家尝试开展乡村建设的实验工作。7月，他们举办了"乡村教育暑假讲习班"与"农产品展览会"，并在农场

组织游艺活动，放电影，为乡村建设作宣传。接着便派学生到乡下去实习，开始建立村学和乡学。

由于乡村建设还在起步阶段，人手少，经验不足，又缺乏经费，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地方各种法令的限制，不能自由实验，所以，头两年的实验工作成绩有限。



研究院的同仁在商谈事务。

1932年12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梁漱溟前往出席。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三十条》、《县政改革案》,《地方自治案》等文件。1933年6月和7月间，山东省政府依据这些文件，决定在山东进行县政建设实验，并划定邹平、菏泽两县为实验县区，在行政上完全归乡村建设研究院管辖。在实验区内，研究院可以举荐县长，改组县政府机关，任用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实验计划可以不受中央及地方法令限制。

研究院得到如此全面的授权，立即开始着手对邹平县政府进行改革：首先，裁局设科，科长多由研究院中研究部毕业生充任。此外，县政府增设了户籍室、农村金融流通处等机构。各科室在县政府合署办公，以提高工作效率。在对县以下组织机构的改革中，他们撤消了原来划分的7个区、157个乡镇以及各区、乡镇公所，根据自然地势、社会习惯以及户口数，将全县划分为14个乡、336个村。乡设乡学，村设村学以代替原来的公所。

梁漱溟等人特别重视邹平的乡学、村学建设。在他们心目中，乡学、村学既是一个教育机关，又是一种团体组织形式。基于中国农民对官府所提倡的新事物、新花样一贯持怀疑抵触情绪，他们尽量淡化乡学、村学的行政色彩，特别是对与民众直接相关的村学建设，尽力采用引导启发农民加入的办法，

逐步推广设立，不要求整齐划一。作为最基层的村学，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村里的领袖，在设立村学的时候，先从村里选出五至十名有威信、有资望、能办事的人作为学董组成学董会，并从中推举一位年富力强者作为常务学董，由县政府聘为村理事（相当于村长），负责村里行政事务。然后，由学董会从村里父老中推举一德高望重、有品有学的人报县政府礼聘为学长，主持村里的教育。学长在村学中，主要调解众人矛盾，监督村理事，不负事务责任。二是村里的普通大众，他们都是村学的学众。学众作为村学中的一分子，要求他们必须尊敬学长，信任理事；要以团体为重，开会必到；要学会思考，事事都从心里过一遍；要支持公道，勇于任事等等。三是乡村建设工作者，主要是指从研究院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培养出来充当村学教员的那一部分人。作为教员，其责任是对学众进行教育。这种教育是广义的，除了从事学校式教育，更重要的是指导村民进行社会改良和社会建设事业。乡学结构与村学大同小异，只是更高一层而已。

邹平乡学学长会议，二排右一为梁漱溟。



按照梁漱溟的观点，乡村建设是要走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从而达到使中国产业振兴、经济发展、民智开化、风俗改善的目的。乡学、村学等组织的建立，只是实现这一目的之前提，而农业的促兴"须把握三个要点：流通金融、引进科学技术和促进合作组织"。因此，在乡学、村学普遍建立后，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建设事业，包括：

（一）组织合作社。合作社是梁漱溟建设新中国计划所依赖的经济组织。梁漱溟要利用合作形式增加生产，积累资本，最终建立一个资本由大家共同支配、享受和占有的经济制度。由于梁的重视，邹平合作社的组织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到1936年底，已经成立了棉花运销、蚕业产销、林业生产、信用、购买、机织等多种合作社，社数总计307所，社员8828户，已收股金12422元。其中，棉运合作社办得最好。尤其是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引进了优良的脱籽美棉种，并改良了栽培、脱籽等技术，使邹平北部传统种棉区农户的收入明显提高。信用合作社也办得相当有规模。

（二）兴办学校，开发民智。在建立的村学中，都设有三个部：小学部、成人部、妇女部。小学部主要是对青少年进行识字以及基本的科学知识教育；成人部和妇女部除识字教育外，还进行品德教育、农业知识和其它生产知识的传授。对失学儿童设有共学处，因陋就简，随处施教。在乡学中，一般设有高级小学部或职业训练部等，供村学学众进一步学习。据说，到1937年，邹平已接近扫除文盲的边缘。

（三）改善风俗，反对陋习。乡学和村学鼓励村民们在自愿拟订和达成公约的基础上建立一些地方道德协会，以提高民众的道德风尚，反对有害而落后的风俗。他们总的口号是"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大力提倡如敬老慈幼、礼贤恤贫、扬善抑恶、勤劳俭朴等传统道德。同时，又大力反对诸如吸毒贩毒、缠足早婚、赌博斗殴等不良风气。有些地方还把村民的行为准则编为歌谣传唱，比如有一首《早起歌》就唱道："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勤俭孝友，慈幼敬老，乡村风俗自好；力田而食，布衣亦尊，天下将太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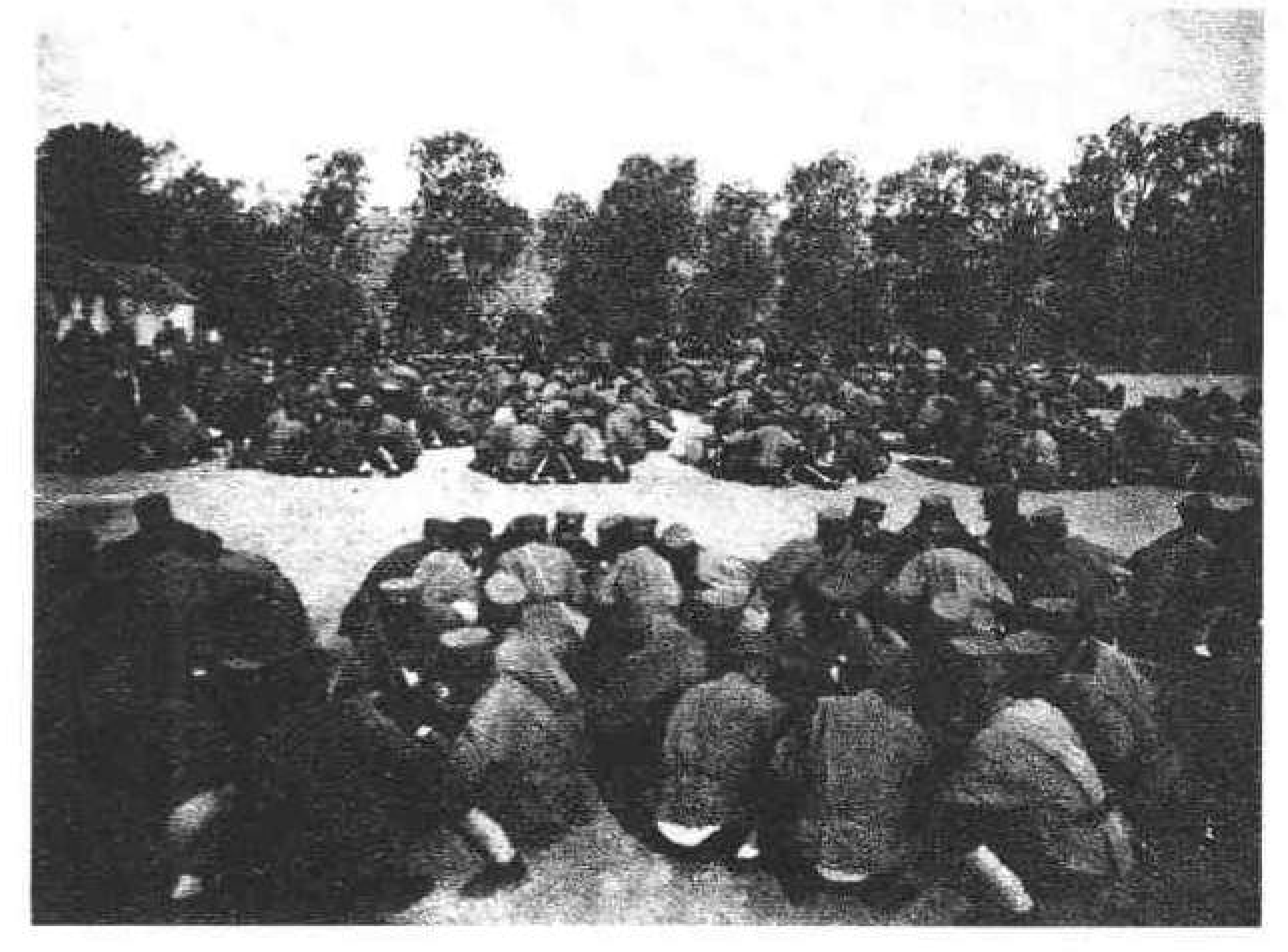
（四）办理乡村自卫。民国时山东多匪，靠近铁路的邹平治安一向很差。为改变这一状况，研究院决定设立真正的民众自卫组织——联庄会。他们首先从各乡选出两三名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到县民团干部训练所受训四个月，

然后回到各乡。各村再从每二十五户人家中选出一中农以上的青年人，到乡学进行四个月的训练，再回到各村组织村民团队。乡村民团定期举行训练和打靶竞赛。这些活动由县长主持，他们遵循《周礼》为乡射所规定的古老仪式，活动结束后县长发奖，参加者围着训练场地举行一次庆祝性的聚餐。到1935年，邹平各地由2500个经过较好训练的人员组成的民团，负责所有治安任务。这种办法取得明显效果，不但邹平的匪患绝迹，就连小偷、流氓等小型犯罪也大为减少。

（五）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乡村建设实验之前，邹平几乎还没有现代医疗设备。梁漱溟在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帮助下，筹集资金于1935年在研究院创办了一所卫生院。以此医院为中心，培训了一批医务人员，在各乡设立卫生所，这些卫生所再培训各村医务人员。研究院为一些医务人员配备了自行车和简易医疗器械，深入农村进行保健宣传和防疫活动。他们尤其注重妇产科方面的保健教育工作，培训了一批接生人员，在较短时间里，使邹平幼婴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邹平的乡村建设在一段时间内的确取得了相当成绩，知名度也大大提高，许多知名人士如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清华大学教授顾毓琇等都前往参观。

防匪的联庄会成员在训练。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最初是在邹平一县进行的。1933年7月，菏泽县也被划为实验县区。由于菏泽靠近三省边界，是匪徒出没之地，人口与经济基础都与邹平有很大差异，所以，其乡村建设也与邹平明显不同。菏泽的乡村建设的基层组织叫“乡农学校”，但菏泽的乡农学校仅建到乡一级，未能建起村学。它所做的最重要、也最有成绩的是民众自卫训练。拥有一万多人并

训练有素的菏泽民团，在保卫地方治安方面起到了人所共见的作用。1934年，山东巨匪刘桂堂窜扰鲁西，附近各县无不受其蹂躏，但他慑于菏泽乡村自卫组织的完善，环绕其县而不敢入其境。

也许是乡学学校在组织训练壮丁方面的成就引起了韩复榘等人的兴趣，1935年元旦，山东省政府决定将济宁和鲁西南十三县作为"县政建设试验区"推行乡农学校。同年底，山东省政府又宣布实施一个三年计划，在山东全省普遍设立乡农学校。

但是，乡农学校制度从邹平一县扩大到山东全省，并非是乡村建设运动的胜利进行。统治者的急功近利，乡村建设干部的缺乏都使乡农学校在其它各县的建立和运作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知识分子的天真热情并不能弥合他们与农民的隔阂。即使在邹平，乡村建设虽然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绩，但并未真正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支持。农民大众对梁漱溟等人的一系列改革活动，仅是消极地应付而非积极地合作。这原因也不难找，正如梁漱溟自己认识到："农民为苛捐杂税所苦，而我们不能马上替他们减轻负担；农民没有土地，我们不能分给土地……当然，抓不住他的痛痒，就抓不住他的心。"的确，在苛捐杂税压迫下缺少土地的农民，"救死犹恐不赡，其何暇谈自治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韩复榘不但未能积极抗战，反而在撤退前利用乡农学校拉丁派款，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梁仲华、孙则让等各带走数千民团，由此使乡农学校招致民怨，"致有砸毁乡校，打死校长之事"。乡村建设运动陷于绝境。

1938年，韩复榘在武汉被杀，沈鸿烈继任山东省主席，以"违背法令及为社会诟病"为理由，将包括邹平在内的全省各县乡农学校全部撤消，恢复原来的区、乡建制。邹平乡村建设至此结束。

邹平的乡村建设奉梁漱溟为宗师，但梁的许多理论主观色彩很强，也很难经受科学逻辑的检验。不过，他的直觉是敏锐的，他的精神是严肃真诚的，他不相信教条，独立地思想，并坚信自己的思考，而且还以身体力行的精神去邹平实践。说到底，不是他的言论，而是他的所作所为、他的人格使今日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真谛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传统在他的身上不再是僵死凝固的教条，而是迸发出生气勃勃的火花。

【随想录】

失落灵魂的革命

⊙厉小健

中国有好多言行不一的怪事，只是大家习以为常，不觉其怪罢了。就拿最神圣的“革命”一词来说，便是一例。革命总伴随着革命者发自内心深处的渴求、一股无法抑制的激情，为追求纯真的理想，功名利禄，甚至是生命的牺牲也在所不惜。而当激情一衰退，革命就失去了灵魂，甚至显得不可理喻。如果这时还以革命者自居就有点虚伪可笑，而且有点居心叵测了。国共分手后的国民党领袖就是如此尴尬的一群，不管他们嘴上把“革命”讲得多么轰轰烈烈，总免不了让人有沐猴而冠的感觉。

一、戴季陶的故事

谁都知道，戴季陶是蒋介石的密友。他早年以“天仇”(与清廷不共戴天之意)笔名宣传革命、共和，为一情感激越的革命分子，五四前后对社会主义也有浓厚兴趣，还差点成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

到国民党掌握政权后，他官居考试院院长，却一心一意回归传统。考试院成立时，戴季陶特意将办公楼和考场建造得和孔庙布局相仿佛。他有一个独特的理论，即中国由一个伟大的“道统”维系着，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孔子都是“道统”中的一环，可惜这一环到孔子和孟子时就中断了，到两千多年后才出了个孙中山给连接上。同时，他还下令卫兵一律佩剑而不带枪，显示主人的古雅不群。政府拟订文官礼服时，又是他出头主张不以有西化嫌疑的中山装为礼服，而以古典的蓝袍黑马褂为礼服，建议获得通过后，他很是自

豪了一阵。他的保守心态在1934年的“古墓风波”和“时轮金刚法会”上再度充分显现。

1934年3月28日，戴季陶等一行三十余人由南京启程前往西北考察水利及交通。4月11日，上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及行政院长汪精卫、教育部长王世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同时收到戴季陶的西安来电，内容与他出行的使命无关，而是要求政府通令全国，严禁发掘古墓。他的措辞很严厉：“何必发墓，然后为学？民德之薄，至今而极。此心不改，灭亡可待。”他的态度极明朗，寻取学术材料的考古等于挖人祖坟，要与盗墓者一样，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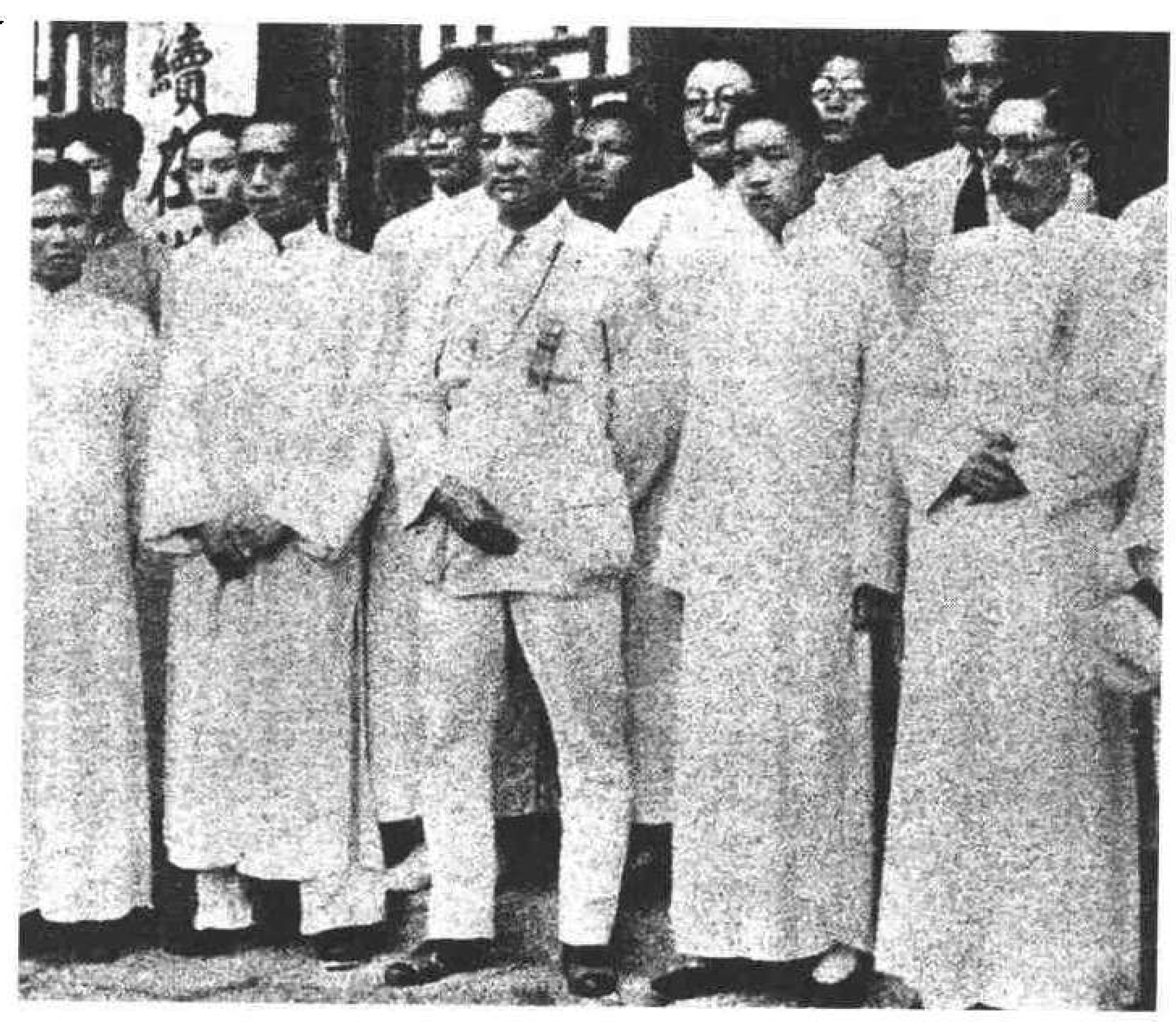
戴季陶的这一通电出自他日渐浓厚的佛教意念。自20年代一次投长江自杀被人救起后，他便开始信佛，老而弥笃。在西安杨虎城将军作东的酒宴上，他听到当时正在西安从事考古的徐炳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谈论，忽有所感。在这位一向提倡“将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的党国元老看来，考古发掘无疑是挖了祖宗的根，同私掘古墓毫无二致。于是乎，“保墓贤人别有思，痛心考古播邪辞”（陈独秀狱中作《金粉泪》诗句），有了这么个被学术界贻笑大方的通电。



叶楚伧在山东曲阜祭孔。

13 日，南京的《民生报》、北京的《世界日报》等以《戴传贤反对考古　请禁科学家发掘古墓的通电》的标题登载出来。教育部长王世杰不敢怠慢元老，在戴电发出的第二天，当即复电解释：发墓取物之事，颇闻各地有古董商或不良分子为之，在考古学术机关实际上尚属罕见。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他保证要从严取缔不法分子的行为，并提醒考古机关不得侵害有历史意义的古墓。14 日，蔡元培代表学术界对戴季陶的西安通电作了答复，称学术性的发掘不仅没有破坏民族历史，而且足以恢复千余年历史的可靠性，不应该泛加禁止。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戴季陶不只在古墓风波中表现得迂腐不堪，他的佛教情结和对佛教的虔诚也逐渐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西藏的班禅九世是戴季陶最崇敬的活佛，关于他向班禅学习法术的各种传闻时常见诸报章。1935 年 3 月，戴季陶等



各部行政长官与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合影。



祀孔的古礼

在上海发起组设"时轮金刚法会",请班禅往杭州建立"时轮金刚法会"。各地军政首要黄郛、张群、张学良、朱绍良、马鸿逵、刘镇华、商震、沈鸿烈、韩复榘、熊式辉等二十余人响应。蒋介石也致电嘱浙江省及杭州市政府予以便利。与戴季陶不同,蒋介石此举纯粹是为了政治上讨好班禅,因为在处理内蒙古和西藏事务时,班禅的影响力是不可缺少的。

"时轮金刚法会"正式开场后,由九世班禅在杭州灵隐寺设置道场,祷告诵经,"祈世界和平,消除国内灾害"。但杭州市工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杭州《民国日报》等公开批评"时轮金刚法会"是愚昧迷信之举,蒋介石为制止各方的反对,出面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称法会意在慰劳班禅,联络汉藏感情。北京的刘半农教授为此写题为《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的文章痛加针砭。他评论说:"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四十年,目的只是要教一大堆俯伏在皇帝脚下的奴隶,站直起来做人。戴先生到了可站直的时候,却因站得腿酸,仍要跪到班禅脚下去做矮子,这原是戴先生个人的癖好,说得好听些是信仰自由,我们尽可以不理会,但如戴先生要利用他的地位,使他个人的癖好发扬



孔德成

滋长而遍及于全体民众，那是我们有脑筋的人决不能容忍的。”

从革命的宣传家一举变成传统的卫道士、佛祖的诚实信徒，戴季陶为我们演示了沧海变桑田的诡谲。如果再想到他是蒋介石的政治灵魂，事实就很清楚了：国民党虽然一直与革命相伴，但旧绅士的气息依旧是很重的。

二、读经

南京政府建立后，对文言情有独钟，正式公文一直使用文言，迟至1934年才肯使用标点。除了文言的形式，读经也兴趣盎然。

1932年年底，教育部颁布的《高级中学普通科课程标准》，明确规定毕业最低限度第四条为“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及平易的文言文作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文字”。于是，雕琢的、铺张的、艰涩的文言文恢复了社会宠儿的地位。1933年6月，广东的陈济棠提案：各学校应该注重读“五经”、“四书”，每周至少在六小时以上，还要青年读《孝经新诂》。有一家报纸特撰评论，说“自北大所谓新潮流发生之后，斥经书为死物，署礼教为桎梏”，“于文字则尚白话”，“然行之数年，黉舍中之课艺，求一文从字顺者不可或得；而礼教既倒，共产党乃遍于中国矣”，为陈济棠的提案喝彩。1934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汪懋祖在《时代公论》上发表《禁止白话与强令读经》，鼓吹“复兴文言”。在广东，陈济棠与邹鲁一武一文均是文化保守派的核心。陈济棠要祭孔，祭关岳，邹鲁坚持要中文系将《孝经》列为必修课。身为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长期是蒋介石最坚定的反对派，但这两个对头在守护传统道德文化方面颇有些共同语言。在祀孔读经的活动中，戴季陶自不甘后人。1934年10月15日，他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教育问题，以发扬固有文化为由，反对中小学读白话文，主张读孔孟经书，称：“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般新学说均为充实。”湖南的何键、山东的韩复榘等一个个杀人不变色的将军大吏们，也对古色古香的经文和温文尔



戴季陶(前左二)与新委任的"奉祀官"。

雅的孔夫子情有独钟。

靠白话文起家的胡适博士对国民党的文化保守主义长期耿耿于怀，激愤地批评了国民党的保守，并很不客气地用了"反动"一词，这个词对以革命政党自居，并动辄以反动之名迫害政治对手的国民党是极大的嘲讽和不敬。读经的争论在1935年《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五期出的"读经问题专号"上充分表露，七十二人就中小学应否读经问题发表意见，多数认为："把读经当做一种专家的研究，都可赞成；若是把读经当做中小学校中必修的科目，则不必。"陈立夫、何键、江亢虎等人主张"学校读经，宜从小学开始"；古直强调："舍经而言教育，吾惟亡国是惧。"柳亚子、周予同、林励儒等人反对中小学读经。柳亚子说："时代已是1935年，而中国人还在提倡读经，是不是神经病?""倘然读经可以抵制日本人的飞机大炮，那么我将引吭高呼：恭祝东方文明万岁!"

三、尊孔

1934年5月31日，国民党中常会定8月27日为孔子诞辰日，要求全国纪

主持读经的邹鲁



主张读经的何键（中）在谭延闿墓前。





杭州金刚法会

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以后，一直运交华盖的孔老夫子至此吉星高照，道统重光，而且被抬到祈求国泰民安和世界和平的高坛。

距津浦铁路曲阜站约十八里的孔林，那里有古柏苍松，有石刻雕像，有“万古长春”的牌坊和刻有“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的石碑，有子思、孔鲤乃至孔子后裔成百上千的坟墓，幽静而古朴。8月27日，这宁静被各种祭祀活动破坏了。这天，人称“好好先生”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率领南京政府各机关代表参加山东曲阜的祭孔大典，以为天下倡。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及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等高官在一道陪祭。同日，全国各地军政首脑都在祭孔。南京的祭孔活动由行政院长汪精卫、考试院长戴季陶主持，各地报刊也刊出祭孔专号，掀起尊孔风潮。

10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修理孔子陵庙办法，规定除由政府拨款，



南京举行孔子诞辰纪念。

孔子像摆放在供奉孙中山遗像的供桌上。

另对全国各校毕业证书附收捐款来解决经费。11 月 15 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四七次会议通过《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规定:(一)将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给特任官待遇;(二)四哲给以"复圣奉祀官"名义,并给荐任官待遇;(三)至圣及四哲嫡裔,由国家资给培育至大学毕业;(四)特设小学于曲阜,优待孔子、颜回、曾参、孟轲后裔。同日,国民政府训令教育部,以《礼记》中的《大同》一节谱成纪念孔子的正式歌曲《天下为公歌》,以为孔子纪念歌。次年 7 月 8 日,十五岁的孔德成到南京受任"奉祀官"新职,而世袭的衍圣公被国民政府废除。与孔一起就任"奉祀官"的还有曾繁山、颜世镛、孟庆棠,这四人分别负责祭祀孔子、曾参、颜渊和孟轲四位儒家圣贤。监督他们宣誓的便是戴季陶。

尊孔的复活和读经的提倡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精神。党国要人们看到国人沉醉于来自西方的现代思想,像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之类,以为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就拾出了看家宝——儒家思想来抗衡。复古加思想控制,加党化教育,这就是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法则。新闻出版事业、教育事业是文化的重心,一国的发展,文化是它的表征。可是,国民党的宣传却告诉人们,中国不仅有十全十美的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而且在两千年前,已经出了个博学多能的孔老夫子,精通六艺,发明了一切。这个党嫌弃知识分子的"思想"太发达,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言论就头痛,所以希望出版界只要有教科书就够了,甚至最好连教科书一项也统一起来,而别的著述一概多余。至于学校,则"自然科学"应当保留,"人文社会学科"理应取消。于是乎,当时有的敏感文人生出由衷的感慨:"知识分子必须改行","从此以后,会写的赶快去抄佛经,会讲的早该去加入'宣传队',不然,就得丢下笔杆子当什么'国'的文化宣传处处长或者放下书去荣任什么委员。"幸亏国民党还没有一统天下,幸亏国民党自己内部就思想混乱,幸亏还有 20 年代思想、教育、学术自由和多元化的传统和基础,30 年代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许多成就才能到现在还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革命者从激进奔放回到保守专制,革命也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轮回。

【随想录】

民主还是独裁?

⊙李立锋

迫于30年代的内忧外患，中国的国民，当然也包括知识界产生了极为不安、焦躁的情绪。1934年前后，以蒋廷黻、丁文江为一方，以胡适为一方，就“民主与独裁”的取向所进行的激烈争论，就是在这种紧张氛围中出现的，问题的中心：中国将来的政治制度应该是独裁呢，还是民主立宪呢？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则是讨论哪一种制度更有效率，来应付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如统一、工业化和抵抗日本的侵略之类。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在1933年底的《独立评论》杂志发表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为例证，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应该分两步：第一步称作建国，第二步才能实行政治民主。“建国”是第二步的必要基础，所谓“建国”，就是不管以什么作代价来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可以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权力。蒋廷黻把当时中国的国内情况归结于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经历“建国”这一步。因此，中国就和波旁王朝以前的法国、都铎王朝以前的英国、罗曼诺夫王朝以前的俄国一样，“只能有内乱”，“革命没有出路，不革命也没有出路”。蒋廷黻给当时中国开出的药方就是要补课，补“建国”这一课，为了进行建国，中国就必须以民主为代价，“民主政治根本还谈不到，独裁政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应该仿效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实行“新式独裁”，以民主为代价换取建国任务的完成。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像法国革命一样成为真正的革命。地质学家丁文江与蒋廷黻的观点相近，在《革命与专制》一文中，丁文江甚至痛苦地发问：“除去了独裁政治还有旁的路可走吗？”

当时，左翼知识分子向往苏联，右翼文人心仪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

义，在专制主义显示自己威力的时候，温和的自由主义的阵营也发生分化。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等一批接受英美自由主义教育的学人都改弦易辙投奔独裁。但也有不为所动者，胡适就是如此。当他看到蒋廷黻、丁文江这些自己的朋友迷失了方向时，一向外表很随和的胡适，再次显示了他外圆内方的个性。他有他的原则，为了他的立场，他也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阐明自己的观念。就像他曾为白话文辩护，曾为被赶出宫的溥仪辩护，"九·一八"事变后曾为与日本和谈辩护一样，这次他又准备站出来为民主和宪政的原则辩护。



地质学家丁文江赞成独裁。

在蒋廷黻、丁文江的文章发表的第二天，胡适便发表了《建国与专制》一文，反驳蒋廷黻们的独裁论。他提出两点：第一，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况且中国也没有人有资格做专制独裁的"诸葛亮"。第二，中国在两汉以后已经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因此，现在谈建国，不仅是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更重要的是建立现代国家，而民主政治才是现代国家的标志，独裁绝不是现代国家的目标。他批评，在中国提倡独裁，无异于教三岁孩子放火，结果绝对不会是什么开明的"新式独裁"，而只能是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稍后，胡适又写了一篇《再论建国与专制》，明言无论是旧式的还是新式的种种独裁都加以反对，理由有三：第一，中国没有能专制的人、政党和阶级；第二，"我不相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够站在某个领导或某党某阶级的领袖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第三，"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

关于"民主与独裁"的争论，持续了有一年多，无论是独裁论还是民主论，在当时都有其社会基础。

胡适为民主辩护。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可并没有带来政治民主和国家富强。相反，军阀干政、外患日增，连国家的统一都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因此，当时许多的知识分子情绪低落，充满失望之情。恰好在这时，意大利的和德国的国家社会党登上了历史舞台，法西斯主义式的“新式独裁”似乎将德国从战后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在人们看来，它们统一、团结而繁荣，从战败中彻底恢复过来。这一景象对中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产生莫大的吸引力，他们以为已经找到“药方”，德国就是榜样，也许还可以算上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这些充满焦虑感的学者在胡适眼里显得急功近利。胡适是个乐观的人，他虽然对中国的现实不满，但始终认为，应该用公平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来评估辛亥革命，他认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在许多方面有大进步，虽然“这点成绩还不够抵抗强暴，还不够复兴国家，这也不应该叫我们灰心，只应该勉励我们鼓起更大的信心来，要在这将来的十年二十年中做到更大十倍的成绩”。胡适认为，以法治、宪政为特征的民主政治是现代国家必须具有的基本条件，事实上这也是他永远的政治理想。无论在此之前的“人权风波”，抑或是后来在台湾的《自由中国》风波，无一不体现了他的这种理想。当然，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政治理想无异于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毕竟，民主的理想总要比“情愿歌颂专制，梦想做独裁下的新奴隶”要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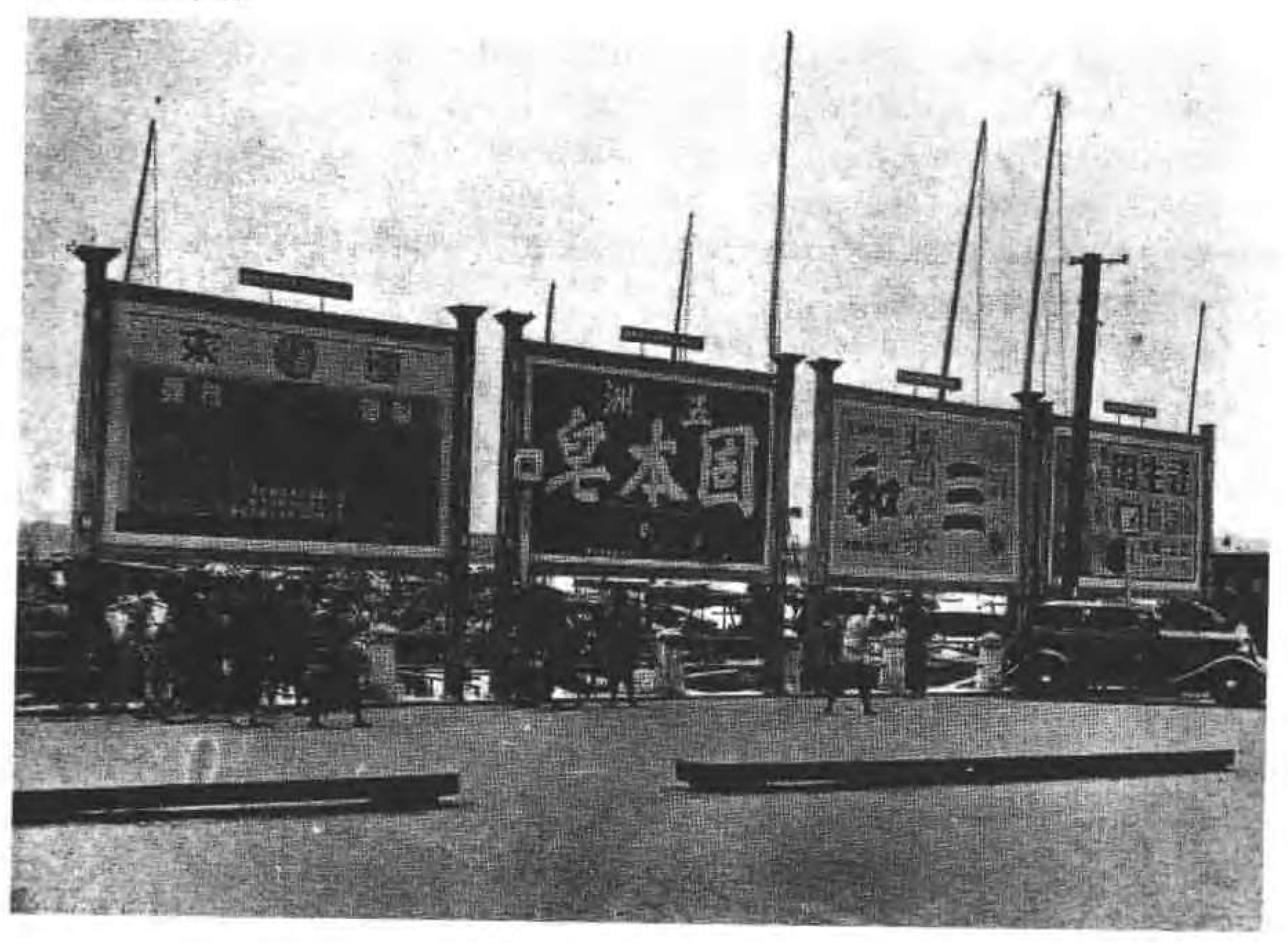
最后，要特别提醒一点，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是世界性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就是胡适这样的人当时也对法西斯式的新式独裁抱有某种难以言状的敬畏，所以他称民主政治是幼儿园的政治，而新式独裁是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做到的，而后者是难以轻易尝试的。这样的论证叫人觉得底气实在不足。

【经济生活】

多面的上海

⊙毛　子

广告林立的上海街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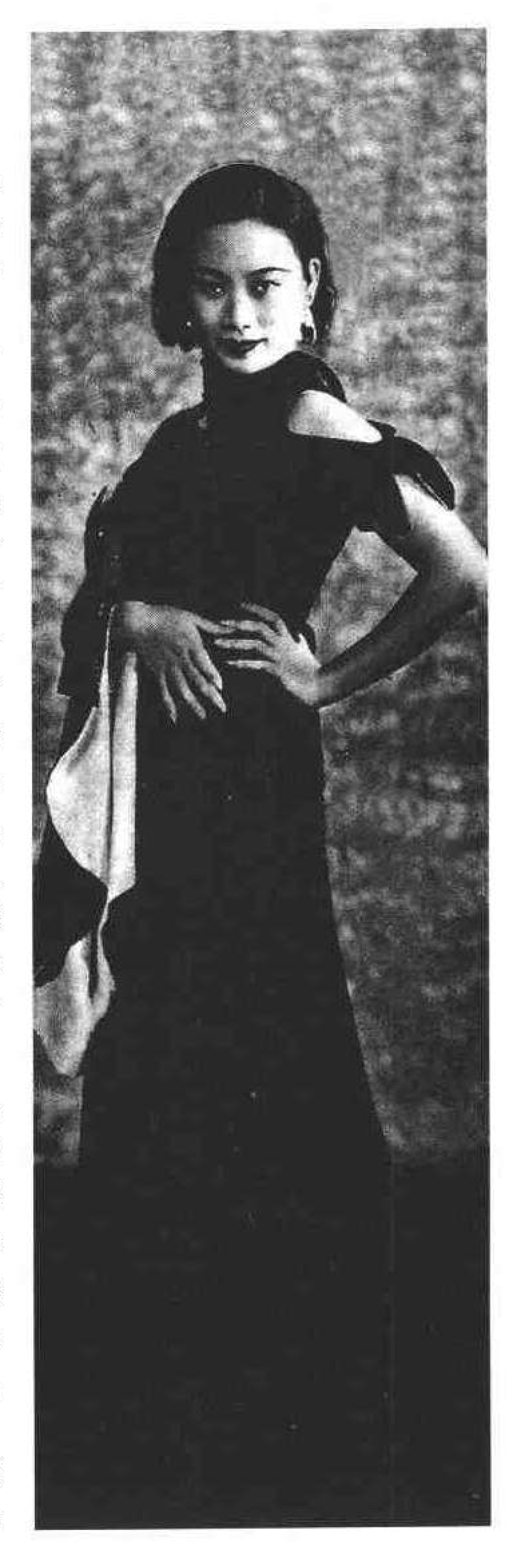


要没有上海，一部中国近代化史真剩不下多少内容。这是一个既招人痛恨，却又有着极大诱惑力的远东大都市。

自有租界以来，实际上就有了两个上海。外国的上海在霞飞路、杨树浦、南京路和虹口，有整齐的柏油马路、宏伟的建筑物、最大的游乐场所和管理权在外国人手上的百货商店，在这个上海，房客的气焰压倒了房东，看上去街道上的行人似乎个个衣冠楚楚，精神勃勃，连人们携着走的洋狗都趾高气扬。中国的上海在南市、闸北和西门，房子狭小，马路颠簸，街道也有点污秽，看上去只有上海市府大厦是庄严、清洁而又华丽的。行人似乎个个衣衫褴褛，精神萎靡，连钻来钻去的许多狗也都貌不惊人。1934 年 7 月，丰子恺笔下的上海景象大致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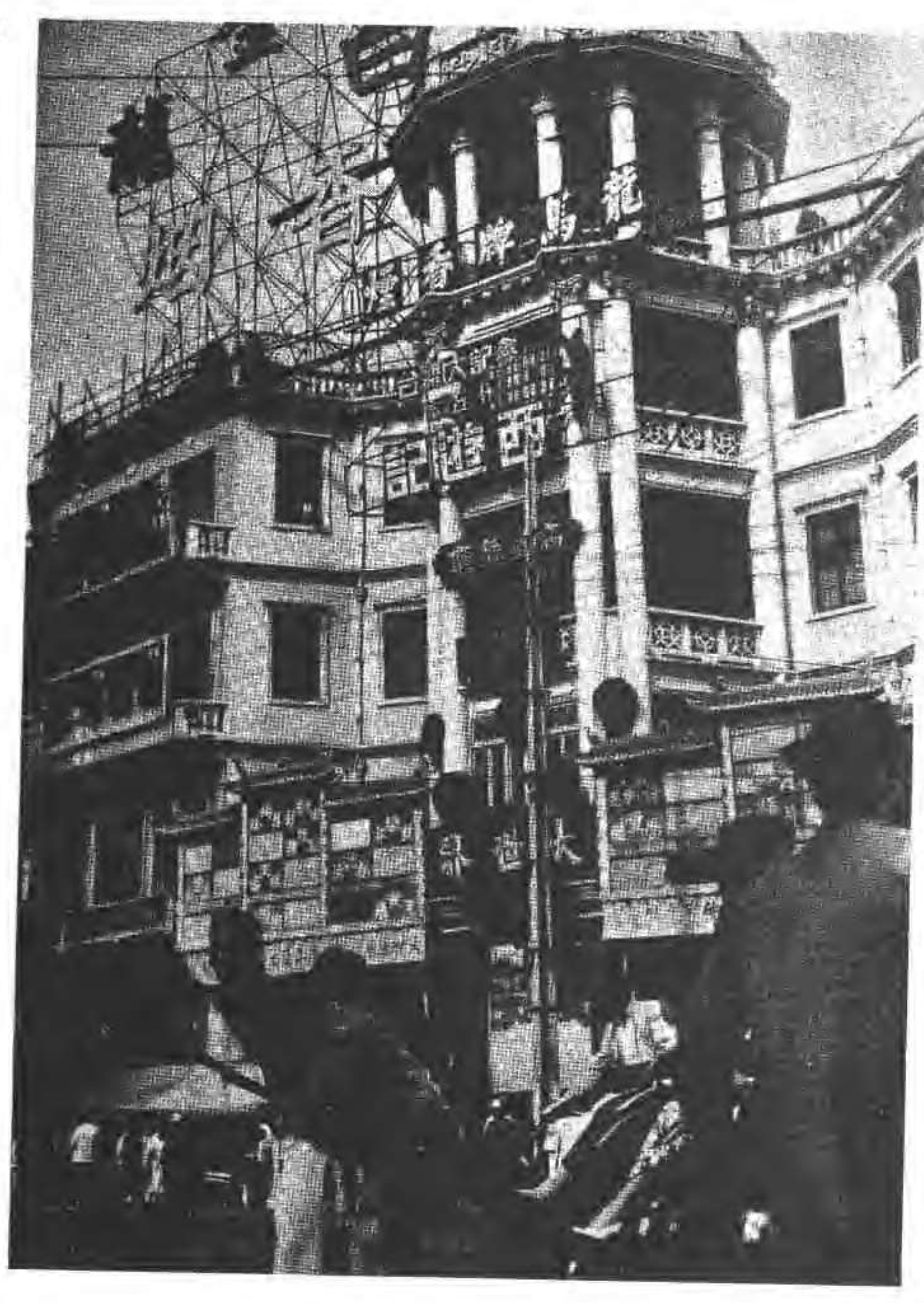
尽管受到世界危机的袭击，1934 年的上海仍然不由分说地散发着自己的魅力，看起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的步伐。人晚，南京路一如以往，依旧星汉灿烂，永安公司的倚云阁和先施公司摩星楼双峰对峙的胜景历历在目。摩天大楼争奇斗妍，展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风姿。

这一年，在南京西路 170 号新矗立起一座摩天大厦，名为 Park



穿着时装的影星胡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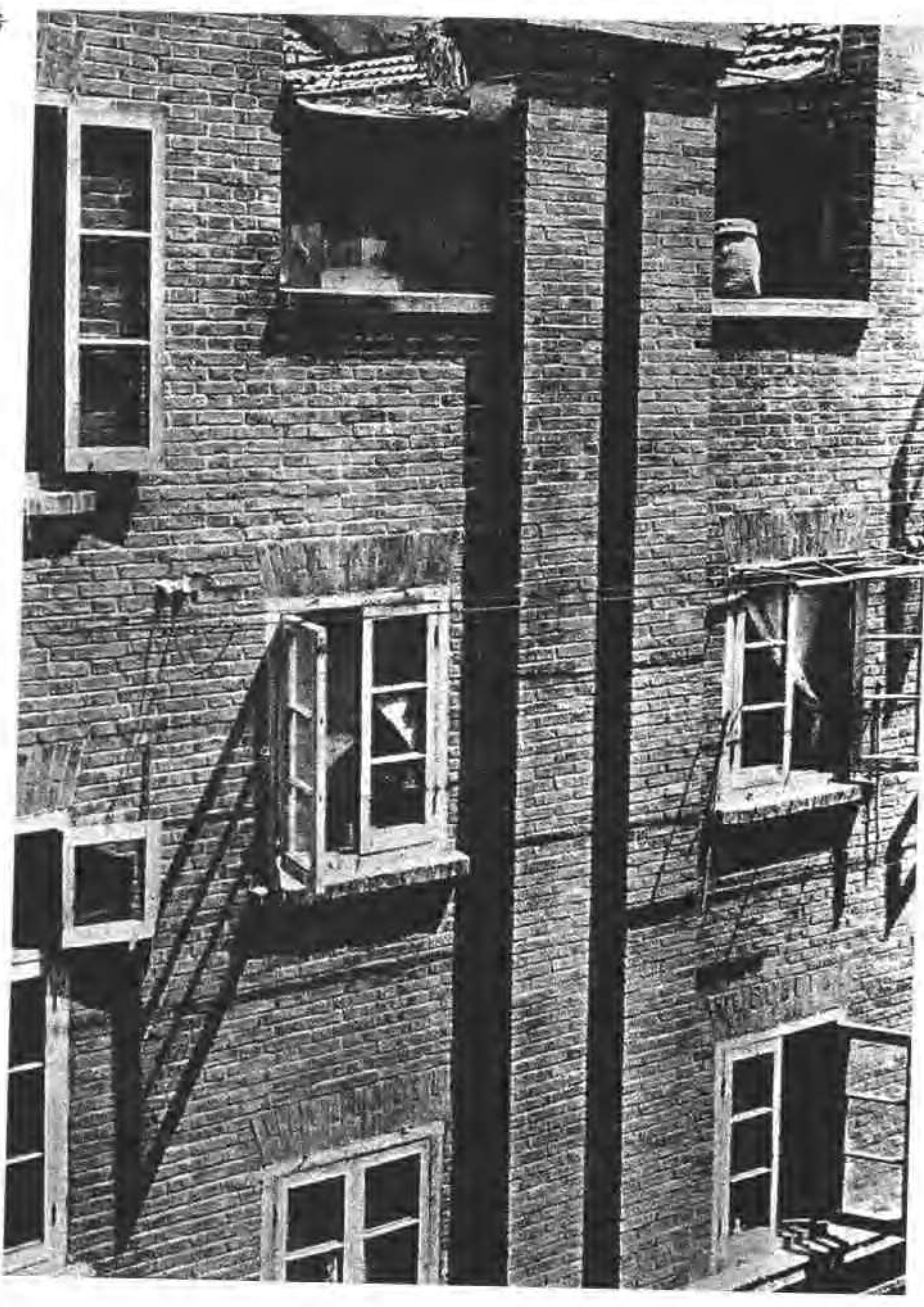
热闹的大世界游乐场





推销者

像鸽笼一样的狭小住房里住着许多文人。



Hotel(国际饭店),同年落成的还有白老汇大厦,它那多变而又对称的形体好像用一块块的巨型积木垒成。国际饭店是近代上海华商投资开办的最大、最豪华的旅馆,造价 500 万元。它由四行储蓄会投资建造,聘希腊工程师邬达克设计,交华商陶馥记营造公司承包建筑。1932 年动工,1934 年落成。大厦共 24 层,其中地面 22 层,标高 82.8 米,30 年代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厦。初时准备全部出租,由于国际经济不景气,出租未成,决定由四行储蓄会追加投资 100 万元,添设饭店设备,自办国际饭店,聘瑞士籍席勃拉任经理。在此后三十年内,它的高度在远东都无人企及。直到 1983 年,国际饭店才失去沪上第一高楼的荣光,其间整整隔了五十年,它目睹了中国现代化步履的艰辛与

失业者



迟缓。

那时，东北的义勇军多数被消灭了，剩下的，都市的人们也渐渐把他们淡忘了。富有的阶层继续享用着跑马、跑狗、回力球、博彩、摩天楼、巨幅广告、啤酒与五加皮、舞场中的爵士乐、恐怖冒险侦探影片，女人旗袍的开叉越来越高，人们耽于心灵的麻醉和肉欲的刺激。

摩天楼的光彩和自我麻痹终究遮不去街市上的危机阴影，1934年的上海，商店倒闭三四百家，银行倒闭六七家，灯红酒绿的跳舞场日见冷落，新世界游艺场关门歇业，找不到工作的苦力垂头丧气，失业的工人面目憔悴，小商贩为推销自己的产品绞尽脑汁，将自己打扮成小丑也在所不惜。

多面的上海，在危机中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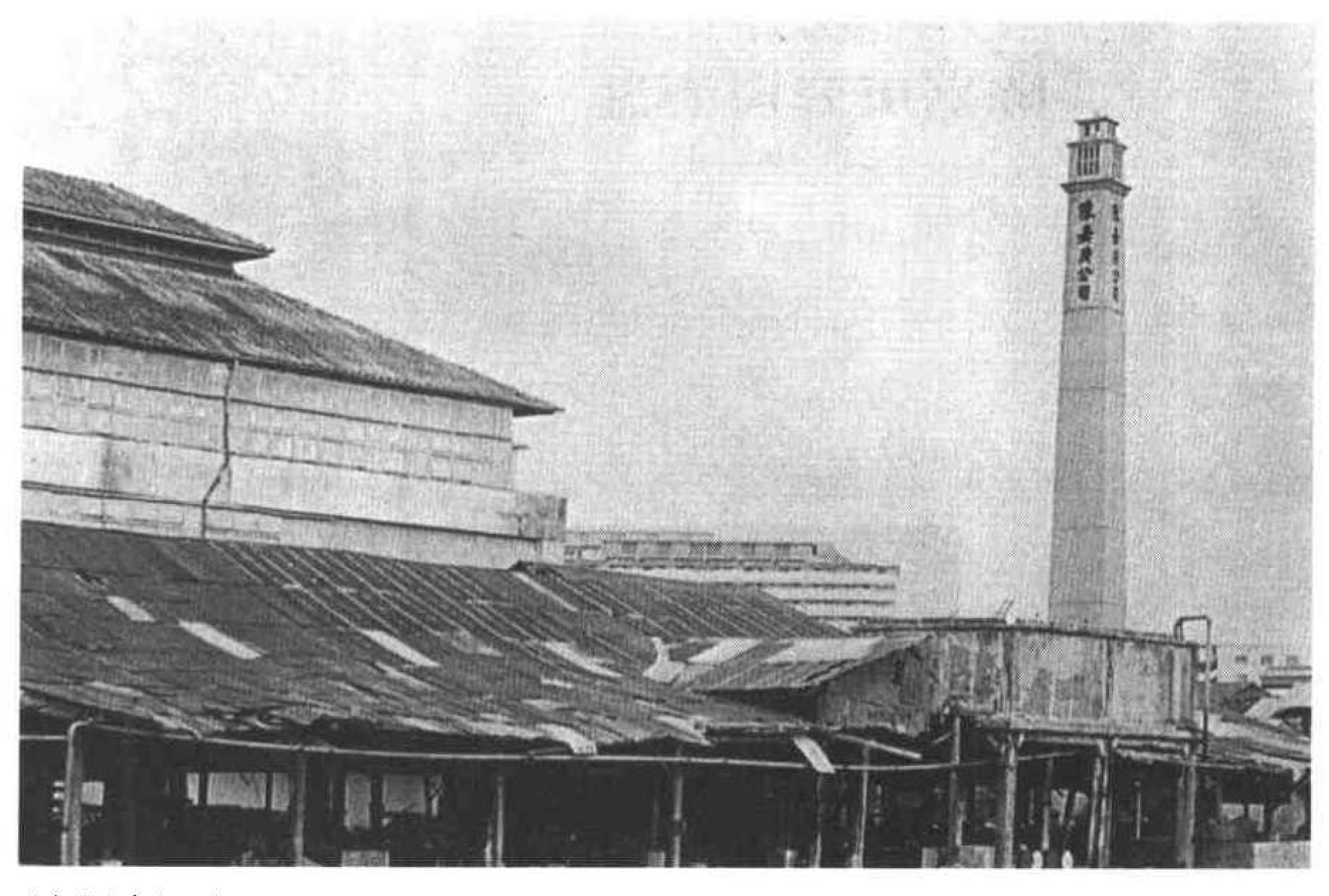
【经济生活】

陈嘉庚公司清盘

⊙枫　林



捐资办学的南洋华侨陈嘉庚



破产的陈嘉庚公司

南洋橡胶大王陈嘉庚的生意自1926年开始走下坡路。当时生胶及橡胶制品因供过于求而价格暴跌，而陈氏的产品又竞争不过日本、美国的价廉物美的橡胶制品。1928年，陈氏的橡胶熟品制造厂新厂又毁于大火，损失惨重。连遭挫折的陈嘉庚只好出售部分橡胶园，并向外国银行举债，他的财产大幅度减少，企业的控制权也逐渐旁落，但是对厦门大学等学校的资助仍然继续予以保证。1931年，债主强行将他的全部财产交给债权人指定的监管人监管，只给他保留了工资很高的总经理职位。1934年2月21日，陈嘉庚公司清盘并宣布破产，6000多工人失业。好在他已经将相当资金转移，才免于个人破产。华侨事务委员会曾经要求国民政府给予他援助，但没有下文。

【经济生活】

危机中的荣氏企业

⊙肖　健

一、危机降临

“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铁路不功，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贱，愈无销路，乃至于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这一席话出自中国棉纺业第一人荣宗敬之口，中国纺织业危机的严重性可以想见。这些尚在萌芽的民族棉纱业因受内战、舶来品及国内外商纱厂的挤轧，更因棉贵纱贱的关系，已日趋危殆。世界经济危机的恶魔终于到中国来肆虐了。

当时，全国共有83家纱厂在惨淡经营，纱锭250万支，拥有工人17万人，每日生产出纱线100多万包。它们在工商业落后的中国经济地位的重要可想而知，如果一旦倒闭，则不仅17万工人立即陷入失业的苦境，影响到都市治安，同时用作全国人衣料的棉织品均将依赖外人，后果不堪设想。1933年4月，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并决定：自4月22日起，实行每星期六、星期日停工两天，或减工23%，以免生产过剩，维持营业。为谋救济的根本办法，又推派代表荣宗敬、郭顺、聂潞生等赴京晋谒行政院长汪精卫，陈述纱厂的困难情形，请求救济。随后，各厂相继裁员减薪，如上海申新七个厂，自5月1日，工人工资一律九折支付。具体办法为：月薪150元以上200元以下者，以八折计薪；150元以下100元以上者，以九折

计；50 元以下者，以九五折计。有些厂甚至裁减员工。行政院召集实业、交通、财政、铁道各部暨纱厂联合会，共同讨论救济办法，5 月 2 日通过四点：一，设法推销存货；二，商请各国家银行低息贷款；三，予以运输上种种便利；四，缩短减工期间并不得再行减低工资。但一切努力难以挽救纱厂的困境，亏蚀继续增加，不是赢利，而是生存，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申新纺织公司濒临破产的消息一传出来，便成为政府、舆论和工商金融界关注的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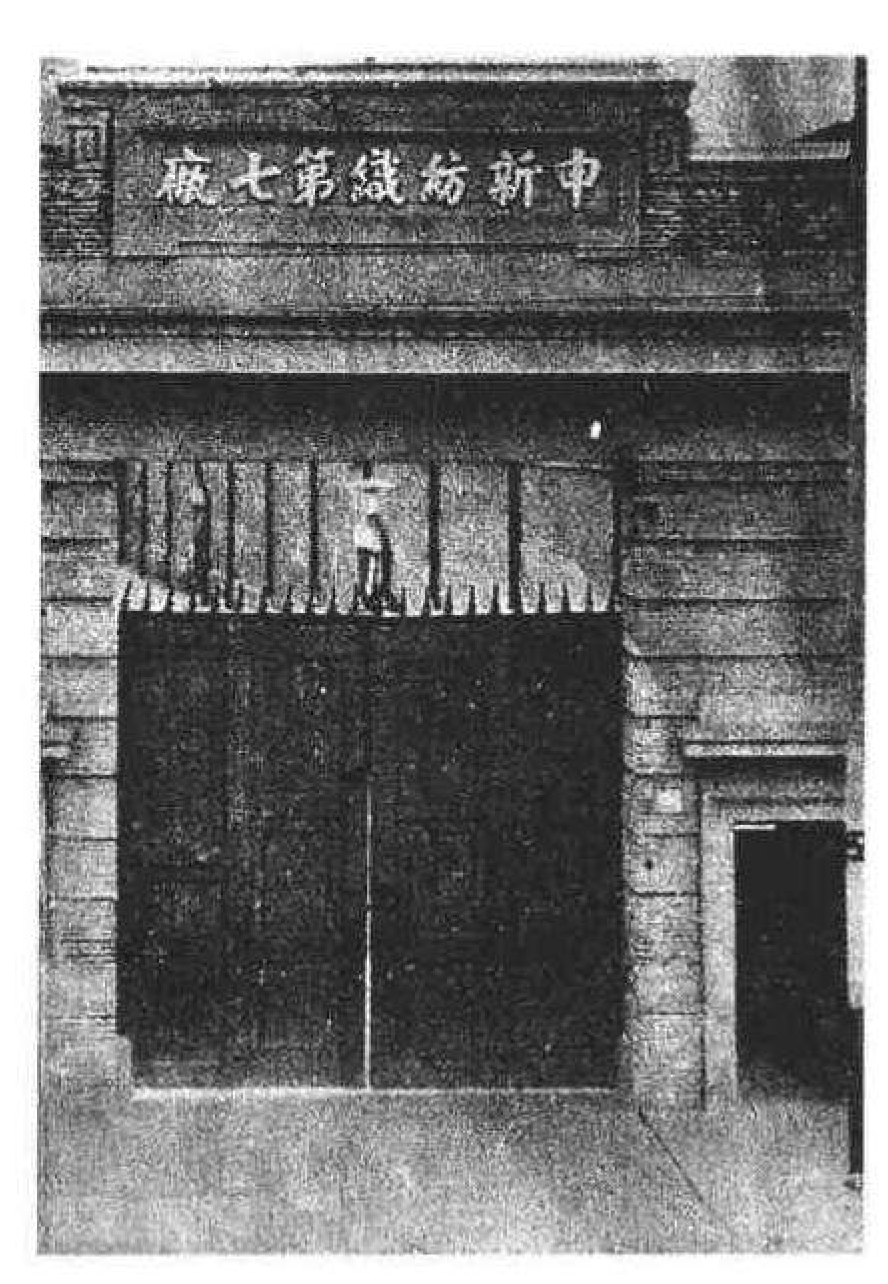
二、荣宗敬的挣扎

无锡荣氏经营的申新纱厂创办于 1915 年。至 1934 年，它发展成有九个厂的申新纺织公司，分布在上海、无锡、汉口等地，它拥有的纱锭数量达到 55 万枚，约占全国总纱锭数的 20%，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纱厂集团。

兴盛的表象后面往往蕴藏着绝大的危机，荣氏集团也没有逃脱此劫难。它扩张过快，举债过多，流动资金周转失灵。申新纺织公司向中国银行借贷始于 1923 年，借款数逐年增加，此外还向日商银行、英商汇丰银行和上海钱庄借款，到 1932 年 6 月，向外商银行所借到期应还款已经达到 500 万元左右。而申新各厂的厂房机器，几乎都充作抵押品，但纱布市价持续跌落，让申新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总经理荣宗敬只得向中国银行恳求援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组成申新第二、第五两厂贷款银团，先后贷款 900 万元。

无奈申新公司祸不单行。1933 年，申新九厂租期届满，地主逼迁，公司总经理荣宗敬出于无奈，只得向英商麦加利洋行借款，另建新厂。同年 3 月，汉口申新四厂又遭火灾，损失惨重。荣宗敬不得已又向中国银行借款 200 余万元。如此债上加债，到 1934 年 4 月，申新九个厂的资产总值为 6800 万元，而负债总额则达到 6300 万元。申新九个厂的厂基已都作了抵押品，欠中国银行一家的借款就已经达到 1034 万元，负债额已接近资产数。这样惊人的负债数，将申新推到了岌岌可危、大厦将倾的边缘。6 月，申新公司又有将到期的外债 250 万元必须归还。整个荣氏集团陷入资金短缺、调度困难的逆境之中，各银行、钱庄见状纷纷上门索债，就连同仁储蓄部的储户们也担心申

新破产，纷纷前去提取存款。坐落在江西路的申新总公司内气氛紧张，逼债人一串串像长蛇阵一样等候坐索，通宵不散。



被拍卖的申新七厂

荣宗敬是个干练的实业家，为度过难关，他绞尽脑汁。但由于他经手的债务过多，已经失去债权人的信任。不得已，只有向无锡的弟弟荣德生告急。29日凌晨4时，荣德生携带全部有价证券赶到上海，银钱业债权人看到荣德生赶来，情绪逐渐缓和下来。荣氏兄弟又用茂新、福新两面粉公司及申新股票等资产作抵押，向中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续借280万元，一切款项按票面照兑，再次勉度难关。

1934年7月13日，荣宗敬公开登报宣告不再任申新总公司总经理，由面粉部经理王禹卿出任总经理，李升伯主持纺织部事宜，陆辅臣主持面粉部事宜。但王禹卿等难于应付不利的局面，知难而退。荣宗敬考虑再三，于7月20日宣布复职，组织了申新改进委员会，由荣伟仁任主席，整顿申新厂的各方面工作。

三、"整理"风波

荣宗敬复职后，为了使申新公司度过难关，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曾同《申报》老板史量才磋商解救之策。史量才提出资金由他同银行协商解决，但申新在组织上必须彻底改组，废除总经理制，改设董事会，并吸收贷款银行

实业部长陈公博



为董事单位；财务处工作由中国银行或上海银行派人主持。对宗亲观念很深荣宗敬来说，难以接受申新要作如此大的改革，史量才的意见便搁浅了。

1934年6月，荣宗敬又向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委员会紧急呼吁，请求救济。他申辩道，自建立纺织厂以来，申新的事业得到很大发展，计有工厂九家，纱锭53万枚，线锭6万枚，布机5000余台，工人4到5万人，每日交纳国家特税10000元以上，3年共纳税1000余万元。但自“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以来，屡受外货倾销的打击，申新的营业状况一落千丈，不得已将厂房抵押借款，但无济于事。他要求政府允许公司发行500万元债券，由政府出面保息。

荣宗敬的请求，正好为图谋侵吞申新的实业部官员找到了口实。实业部长陈公博于7月派官员到申新进行清查。调查者很快撰写了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报告书蓄意低估产值，指责申新资不抵债，组织不良，经营混乱，公司连预决算都没有。报告书的结论是：“该公司资力人力，俱不足以经营如此大规模之工业，以致累及方面甚多。长此以往，为害甚烈。”因此提出要变“救济”为“整理”，迅速清理债务，变换经营组织。据此，陈公博拟具了一份救济申新纺织公司的办法，提请行政院讨论。办法有三项：(一)由政府责成该公司速行清理，以六个月为限。若清理不成，再由政府派员清查。

（二）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该公司现有九个厂，至多以六个月为限，六个月后，依整理所得结果，再定具体办法。（三）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内，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六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并入公司债务债权内计算。陈公博公然宣称，荣氏信用已失，空头支票已不灵了，如果仍然以荣氏为中心，那么外界已不再信仰，公司的信用无法维持，将重蹈无组织、无管理的复辙。陈公博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想以300万元作为代价，将申新收归国有，变私营为国营。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是荣宗敬的同乡。

荣宗敬得此消息后十分气愤。他说："他们想拿三百万来夺我八九千万的基业。我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于是使尽浑身解数，同陈公博等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一方面致函蒋介石、孔祥熙为公司辩护，称：申新自创办以来，已三十余年，这次由于受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致使金融周转不灵，因此要求政府予以救济，以维持营业。但实业部组织的整理委员会，不言救济而言整理，不言调查而言估计，其用心所在，实有企图宰割之嫌，实在令人寒栗。他大声疾呼："民商何罪？申新何辜？"

另一方面他又请出吴稚晖出面疏通关系。吴稚晖与荣宗敬是无锡同乡。这位国民党元老讲的话，连蒋介石也要买他三分账，而且他与实业部有些官员关系不睦，因此也乐意去办这件事。7月27日，吴稚晖分别致函行政院长汪精卫和财政部长孔祥熙。鉴于汪精卫同陈公博的关系亲密，吴稚晖在给他的信中着重论证将申新收归国有是不可取的。他说：一是现在政府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实业发展计划，在经济上也没有这种可能；二是今日政府中的所谓专家，尚多出于书本之知识，缺乏经验。不像有经验的商人，必然为了自己的企业殚思竭虑，因此如果收归国有，管理人必然不能集中精力，那么成功是没有希望的。最后他提出在棉纺业中，荣宗敬是一个有才之人，"为值得维持之一人"。而在给孔祥熙的信中，他就公开指责实业部，说实业部此次并

荣德生



非维持申新，实际上是在处分申新。他表示，申新经营搁浅是商业上常有之事，只要政府能予以贷款，则难关能够轻松度过，何必大张旗鼓，大动干戈？

陈公博对申新的“整理”，在整个民族工业界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各同行同业眼看硕大的申新集团将有被侵吞的危险，不禁有兔死狐悲之感，从而奋起声援。7月30日，无锡纺织厂联合会致函上海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市商会、各报馆等，批评实业部对申新的估产令人不安，如申新九厂，1933年10月建成，按照市价最廉价值，也须在800万元以上，而实业部估产仅400余万元。以新建刚一年的厂，估价只是对折。至于每一纱锭购价至少在30元以上，而估价才17元，尤属骇人听闻。他们惊呼，如全国纱厂，均以17元的标价评估，那么全国没有一个厂不破产，没有一个厂不需要收归国有了。这些工厂主忧心忡忡地表示：荣氏兄弟以自己毕生精力惨淡经营的实业，历经二三十年，而政府却乘他疲备之时，收归国有，这不明明是对其宰割攘夺吗？于法于理，能不令民心寒？而今后又有谁敢再投资于实业呢？

实业部和财政部意见不一致，实业部内的工业司和商业司意见也不统一，因此行政院对实业部有关申新的“整理”计划没有作出决定，实业部的整理计划很快改为“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

申新承受了一场暴风雨的洗礼，虽暂时避免了倾覆的危险，但资金短缺、债台高筑毕竟是事实。为了使申新正常运转，荣宗敬不得不于8月15日将申新一、二、五、八厂与主要债权人中国银行、上海银行等组成的银团，签订补充营运借款合同。补充合同规定，上述各厂所聘用的会计员、管账员、出纳员均由银团指定，各厂买卖花、纱、布，添置五金物料及其它应需物件，均需征得银团同意，各厂对外发出的一切单据，须银团派员签字盖章后施行，各厂门口及各账房门口均须一律悬挂印有银团名义的标记。从上述合同看，

银团从人、财、物各个方面控制申新各厂的经营。对这种局面，荣宗敬非常郁闷。有一次他将印有银团字样的空白账单撕得粉碎，并忿忿地说，我没有办法管了，一切让你们管好了！但为了维持各厂正常生产，最后还是忍气吞声了。



荣宗敬

四、拍卖"申七"

申新七厂原为英商东方纱厂，1929年荣氏兄弟看上该厂地处上海杨树浦路，前门是马路，后门通黄浦江的有利交通条件，从英商手中购入。当时因没有那么多现金支付，便以厂基、房屋、机器等价值500余万元的产业向汇丰银行抵押借款200万元，规定年息8厘，照契约应该于1934年底到期还本付息。

1934年7月，南京政府修改进口税则。棉布的税率减低1%到48%，而棉花税率则增加48%。这种不合理的政策，造成国货成本提高，外货大量倾销的局面，民族工业犹如漫漫的黑夜，看不到一点曙光。此外，荣氏兄弟因债台高筑，催索欠款者纷至沓来。他们除一再请求推迟还款期限外，不得不再向政府要求救济。8月6日，荣宗敬致函汪精卫，要求政府担保借款，准发公债。但荣宗敬的呼吁犹如石沉大海，无人理睬。

1934年底，申新七厂欠汇丰银行200万元到期，无力偿还欠款，荣氏兄弟便向汇丰银行请求放宽限期，先付清利息，本金延期支付。汇丰银行毫不理会，坚持全部归还，否则将抵押品——厂基、房屋、机器拍卖抵债。消息传出，引起了中国、上海银行的极大不安。因该厂也有两行的大量贷款，汇丰拍卖申新七厂的行动损害了中国、上海两行作为第二债权人的权益，银行方面致函荣宗敬，要他尽快研究对付汇丰拍卖的办法。

1935年2月2日，申新七厂律师发表紧急通告，宣布汇丰银行的行动是有意侵害本厂权益，绝对不能承认。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向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备案。于是，地方法院发出布告，声明申新七厂的全部地

申新纺织总公司



基、房屋、机器及其它财产非经法院核准,不准擅自处理。

然而,1935 年 2 月 26 日下午,汇丰银行仍在北京路鲁意斯摩洋行正式拍卖申新七厂。汇丰银行为什么不顾各方反对,一意孤行拍卖申七呢?一是企图杀一儆百,借此警告同样押款到期不赎者;二是拍卖申七,可以减少竞争对手,以利其大量倾销棉纺织品;三是汇丰此时库存空虚,想收还贷款,增加实力。当时的拍卖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到场的足有二百余人。当该行职员劳特宣布拍卖规则时,场内鸦雀无声。拍卖价格一次一次地叫喊,但久久没有反应。半小时过去了,静坐在一旁的日本律师村上在听到拍卖价降至 225 万元时,突然挺身而起,声称愿意承购此项产业。劳特高声询问在场人员,有无愿意出较高代价者,但无一人应声。于是小锤击桌,申新七厂被公开拍卖了。

这次投标得主,名义上好象是村上律师,实际上是日商大连汽船会社。大连汽船会社位于杨树浦路黄浦码头,正好同申新七厂毗连,申新七厂在东,该公司码头在西,为了进一步开拓航运事业,该公司老板早已想扩大码

头，但苦无机会，这次汇丰拍卖，正是天赐良缘，因此很快就成交了。

"申七事件"发生后，上海工商界群情激愤，纷纷起而反抗。各报社发表社论，一致谴责汇丰的非法行径，各社会团体也激于公愤，热烈声援。申七工人举行集会，并一致议决：在汇丰银行未遵守中国法律，因而要取消违法拍卖以前，职工们必誓死反对。2月28日，申七职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纠察队维持工厂秩序，表示厂存与存，厂亡与亡，不惜任何牺牲。申七被拍卖的当天晚上，全体职工自觉起来护厂，并根据厂方的布置，将新购机器全部拆除，以防落入日商之手。汇丰银行在厂内各处张贴封条，工人立即将法院的封条再贴在封条上，表示不予承认。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也召开紧急会议，通告全市国货商，自即日起，与外商银行断绝往来。

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强烈要求，派实业部长陈公博与汇丰银行进行磋商。汇丰银行也有意妥协，虽然拒绝承认其拍卖行为非法，但却将责任推卸给承购的日本人，企图减轻罪责。日本驻沪领事则发表声明，完全否认购买申七的是日本人。申新七厂拍卖终于归于无效，汇丰同意申新将借款200万元延至1940年底偿还，约定年息由8厘改为7厘。由于1935年下半年开始，农业丰收，市况好转，纱厂业务逐渐复苏，1936年申新各厂获得了稳定的盈余，汇丰的那笔债务也就提前偿还了，度过了困难时期的申新公司，终于转危为安。

【经济生活】

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

⊙肖 健

浙赣铁路杭州至玉山段通车后，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浙江建设厅厅长曾养甫认为，钱塘江一水将浙省分成东西，不但一省交通受阻，且对全国国防与经济、文化发展也大有妨碍，想推动各方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请工程专家茅以升、罗英主持其事。1934年11月9日，浙江省政府与铁道部成立铁塘江大桥工程处，茅以升为处长，罗英为总工程师。11日在杭州闸口举行大桥工程开工典礼。它是中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和主持施工的第一座近代化桥梁。大桥全长1453米，上层为公路，下层为铁路，预算全部经费510万元，后因资金、材料等问题，推迟至1935年春天才正式动工。

曾养甫夫人揭幕。






大桥开工。



打桩礼



破土仪式

【百　家】

紫金山天文台建台记

⊙啸　剑

1934年9月1日，紫金山天文台落成，隶属于中央天文研究所，共耗资50多万元，为东亚规模最大的天文台。

天文台的筹建早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初就开始了。1927年11月20日，中央研究院筹备会上，曾任孙中山秘书的高鲁提出在南京紫金山建立一个国内最现代化的天文台，议案获得批准。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成立，高鲁出任代所长，勘定紫金山第一峰为台址，到年底，建筑师李宗侃设计出了初步台图和登山汽车路线。正要施工时，高鲁突然受命出使法国。厦门大学天文系主任余青松应聘出任天文研究所所长，主持建台工作。他经考察，意外发现紫金山建台并非最佳选择。紫金山空气湿度大，妨碍天体观察，而且高度不足，最高的第一峰也只有海拔448米，峰顶常在云下。但他的意见无法获得国民政府的认同，军政要员们坚持天文台必须建在首都。余青松便将精力集中在如何在紫金山建台上。最初设想的在第一峰建台的计划被余青松放弃了，他意识到第一峰的盘山公路耗资甚巨，便改址第三峰——天堡峰，这峰海拔267米。余亲自设计建筑蓝图，他已被告知：天文台的建筑既要便于天文观察，又要有中国特色，不妨碍它所处的整个孙中山陵园的布局。

1929年12月21日，天文台四里的盘山公路破土动工，为节约开支，天文台主体建筑皆由余自行设计、绘图，并与各职员共同监工建筑，花了一年半时间建成。但1931年那场罕见的水灾妨碍了建台工作。本来已经拨下的25万元建台费被用来购买赈灾公债，因为国民党中央决定：停建全国一切



远眺天文台。



天文仪器运抵山上。

非切要的建筑，将经费移借救灾专用。水灾刚结束，日本人又在东北和淞沪挑起战火，天文台的职员们都分散到南京城内各处司职防空警报，直到1932年7月才重新开始工作。1933年6月10日，天文台主体建筑落成。八天后，天文台的鼎力支持者——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1934年8月25日，紫金山天文台终于竣工。

1934年9月1日，举行了紫金山天文台揭幕典礼。天文台占地3.1公顷，设有6座银灰色的巨型天文观测室，分别负责观测太阳、恒星、行星、月亮等。每座天文观测室圆顶四周环绕着天坛式石栏杆，用料均为紫金山特有的虎皮石，砌成水波纹形状，大方庄重而且美观。台本部四周为一大平台，平台中央圆顶内设有亚洲地区最大的、直径为60厘米的现代式反射望远镜，和陈列在台本部下的几架中国古代天文望远镜同居一座山峰，相映成趣。中楼正中有一长石阶道通向一巨大银色圆顶，长阶中段，中国式的三孔牌坊横跨其上，牌坊顶部覆盖蓝色琉璃瓦，正中镌刻“国立第一天文台”七个蓝底填金大字。

【百　家】

远东运动会:最后的晚餐

⊙林　风

一、日本人的算盘

1934年5月12日,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开幕以前,运动会曾因受到中日政治问题的困扰,差点搁浅。问题的核心出在日本,它处心积虑要让伪"满洲国"这个傀儡赢得国际承认。

1932年,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日本人就曾代伪"满洲国"向大会报名,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不甘心的日本人便将主意放在远东运动会上。它向主办国菲律宾提议,让伪"满洲国"参加,菲律宾开始犹豫不定,就根据会章征求中国意见。中国代表当然坚决拒绝,菲律宾遂拒绝伪"满洲国"参加,同时则接纳法属越南和荷属东印度加入。日本不肯罢休,他们找到了东道主的一个弱点。当时菲律宾为远东运动会建造了一座宏大的体育场,花费了菲币150万元,极想利用门票收入收回成本。于是日本就发出威胁:如果伪"满洲国"不参加,它将不参加运动会。菲律宾试图在中日间调停,而中国的态度是非常坚定,不准伪"满洲国"参加,坚持要按照会章的规定:新会员的加入必须经过旧会员国的同意。菲律宾于是也宣布,无论日本是否参加,远东运动会将如期举行。日本人无计可施,仍然派团参加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度过这一难关才艰难开幕。

中国中华体育总会组织了150人左右的体育代表团,团长是王正廷。王是位老资格的政治家,担任过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中国政府请他出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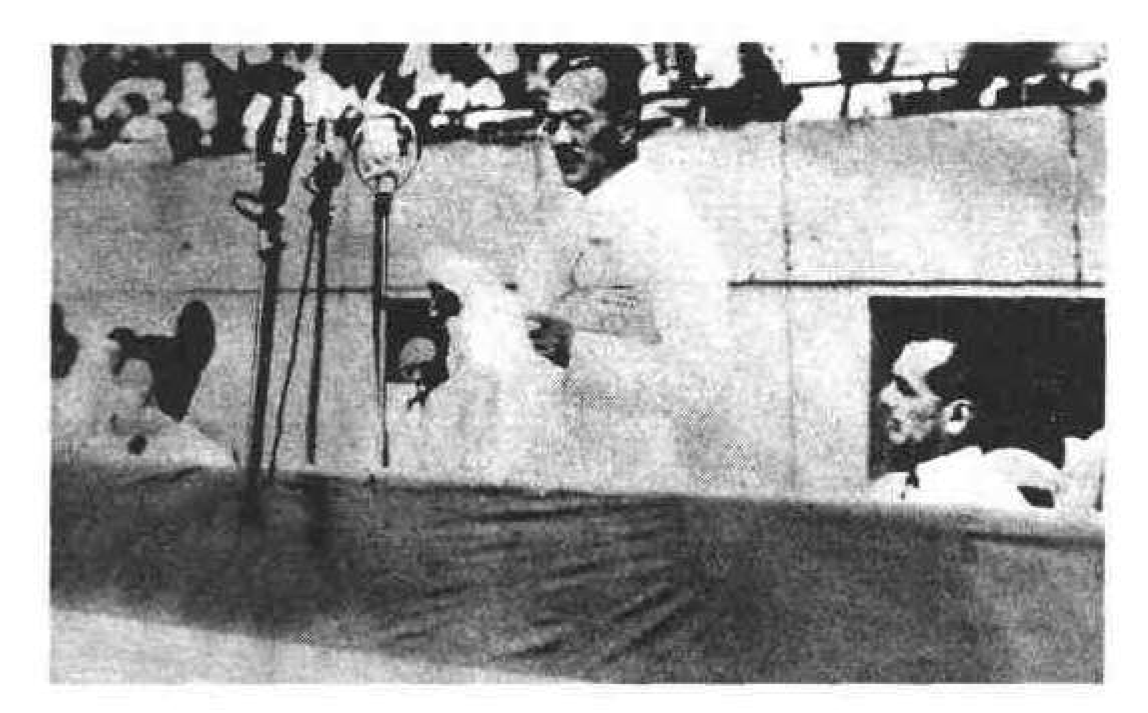


马尼拉的华侨在码头欢迎中国选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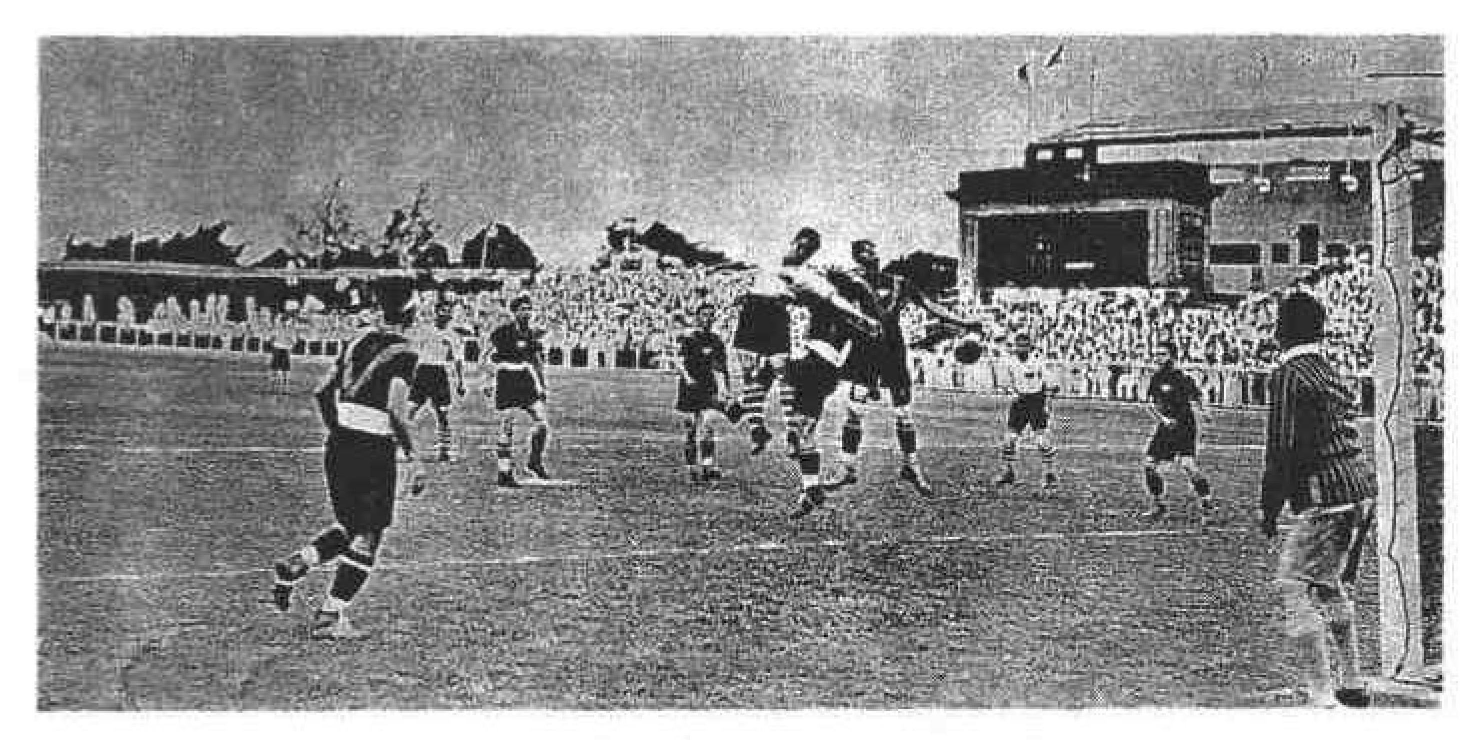
团长，显然是准备应付日本人的外交阴谋。果然，日本不肯放弃让伪“满洲国”进入远东运动会的图谋，提议改变会章，将新会员人会手续由全体会员通过改为多数通过。在运动会的最后两天，全体会员开会，讨论日本提案，尽管菲律宾知道日本的用心何在，但它决定宁愿开罪中国，也不开罪强国日本，同意了日本的提案。中国无奈，只得退席抗议。会议由日本、菲律宾两方继续召开，21日，双方未经中国同意，便决定停办远东运动会，而成立“东亚体育协会”。拥有二十一年历史的远东运动会宣告解散。

二、明星杨秀琼

本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除在外交上处境不佳外，体育比赛成绩也下



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正廷致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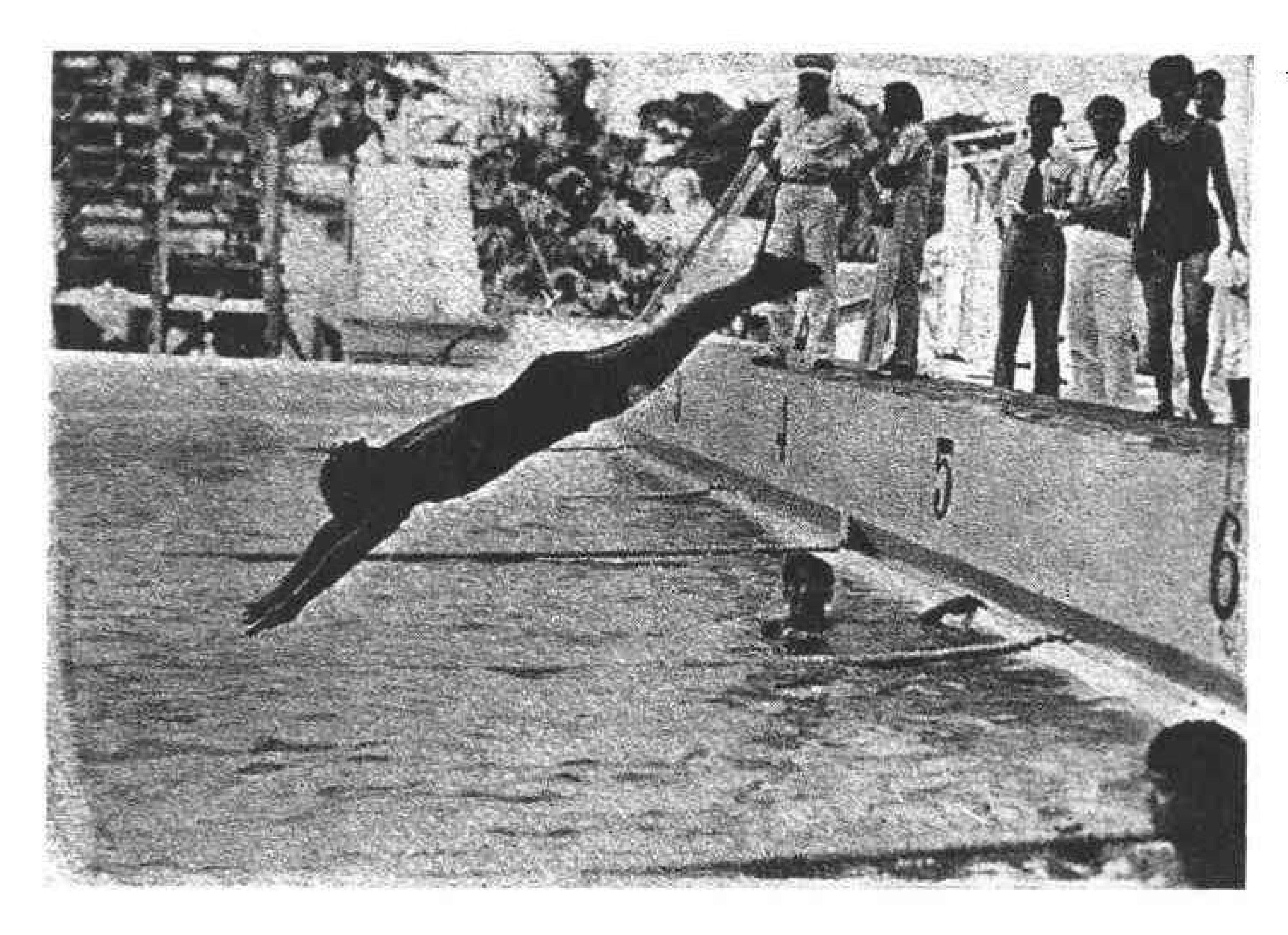


中国足球——远东的霸主。

滑。田径比赛中，日本得分最多，菲律宾位居其次，中国只能垫底。以前的远东运动会上，中国好歹每次都能够夺取两个以上的冠军锦标，本届只得了一项——足球冠军：首战2:0胜菲律宾，次战2:0胜荷属东印度，最后以4:3胜日本。中国的足球在远东继续保持优势，除了足球，中国代表队最抢眼的非女子游泳莫属。这届运动会上，女子游泳被列为表演项目，日本没有派选手参加。比赛变成了中国与菲律宾两国的竞争，中国游泳女选手包办了全部冠军，尤其是美人鱼杨秀琼包揽了50米自由泳（36秒9）、100米自由泳（1分27秒5）、200米俯泳（3分58秒）和100米仰泳（1分38秒）的冠军，还与队友刘桂珍、陈焕琼、梁咏娴合作夺取了200米接力金牌（2分41秒7），全

女子游泳异军
突起。





杨秀琼入水瞬间。

部超过了国内的最好成绩。可惜的是，在 200 米蛙泳中，菲律宾说她犯规取消了她的成绩。整个菲律宾都知道了来自中国的美人鱼，惊为天人。

这位来自香港的女孩出生于广东东莞，她的父亲是香港南华体育会的救生员，后来当了游泳教练。他有两女一子，都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游泳，不久，杨秀琼、杨秀珍姐妹两人进步很快，先在香港的比赛中崭露头角，1933年杨氏姐妹在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一举成名，她们帮助香港队获得了女子游泳团体冠军，杨秀琼更囊括了四项第一，"南国美人鱼"的称呼非她莫属，她成了国内报刊持续关注的热点人物，有的报纸甚至为她编写起居注，以此招揽读者。酷爱太极拳的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不惜充当马夫，用自己刚打造成的新马车带杨秀琼姐弟在南京兜风。1936 年，杨秀琼还代表中国参加了在德国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抗战爆发后，她的运动生涯骤然结束，后移居加拿大，1982 年病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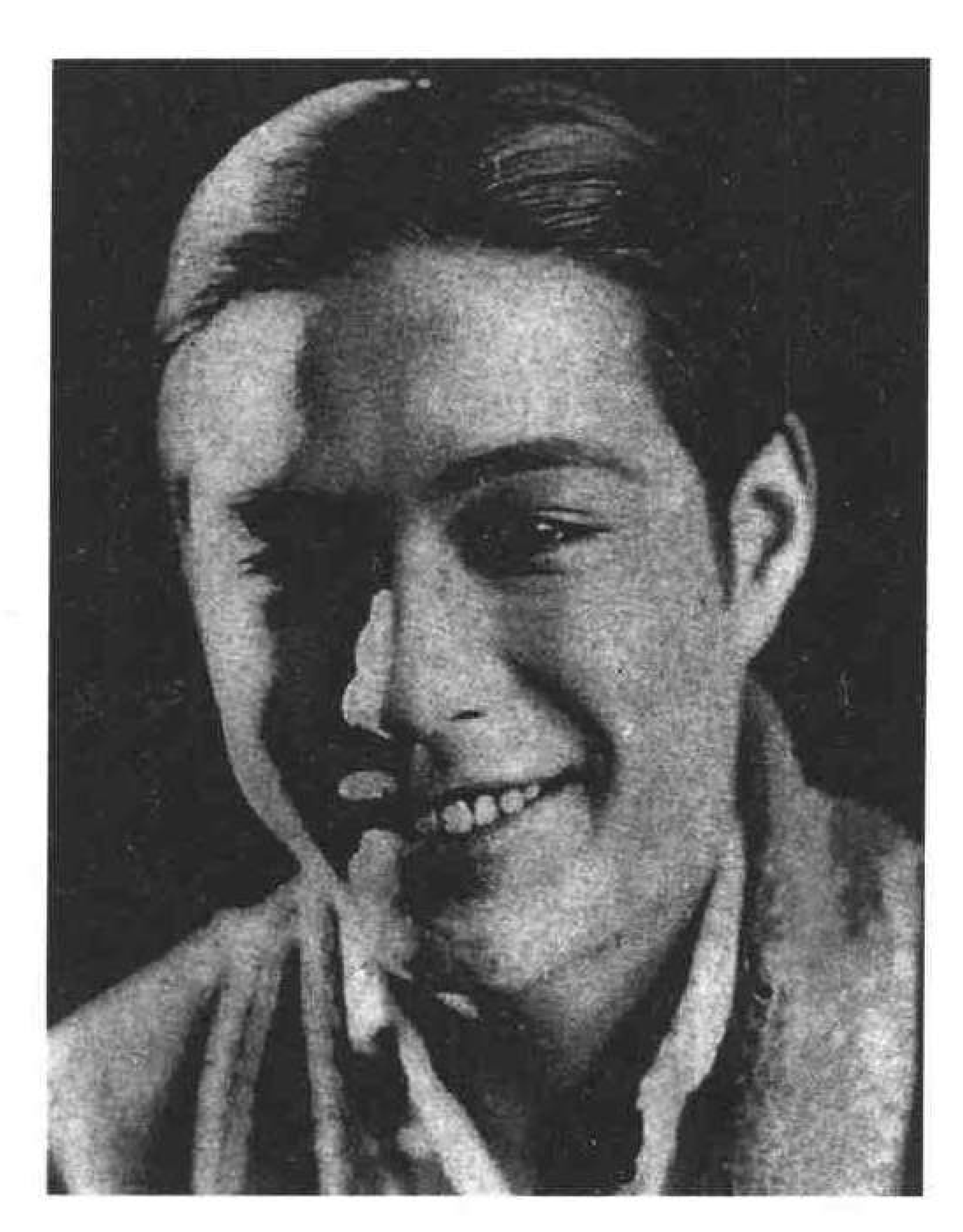
【百 家】

现实主义电影的节日

⊙朱 剑

电影人——尤其是各大电影公司的老板和编导们——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迎来了1934年的元旦。《明星月报》的新年献词可以说是这种心情的写照："中国的影坛，在一九三三年度，该说是值得非常重视的一个年头，既受到了暴风骤雨的袭击，也受到了春风甘霖的培养。'转变转变'：曾拨开了荆棘，闯进过充满着光明的大道，但布置了陷阱，也曾被抛进过黑暗的深渊！现在仍然徘徊在十字路口，等待着最后的路线的决定。"语言颇为晦涩，这里所说的"转变"，即指左翼电影运动所引发的电影变革的热潮，影人们有着走过一段布满陷阱的光明大道的感觉，"陷阱"所指，乃是当局对左翼电影的封杀和左翼电影本身在艺术上的一些缺陷使其并不十分卖座，电影公司仍举步维艰。继续拍摄像《狂流》这样的左翼电影，无疑使公司要冒较大的风险，而重新回到鸳鸯蝴蝶派和武侠神怪片的老路显然也已不可能。这种艰难的局面，却为"明星"、"联华"等著名电影公司的进步影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有着电影艺术方面较为深厚的功底，左翼电影则为他们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变化，此两者相结合，使他们在1934年拍出了一批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电影佳作，从而在中国影坛上掀起了第一个现实主义电影的高潮，同时也使这些公司名利双收。

1934年春节，明星影片公司推出了该公司资深编导郑正秋编剧并导演的《姊妹花》，标志着现实主义电影高潮的到来。影片的题材仍是郑正秋一贯关注的妇女的命运问题，描写了幼年曾相依为命的一对孪生姐妹大宝和二宝，因为父亲赵大私贩洋枪事发外逃而分离。二宝跟随父亲，长大



演员金焰

后嫁给了军阀钱督办做七姨太，赵大仗着军阀的势力做了官。大宝跟随母亲留在农村，嫁给了善良忠厚的木匠桃哥，连年灾荒迫使大宝携儿奉母随丈夫流落城市。为济家用，大宝忍痛放下刚满月的孩子，应召到钱公馆做了二宝的孩子的奶妈。姐妹相逢却不相识，一个是贫困穷苦的下人，一个是骄奢淫侈的姨太太，两姐妹的生活有如天壤之别。大宝当奶妈的第三天，桃哥干活时从房上摔下，急须救治。大宝恳求二宝预付一点工钱，得到的却是二宝伸手一记耳光。大宝万般无奈，内心非常矛盾地偷了小主人身上的金锁片，却被钱督办的妹妹撞见，慌乱中大宝失手碰落的一只大花瓶恰好将她砸死，大宝因而被捕。大宝的母亲前去探监时，发现军法处长正是昔日外逃的丈夫赵大，赵大对妻女的悲惨境遇无动于衷，不得已才告

《神女》剧照



知二宝真相。二宝良心发现，驱车带着母亲和姐姐前往钱督办处求情。一家人虽然团聚，但他们的命运却要取决于钱督办的态度。

《姊妹花》显示了郑正秋编导影片的一贯特点，情节曲折动人，戏剧性的巧合，基本封闭的结构，浓郁的悲剧气氛等等，但该片已不再局限在家庭伦理的狭小范围里，而是展示了现实社会中尖锐对立的贫富阶级之间的矛盾。片中大宝、二宝由胡蝶一人饰演，她将这对面貌相同的两姐妹的迥然不同的性格充分表现了出来。1934 年春节《姊妹花》首映于上海新光大戏院，盛况空前，创下了连映 60 天的纪录。

这个纪录在这一年的夏天被联华公司的新片《渔光曲》打破。联华公司素有“新派”之称，集结了一批艺术上颇有造诣的编导，在现实主义电影的主潮中，他们如鱼得水，佳片不断问世。

《渔光曲》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海边渔村，渔家儿女小猫、小猴与船主少爷何子英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子英出国留学，攻习渔业；小猫、小猴租了何家的船在海上捕鱼。因打渔难以维持生计，小猴兄妹奉双

日失明的母亲之命投奔上海舅舅，随舅舅沿街卖唱。子英学成回国后，在上海其父的华洋渔业公司任职。一次，子英寻着他熟悉的歌声，找到了卖唱的小猫、小猴，子英好意以百元相赠，不料小猫、小猴因此被诬为盗，被关进了监牢。母亲慌乱中打翻油灯，与舅舅一起葬身火海。出狱后的小猫、小猴无家可归，而子英的父亲因公司破产自杀身亡，子英改良中国渔业的理想也成了泡影。于是童年时代的三个伙伴又一起到渔轮上干活。最后，小猴因工伤致死，临死前，要小猫为他唱一首歌，小猫凄凉地唱起了《渔光曲》："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轻撒网，紧拉绳，/烟雾里辛苦等鱼踪，/渔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全片在这哀怨的歌声中结束。

《渔光曲》是一部严格地按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电影，海边长大的蔡楚生通过对他所熟悉的渔民的苦难生活和青年知识分子改良中国社会的梦幻破灭的描写，艺术地展示了社会现实。由王人美饰演的小猫和韩兰根饰演的小猴，将渔家儿女朴实、勤劳、善良的品格成功地塑造了出来。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渔光曲》在影片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几度响起，更加渲染了影片特有的悲剧气氛。

1934 年 6 月 14 日，《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恰逢上海 60 年来少见的酷热天气，但仍观者如潮，连映 84 天，创下了历史记录。1935 年 2 月，该片参加了苏联电影工作者俱乐部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荣获"荣誉奖"，从而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故事影片。随着影片的放映，其插曲《渔光曲》风靡一时，且历久不衰。

1934 年 7 月，联华公司的著名导演孙瑜开拍他的代表作《大路》(洪伟烈摄影)。描写筑路工人的后代金哥(金焰饰)与他的五位性格各异的伙伴在大都会里由于反抗工头压迫而失业后，辗转来到翠湖边修筑公路。他们结识了在湖滨开饭馆的小老板的女儿丁香(陈燕燕饰)和茉莉(黎莉莉饰)。不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汉奸胡天为破坏翠湖边这条军需公路的修建，威胁利诱金哥率众离开工地。金哥等不从，被胡天关入土牢。众路工冲入胡家，救出金哥等人。金哥带领众人和军士一起苦战三天三夜，修通了公路。但敌军飞机袭来，金哥等壮烈牺牲。最后，在开赴抗敌前线的中国军车扬起的尘雾里，丁香仿佛看到金哥等又站了起来，伴着《大路

《渔光曲》剧照之一



《渔光曲》剧照之二



歌》的歌声，合力拉起了压路的大铁滚，以无比英雄的气概和必胜的信心向着自由大路前进。


导演郑正秋

《大路》没有曲折的情节，人物也没有复杂的性格，孙瑜“主要着力描绘了一群革命、乐观、斗志昂扬的青年筑路工们”，“展示了我国人民那种大无私、勇往直前、热爱祖国的优秀品质。”《大路》在题材的择取上是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但其具体的创作方法则更接近于浪漫主义，惟其如此，才使该片形成了孙瑜所设想的“诗意的、抒情的、歌颂青春活力和乐观义义精神风格”。影片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作曲及全片配乐均由聂耳完成，旋律激昂雄浑有力的歌声与拉着铁滚迈步向前的筑路工人的形象相交融，特别富有感染力。

1934 年，“联华”年仅 27 岁却已在摄影场从事美工达十年的吴永刚第一次作为编导，拍出了 30 年代名片之一的《神女》(洪伟烈摄影)。影片描写了被称为“十字街头的神女”的暗娼(阮玲玉饰)悲惨的生活。一位年轻的母亲，为生活所迫做了暗娼，一次为逃避警察追捕，慌乱中逃入了一个流氓家(章志直饰)。不久，流氓找到她家，她不仅被流氓霸占，而且她以屈辱换来的钱也被流氓夺去。为能把孩子(黎铿饰)送进学校，她暗中积蓄，把钱藏在墙洞里。孩子终于上学了，她心中有了一丝安慰和寄托。然而，孩子的身世被一些学生的家长发现了。迫于他们的压力，学校董事会决定把她的孩子开除，富有同情心的校长愤而辞职。她伤心叹息，偌大个城市，竟无她母子立锥之地。于是想取出积蓄远走他方，但钱却被流氓偷走了。她赶到流氓常去的赌窟，流氓已输得精光，并矢口否认偷了钱，大耍无赖。她气怒交加，顺手拿起酒瓶向流氓砸去，正中要害，流氓毙命，她却被判了 12 年徒刑。铁栅栏中，她猛然想起孩子……

《神女》倾注了吴永刚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受凌辱的妇女深深的同情，影片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逼良为娼，而在暗娼身上却体现出崇高的母



《渔光曲》女主角扮演者王人美

爱。影片开头即以哺乳婴儿的母亲浮雕为衬景，映出了这样的字幕："神女……挣扎在生活的漩涡里……在这夜之街头，她是一个低贱的神女……当她怀抱起她的孩子，她是一位圣洁的母亲……在这两重生活里，她显示出了伟大的人格……"吴永刚的导演很有特色，体现了朴素而含蓄的风格，娴熟地运用了电影表现手法，不追求戏剧性的故事情节，而是用素描的方法来刻画剧中人物，"在真实里找出情感"，"努力于心理的描写、情绪的变化"。主演该片的阮玲玉也显露了非凡的表演天才，加上她个人生活所受到的心灵创伤，使她能体会到下层妇女的心理感情，她的表演，"丰富了导演的构思和想象，成为影片拍摄成功的重要因素"。《神女》公映后，观众的心弦被深深地打动了，甚至连坐在观众席上的吴永刚也忘记了该片是由他自己编导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该片得到了影评界的赞誉，被称为是当年最好的国产片之一，有的影评还称之为"中国影坛奇异的收获"。



《姊妹花》剧照

【百 家】

赤区教育断片

⊙赓 雅

教育与宣传原是两件性相近而实不同的东西。但在赤区的教育，方针纲要虽未得悉，惟其施教之手段与方法，由几件事实里面却可把握着他们是寓宣传於教育之中的，甚且可说教育即宣传。

列宁小学、中学、政治学校、红军军官学校……都是赤区学校之名色。可是我们所到之处——收复区，闻都只办过许多列宁小学，其余的也许是办在"中央苏区"、"赣粤闽边省区"那些我们未得"剑及履及"的地带吧？

列宁小学，亦分高、初两级。课程仅国语、唱歌、体操三科。国语取材范围较宽，旁涉史地及时事，多与政治问题有关，尤以寓有刺激性之词意为合格。高级或加授数学等科，但亦仅讲授简易问题，毕业期不一定。成绩优良者则提升甚快，毕业亦较早，否则反是。

学校设备非常简单。校址多就乡村宗祠、公所及地主富绅之房屋，甚至能容二十来个学生之空屋，一经乡或村会议议决，即可到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请委教员而开办。设备虽任其简单，讲室空气和光线却非常注意。教科书多由学校印发，笔墨文具亦概由学校统购分发，虽然质料欠佳。

经费系由乡文化部及县文化委员会统盘筹措，各校教员多为一人或二三人，另辅以一事务员，概为无给职。因为他们都分得有田地，而且有人代耕。学龄儿童，除残废者外，概得入学，不纳学费。惟赣西莲花县附近所设列宁小学，初办的头三年内，学生果未花过一钱，各乡村学生数与各乡村学龄儿童数之比例，达92%。第四年以后，有些学校因经费缺乏，曾经叫学生交过几斗谷子。

他们的教授法大概是采取教学合一的方法吧？譬如教科学上要讲山，教员必尽可能地要把学生引到山上去，至少也要看见山之真面目，讲田讲水亦同样地把学生引到田旁水边，然后似玩带笑地把本文讲授给学生，但结语都必归落在他们自己所奉主义之立场上。如云：

> 山上生产着蕴藏着那些森林、禽兽、矿物种种巨量的富源，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是怎样怎样的被资产阶级据为私有，货弃于地……今在社会主义的范畴里，则与其它一切水利、江河、牧场、旷野等概归苏维埃管理，依照基本农民群众的志愿，随时开采以用于大众利益之头上。

在校学生还有“儿童团”之组织，奉行所谓“十一字的口号”，是“准备着！时时刻刻的准备着！”常开会议，讨论浅近的政治问题，且与其他较年长的青年所组成之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等互派代表，以通声息。必要时且须轮当儿童步哨，儿童侦探或写标语、散传单、清查户口等工作。有许多富农犯罪，都是这些小孩们告密的。假如父母不愿意他们的儿女干这一类的工作，甚至打骂以禁之，俟该儿女报告于团，或为其他团员发觉时，该父母即受压迫儿女之警告。



占领苏区的国民党军的反共宣传

赤区儿童因列宁学校之普设，入学且不用学费，差不多个个都有入学的机会。虽然学校设备很简陋，而教得未必会好，可是凡受过他们这种赤化教育的儿童，似乎比普通一般小学生机警得多。我们在莲花曾与这样的儿童接谈过，他们现在已被改编为“儿童反共团”，若问他们过去的情形，他们都能简单



国民党忙着覆盖苏区的标语。

明了地告诉你，听了令你满意。“公历19××年”、“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国际路线”一类名词，语间提及、惯用如数家珍。若谈着比较重要的问题，更进一步询他从何而知，大概他怕发生什么关系，他便亟用一种巧法把它回避掉，如云“这件事是教员告诉我们的，是他们压迫着我们去做的”，或说“是看见县苏维埃政府的告示才知道的”。

那样简陋的学校，俟下午小学生回家之后，还要把它移作成人简易识字运动或民众学校之用。所教字是择日常习用，而且容易认识，便于记忆的。有许多繁笔字，如縣、鄉、蘇、擊、鬥等字都被改用为县、乡、苏、击、斗。农村中所贴告传单，亦多改用此等简笔字。我们在宜黄、棠荫遇着几个曾受此项教育

的农民，原是目不识丁，今亦粗能阅读告示及记账了。

当时还遇着赣省府所派农村合作社宣传员，不辞舌敝唇焦，宣传组织合作预备社，听众初似很赞成，继见要把姓名登记，中有一人竟站起来发问：

"合作社办事人要开销么？"

"要！"宣传人答。

"是否动用社员的股本？"

"不是，创办时是由省政府津贴。"

"省政府的钱又由何处来的？不是由我们老百姓得来的么？入社每股虽只两元钱，但两元钱可买米七八斗，一小家人已够吃好多时候，若是无故而花了，岂不坏事？"

"曾经赤化过的农村不好对付！"这是那位宣传员扫兴而返的叹语，于此可见赤区教育影响之一斑！

（原载《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二号）

【众生相】

标准女性

⊙李继锋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梦，由梦而生成心中崇拜的偶像。

1934年12月1日，第九十九期印刷精良的《良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标准女性的评选。入选者的形象集中在一幅名为《标准女性》的招贴画上。画面颇有些奇特，呈圆形布局，外圈放射形地嵌着十位女性的头像。里圈则标示有具体的象征物，显露这些标准女性的成功所在。

拥有众多读者的《良友》杂志，并不标榜自己是女性刊物，但在树立新女性形象上，琢磨很多。既然从亿万人仅挑选出区区十名偶像，挑选者当然自有独到眼光。当年的主编马国亮先生回忆，那次评选虽然没有做太多的宣传，所谓标准，也只是《良友》一家所定，但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

二三十年代虽然已经渐行渐远，近乎渺不可及。但那个时代的气质、追求与八十年代后的中国颇有相通之处。人类历史犹如潮涨潮落，变动不止。一个时代的精神也起伏不定，有的时段追求世俗的享乐，有的时段追求纯真的理想，充满了虔诚信徒的激情。到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一个精神上的轮回。

在追求高尚理想的激情消退后，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者在不经意间变成了追逐金钱的世俗之人。和平时代日久，革命的原始冲动终于逐渐褪色，终于不被了解。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可以看懂有关二三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场发生的事件，却无法了解文化大革命或者五六十年代所发生的一切。过往的梦想恍如隔世，引发生命冲动的内在精神已经无从沟通。

台湾作家林清玄对30年代曾经赞不绝口，他动情地写道："素来看电

影，我总觉得30年代的事物什么都好看，衣饰、发型、装潢、颜色、汽车种种，几乎无一不美，既古典又高雅。有时想想真是不懂，为什么'进化'到现在的样子呢?"他认为大众消费的物欲时代来临后，一切在逐渐丧失典雅与精致，并为此感到深深的沮丧和悲哀呢!

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制造梦幻的地方。现代经济使上海空前繁华，大上海向越来越多的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大批的女性进入纺织厂、纱厂等成为了女工，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成了商店的店员、公司的职员，或者学校的老师之类。她们有职业，会享受，在越来越多的公众场合展现自己的魅力。

旗袍是那个时代的流行着装。时代不同，旗袍开叉的高高低低，就是30年代能够画出的起伏着的心情曲线，但旗袍突显的女性的高雅、含蓄与深藏的诱惑力，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急风骤雨也没有什么改变。中国的政治是很男性化的，政治家们——如果他们还配得上这称号的话——常常就像用粉笔在浴室的瓷砖上画画，写标语，也会绚丽，也会让人心潮澎湃。但女主人洗浴的不经意间会把它冲得干干净净，不再留下一丝痕迹。毛泽东曾经对斯诺感叹，他没有改变世界，也没有改变中国，他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外的几个村庄。谁都以为这是玩笑，但对想改变人的内心世界的毛泽东来说，这也许是由衷的感叹。

现在的城市妇女绝大部分已经是职业妇女，30年代则不然，上海是个特别的城市，那里的职业妇女阶层正在迅速形成，而她们内地的绝大部分同胞姐妹们的活动空间，还仅仅局限于家庭这个小圈子。这种反差让人想起了丰子恺30年代画的一幅漫画，题目是《母女俩》。母亲应是个中年人，看上去却有几许苍老。手腕挂着佛珠，居家的大量闲暇时光需靠念经诵佛来打发。一身传统服饰配上一双畸形的小脚，不禁将人的记忆带到遥远的年代。旁边的女儿则是另一种风景：一头精干的短发，脚登运动鞋。上身运动衫，下配短裙，手上一副网球拍，走到21世纪的上海街道上也是位不落伍的健美女性。两人不像是母女，她们之间好像已经隔绝了一个世纪。3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纷繁复杂、新旧并存的时代。像上海这样沿海城市的新女性与内地传统女性之间的巨大形象落差，又与这母女有多少差异呢?

不同的生活方式，带来不同的评判标准，这是无可奈何也是极自然的



本年度《良友》杂志推出的标准女性。

事。

胡木兰人选，只是因为“孝”。她的父亲胡汉民是敢当面数落教训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就数次委托他代理自己的大元帅之职，而蒋介石的活动空间还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汤山之囚后，他再也没有原谅过蒋介石对自己的鲁莽粗暴。他把广州变成了抗拒蒋介石一统天下的精神堡垒，陈济棠、李宗仁等广东、广西的军政首领奉他为政治偶像。胡木兰一直照顾父亲胡汉民的起居，直到他1936年脑溢血去世。这位全身心融入父亲政治生涯的女子，常常辛劳地奔波于铁路与海上，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履行着一个女儿甚至妻子该扮演的角色。评价胡汉民的后半生政治生涯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有这样孝顺、能干的女儿总让同时代的人为他感到幸运。

宋美龄以相夫贤德人选，粗一看像是妻以夫贵时代残留下的痕迹。其实，30年代初的宋美龄比起她那阴郁、寡言、暴躁的丈夫，要有魅力得多。她对丈夫——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军事强人蒋介石——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对她的追求使这位将军皈依了基督教，虽然当时和以后的许多人都对他是否虔诚深表疑虑，但每天早上起来摇头晃脑地诵读《圣经》确实成了这位委员长长久的生活习惯。蒋介石知道她的妻子对他有多重要。在和英国人、美国人打交道时，她成了他的眼睛和嘴巴，是最可靠的桥梁。

宋美龄不同于传统的女性，她常常与蒋介石共同出没于军旅之中，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多见，以至军中将领们对此颇有看法。对年轻的中国空军，这位女士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也喜欢与那些英俊、聪明、有教养的飞行员们在一起。抗战时期，她出访美国。在美国的国会山，她优雅的风度、熟练的英语和激情的演说打动了美国议员们的心，那是她政治生涯中最光彩夺目的时刻，她和中国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虽然只是短暂的瞬间。

从相夫贤德这个角度去看，1936年的那场人质危机才是宋美龄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时候。那年深秋，宋美龄陪蒋介石在洛阳度过了他的五十寿辰，后因身体不佳，与蒋介石小别，谁知很快就发生了蒋介石被扣押的“西安事变”。如果没有宋美龄在南京及时阻止何应钦等将领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并只身勇敢地前赴西安，蒋介石能否活着回南京，继续当他的最高领袖，还真是个未知之数。台湾有人评价了“西安事变”的三个主角张学良、蒋介石和

宋美龄的临危表现，说他们是一个天真，一个伟大，一个勇敢。笔者不想在这里对前两个说三道四，但宋美龄的勇敢却毋须质疑，她出现在西安时已经是将生死放在一边，她的到来使蒋介石惊为上帝的旨意，他那一直僵硬的态度就从那一刻开始软化的，对求生的向往促使他不再一心只想着大义凛然作圣贤烈士了。

宋太夫人，连名字也不出现的老妇人，也厕身于标准女性。并不是她太渺小，而是她太尊贵了，写出她那“倪桂珍”的名字，当时的编辑可能觉得有些不恭。

宋老太太，实在是个幸运的母亲。儿子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已是个个精达干练，横跨商界与政坛。掌上明珠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风光显赫，又远远盖过众兄弟，真叫人不禁念起“不愿生男愿生女”这句诗来。三个女婿已经是名震天下：二女婿孙中山有国父之尊，民族的偶像。大女婿孔祥熙是财神爷，长期掌管国家财政。三女婿蒋介石则毫不含糊地行使铁腕权力，统治着世俗的亿万芸芸众生。都说30年代是“蒋家天下”，可换个角度再看，还是更名“宋家王朝”合适些。宋家母女二位能够双双入选十个标准女性不能不说是异数，难怪宋太夫人因为福寿双全被人羡慕煞也。只是这个标准如今已成绝唱，计划生育的国策使任何一位母亲也没有办法拥有那么多的子女，更不必说个个声名远扬了。

林鹏侠女士人选标准女性是个异数，她是凭冒险精神人选的。

“九·一八”以后，东北丢失。1932年春，林鹏侠奉母命由新加坡回国，准备前去东三省参加东北义勇军。等到上海《淞沪协定》签订，战事告一段落，让她感到一腔热血，无处可洒，便独自游历西北。自从东北沦陷，西北的开发便备受国人关注。但只身深入到贫瘠荒凉、治安紊乱的内陆探险考察，对一个军人都充满了危机，更不用说是一个平民一个妇女了。她在新疆、青海、甘肃等西北省份游历考察，历时达半年之久，行程已逾万里。旅行期间的遭遇自然是曲折艰辛，险象环生，其经历、见闻和思考都记载在1934年她撰写出版的《西北行》一书中。她提醒国人，要“事事以开发资源，调和汉回感情为先务，立国家百年之基”，并详尽记录了西北诸省的风土人情、民族习俗、地理资源。身为女性，林鹏侠敢单身率先考察为大家视作畏途的大西北，不仅是女界豪杰，也是国人中深具远见者。至今读来，仍能激起国人开发西北

的豪情。

但她的入选主要不是因为这次游历，而是她能够驾驶飞机升天。1933年、1934年的中国正兴着"航空热"。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空军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日本的威胁使中国的处境危若累卵。年轻的空军被国人寄予厚望，飞行员受到英雄般的礼遇。像从德国驾机飞行回国的孙桐岗就受到广泛的礼遇，关于他的消息不断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但林女士不让孙桐岗等男性飞行员独享飞行勇士的荣誉，她也能够独自驾驶飞机在天空自由翱翔。这位出生福建莆田的女性，是在英国学习并掌握飞行技巧的。想想现在还有不少像荷兰球星博格坎普一类恐惧飞行的男子汉，就不能不为这位30年代的女士捏把汗，毕竟那时的飞机更容易从天上落下来。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追求财富的狂热将被载入历史，不过30年代的上海也是淘金的乐土。犹太地产巨商哈同是外国冒险家中的幸运儿和佼佼者。不过他的遗孀罗迦陵入选标准女性并不仅仅因为控制着大量的地产与巨额的财富，而是她能够利用这财富赞助文化事业和慈善事业。传说罗迦陵的父亲为法国侨民路易·罗诗，故随姓罗诗。23岁与哈同同居，协助他经营。她并不谙西文，汉字也识所无多，但她笃信佛教，晚年自号"慈淑老人"。她热心保留传统文化，先后创办了华严大学、仓圣明智大学、仓圣明智女学、广仓学会，刊印全套《大藏经》。1931年哈同死后，她艰难守业，她居住的、象征着豪富的爱俪园逐渐开始衰落。1941年10月3日，罗迦陵病逝于爱俪园。据载，当时爱俪园前素车白马，吊客不绝，耗资计20万元。

要论人气，胡蝶影响在标准女性中风头最劲。她是来自电影界惟一的标准女性。尽有许多人不知道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是谁，行政院院长又是谁，但上至党国要人，下至贩夫走卒，不知道胡蝶大名的却很是难得。谈政治，对普通市民来说既显得不着边际又隐含有风险，还是看一场胡蝶出演的电影，能够放松自己疲惫的身心。

想当初《良友》画报第一期的封面用的就是胡蝶的照片，画报的发行量才3000份左右，而胡蝶也只是刚出道的演员。但到九年后的1934年，《良友》画报已经发行到四万多份，胡蝶也出落成最走红的影星。从影十年的她，已塑造了众多的都市女性形象。1933年，上海《明星日报》发起了电影皇后的评选，这是30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于电影明星的宣传炒作。被投票推

选的女演员有几十人，最后胡蝶以绝对优势摘取桂冠，成为中国第一个电影皇后。1934年在上海连影了六十多天的《姊妹花》，表现了一对孪生姐妹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遭遇。胡蝶在影片中饰演姐妹两个角色。表演生动真实，被认为是她演得最好的一部电影。胡蝶的成功，绝不只是命运对她独厚，而是因为她一直勤奋工作洁身自爱，能够长时间地拒绝各种诱惑。胡蝶展示了当时女性通过自强奋斗走向成功的经历。

30年代的城市女性已经不再喜欢弱不禁风的林黛玉了，她们有了新偶像——杨秀琼。这位最年轻的标准女性在1933年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一人摘取四项游泳冠军，把"美人鱼"变成了她的专有名词。1934年，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运动会上，她在女子游泳表演赛上获得四项锦标，并与队友合作取得女子团体冠军。她身着泳装的那种健硕、美丽而质朴的形象是新时代女性的完美体现。在体育运动员的风头远不及电影、戏剧名角的时代，杨秀琼是个例外。1933年至1934年间她成了报章上曝光最多的新闻人物，也是社交场上的明星。

何香凝是妇女运动的先锋，从年轻时代就留着叛逆的一头短发。她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如第一个女同盟会员、国民党第一任妇女部长、国民党第一批女性中央委员等，这个坚强的女性从不惧怕政治的烦嚣，丈夫廖仲恺遭暗杀的悲剧也没有吓倒她。不过她人选标准女性并不仅是政治因素，而是得益于她出众的丹青技巧，多才多艺的女性总会赢来一片赞叹声。生活艰苦的时候，她甚至靠卖画来维持生计。

人们还会产生新的遐想：要是一个女性能够具备作家丁玲的生花妙笔、舞蹈家郑丽霞的婀娜多姿……

也许是按照姓氏笔画，女作家丁玲被放在第一位，那年她三十岁，这位湖南女性已经以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走红上海文坛。1934年底，《良友》将标准女性的桂冠颁给丁玲够大胆的，这位女作家是同情共产党的左联成员。当时正在处于政府当局的软禁之中，期待她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她的丈夫诗人胡也频更在数年前被南京政府秘密杀害。丁玲写作的内容大多是关于女性题材，诉说出五四以后新女性的精神苦闷和对解放的渴望。除了丁玲，上海还聚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像苏雪林、冯沅君、白薇、庐隐，以及稍后的萧红、张爱玲等。她们大多住在石库门里，切身感受着女性在

都市发展，在生存竞争中的种种遭遇。

那个遥远年代的理想中的标准女性形象已经慢慢浮现在脑海中。一个标准女性，她需要尽心孝敬公婆父母，帮助丈夫事业成功，生育一大群孩子。她是古典的，是贤妻、良母、乖女儿、孝顺媳妇。她又是现代的，受过良好教育，多才多艺，知名度甚高。还爱好体育户外活动，身材健美，如果有钱，她就必须有善心。如果再加上能够冒险犯难的勇气，那就臻于完美了。

当然，这是当时许多都市人的标准与向往，与还处在中世纪的农村女性们是绝不相干的，甚至与内地的都市女性都渺不相关的。

都说时代在进步，其实人的理想看起来总是相差无几，也许越简单的东西越持久、越真切吧。

【众生相】

影星漫画

⊙张白鹭

1. 阮玲玉笑着说："叫你们别看我这风骚的样子，以为我是个娘儿，要晓得我还没有结婚咧！" 2. 在昆山打猎的王人美说："你敢动？你动一动，我就叫我的老金一枪打死你！" 3. 艾霞和她的新爱人——死神。 4. 大妹妹黎明晖向着长脚鹿——陆钟恩说："达令！我这套结婚礼服够不够漂亮？" 5. 胡蝶在南京接到一封什么"锄奸团"的恐吓信，她这样想着："唉！这世界还成什么样子？连我堂堂皇后也给人家恐吓一下！" 6. 从前湖南长沙某咖啡店的女招待胡萍小姐说："先生，你的那杯咖啡，要不要加点牛奶？" 7. 标准美人徐来说："假使我有一晚不跳舞，那我就活不成了。" 8. 陈玉梅女士的皇后梦。

《良友》画报



【民情民风】

牛和湘乡人

——湘乡的民性和语言

⊙清 池

在湖南的领域内，外县人常用"湘乡牛"的徽号，来骂湘乡老哥！同时一般居留在外县的湘乡人，对于这一个怪难听的名辞，也不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只好笑一笑，或拿"同是人类……骂人就是骂了自己……"等一类的话去应付。

"湘乡牛"这一个名辞的含义有两种：第一，湘乡人的言语非常难懂，尤其，他们的"我们"二字的音调恰像黄牛的叫声，在外县人的口里，"我们"（"我们"二字必用牛叫的声音去读才符原意）成了湘乡人的代用字。由牛的声音转到牛的本身，于是这个名辞宣告成立。第二，湘乡人的性情非常强毅，忍劳耐苦的"干"的精神，不但在湖南算是第一，恐怕在全中国也难找到。它又正象征着"牛力大，能耕田，能挽车"的特性，所以这名辞更加强了他的存在性。

湘乡夹在邵阳（原名宝庆）和湘潭的中间，是通湘南及广东、广西的要道，现在有潭宝汽车路纵贯县中，交通更加便利。邮电事业也非常发达。教育方面，小学教育的普及，除长沙市以外，在湖南要算第一，全县共有完全小学六十多校，前期小学千五百余校，虽然在质的方面，缺点很多，但在量的方面，确有惊人的发展。文化虽然绝不落后，可是言语非常怪拗，而且非常复杂。"湘乡腔"在外县人听已是难懂，可是同在湘乡的领域内，这一个地段的人，有不懂那一个地段的土话的。有许多地方只隔一条河，或只隔一个山，彼此的语音显然两样。所以比较概括地去区别，湘乡各地的土音不下二十种。这足见湘乡言语的复杂了。

湘乡学生在长沙、武汉、京、平各地念书的很多，成绩都不差。不过和外地人交接起来，思想的发表或传达方面，大多数感觉到一种“别人难懂”的隔膜，言语不统一，确实是当今中国民族分崩离析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变腔也很难，前清时代，一手替满人平定太平天国、支持天下的曾湘乡（国藩），老湘乡腔到底不能改变，就是一个例子。许多教育名宿想要利用国音来统一语言，我看毕竟是一个梦。

湘乡有人口百二十余万，其不怕死，在全国的军队中算是少有。现役军人在十万以上，中央直辖部队（海军除外）里到处可以发见湘乡人的足迹。据军政部的报告，全国恤金以湖南为最多，达一百三十四万元。而这数目，湘乡要占个大股，这足见湘乡人“铁”、“血”的精神。

耐苦、负责也是湘乡人的特性：湘乡的劳工在夏秋间总有一批批的跑去滨湖（洞庭湖）各县打禾，不怕风霜，不怕雪雨，更不惧热的太阳，不辞跋涉，徒步去，徒步回，赚钱养妻育子。因为劳动力超过他本县（指滨湖各县）的工人，所以，非常为当地雇主欢迎。益阳人曾经有一段歌谣：“黄肚皮，黑背心，泥里面去得，水里面去得……”学着湘乡腔的语调，半像半不像地歌唱着，讥笑湘乡的打禾劳工。这恰好是证明湘乡人耐苦、负责的特性的最好材料。

“气量窄狭”是湘乡人的最大缺点。湘乡人的脾气非常大，三句话不相投，马上放下脸来，眼睛一鼓，眉毛一挥，轻则反唇相讥，重则拳足交加，就是自己气力不够，敌不过对手，也决不会就此屈服，在外边活动的人，因为这一点——显示出傲慢的神气，地位比较高点的人往往遭同侪和下级的嫉恶，所以近百年来，除了曾国藩外，绝少有大成就的人物。但是，在另一方面看，湘乡人是很直爽的，不怕强，也不欺弱，总算有欧洲中世纪的武士道的风尚。在滨湖各县打禾的，各县人都有，有时候，别两县的打禾工，因为事故发生械斗，湘乡的打禾劳工不去调解，而转入漩涡，帮助有理的去征服无理的。最奇怪，有时候有理的一帮因为力量不足退缩了，湘乡劳工会单独地和无理的一群宣战。其“见义勇为”的“打抱不平”的精神，我想别处恐怕难找。

总之，湘乡人的特性，在湘乡本地，不论本地人或外地人都难得感觉到有多大的异样。因为人人如此，找不到显著的区别。可是出了湘乡，却充分地表现出和别地人的不同。所以，上边所举的例子也只有从别地方拿来的才算适当。

不论从言语方面或民性方面，都充分地显示“牛”的意味，外地人虽然会拿它来骂湘乡人。可是丢开言语不说，“牛”的精神在这世风日下的时期中，总不失为一种难能可贵的特性。也许我们更可以设法把这种精神推广起来，足以消灭那“畏缩”、“因循”、“诡谲”、“狡猾”、“不负责”、“不耐苦”……的劣根性。

（原载《申报月刊》第四卷第四号）

【民情民风】

谈谈北平之有闲阶级

⊙安 之



北京海王村公园

北平曾经做了数百年的专制帝王的都城，所以直到现在，依然还保存着不少的封建时代的现象，这种封建时代的现象在北平的“有闲阶级”的生活里很能够代表了一小部分。

有闲阶级的分子，是由满清政府遗下来的旧官僚政客、文人学士和所谓“皇亲”的旗人组合而成。他们是不作工的，根本也没有作工的技能，只是整天的优游过日，消磨了他们所有的时间。

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呢？他们如何去消磨了他们的时间？自然，这中间的事情是很多的，但是最普遍的生活总不出以下的几种。

一、听曲

他们对于歌曲的理解力很强，这是积了许多年的经验所致。对于歌声、拍子、转板、神态……他们都有很精微的考究。他们不仅能够精密地欣赏，而且还能够很准确地歌唱着。这被认为是一桩风流文雅的事，所以有不少的有闲阶级还花了钱跟着乐师学与唱呢。

听曲在他们是有瘾的，他们的听曲又很与一般普通的人不同。南方人上戏园去，叫做“看戏”，北方人却叫做“听戏”。这就很可以分别出南方和北方的人对于戏剧的观点的不同来，北方人对于戏剧是注重于歌唱的，

目的在“听”。当你在戏园里看那些有闲阶级在听戏的情形时，那形状是十分有趣的。扮戏者在戏台上大声地唱着，他们在坐位上摇颈摆脑地轻声地和着；脸上的神情十足，仿佛是在扮演着戏剧一般。而且，有的是用手指击着凳子的扶手，有的是用脚踏着地板，大拍其板子。他们对于各样的曲词都是熟透了的，在曲词到了一段落的时候，他们就哈哈大笑，鼓掌声和叫好声起于四座，就如像雷响一般。

他们的听戏是不避熟的，只要是他们所喜欢听的戏，也许还越熟越好呢。所以他们今天听某戏角的戏，明天依然还要听某戏角的戏去；今天听某姑娘的曲，明天还要听某姑娘的曲去。因此，他们天天上戏园，天天上大鼓摊，是永远不会寂寞的。

二、喝茶

这里的所谓喝茶，指的并不是在家里喝的茶，乃是指着上茶馆喝茶而言。

上茶馆，这也是有闲阶级消磨时间的一种消遣。比较低级的人，上“下等”的茶馆；比较高级的人就上“高等”的茶馆。下等的茶馆是用八仙桌子，四周围着了长木凳子；用大壶吸茶，随便坐下喝。且喝且谈，一坐就是大半天了。

高等的茶馆那是很讲究的，如像屠寺街的青云阁，就是有闲阶级的高等人物喝茶的地方。那里的桌子凳子都是桑木的；还有桑木的卧椅和茶几。地方既干净，陈设也十分雅洁。茶具是很精致的，有盏碗也有茶壶，听由饮茶者使用。

那里泡茶的茶叶都是比较的好点的，就是泡茶的水，据说也来得很干净。到这里来喝茶的人是很舒适的。他们喝了一会茶，就躺了一下子；也许是看看报，也许是谈谈天；有的干脆就在那里睡了一觉。这么样的半天就过去了，就回家去吃了饭再来。

外人看看他们这种生活好像是很寂寞的；其实不然，他们是很领略到清闲的快乐的呀。

他们还有好些人是自己带了上等的茶叶上茶馆去；因为是嫌那茶馆里的茶叶喝不上口呢。像这种的茶客，就算是很阔的。

玩鸟。



三、玩鸟

最喜欢玩鸟的是那些旗人。他们在清朝的时候，是能够领到恩俸的，所以不做事也能够过活。这养成了他们的懒惰的性格；玩鸟的习惯也因以造成。

只要他们有得饭吃，是不愿意做事情的。他们永不会寂寞；因为小鸟是他们的良伴。他们每天也不至没有事做，因为服侍小鸟的工夫却也不少。晚上要睡觉了，鸟笼上给下了布罩。早上起身来，把布罩除去，又把笼子里的鸟粪收拾干净；然后就弄给小鸟食，一边逗着它玩笑；又是过着快快活活的生活了。

在北平的市街上，拿着鸟笼子在街道上走着的人是很多很多的。还有的是把鸟缚着绳子的系在很长的旱烟筒上，就这么样的负在肩上走着。你看着他们好像是很没有意思的；其实他们这时候就同如负着了什么严重的责任一般。

有几个地方是他们这些养鸟的人会集的处所。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们如

荷重任地一个个拿着鸟笼子集合来了。各色各样的鸟都有，那清脆的叫声充溢了耳际。他们看一看自己的鸟，又看一看别人家的鸟；听一听自己的鸟的叫声，又听一听别人家的鸟的叫声，是感到多么的快乐啊。

像这种玩鸟的生活他们已经过惯了，丝毫不觉得厌倦的。他们在这种玩鸟的生活中很容易地过着了每一个日子。

四、下棋

北平有好些棋馆，专供给人们下棋的。有象棋，也有围棋，随便人们的嗜好。



下象棋。

这种棋馆也即是茶馆，它一边给客人下棋，一边还卖茶的。于是到这里来下棋的人，一边下着棋，一边还有得茶喝。一把茶壶放在他的左边，当他下了一着得意的子之后，就拿起茶壶来往嘴里灌，沽鲁沽鲁地喝他的茶。

也有好些有闲阶级的人，就这样地以下棋消磨日子。当他们在下着棋的时候，哪里觉得时间的飞逝，迨二三局既终，已经是半天过去了。所有的花费常是输的出钱。但也有的不是含有赌胜的性质的，那就不计了。

五、古玩

有钱的有闲阶级，多数有爱好古玩的癖性。在北平，像这种有闲阶级的人是很多的；并且北方的民族性就很有点好古的根源，因此造成了北平真像



公园中的古董摊

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城市，随处都涌现了“古”的色彩。

在北平资本极巨的古董店是很多的；小的古董店或古董摊那就算不清有许多了。

有些有闲阶级的人们他们玩着古董也能够过日。当他们买到了一件心爱的古董的时候，真是乐极欲狂，珍爱如宝！他们甚至向别人家借着古董欣赏，望梅聊以止渴。他们整天地揣摸着古董，欣赏着古董，就这样的快乐地过着他们的日子。

他们的足迹常常在古董店里，碰到了有合意而价钱公道的古董，就收买下来。古董商也很知道他们的脾气，知道某种古董是某有闲阶级的人所爱的，在有新的货物入手的时候，就送上门去发售。

除了上面所记的几种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如像文人学士的诗社文会，吟风弄月，寻章摘句；和骚人墨客的观山玩水，踏雪寻梅，习以为常，这自然也是有闲阶级的日常生活之一。但我在这篇短文里是不能备记的，就此结束了吧。

（原文载《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九号）

【民情民风】

典型的天津人

⊙萧仲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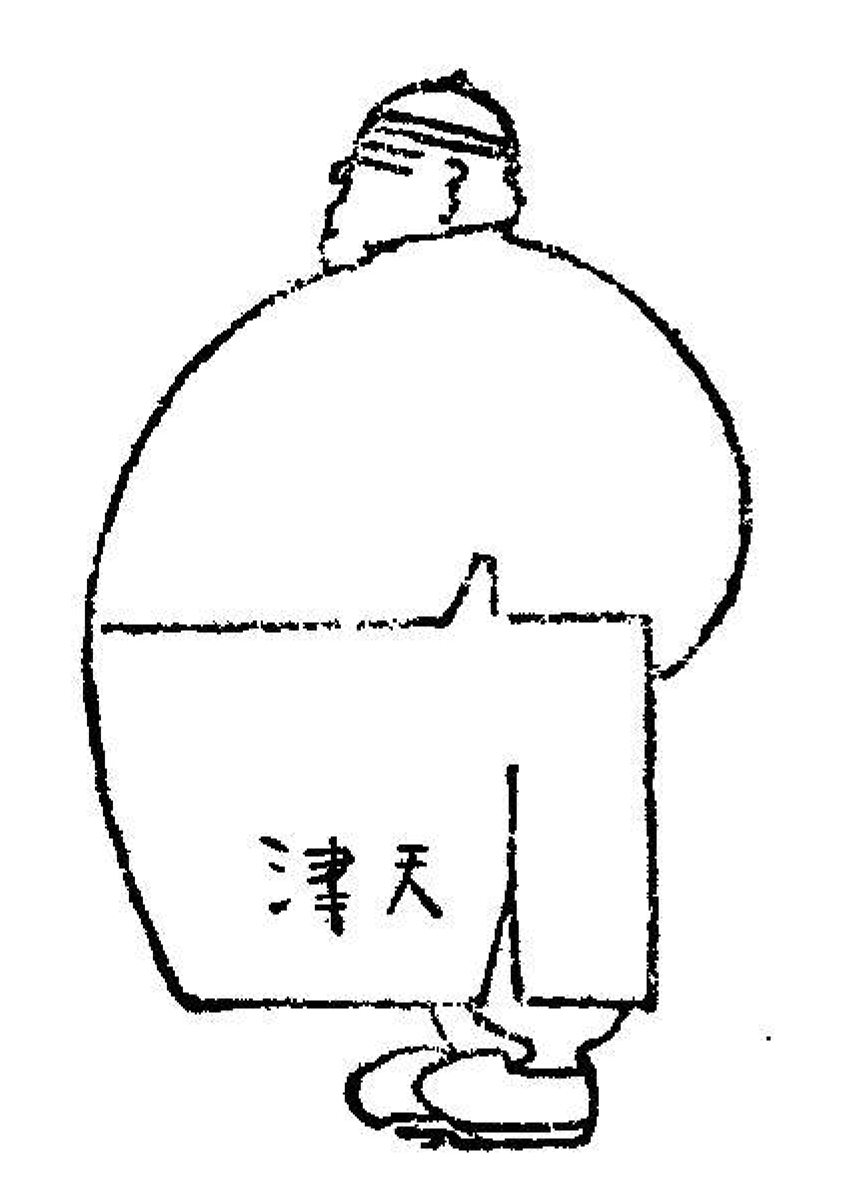
天津的标准人物便是一个大胖子。

天津人的标准胖，和北平或南方各省的胖子不同。你如果看见一个人，面部像一个肥硕的鸭梨，上面窄小向下阔大臃肿起来，由胸以下到大腿根泛凸起一个半地球仪式的大肚子，那便是天津人的标准胖。你如以为未尽，从那大肚子向下看去，两条大腿慢慢地细下去，一直到小腿腕，裤脚扎得很瘦，很细，把绸带扣一个蝴蝶形的结。因为他们喜把那肥厚的脚板挤入一双瘦小的鞋子里，两只脚便像两只长方形的小匣子。于是乎，脚部与其头部形成一适当之比例。你把一个橄榄立起来看，便可以想到一个天津胖子的轮廓。

多数的天津人，从二十几岁便开始胖起来。我以为用孕妇怀胎去形容天津人的胖为最适合。因为并不是胖，只是肚子的膨胀罢了。到了三十多岁，肚子便膨胀到典型的半地球仪式的程度。天津有句成语“三十不发四十不富”。所谓“发”，便是指肚子的膨胀而言。天津人认为肚子不大的人无有福气，他们说：“谁见洋车夫是大肚子的？”

据说天津人之所以胖是因为水土的关系。这也很有些道理。天津人的喝茶有着惊人的雅量。他们每天吃完了饭以后，便要喝茶。喝茶的地点除了在家里以外，便是到茶楼落子馆或澡堂喝茶，总是喝“大方”(一种花茶的名字)。大方放在较亚细亚煤油桶略小的茶壶里，泡满了一壶，便开始喝。你莫以为天津用的茶碗像北平上海等地那么小，他们的茶碗便是上海人用的饭碗，喝完了那么一壶，在家里的人便登上包月车去公干；在茶楼上的便和人

谈天或听鸟儿叫；在落子馆的便喊着喉咙喊几声好；在澡堂的便睡一觉或烫一个澡。天津人洗澡叫作烫澡。他们不是洗而是烫，在半滚水的池塘里一烫，出来一擦，被烫得骨软筋弛，便到木板的铺上一躺，睡一两个小时以上。无论是在家里、茶楼、落子馆或澡堂，喝完茶总是要休息，使吃的馒头等物为水泡而膨胀，渐渐地使之养成那典型的大肚子。



最后，我可以举两个事实以证明天津大肚子的之大。第一是天津西城有一个出名的胖子，当然家里是富足的，在津变的时候，他自己避居在租界里，看家的人便把院门砌小，只可容一个人偏着身子出入。砌小门口的事在津变的时候是很风行的，他家砌门的时候也是照着普遍的尺寸砌好，而忘了把那位胖主人切在门外。等到市面平定之后，他回到家去却望门兴叹起来，那半地球仪式的肚子无论如何不能进那狭小的院门。

还有一件可笑的事，是我亲眼看见的。有一次我到澡堂洗澡，看见一个大胖子坐在我对面喘吁吁地叫茶役拿一面镜子给他。原来他的肚脐下生了一个小疖子，因为那肚子凸着，他尽力低头也看不见那疖子，所以便要借重镜子去照。

我的朋友高龙生在天津以画漫画为生的，他对于天津的典型胖子很有研究，曾画过一个典型天津人，现在我剪下来作这篇东西的收尾。

（原载《申报月刊》第四卷第四号）

【民情民风】

南 京 人

⊙时　楚

南京人不知是哪里来的？说他们像乡下人，却没有乡下人的敦厚，说他们像城里人，却又没有城里人的气魄。

南京人中偶尔也有荣任什么“长”的，但他彷佛像登了极，坐在包车上，好像坐在金銮殿的龙座上，头是八角的，两眼朝天，晏子的车夫没有他得意。

如果送一个铜板给南京人，或者送几块饼干给南京人，他们会笑出眼泪来。为了一根草，要吵上半天嘴。

夫子庙等处乌烟瘴气的茶馆，是他们的俱乐部。人其中，如入日中之市，两只耳朵会被吵聋，但他们却笑，谈，喝，吃，津津有味，乐而忘返，每天都有瘾的。南京多佳山水，但对他们好像前生注定早绝了缘。

他们的房子，像拖尾巴老鼠，一进又一进。私人的客厅便是众人的厅堂。在会客用膳的时候，行人往来络绎不绝。

南京人的“睡”，实同东西的“塞”，进门便是卧室，没有前庭后园，天井只二三尺阔，在又低又湿又脏又狭的小厢中，到了天黑，便往里一塞。他们养了许多“南京虫”，饲料是他们的膏血，他们很舍不得的。但他们之中有的是洋房的房东，有的是街屋的地主。

有名的南京板鸭，我总吃不出什么好味道来。他们好腌鱼肉，挂在自己的卧室内外，但吃起来却味同嚼蜡。南京菜是酱油缸里撞出来的，全是酱油味，没有菜味。他们惯用豆油，吃了会叫人打上几个钟头的噎。南京女人喜在大门外吃饭，近午傍晚，每家门口，总有一二个女人站在那儿，大嚼特嚼，好

南京女孩子在户外留影。





沿南唐御街修建的城南干道中华路，当时极为繁华。

像在守候谁。有的还要七搭八搭地和旁人谈话。在我们那边，哪怕小孩这样吃饭就要被人骂为“讨饭相”。

南京女人多穿旗袍，臃臃肿肿，好像在里面塞了许多草。一到冬天便用带子把两只裤脚扎起，说不出像什么人。她们说话的声音，比男人还粗还重，她们的音带好像是特别定制的。女孩儿们如果学了一口南京腔，那只能嫁给南京人了。

南京的大萝卜的有名，不在板鸭之下，连根的萝头，倒有点像阿Q的“Q”形。

(注)日人称臭虫曰“南京虫”。

(原载《申报月刊》第四卷第四号)

【民情民风】

广西人的特性

⊙钱　华

广西人的特性便是服软不服硬。俗语道得好："广东人硬绷绷。"而广西人较广东人还要硬三分。所以和广西人交朋友要以柔克刚，否则硬碰硬，非弄得你死我活不可。治理广西也是如此，当局举办一事，一定先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拿极诚恳的态度解释利害，使他们心悦诚服，然后再雷厉风行的实行，全省民众必能矢忠服务，牺牲一切。倘若蛮不讲理，一味地拿威力来压迫他们，力量越大，反动越利害，确有宁死不屈的精神。陆荣廷治桂时代，广西土匪如毛就是最显明反动的表现。现在桂省当局就是能运用"诚"字和"理"字来折服他们，使全省人民很情愿地听从指挥。乡农清早晨奔跑数十里路，拿枪杆受军训，当民团。耕种空下来的时候，还要做征工，牺牲劳动时间服务公家，毫无怨言。土匪如毛的广西却变成路不拾遗。目下广西政治的廉洁、建设的进步，一大半是广西人的特性所造成的。有许多国内外专家和学者跑到广西去视察，对于桂省的民团组织和治理成绩，都觉得惊奇赞赏。但是都有一种疑问，便是广西这种制度和方法是否能推行到其他各省，因为其他各省人的性情根本和广西人不同呀！

这次中国科学社等六学术团体会员三百多人到广西南宁开会。学者名流荟萃一堂，真是绮欤盛哉。广西人的硬性在会员们极短促的游览广西时间内，却很显明地表演出来。第一件事便是汽车司机人的称呼问题。在平津通常叫开车的，有时候呼汽车夫。江浙通称汽车夫。香港、广东因为英语色彩浓厚的缘故，简称车夫。但广西人却认车夫这个名词是含有重大侮辱性的，誓死不承认，于是乎闹出许多笑话。桂省当局施政的方法便是因势利导。认识

了广西人的硬性，所以处处顺从捧场，竭力提倡人类平等和人道主义。广西南宁、梧州、桂林等处本来也有人力车，当局说是车夫拉人工作有背人道主义，一度禁止。现在虽然开放，但广西人去拉人力车的却是绝对少数，情愿去开垦，做苦工，不愿意沿街求乞，和戴上含有奴隶性的“车夫”名词。广西开汽车的差不多都受过初级中学教育，待遇方面每月从五六十元到百元左右，在广西已经算很好的了。一方面受人力车夫恶名词影响，同时又有相当智识，所以在年前他们召集一个全体大会议决，任何乘客绝对不许用“汽车夫”名词，一律改叫司机。因为司机含有技术性的，根本不是人家的奴才。他们的制裁和平一点的立刻停止服务，随便什么时候或汽车开驶到任何地方，坐汽车的叫声汽车夫，便请他下车，意思就是我不情愿做你的汽车夫，请你另找别位。激烈一点的便挥拳相向，你侮辱我，我就来一下子武力抵抗。他们的议决案既未正式公布，就秘密地执行起来。广西坐汽车的只是各机关的官吏和最少数的上级社会中人，无形中碰了司机的不少钉子，不知道发生了多少的争执和纠纷。公安局也捕了不少的司机人，都表示情愿吃官司，头可断，身可杀，万不能叫我们是汽车夫。同时省党部也奉令饬总工会恺切劝导，亦是无效。硬的不成，只可软来，坐汽车的无形中各自戒备，异口同声尊声司机。有一次南宁军官学校的教育长某君坐总部汽车到郊外公干，冲口而出地叫了一声汽车夫。司机人立时刹车，请他下来。某君勃然大怒，掏出手枪，厉声道：“不开就打死你。”司机人挺起胸脯亦大声回答道：“打死我也是不开。”结果还是某君软化，说了许多好话，总算勉强开到了目的地。

外省人到广西去游览观光的，自然不知道此中曲折，随便喊了一声汽车夫，就要发生许多麻烦。国联交通部长哈斯前次偕同国联秘书吴秀峰到广西去视察，坐汽车到武鸣参观民团。中途车开到半山，吴秀峰问道：“汽车夫，这是什么山？”碰到这位司机人又是一位霹雳火，把车停住，猛挥一拳，喝道：“我把你送下山坡去！”吴氏大吃一惊，连忙避过拳风，含笑请他解释，始知触怒理由，四顾荒山又无人烟，只得连连鞠躬道歉，方获度过难关。事后当局知道此事，把这位司机捕来拘留三个月了事。六学术团体会员到南宁的一天，匆忙未曾关照，也发生同样情事。有一位广州市政府秘书利君带了夫人黄女士和黄女士的妹子以会员资格来桂游览。到了南宁，利君夫妇住第一招待所，利君的小姨被派住乐群社，比较更优待一点。不料到乐群社以后，又说仍

该往在第一招待所。所以就派一辆汽车，送黄小姐去招待所。中途，黄小姐也无意地叫了一声，汽车夫便硬逼她下车，还说："你是一位女子，我不难为你，请你自己走路吧。"黄小姐木立路旁，眼看汽车驶去，人地生疏，又不认得路途，两行苦泪，便夺眶而出。幸亏不久招待员坐车过路，连忙把小姐接上车来，百般安慰，此事遂轰传全城。第二天各执行所门口都贴了一张极大的通告，略谓"敝省习惯开汽车的都叫司机，千万不要叫汽车夫，免得引起无谓纠纷"。吃饭的时候，又经过多方面的口头报告，于是各会员谈虎色变，坐上汽车便毛骨悚然。大家我看你，你看我，索性一语不发，坐上长途汽车更加心惊肉跳，恐怕不小心便被轰下车来如何是好。能说话的官员坐上去尊他一声司机先生，敬他一支卷烟，倒也和蔼可亲。司机的名称这才打下了天下了，众志成城，始终硬干到底得到最后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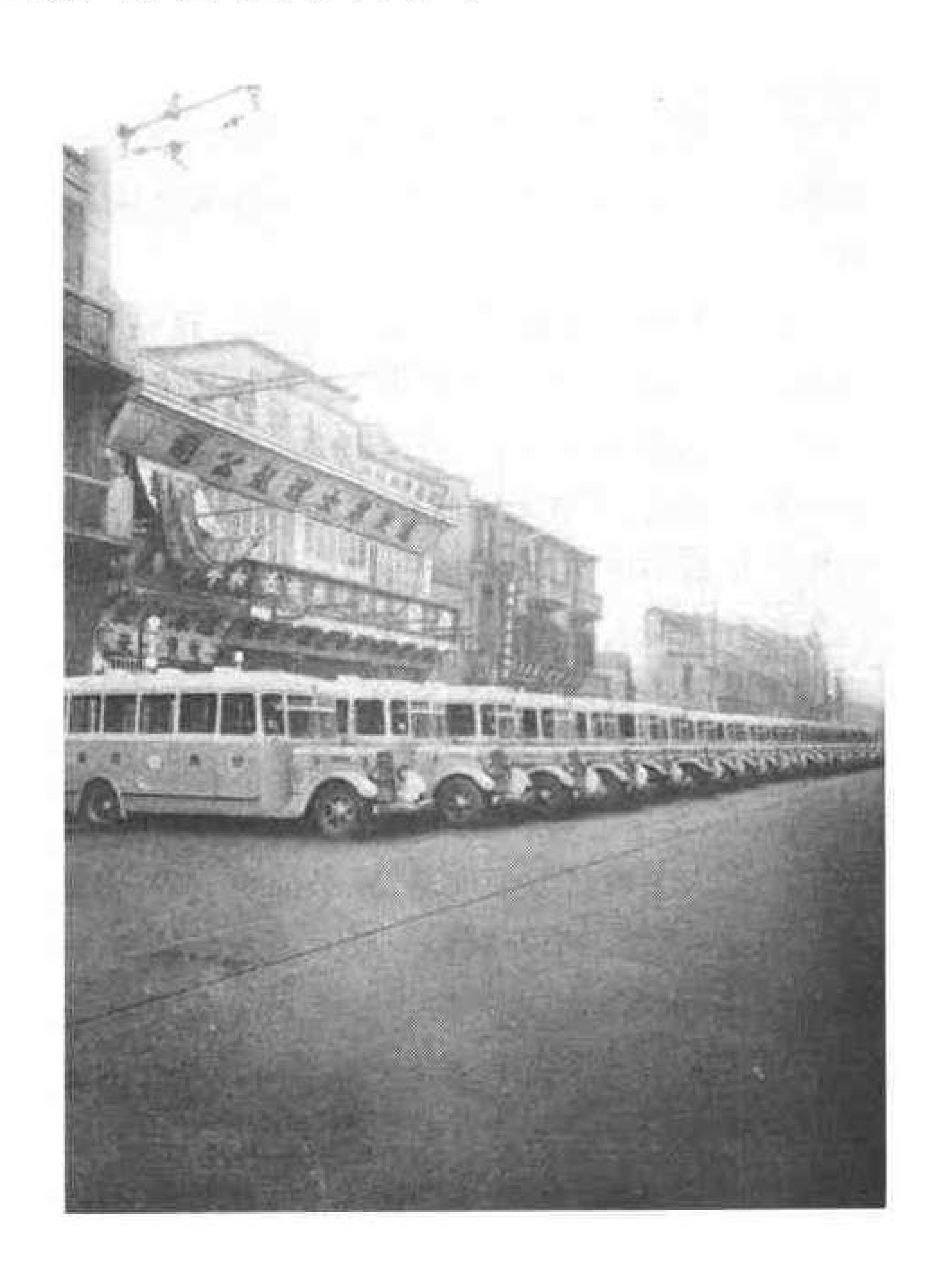
第二件事是记者亲自尝到的。记者要到龙州去看看西南边防情形，事前和招待委员会当局商量，约定第二天清早专派一辆汽车送去，同时再打一个电报到边防督办公署，请他们特别招待。从南宁到龙州循公路走有六百四十华里。清晨6时启程，下午三四时便可到了。但临时约定6点钟的汽车未来，等到8点还没有消息，连忙摇个电话到招待委员会去问，在万分抱歉声中，还要请少待，到9点钟便亲自赶去询问究竟。原来，昨天派定的这辆车这位司机先生因为路远不愿意去，清晨跑去声明有事走不开。会内职员当然大发雷霆，硬要他去。他一定不去，双方争执一小时未决。因为那时车辆已调度一空，临时无论如何找不到车辆的，结果职员硬不过司机人，于是退一步请他代雇一辆。司机人勉强答应着，开着车出去，又是一二小时跑回来说没有办法。招待员说："既是没有车，你绝对非去不可的。"同时更答应他多给钱。司机人一味摇头。于是，交通组主任公路局长跑出来说："你不去就吊销你的开车执照，永远不许在广西开车！"司机人也硬性发作，毫不顾虑地悄然离开。于是再设法找车，弄到12时方才启程。晚上8点才到龙州。广西人的硬性倒吃亏了记者在龙州少玩半天。

第三件事是在广西到处都可以看见的，便是旅馆的茶房、酒楼的堂倌、轮船的侍役和公馆内男女仆从绝对不向雇客或主人索取一文小账。你去住旅馆，茶房拿进茶水等照例公事，便掉身走开，不奉呼唤决不来同你假献殷勤，临去给他五元、十元小账也决不道谢，不给他也不向你翻白眼，照样拿行

李欢送你出去。在酒楼里吃饭多数是不给小账的,给了也是一样待遇。种种硬绷绷面眼真是朴实可爱。从前广西遍地是匪,捕获了绝对没有口供。他们有句口号"砍头风吹帽",过了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审问的时候,一律一句话:"砍头以外还有何说?"由此可见广西人的性情的一斑了。

(原载《申报月刊》第四卷第九号)

停放整齐的上海市营公共汽车



【战事纪要】

赤区经济封锁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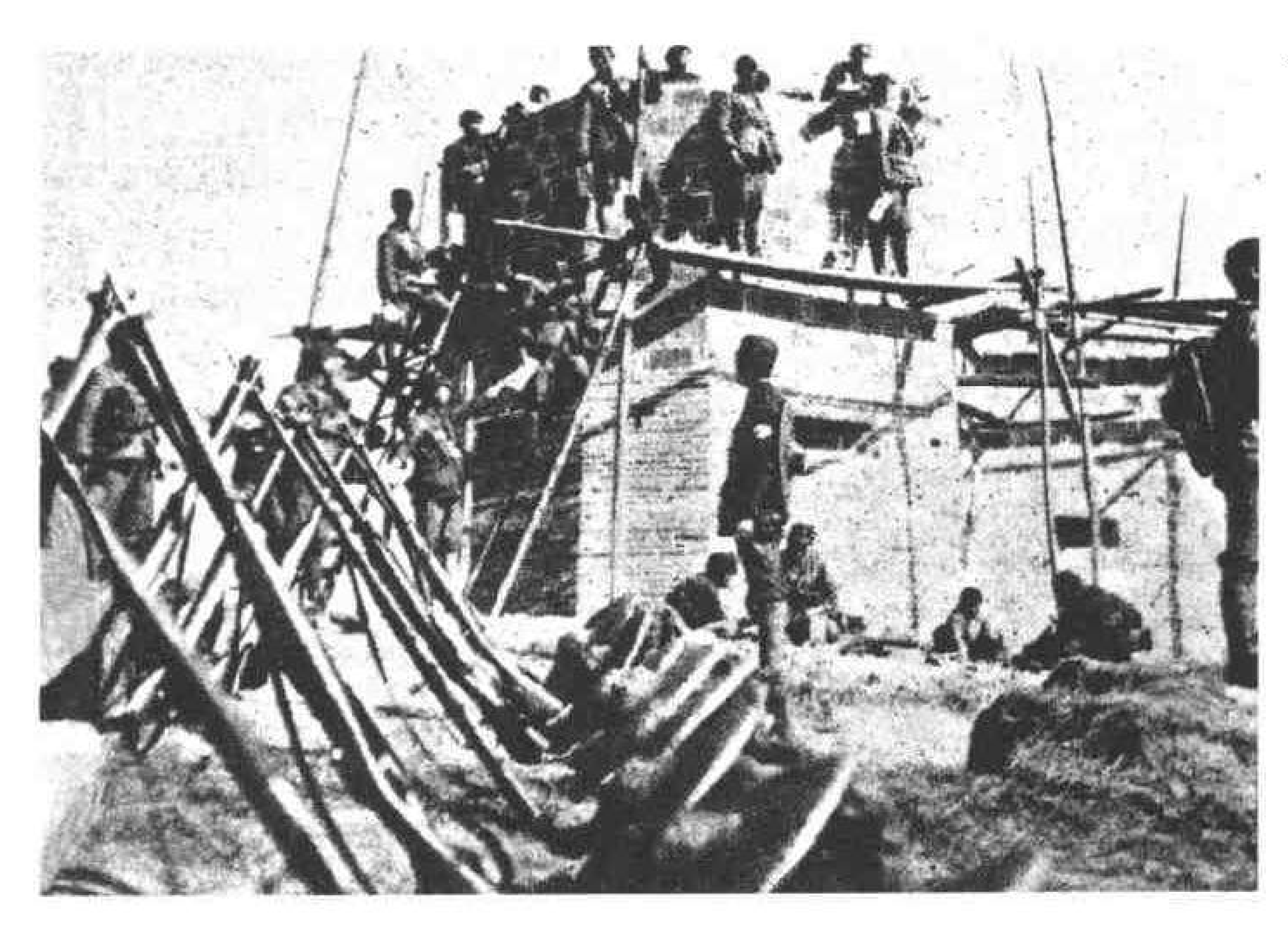
⊙赛　雅

国民党军自第一、二、三三次围剿失败以后，才于第四次以及今第五次围剿中加紧实行封锁赤区的政策。“剿匪”总司令部先后颁发的封锁条例不下十余种，南昌行营曾汇编成一本很厚很厚的小册子，纲举目张，有条不紊，读之诚有“务使赤区无勺水粒米之输入，无蚊虻蝇蚋之通风”之概！

封锁条例虽极繁多，但概括起来说，就是和赤区断绝一切——尤其经济方面的交与关系而已。试举几件主要物品来说，赤区自外输入的日常必需品为食、盐、火油和布等，自内运出的生产品，如竹、木、油、纸、煤及钨矿等（系指江西赤区言，若在豫鄂皖边区，还有茶、麻等可输出），可是一经封锁，赤区的生产品既不能销售于外，一部分农民工人便日陷于贫困与失业的恶境中，他方面且因输入的日常用品之昂贵，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更加恶劣，同时还因偷偷摸摸地不惜以重价购货输入，而输出的却平价也很难得输出，输出入既不平衡，于是现金大批外流，致感现金逐渐缺乏，而使赤区经济日益陷于严重的危机，至少亦足以困难和障碍赤区之巩固和扩大。

上言未免嫌其近于理论，似乎抽象了些，自然应当接着叙些事实以为例证。不过，读者们千万别替一般劳苦大众叹息，他们无论在那里在这里转去转来，都会永远地在生活物质享受上，连起码的条件都得不到。

赤区民间日需品最感缺乏的就是食盐和火油，所以经济封锁便从这两样先封锁起。一县一地的新收复首先成立的机关，大多是“食盐火油公卖局”，然后始递及“铲共义勇队”、“自首自新登记处”、“农村复兴委员会”等



为封锁苏区而建的碉堡

等、邻近赤区的县份"食盐火油公卖局"的招牌，早已挂旧，更不待言。

购买食盐的办法：每人每天只许购买三钱，五口之家得购一两五钱，余类推。但购时必须凭证，失证，请求补发手续甚繁，离赤区稍远之地或可通融，一次购备三日之用，火油办法亦如之，惟重量稍稍不同而已。

有些僻静乡村的食盐，是由义勇队部兼卖。义勇队的领袖们多是无法无天的人，他们先叫食盐户口垫出款来，由他们一趸去县局购来，然后又分卖于村民。他们从中取利，高抬盐价，少称重量，有时不高兴，盐已卖完数日，还藉故不去县局添办。添办时，又常有被劫之不幸事发生，要吃盐的村民们自然又要听命另垫一回款。有时扮演被劫的艺术露了马脚，村民已意识到他们名虽被劫，但暗地里已经向劫者得了意外的收入。可是"天高皇帝远"的村民们，尤其尚被指为"匪性未解"的新收复区之村民，谁又敢说"不信"呢？

有些客栈留了外来的旅客，所需食盐是叫旅客们亲自到公卖处去买，数量自然是勉约一餐之用。有些饭铺更居然贴出"小账可免，盐钱照加"的红纸条子。于此，不但可见食盐封锁之严密，并可想知盐价之因封锁而日益高涨，

这些都还是非苏区的现象。至于赤区因封锁而直接所感受到的物资恐慌，自然较此更加严重。兹仍以食盐为例吧：

"……自从白军（指国民党军）实行食盐封锁以来，县区内的民众非常地感受食盐缺乏的威胁，一般人家经常地得不到一两食盐，甚至无数的贫苦民众四五日不尝盐味，倒被反革命的商人操纵，竟至每斤涨到二元四角。"（见共产党南丰县委的报告书）

"……四乡的民众往往三四日甚至一礼拜得不到一两食盐。食盐的代用品如卤菜卤肉之类在两三月前已经煎水吃完。他们目前对于食盐的需要比较白饭还重要，盐价涨到一块花边（即银元）只能买七两四法钱盐。"（见共产党永丰县委的报告书）

此外，我们在赣南、赣西各县，还打听得一些偷运食盐的方法：

有些是把纸张或棉衣服先用盐水浸过并晒干，然后带进赤区，又用沸水把它含蓄着的盐质盐味煮出食用。

灰色区或赤区的农民来城市购买肥料、人粪，粪篓、便桶中也会暗藏着盐包或盐盒；或把便桶制成两截，底截较浅于上截，即藏食盐，检查时，若不将大便倾倒于地仅用棍子由上略微戳挑，自然即可轻易躲过。

上饶县城还有人抬着小孩棺木运往郊外掩埋，后面跟一妇人啼哭，且其哀。经检查人员开棺视察，并无小孩全是食盐。

前线军队已经挺进据守某一要地时间较长，而所需油盐食粮须由后方输送队输送时，经过半路险要，不知是否真正戒备得不充分，怎样也会常被赤军或者赤化乡民探实消息，要路劫抢，满载而归。所以有些输送队会经被人讥诮为"此输送队之所以为输送队"，甚且有被他人告发作弊，说他们事先故意走了风声，临时只消随便放了几枪，银货兑现了，甚至接洽好下次的生意以后才肯回头捏词谎报。

同时，赤区的"五里一哨十里一堂"的交通网听说也组织得很周密，几乎可于封锁政策的反面，而与封锁政策互竞其美，各奏其效。他们看见输送队之出发或采实其他军情，便用手示、旗语、唿哨、呼叫大家或用捷径飞跑传送，或由上流漂浮一号筒于下流，就会把很机要的消息很迅速地传递到前方去。而且他们都是道地十足的老百姓，还顺便做着耕作渔牧小贩一类事情，怎能容易识破？围剿"豫鄂皖边区"的某军工作报告曾谓武汉消息只消在六

七个钟头内，远在四五百里外的赤区，如七里坪、新康（今已收复）等地便可知道，殆非虚言。

在上杭、汀州、灵都以及赤都——瑞金，各赤区内因前年收成不好，去年青黄不接时，曾感粮食的极度恐慌，每石糙米汀州涨到十八元，上杭更贵。瑞金十五元，灵都十三元三角。南丰、南城的贫苦民众曾因饿而吃过去给与骡马猪羊吃的包薯、蔄蒿、野山姜、苎麻叶等物。但在另一方面的赤区，如赣县、万太、公略等县，反而因为生产品的过剩，而谷价狂跌，每担谷子往往跌到一元都不到，农民不但不赚钱，而且还要每担赔钱五六角。同是赤区，前者粮食恐慌，后者丰收成灾，究不得挹此以注彼，自然也是受了封锁的影响。

可是天下事，往往不能尽利而无弊。封锁之布置愈严，偷运之诡谋亦愈巧。除上述各偷运方法外，兹据南昌行营政字一四三九通令又发现了一桩偷运的办法，略云：

近有奸商由江西临川、浒湾等处购买大批货物，暗运赤区。其办货时，诈称运往南丰、南城等销售，而发单上不载全数，大批分写数张，待运至中途，与赤区接洽潜行变卖。如销去之数量有与某货单数量相符时，即将其货单废除，使无根据，无法稽查。

又我们在赣西莲花的时候，还看见几张给西区苏维埃政府封锁白区（指非赤区）的布告，也不厌其详地规定着某些产品是绝对的禁止输出，某些产品是可输出但须经过赤合作社之手，只限定卖进现金或换入某种日用必需品。向外购买某种要物仍须标准的以货易货的原则，非不得已，不准擅用现金一元。

去年湘军初从茶陵深入赣西莲花县城时，因为后方运输接济不上，骤感候粮缺乏，迫不得已，曾托"自首自新分子"分向四乡赤区去买，他们卖是卖的，但多半只限于出售糯米。据说糯米可酿酒，若在非赤区因很需要此种消耗品，可售善价，故赤区的糯米向来是不禁止向内输出的。

我们初到"剿匪"军事后方中心地的临川，正当盛暑炎天，常向一个西瓜贩买西瓜吃，即经相熟，无意间还听得个"有关封锁"的故事。有个瓜贩因头次挑瓜到宜黄驻军某营部门前去卖，很赚了几个钱，二次又去，刚抵城门检查，许多士兵纷纷簇集，各自取瓜而去。结果一个铜元都收不到，愤愤而返临

川。中途遇一同业，相约下次挑到某山坳去卖，再次另约新址，均有雇主(赤化者)前来接洽，果获大利。此瓜贩从而难保他不另去勾蜂引蝶，咸向这些僻静的野花丛中去钻。虽然他们也会想到这是冒着砍头的危险的，但是毕竟为了“大利所在”，抑且简直因缘着或种关系，似乎他们也管不了这许多了。

综观上述各情，赤区经济封锁的结果，会使赤区一部分的物资很严重地感受到缺乏的恐慌，也可以说这就是经济封锁政策的一种相对的收获。

(原载《申报月刊》)

妇女国货年





1934年1月1日下午，上海市商会、妇女提倡国货会、妇女节制会、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等团体发起，有四十多家国货厂商参加的妇女国货年进行集会。1933年为“国货年”，但是提倡国货的效果并不明显，考虑到妇女主持家政，发起妇女国货年。典礼结束后，有国货时装表演，还有人写出了妇女国货年歌。与会厂商举行汽车游行，路线拉得很长，观众踊跃。

【战事纪要】

“长征”的名与实

⊙桑学成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过，人类曾经有四大史诗：以色列人从埃及出走、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美国人拓荒西部。但是，它们与长征相比都黯然失色。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

“长征”一词，现在指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的从江西等南方省份到西北陕西等省份的战略大转移。

这次战略转移是从突围开始的，所以开始并不叫长征，而是叫“长途行军”、“突围行动”或者“西征”。其目的是放弃国民党军重兵围困的中央苏区，突围到湘西去，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寻求建立新的根据地。当时根本没有打算要走两万五千里路，更没有想到要跑到贫瘠遥远的陕北去。

那么，突围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呢?这要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谈起。

1934年4月底广昌战役失利后，博古、李德等人就考虑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苏区。5月，最高决策层秘密地开始了突围的准备工作：

——在苏区猛烈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5月至9月，扩大红军近十万人。

——决定高级干部的“走”与“留”。干部的走留，一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主要由博古)决定，党中央机关、政府、共青团、总工会等部门的干部，则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经博古批准。部队人员由总政治部决定，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批准。当时的走与



来自上海的记者在毛泽东长征前住过的房前留影。

留、对每个人以后的命运关系极大。像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着红军行动，都被保存下来，安全到达陕北。而博古、李德不喜欢的干部，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古柏、周以栗等人，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得知被列人“留”的高级干部名单后，去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表示希望能够带他走，张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做工作，但博古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最初，他们连毛泽东也不打算带走，已决定将他派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由于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再坚持，说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创建人，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被允许随军转移。

——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留下中央分局，以项英为书记；留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10月22日，又成立了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领导与坚持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后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同时还留下了红二十四师和八个独立团，共一万多人，加上历次反“围剿”中负伤住院的伤员一万多人，总共留下三万多

人。

中央苏区迅速展开了空前紧急的粮食、草鞋、食盐、棉被、军用器材等的筹集工作，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的物资。据伍修权回忆，当时兵工厂、印刷厂的机器都想带走，“为了拆搬这些东西，实际上作了近半年的准备”。

三人小组寻找并确定了转移的方向。当时担任中央组织局局长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1934 年 7 月、8 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这说明在 7 月、8 月间中央已确定要转移到湘西去。正因为如此，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建议，同其进行停火谈判，并于 10 月 5 日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对后来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埋下了伏笔。

9 月 29 日，《红色中华》刊登了张闻天撰写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文章，表示：“为了保卫苏维埃，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但是，这些准备工作又是很不充分的。

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关系到共产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问题。但是，准备工作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正如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李德片面强调：“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结果，“保守秘密”不但保到高级干部都不让知道，连必要的政治动员也没有，使广大指战员毫无思想准备。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干部尚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甚至许多党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陈毅等，当时都不知道实行战略转移这一重大意图。直到 9 月底，中央苏区已是岌岌可危，这时最高领导者才在政治局和军委作了传达。

在突围的时机上，最高决策者决断犹豫。在广昌战役后，中央既然已经

红军转移后，国民党强迫原苏区的民众参加“铲共义勇军”。



开始准备战略转移，就应毫不迟疑地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可是自6月25日接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后，一面进行转移的准备，一面又要求各主力红军用一切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与敌人拼消耗，使红军继续遭受重大损失。9月初，最高层对打破敌人的“围剿”彻底绝望，才开始部署突围，9月底10月初仓促决定提前出发（原定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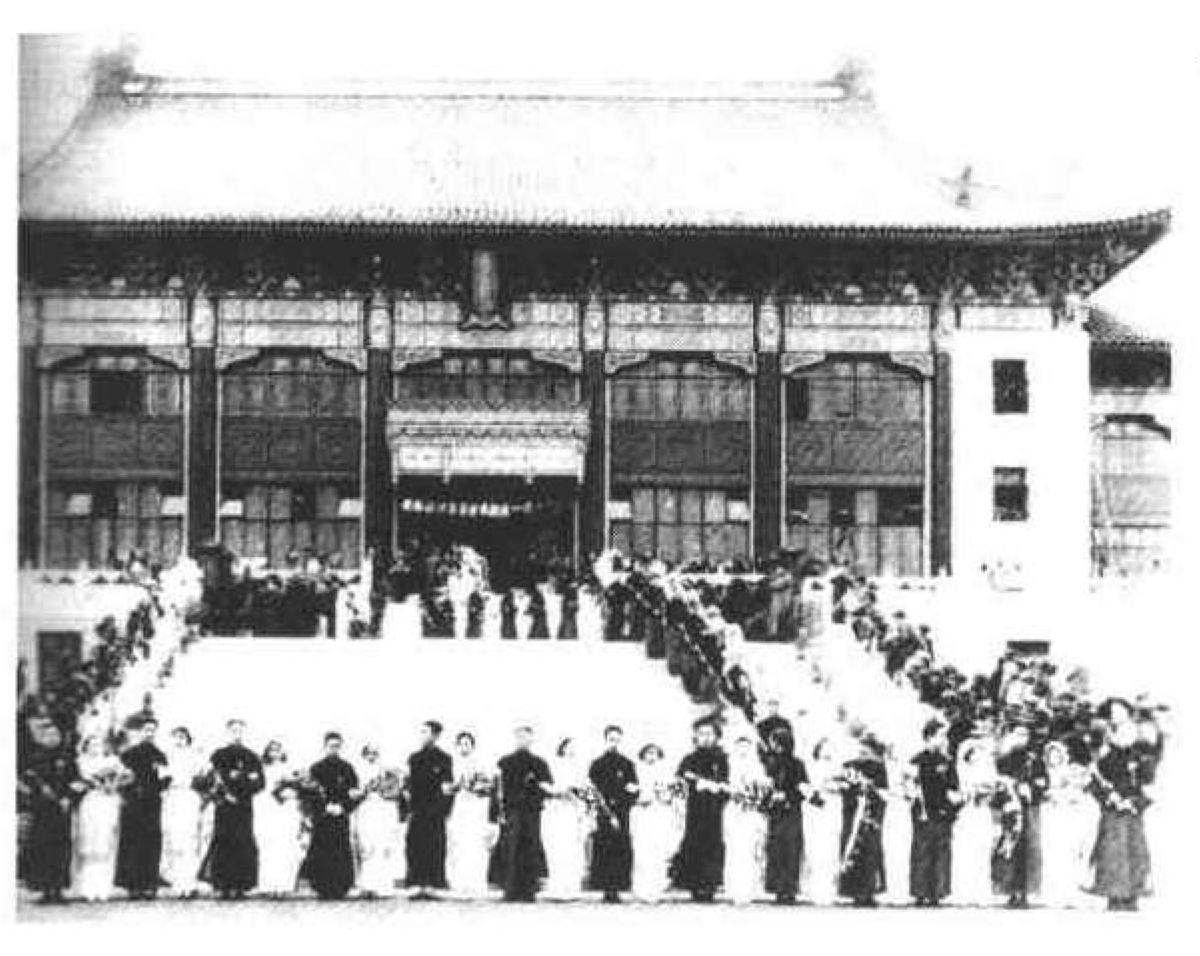
上述可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时，并没有称为“长征”。当时的文献资料一般把红军的突围转移称为“长途行军”、“突围行动”或者“西征”。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呢？据文献资料记载，最早使用“长征”这一概念的是王明，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逐渐在共产党与红军的宣传中统一使用。

1934年11月，也就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一个月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的报告中，谈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时，曾经把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称为“长征”。这是文献资料中第一次把红军的突围转移称为“长征”。但是王明当时仅只是指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大转移，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电讯

联络已经中断，因此王明虽然在莫斯科使用了“长征”这一概念，但是国内正在苦战中的红军并不知道，也未使用这一概念。到1935年9月，红军转战已经一年，行程达二万余里，于是在9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中，第一次把这次战略大转移称为“二万余里长征”。但是，由于这个决定当时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所以“长征”一词并没有能广泛使用。9月22日，在哈达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使用了“两万多里长征”的提法。从此，“长征”一词便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使用。10月19日，即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当天，毛泽东在和部分指战员谈话时，对红军的这次战略大转移作了高度的评价，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概念。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再次对“长征”作了高度的评价。

从此以后，“长征”便成了红军战略大转移的专用名词了。

1934年在上海江湾举行的新式集体婚礼



上海江湾集体婚礼

【战事纪要】

漏风的包围圈

⊙桑学成

一、红军与陈济棠的密约

1934年10月21日夜，红一方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路途上，一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动40万兵力，几十架飞机，采取围追堵截的战术，企图彻底消灭中央红军。曾经被蒋介石形容为"钢铁封锁线"的第一道封锁线，是由碉堡群筑成的，由广东的部队防守。这些碉堡群大都建于公路两旁、重要路口和山头，堡垒之间可以互相策应。碉堡多以砖石砌成，根据地形分成一二三层不等。平时，守军扼守在碉堡内，有无数枪眼可向外射击。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差，这些碉堡对红军的军事行动构成极大威胁。当地群众称它"乌龟壳"。但红军突破这道封锁线时并没有经过大的战斗，这其中的秘密是蒋介石预料不到的：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曾与陈济棠互派代表，进行了秘密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

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1907年进入广东陆军小学，1913年毕业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1921年转入粤军第一师，历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以后逐渐发展。1931年，陈济棠扩编所部为第一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并接管驻广东的海、空军，兵力达15万人以上，成为广东的统治者。他与蒋介石之间一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陈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居心叵测。蒋介石在镇压了十九路军后，屯兵闽南，对广东虎视眈眈，并以重金收买他的部下，陈甚为不满。他深刻懂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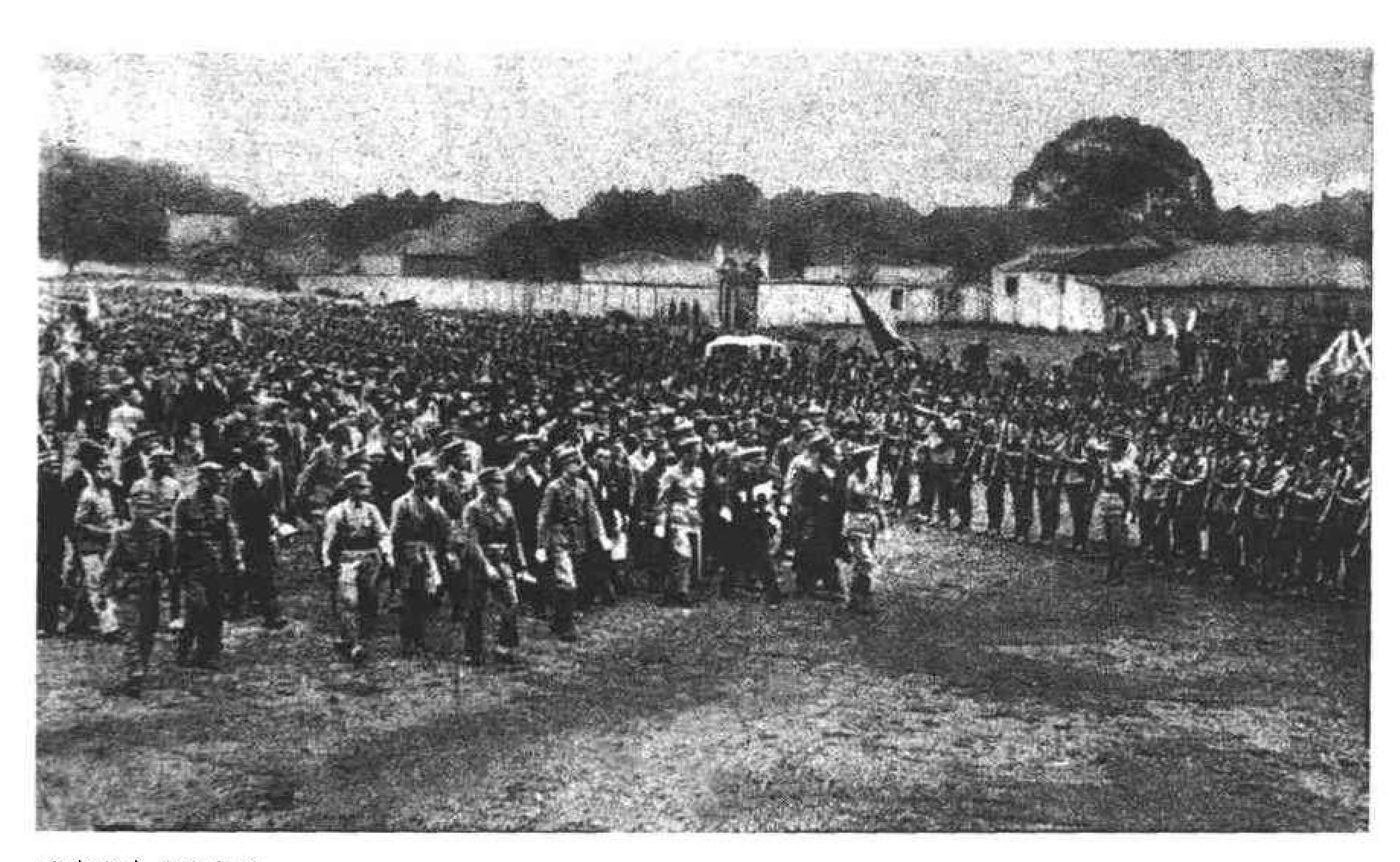


参与围攻红军行动的粤军余汉谋部

蒋介石要他进攻红军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所以表面上摆出一副进攻红军的架势，暗地里却派人前来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

1934年7月间，陈济棠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表示赞成中共在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诚恳提出："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吾等当无不欢迎。"又晓以利害：日寇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增兵于赣闽，福建事变，可为殷鉴，"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蒋各项准备工作"、"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等五项建设，及"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的提议。

10月5日，红军代表何长工、潘汉年同陈济棠代表扬幼敏、黄质文、黄旭初在江西寻邬县罗塘镇进行了秘密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第一，双方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第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因无线电不保密）；第三，解除封锁，互相通商；第四，红军可在粤北设后方医院；第五，必要时可



陈济棠在检阅部队。他命令部下偷偷给红军让路。

以互相借道，红军行动前将所经过的地点告诉粤军，粤军后撤四十华里，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西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谈判期间，周恩来给我方代表发来了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陈济棠代表杨幼敏很敏感，问何长工："是不是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机智地回答说："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但此时，何长工和潘汉年都明白，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已经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根据同陈济棠的代表秘密谈判达成的"互相借道"的协议，1934年10月21日中央军委下达突围命令后，红军总部派人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要借道。陈济棠执行了秘密协议，在红军行动方向上，让出了一条四十里的通道。红军未经大的战斗，在短时间内即安全通过陈济棠防区，向湘南挺进。

二、湘桂边境的"开放"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广西。蒋介石了解到红军西进的动向后，当

即打电报给李宗仁、白崇禧，要广西无论如何一定要和湖南的何键以及南京派来追击的中央军周浑元、薛岳等部，合力夹击红军于湘江以东。蒋介石答应如果取得胜利，将委派李宗仁、白崇禧为黔桂绥靖正副主任，同时答应立即拨给开拔费100万元，所用弹药，实报实销。这是蒋介石一箭双雕的锦囊妙计，即趁追击红军之机，顺便兼并或削弱各地方实力派，以实现其"统一"西南的计划。他把嫡系摆在北面，企图把红军向南压，一直压到广西境内，使红军与桂系决战，拼个两败俱伤，然后乘虚进入广西，以坐收渔人之利。

当时的广西，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统治之下，在全省推行所谓"三自政策"（即自卫、自治、自给）和"三寓政策"（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鼓吹大广西主义和排外思想，对蒋介石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老于谋略的李宗仁、白崇禧对蒋介石的这些把戏，洞若观火。尽管他们极其仇视共产党，但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保存自己。

11月上旬末，桂系接到蒋介石要桂军在湘江堵击红军的电令后，立即在南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谋商对策。当时，白崇禧对红军的动向，判断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三是攻打四川，占领这个"天府之国"。这三种可能性中，以第三个可能性最大，因为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又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是共产党立足最理想的地方；第二个可能性次之，因为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第一个可能性最小，白崇禧自以为广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不至在此久留。根据这三种可能性分析，李、白判断红军只是路过广西，并不打算在广西立足。那么，是否在湘江堵击红军呢？他们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红军有十万人马，来势凶猛；广西只有两个军、五个师、十六个团，共两万余人。以两万人去堵十万人，弄不好会被红军消灭。即使不被消灭，也会两败俱伤。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会以追击红军为名，乘虚而入。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广西既要反共，又要防蒋，对红军"只能追击，不能堵击"。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李宗仁、白崇禧决定采取以下对策：一是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广西完全有决心有力量在广西境内堵截红军，一定要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同时，请蒋介石约束"中央军"不要进入广西，目的在于确保桂系的地盘不被侵占。二是由白崇禧在12月上旬广西省政府举行的大会上，公开宣布他要到全州去，并说明他对红军动向的三种判断，把"军事机

密”公开出去。当时就有人背后议论说：“白副老总（指白崇禧）是个军事家，为什么把‘敌情判断’在公开场合中宣扬呢？”有人立即回答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白副老总的话，是讲给蒋光头听的。”第二天，白崇禧带着高级参谋刘斐到杜北去视察前线，并在那里接见了何键的一个军长刘建绪（此人和蒋介石有直接关系）。据说白见到刘建绪的时候，也曾把他对红军的判断，告诉刘建绪，并诡称准备对红军迎头痛击，其目的都是要蒋介石不要打广西的主意。三是立即调兵遣将往桂北布防，摆出决战的架势：这样做一则可以应付蒋介石，二则让红军知道，广西早有准备，不要轻易进入广西。如果红军过境势不可免，就将部队摆于南侧，让出桂北一条路，给红军通过，但决不能让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在红军经过时，可以相机进行侧击和追击，迫使红军尽快离境。白崇禧还亲自对桂军第七军军长廖磊交代：必须在湘桂边境，沿线构筑防御工事，对红军只宜“追击”，不宜“堵击”，对“中央军”就必须堵截。他们认为这样做既可以相机打击红军，还能应付蒋介石，是保存实力和地盘的妙计。红军突破粤湘边境后，白崇禧眼看红军过境势不可免，在面临和红军决战的重要关头，他本着事前的既定方针，认为让路时机已到，遂命令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灌阳至永安关只留少数兵力，全县完全开放，第七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这样，在灌阳以北，留下了一条东西向的通道。红军主力旋即轻而易举地越过湘桂边境的灌阳、永安关、文市、石塘，沿桂北直趋贵州。何键因为湖南是他的老巢，所以他用猛烈的炮火，“欢送”红军快快出境。

蒋介石原想压迫红军进入两广，所以在贵州并无军事部署，因此红军如人无人之境，急风骤雨般地往来川黔各地，最后直趋贵阳。蒋介石坐镇贵阳，大唱“空城计”时，又急电桂系廖磊部飞速救援。廖复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叹气说：“这简直是外国的军队了。”

【战事纪要】

孙殿英兵败宁夏

⊙李　风

一、矛盾的命令

1934 年中国有一场残酷但又无聊的内战，那便是孙殿英所部进攻宁夏的战争。

孙殿英，字魁元，河南永城人，他集无赖、赌棍、毒品贩、土匪和军阀等角色于一身。1928 年 7 月上旬，孙殿英率部炸开慈禧太后和乾隆帝的陵墓，盗走大量珍宝文物，全国哗然。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时，孙站在冯、阎一边。他亲近阎锡山，与阎部各军长结为盟兄弟。

1933 年初，日军南下，进攻长城一线。2 月下旬，应北平军分会令，孙殿英奉调率部从山西晋城北上驰援热河，在赤峰与敌相持七昼夜，获得了舆论的褒扬。5 月，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举起抗日旗帜。孙殿英正好驻扎在居庸关外新保安一线，成为南京政府军与抗日同盟军间的缓冲，孙殿英见在冯蒋之间难以自处，便离开是非之地，去了包头，那里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阎锡山深知孙殿英桀骜不驯，向蒋介石保荐孙殿英出任甘宁青三省屯垦督办，正担心孙殿英加入抗日同盟军的蒋介石，即委孙“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一职，让孙移军西开。孙殿英的军队正欲得一块地盘，开创独立的局面，对蒋的任命，当然欣然接受。

踌躇满志的孙殿英派人去天津大批购买军火，在冀察热等地广招兵马，添练骑兵，意在向西北发展。本来，孙殿英部仅有步兵一师共七个

向西开拔的孙殿英部



孙殿英军经固城西庞垛口村迁防。



团。9月，孙立即率部开发，准备经宁夏开往青海柴达木屯垦。所部拥有骑兵三师二旅、步兵三师，总兵力在四十一个团以上，号称七万之众。阎锡山更是送粮接济，补充子弹，礼送出山西、绥远一带。

孙殿英率部进到绥远省的五原、临河等县(今内蒙属地)，已有夺取宁夏不再去青海的念头。在孙殿英眼里，宁夏的马鸿逵不过是个公子哥，宁夏兵力单薄，而且西北诸马之间平素不和，占领宁夏正其时也。

11月下旬，孙部遂由五原西进，12月上旬到达宁夏省的磴口县附近。西北形势骤然紧张。

二、孙殿英下野

孙殿英部西进的消息震惊了甘、青、宁诸省，西北地区久属马家天下，马麟主青海，马鸿逵主宁夏，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兼靖绥主任，节制三省军务。孙殿英部以一个师的军饷供养七万多人的庞大军队，这样的军队对路过地方的索求可想而知，何况孙殿英的狼子野心已经是路人皆知，引起西北上下一片恐慌。其中利害最深的自然是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他深知孙军过宁夏，必发生一次恶战，将来宁夏的主席，不是马鸿逵，就是孙殿英，全要以战争的胜败来决定。如果孙殿英占了宁夏，马麟也不能安居青海。面对虎视眈眈的孙殿英，这时西北四马终于感到，如不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孙，对他们全都不利。因此，决定用全力来进行抵抗。马鸿逵、马麟、朱绍良先后通电反对孙军西来，并调兵三旅布防磴口，严阵以待。

孙率部至五原、临河、陕坝(今杭锦后旗)，暂停前进，一面休整、练兵，补充给养，收编绥西骑匪杨猴小部。官兵衣单粮缺，手足冻裂，孙殿英公开向蒋介石警告，处此绝境，若再被阻，天寒地冻，风雪交加，无衣无食的军队很可能发生意外。阎锡山担心孙军滞留绥西，危及晋境，许以军械、粮饷，促他早日西去赴任。

当时，双方的兵力悬殊。马鸿逵有十五路军和前来配合作战的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马步青的骑兵师第一旅以及马步芳的三个旅，总兵力约四万余人。孙殿英的四十一军有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炮兵团并且在西进途中又招兵买马，总兵力约七万余人。显然，孙殿英的实力远远超过西北诸马。孙部抵五原等地后，又得到阎锡山的物质支援，补充了军需品和粮草。孙殿英的《告西北同胞书》对马氏集团大加抨击，称“彼辈把待地盘，残暴不仁……”制造舆论，企图动摇马氏阵营。他鼓励部下获取西北三宝而成富翁，所谓三宝：“黄为砂金，白为白面，黑为鸦片。”但他的军队缺少真正的军事人才，军中土匪众多，而且没有大炮，攻防都只能依靠当地防蒙古马贼的寨墙作掩护。更怪的事情发生了，南京政府看到西

孙军虽多,但战斗力不强。



宁夏城外的大礼拜寺变成了废墟。



房屋被炸毁的平民无家可归。



北四马一致合拒孙殿英，不让过宁夏，遂命令四马阻截孙部西进。因此，孙马双方接到的都是南京政府的命令，而命令本身却又是自相矛盾的。

1934年1月初，孙殿英部进入宁夏，前进顺利的原因，是借了一个有利条件，即由平罗直通省垣的唐来渠到了冬季水干，孙军即由渠中进军，两面的堤埂，作了他们的掩护，因此毫无抵抗地一直挺进到省城附近，一星期内接连攻占石嘴子、五响堡和馒头桥，包围了平罗，兵临宁夏县(即今银川市)城下；接着又占领了宁夏城外的两道堤岸。1月下旬，孙调集主力架云梯向宁夏省城爬攻，马军以机关枪扫射，双方死亡颇众。马鸿逵向南京蒋介石、北平何应钦及甘肃朱绍良告急，朱绍良编就援宁三纵队分路出发进援宁夏，并派飞机对孙部俯冲轰炸，战事骤然紧张，甘宁青三省六师兵力集中作战。何、蒋先后下令双方停战。蒋介石命何应钦停发孙部军饷、给养，要庞炳勋等劝告孙殿英解甲归田。孙不甘束手就退，令所部作战到底，并四出求援，派人分头同汪精卫改组派、陈济棠广东派、福建人民政府、陕西杨虎城以至伪满拉关系。2月5日，南京政府免孙殿英本兼各职，行政院亦免孙殿英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兼职，将青海屯垦督办公署撤销。北平军分会还决定，如果孙再度抗命，就由晋绥甘宁青五省共同出兵彻底解决孙部，派人赴晋磋商假道，催促晋绥两省部队向宁绥交界出兵，尾击孙军。阎锡山也表示与南京态度一致，出步兵二师，骑兵一师，炮兵二团及特种部队若干，循黄河岸向南压迫，以傅作义为总指挥，与甘宁青各军联合对孙实行围攻。孙殿英被下令免职，其主力部队仍在宁夏省垣以北结集，时向城垣猛攻，因军队死亡甚多而粮饷不继，收编的土匪杨猴小及王英等部先后溃散。

庞炳勋、戢翼翘等为息事宁人劝孙离军，以期和平解决。何应钦决定派富占魁往磴口晤孙，富于3月10日抵磴口。谁知到孙军中数日，孙并无与富会商的诚意，晋军王靖国、赵承绶等部即出发临河，准备攻孙。甘宁青各军亦采取联合战略，南京政府的空军负协助的责任。

3月14日，晋绥军与孙军卢丰年部接触，战事甚为激烈。不久，孙军内部开始溃散，彭振国旅即行投降，士兵已无斗志，而各路继续前进夹攻。17日下午晋绥军占领磴口，孙部向石嘴子溃退，而孙殿英仍无离军意，但所属各部纷纷派代表向晋绥军等接洽投诚，孙知事不可为，22日

孙殿英



黯然离开军队，前往太原会晤阎锡山，经商谈决定由阎向北平军分会提出几项条件：保留孙军分会委员之职；孙不再过问部下之事；孙暂居山西。30日，何应钦致函孙殿英，称“此次毅然解除兵符，具见为国忠，对友诚，极佩。吾人对国家只要抱定忠诚，不患无报国机会”，表示对孙个人决不咎既往。4月初，孙军残部在磴口、石嘴子附近者由傅作义收编成三旅；其在宁夏、平罗者由朱绍良等收编。孙殿英下野后住在太原晋祠。5月，何应钦给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高等顾问的虚衔。两年后，孙到平、津向各方活动，后经宋哲元提携，于1936年6月被委为察北保安司令。

这场内战暴露了中国政治的许多问题。对战争的发生，南京政府应负始作俑者的责任，它对孙殿英的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任命颇欠考虑，孙殿英的好勇斗狠的军阀本性使这场任命酿成一场军事冲突。这场战争来得突兀，宁夏人民受尽蹂躏，死伤于炮火中的无辜百姓无数。大量牲畜、农具、米粮、财物、房屋被破坏，损失总计达两千多万元，耽误农业生产的土地，计有近百万亩。

【战事纪要】

庐山军官训练团

⊙郭兴强

庐山军官训练团因其办团地点而得名，全名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于1933年7月在江西庐山创办。

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和工农红军的“围剿”不断遭到失败，致使国民党内深感有必要改变过去的“剿共”方针，以“增进剿匪军效能”。蒋介石在检讨其军事、政治失败的同时，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有关高级军事将领的建议下，于是有了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缘起，以轮流抽调参加“围剿”红军的北路军所属各部队的中下级军官入团训练。庐山军官训练团最初由陈诚任团长，后改由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改任副团长兼教育长，总教官杨杰，战术主任教官王俊，射击主任教官李明灏，筑城主任教官林柏森，通讯主任教官王景録，卫生主任教官陈辉，政治主任教官朱怀冰。

训练团1933年7月创办之初，计划共训练三期，每期半个月。第一期学员为3000人，均为北路军上校以下、少尉之上之中下级军官，其人员抽调方法：由每团派团长或中校团副1人，营长1人，营副1人，连长4人，排长13人；各师旅部中下级军官酌量派送。

蒋介石亲自批准制订的《庐山军团训练团章程》，共计十三条，就办团宗旨、训练时间、选派学员、训练课目等均有详细规定，并函请了以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为首的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帮助进行军事教育和政治训练。训练团规定学员必读必修的课程主要有《剿匪军官须知》、《剿匪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匪军战术要点和我们的对策》、《剿匪部队训练要旨》、《剿匪手本》、《剿匪要诀歌》等，这些课程设置严格按照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

蒋介石在庐山训话。



坐在检阅台上的蒋介石(右)。

治"的主旨执行，向受训学员灌输军人精神教育。即恢复军人的精神，发扬中国的国魂，创造军人及中国的新生命，建立中国军队整个的灵魂，以信仰主义为军人成功立业之基本，救国先救国魂，攘外必先安内；应以智仁勇为训练的基本精神，信仰并实行三民主义，是军人精神之真实表现。

在军事训练上训练团也有独特之处。所有军官不论官阶大小，均为学员，接受统一训练方法，废弃以前各派系地方军队训练方式，尤其注重基本技能与战术的训练。强调统一指挥，强调军人必须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与精神，在战术上提倡要取守势，在战略上要取攻势，以命令为生命的指南。要注意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脚到，减少逃兵、病兵。应明了党旗、国旗、军旗是军人的生命和精神的寄托。军事训练上仍旧是以政治灌输统治军事训练。

训练团初建时，蒋介石亲自选定庐山五志峰下海会寺地区为团地，并耗费巨资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大批房舍，包括大礼堂、办公厅、学员宿舍、教官宿舍、仓库、蒋介石官邸，以及大操场、运动场、游泳池等，同时还占用了白鹿洞书院的房屋，供军官训练团使用。为了便于军官训练团活动及保卫安全，专门修建了牯牛岭经含鄱口至海会寺的大道，连接修筑了九江至星子、星子至德安的公路，并与南浔铁路相衔接，组成了环绕庐山的交通网。九江至莲花洞的公路也重新修筑，并把海会寺、白鹿洞、栖贤寺、秀峰寺与九江至星子的公路连接起来，使整个庐山地区如同蒋介石的禁苑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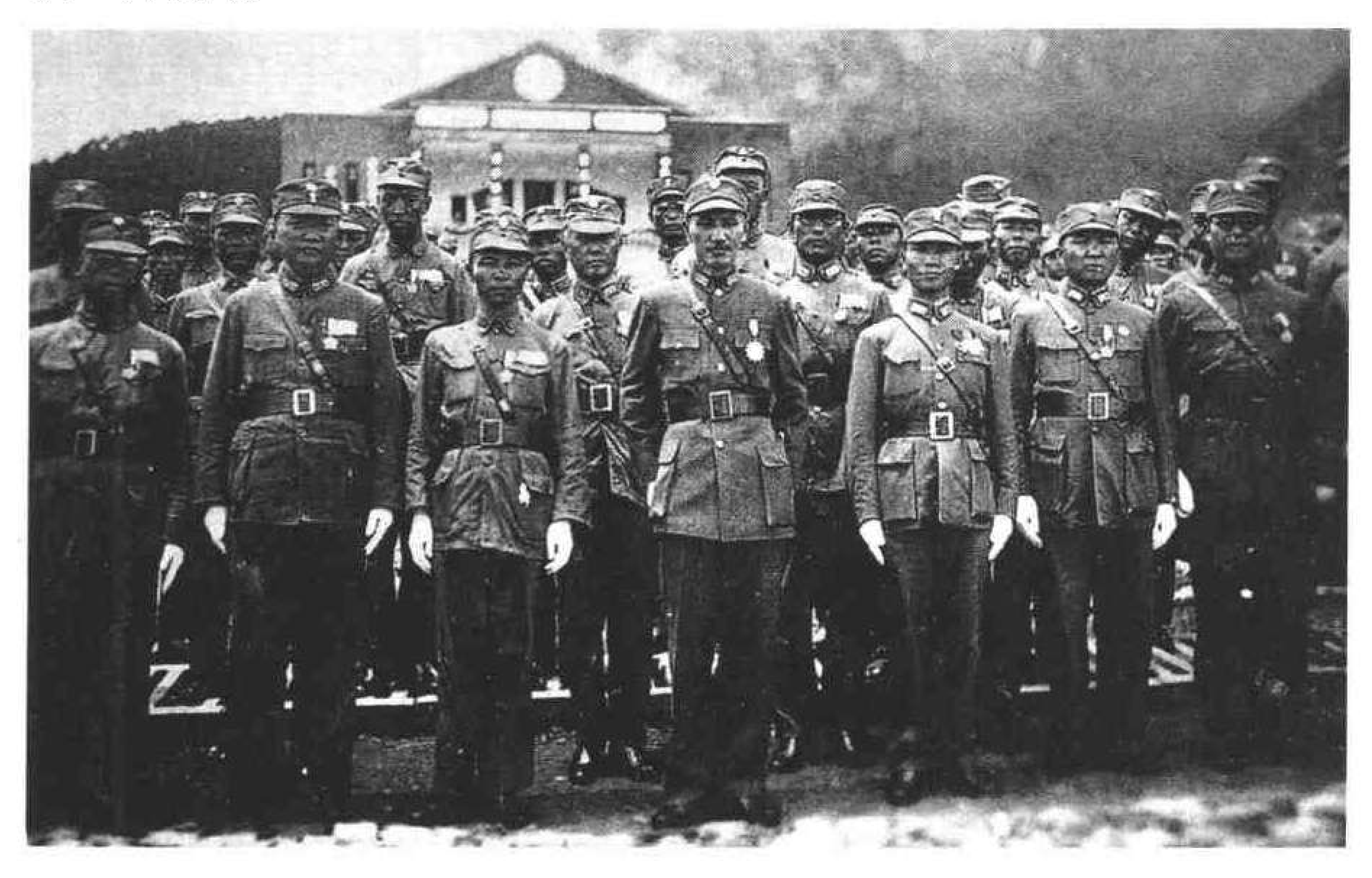
说起来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也有个人的目的。在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上，蒋介石曾训话："第一期国民革命，我们有黄埔军校，取得了北伐革命的胜利；第二期国民革命，我们有军官训练团，必须夺得剿匪军事的胜利。"众所周知，蒋介石通过办黄埔军校，建立起了效忠于自己的中央军，以校长的身份，以师生关系维系嫡系部队。而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亲自兼任团长，与受训学员建立了师生关系，以一种亲近的私人关系控制非嫡系部队。在训练团内，蒋介石安插有亲信特务于各班，了解受训人员的生活及其个人历史，从事分化瓦解工作。在受训人员中，灌输"力行主义"、"杀身成仁"的思想。为了培植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蒋介石不惜亲自出马，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要求每个学员努力"完成安内攘外复兴民族的大业"。庐山军官训练团每期的开学和毕业典礼，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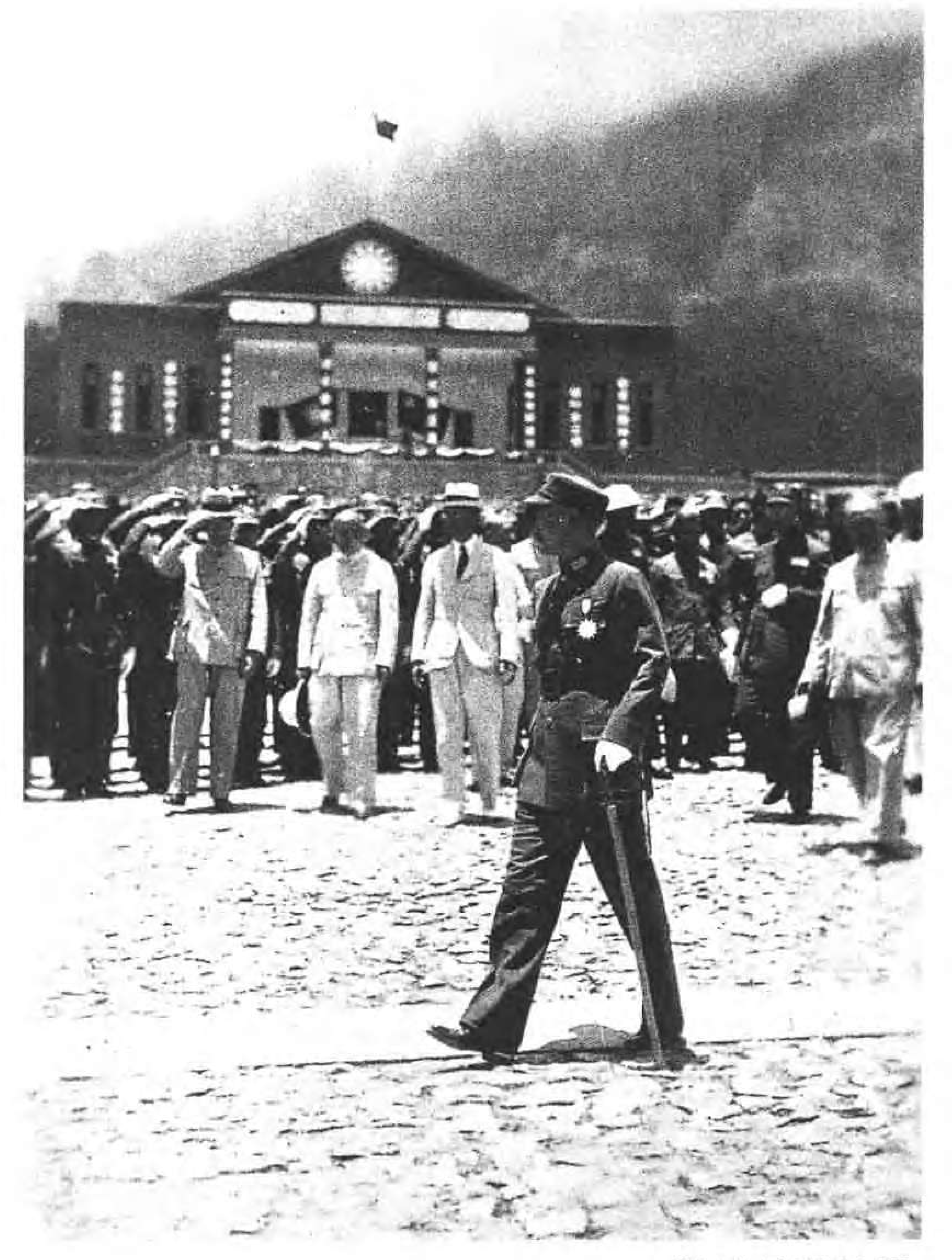
介石必到场训话。他的训话总计有58次，其中对有关剿匪的意义讲得最多，他要求受训学员"提高自信、信任、信仰的精神，打破畏匪心理，增强战斗精神。剿匪须注意基本动作、基本生活条件的训练，养成敬重命令的习惯，使全军信仰惟一主义、惟一统帅，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庐山军官训练团从第二期起，又调集了军队的高级党政人员开办了党政人员训练所，蒋介石还亲笔为党政人员题词训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望我政治宣传各同志刻苦耐劳，坚定工作，忍辱负责，打破目前之难关，完成剿赤之使命。"军官训练团后来扩展到高级军官参加受训，并进而扩充了军政党教人员参加。为了精心培植起与学员的私人感情，训练结束时，蒋介石都要亲自接见，并对某些学员给以个别训示，有时还要区别不同派系，私下施以金钱、许诺官位进行收买。

庐山军官训练团1933年共办了三期，7598人受训；1936年三期，8132人受训；1937年三期，9311人受训，共计训练军官学员25041人。1933

蒋介石与军官合影。





蒋介石接见受训的地方官员。

蒋介石和他信任的助手陈诚一起检阅军官团。



年党政人员训练所，训练地方党政人员11917人；合作人员训练所，训练了13700人；县长训练班，参加受训的县长为570人；1937年又举办了党政军教人员混合训练班，参加受训学员14000人。以上共计训练各类人员40187人。

抗日战争期间，庐山军官训练团迁至重庆北碚、四川峨嵋山等地，改变名称，分散设立。

刘半农(1891—1934)

刘半农，名复，江苏江阴人。1912 年去上海谋生，先后在《中华新报》、中华书局任职，发表了《玉簪花》、《髯侠复仇记》等小说，被视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作家。

1917 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参与新文化运动，与钱玄同一起在《新青年》上合演双簧。钱化名王敬轩写信给《新青年》，提出旧派的各种观点，刘则写《奉答王敬轩先生》一文痛加驳斥。他首创了“她”、“它”两字的用法。他的白话诗很明快，著名的有《学徒苦》、《卖萝卜人》和《叫我如何不想她》等，多收于《扬鞭集》和《瓦釜集》。他还热衷于征集歌谣，开创了研究民间文艺的先河。

1919 年 4 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成立，他被推选为会员。会后不久，刘出国留学。初至英国，入伦敦大学的大学院。1921 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后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1926 年刘任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又兼任师范大学讲师。1928 年，他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29 年春，任辅仁大学教务长。1930 年 5 月，兼任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在 1929 年至 1930 年间，他利用从国外带回来的仪器在北大布置起了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在魏建功、白涤洲等协助下，用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做材料，记录了七十多处方言。



刘半农(前排右起第二人)

1934年瑞典地理学会为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岁生日,向刘征文,刘准备写一有关自己专门研究方面的东西来纪念他,遂利用暑假时间,沿平绥线去调查西区方言。他们在短短二十余日内,跑遍数十县,除记录方音,还收集了不少民歌。但刘不幸染上了回归热,医治无效,于7月14日去世,年仅四十四岁,葬于北平西郊香山之玉皇顶。墓志铭对他的性格外貌有传神的描绘,照录如下:

> 君状貌英特,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至中年不少衰。性果毅,耐劳苦,专治语音学,多所发明。又爱好文学,美术,以余力照像,写字,作诗文,皆精妙。与人交游,和易可爱,善诙谐,老友或与戏谑以为笑。及今思之,如君之人已不可再得。

(枫林)

李石岑(1892—1934)

李石岑,哲学家,《教育杂志》主编。他是湖南醴陵人,原名邦藩,字石岑。早年留学日本,前后八年,在日本时,他因不满日本通讯社操纵东亚舆论,与曾琦等十八人发起组织“华瀛通讯社”,逐日排印稿件,以供国内报纸刊载。1919年他主编“学术研究会”(1916年成立)的会刊《民铎》,长达十一年。1920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院校,回国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这是五四时代最出名的学术副刊之一。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主编《教育杂志》,同时在复旦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大学等大学讲学。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1928年夏,他再度到法

国、德国留学，研究哲学。他以前极推崇尼采的超人哲学，但游欧后，倾向于新唯物论，曾与郭大力合译《郎格唯物论史》。1930年底回国，在中国公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担任过哲学教授。1934年10月28日，在上海病逝。李石岑平日爱游泳，他的处女作即为《游泳新术》，后来所有的著作都与教育、哲学相关，数量颇丰，有《李石岑讲演集》、《李石岑论文集》、《人生哲学》、《西洋哲学史》等。

（枫林）



徐名鸿(1897—1934)

徐名鸿，广东丰顺人。1919年8月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国文系，曾加人工学会，主持平民教育社和出版《平民教育》。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大学附中教书。1926年南下参加北伐，任第四军第十师政治部主任，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后，继续任军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南昌暴动。1932年任第十九路军秘书长。他与蔡廷锴关系极密切，根据他的建议，蔡秘密成立一个叫“改造社”的组织，蔡任总社长，徐名鸿任书记，以对抗蒋介石的“力行社”，防止内部分化。在一个名叫“闽西善后委员会”的机构中，他是实际负责人。福建事变前后，徐名鸿非常活跃，他作为第



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到瑞金与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签订《抗日作战协定》。曾担任第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福建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龙漳县副省长，由于省长未就职，他负实际责任。同时，他还是福建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1934 年福建人民政府解体，他于 2 月 19 日由龙岩化装潜赴广东大埔，途经三巴河口时被捕，陈济棠令黄任寰予以就枪杀。2 月 25 日，徐名鸿就义。死前遗书，一致国人，一致家属，要求葬在汤坑，并请蔡廷锴书写墓碑"社会主义者徐名鸿之墓"。

（枫林）

伍朝枢(1887—1934)



伍朝枢，广东新会人，生于天津，民国老资格的外交家。其父伍廷芳是清末的外交家和民初的司法总长，也是他政治与外交生涯的领路人。

伍朝枢十岁随父亲到美国，接受西式教育。他对法律有兴趣，获得过英国伦敦大学法学士学位。后进林肯法律研究院，取得了大律师的资格。民国建立后，他被选为首届国会议员，参与宪法起草。

1917 年南北分裂后，伍廷芳、伍朝枢父子一直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帮助孙中山办理外交。两人分别出任孙的外交部长和次长，父子搭档共掌一部的情形实为罕见。1922 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伍氏父子坚决站在孙的一边。不久，伍廷芳病逝，伍朝枢为父办理丧事之后，转赴上海。

1923 年 3 月，孙中山重回广州，任伍朝枢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外交部长。他支持孙中山截留粤海关关税余款的决定。国民党改组后，他

担任商民部长，并奉孙中山命，赴天津和沈阳会见段祺瑞和张作霖，商讨建立三方反直联盟。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伍朝枢任国民政府委员、司法委员会主席兼广州市政厅委员长。这期间，伍朝枢同胡汉民、吴铁城等保持密切关系，被视为国民党中的右派成员。"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据说与伍朝枢等有关，但此事件导致蒋介石控制广州局势，而与伍关系较密的汪精卫、胡汉民被迫离开广州的权力中心，蒋介石还逮捕第十六师师长吴铁城，伍朝枢等为吴向蒋缓颊无效，告假离粤，经香港回上海寓居。因此，伍朝枢与蒋介石的关系较冷淡。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9月，伍朝枢被委为外交部长。伍为争取各国承认国民政府，声明对于列强在华利益"不采暴动手段"。192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伍与胡汉民、孙科均下野，同往印度、埃及、土耳其及欧美游历。1929年1月任驻美国公使。伍多次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在华的领事裁判权，遭到了拒绝。翌年在参加国联第十一届大会时，被选为国际联盟行政院理事。

1931年宁粤分裂，伍朝枢闻讯离美回广州，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琼崖特别区长官。宁粤双方和谈后，伍朝枢为粤方代表之一，他的住宅成为双方会谈的场所。双方达成妥协后，伍朝枢出任为司法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但他未就职，连广东省政府主席也一并辞去。1934年1月8日，在香港病逝。

（枫林）

邓泽如（1869—1934）

邓泽如，广东新会人。少时家境贫寒，后赴南洋新加坡、马来亚谋生，靠种树胶、经营锡矿致富。为人谦厚诚恳，交游颇广。因在海外受不平等待遇，反清意识强烈。1907年加入同盟会，负责在南洋筹款。从镇南关、钦廉、河口到武昌等反清之役，革命党人的费用多赖南洋筹集，而邓泽如出力为多。黄兴称："以言南洋爱国之士，吾必以邓君泽如为巨擘。"1912年，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邓泽如护送孙中山夫人卢慕珍经香港到南京。1918年，应孙中山之邀回粤主持矿务，任矿务局局长。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



邓泽如往香港，并设法筹款，接济孙中山军费。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本营，邓泽如任建设部部长、两广盐运使，不久与廖仲恺等会商国民党改组问题，成为九名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年底，以往很少发表政见的他与林直勉等一道反对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政策。1924年1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泽如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并连任四届。6月与张继、谢持等再次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此后，他还在财政上支持西山会议派反共。1927年4月，他又与吴稚晖等十监委联名提案，弹劾共产党，为国民党"清党"的舆论先导。1929年后，他很少过问政事，形同退休。1931年以后，他联合其他三名监察委员，为胡汉民被拘禁一事，弹劾蒋介石。后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广东治河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34年12月27日，死于广州。

（枫林）

吉鸿昌(1895—1934)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县吕潭镇人。十八岁投笔从戎，入冯玉祥部当兵，南征北战，勇猛果敢，深受冯玉祥器重。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升任第十九师长。十九师攻无不克，所向披靡，享有西北军中"铁军"之美誉。后任宁夏省政府主席、陆军第三十军军长。1931年被南京政府解除军职，强令出国"考察实业"。在国外，他胸前佩着"我是中国人"的牌子，沿途宣传抗日。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吉闻讯兼程回国。同年政治观念大变，加入中国共产党，率旧部投奔苏区未果而避居天津。

1933年5月，日军侵占热河、察东，华北告急。吉毅然毁家纾难，重聚旧部，同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6月，出任

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进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7月7日，直捣日军在热察的军事重镇——多伦。多伦城池坚固，敌人火力凶猛，进攻受阻。吉身先士卒，袒臂冲锋在前。同盟军里应外合，终于收复了沦陷七十二天的多伦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首次攻克日军据点，因而张家口军民为此举行盛大庆祝会，全国各地爱国团体也纷纷驰电祝捷慰问。同年9月，在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同盟军弹尽粮绝而失败。吉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后在押解途中逃脱，潜赴天津，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任“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主任委员，创办《民族战旗》杂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1934年11月，吉在天津租界被国民党特务诱捕。24日，在北平陆军监狱的刑场上，以树枝为笔，大地为纸，写下了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喝斥刽子手搬出椅子来，说：“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死了也不能倒下。”坐下后，又回头厉声说：“到前面开枪去，我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怎样打死我！”时年三十九岁。

（张加华）

【本年要录】

1月1日　浙赣铁路杭州玉山段通车。

8日　张学良回国到达上海。

13日　开滦煤矿工人罢工。

15日　十九路军退出福州等地,福建人民政府失败。

20日　国民党四中全会召开。

2月1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下令统一度量衡制

6日　新疆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被马仲英部摧毁。

19日　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新生活运动"开始。

3月1日　"满洲国"改国号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成为"皇帝",年号"康德"。

20日　孙殿英进攻宁夏失败下野。

4月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婚姻法》。

17日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意欲独霸东亚和中国的声明。

21日　蒙古自治委员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

5月21日　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召开。

6月8日　日本副领事藏本失踪,南京军警全城寻找。

9日　《图书杂志审查办法》颁布,规定一切图书杂志付印前须经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删改。

10日　马仲英战败赴苏联,新疆战事结束。

14 日　电影《渔光曲》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荣誉奖。

30 日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海关进口税则》，并电令各海关于 7 月 1 日起一律实行。

7 月 1 日　平沈通车实现。

1 日至 11 日　上海市商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反对新税则，要求国民政府收回成命。

13 日　上海申新纺织公司陷入危机，荣宗敬辞职。

8 月 1 日　宋庆龄发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公布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9 日　红四方面军击败四川军队的围攻。

27 日　南京等地同时祭孔。

本月初　河北长垣一带黄河决口，淹没 50 余县，受灾人数高达 2000 多万。

9 月 1 日　紫金山天文台建成。

24 日　中国红十字会召开首次全国代表大会。

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出版。

10 月 10 日　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

中国兴业银行倒闭。

19 日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盗换故宫珠宝案被法院起诉。

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

11 月 1 日　导淮河入海工程在清江浦行破土动工。

13 日　报业资本家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政府特务暗杀。

15 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

国民政府宣布实行保甲制度。

12 月 3 日　伪满政府民政部发布《集团部落建设文告》，大规模推行归屯并户。

10 日　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30 日　鄂陕湘联络公路正式通车。